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人物

贵  
贵士名贤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士名贤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 3.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8592-1

I . K820.873.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V0T994 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人物

## 贵士名贤

GUI SHI MING XIAN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唐 博  
装帧设计 陈 电  
责任印制 尹晓蓓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1-18592-1  
定 价 7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 《贵士名贤》编委会

主 任 刘丽先  
副 主 任 段 洪 魏玉玲 陈起荣  
成 员 曾 军 李冬生 文 军 曾一崧  
李正常 韦俊帆 周恒屹  
指导专家 史继忠 郑荣晴 郭千里 王任索  
彭文俊 刘贵新 兰道宇

## 《贵士名贤》编辑部

主 编 史继忠 刘丽先  
执行主编 段 洪 郑荣晴  
副 主 编 曾 军 曾一崧  
撰 稿 史继忠 严进军 何 京 陈泽渊  
王春霞 曾 军 郑荣晴 赵 青  
梁茂林 钟子易  
编 辑 李冬生 文 军 秦安阳 韦俊帆  
李正常 陈洪梅 夏 丽 安 妮  
钟 涛 方俊杰  
图片提供 陈季贵 陈泽渊





#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砧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 26 度、平均海拔 1100 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景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 22.3℃、相对湿度 76% 至 79%，最佳

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1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3米，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我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驼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前行、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



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巅，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延绵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玫瑰冰粉沁人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却能在每碗蘸水

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马嚣，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



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 编写说明

《贵士名贤》是《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组成部分之一。本书力求史料真实可靠，语言生动朴实，融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既注重历史的严谨性，又突出通俗读物的生动性的普及性读物。

### 一、编撰要求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简略介绍人物基本情况，着重记叙其主要业绩和贡献，突出人物的特点和亮点。

### 二、收录范围

贵阳籍人物或外籍人物在贵阳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或重大影响的人物；贵阳籍人物在省外、国外，对当地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或重大影响的人物。

### 三、收录时限

收录人物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人物的主要活动或成就发生在近代以前，部分人和事延伸到现代。

### 四、排顺方式

收录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出生时间不详者排于同时期他人之后。



## 目 录

引 言	/ 01
水西彝族女政治家奢香	/ 06
智略兼备的水东女杰刘淑贞	/ 11
崇尚儒业的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昂	/ 15
贵州明代文教鼻祖王训	/ 17
直言敢谏的卫学训导詹英	/ 20
心学圣人王阳明	/ 23
聚徒讲授心学的马廷锡	/ 29
尤精吏治、著作等身的郭子章	/ 32
明代天末才子谢三秀	/ 37
为官润民不润己的潘润民	/ 40
“诗书画三绝”的杨龙友	/ 42
主纂《贵州通志》的著名诗人吴中蕃	/ 46
《康熙字典》首席修纂官周起渭	/ 50
治理台湾的有功之臣周钟瑄	/ 53
能诗善画的武状元曹维城	/ 57
“山水观我”的书画家邹一桂	/ 59
黔中大儒理学大师陈法	/ 62
台南民俗人文的缔造者蒋允焄	/ 65
清廉自持、诗礼传家的周奎	/ 69
骁勇善战的“朱虎”朱射斗	/ 71
一心为官、一心向民的周际华	/ 73

才德兼具的学者诗人傅潢	/ 78
保境安民的台湾淡水同知李嗣邨	/ 81
勤政爱民的云南巡抚张日昷	/ 83
高扬民族气节的天津知府石赞清	/ 87
奉命考察西藏的陈钟祥	/ 90
一生兵戎、著述等身的傅寿彤	/ 94
翰墨昭彰、名重一方的孙竹雅	/ 97
主纂方志杰作《畿辅通志》的黄彭年	/ 100
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李端棻	/ 102
贵州华氏三代儒商	/ 106
政声卓异、独爱贵阳山水的颜嗣徽	/ 111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	/ 113
不以官显、书艺彰名的袁思韡	/ 118
贵州楹联大家刘韞良	/ 120
博雅多能、为官有贤声的罗文彬	/ 123
选派贵州学子留日的巡抚林绍年	/ 126
雄直清刚、学问博通的陈田	/ 130
多学博才的陈矩	/ 132
滇缅边界勘界大臣陈灿	/ 135
不随流俗的何威风	/ 139
以书法闻名于世的严寅亮	/ 143
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雷廷珍	/ 147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	/ 150
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的赵以炯	/ 154
贵州新学的开拓者严修	/ 157

建树良多的开明士绅乐嘉藻	/ 162
树今生之范、育明日之师的尹笃生	/ 165
达德学校的领航人黄干夫	/ 168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者朱启铃	/ 172
逻辑学研究的先行者王延直	/ 178
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夏同龢	/ 180
驰誉京华的艺术家庄华	/ 186
博学多闻的桂百铸	/ 190
以德为本的“德昌祥”创始人刘辅臣	/ 194
“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	/ 197
以竹为画、以画言志的孙竹荪	/ 200
贵州现代企业的拓荒者周诒春	/ 203
贵州第一所公立医院创始人邓文波	/ 207
毕生献身小学教育的贾功台	/ 210
水利高等教育先贤许肇南	/ 213
治学主张“博学而强志”的王佩芬	/ 217
“五代师生”聚一堂的陈寿轩	/ 220
精于脉理的著名中医石玉书	/ 223
贵州医学院院长李宗恩	/ 226
中国一代文化名人谢六逸	/ 230
学养深厚的社会教育家马宗荣	/ 234
成就卓越的数学教育家刘熏宇	/ 237
贵州中医药界泰斗王聘贤	/ 241
辛勤耕耘、诲人不倦的萧文灿	/ 245
古生物地质学家乐森瑛	/ 249
贵州地质“活字典”罗绳武	/ 253

光明使者花莱峰	/ 258
当代女书法家萧娴	/ 261
贵州国画家宋吟可	/ 265
苏州园林的守护者谢孝思	/ 269
人民的“营养师”罗登义	/ 272
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	/ 276
致力地方文献编纂的李独清	/ 279
贵州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李良骐	/ 284
当代文坛的卓然大家陈恒安	/ 287
中国近代土壤科学的奠基人熊毅	/ 292
奉献毕生精力的化学教育家邢其毅	/ 296
宇宙线锥体理论创建人之一张永立	/ 300
著名中医大家袁家玑	/ 303
有色冶金物理化学家徐采栋	/ 306
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数学家秦元勋	/ 311
后 记	/ 315



## 引 言

历史的天空，苍茫寂寥，无限深远。在云贵高原的黔中大地，早在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文明之光闪烁。如今贵阳贵安的招果洞等人类遗址，就昭示了这片土地是早期人类生命的摇篮。

中华文化的生发，是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在华夏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断探索、不断建构、不断融合的结果。当中华民族的主体特征和文化内核在中原一带逐渐形成的时候，贵州的先民始终在参与，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一些古老的传说，有典籍记载，史不绝书。

当然，不容讳言的是，由于距中原和江南等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关山阻隔，在古代生产力低下、交通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唐宋以前，较之中原和沿海地区，贵州的文化呈现是不够灿烂，不够丰满的。抑或有一些重要的地域文化事件，生动的历史人物，被历史的风尘掩埋。未来如有发现，可为历史补笔。

远古的时候，从春秋到秦汉，黔中在传说中经历了鳖人时代、牂牁时代和夜郎时代。其先民已无处可考。到了汉武帝时，有了中央政府主导的第一次规模化移民。应募入黔的豪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并与更早期先后从东、南、西几面迁徙而来的氐羌、苗瑶、百越等族群，共同开发着这片多山的土地，并定居下来，形成了今天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彩多姿的民族大家庭。

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贵州实行羁縻之治。在长期与中原文化若即若离的疏离状态下，黔中如文化孤岛。北看长安洛阳，东望余杭扬州，帝王与才子

长袖善舞，把唐宋词章翩然演绎，直抵古代中华文化的璀璨高峰。这边纳贡偏安，才不外露，建树萧然。

明洪武年间，为稳定云南边陲，保障战略通道的安全和通畅，中央政权开始以军屯和民屯的方式向贵州大规模移民。水西土司头领陇赞·霁翠及继任者（他的妻子奢香夫人）联合水东宋氏土司，进京表达臣服之意，加强与朝廷的联系。随后中央政权逐渐开始在贵州改土归流，建立行省，开科取士。贵州风气渐开，迅速与中土各地形成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不论社会治理，还是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都完全融入中华文化大家庭。

黔中一带是贵州腹地，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自明永乐在此处设贵州布政使司，又于明隆庆年更程番府为贵阳府，此处自然成为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六七百年的历史里，这片土地哺育了许多杰出的儿女，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培育之下，坚守礼信仁义的人格理想，成就出类拔萃的学养智慧，尽忠家国，报效乡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贵州的回音。也有许多出生和成长于大江南北的义士，或由朝廷派遣，或随命运漂泊，来到贵阳工作生活。他们在兹爱兹，以他们的才情与这方山水相互加持，相互成就。这些灿若星辰的贤才达人，编织出了贵阳历史长卷的文化光芒和悠长韵味。

《贵士名贤》收录明代至近现代的近百位七百年来生活在贵阳，或从贵阳走出去的名贤的生平事迹。翻阅品读，从一个个人物生平，过往经历，事功成就，可以生动、具体地了解一座城的前世今生，城因人而灵动，人因城而发展。

报效国家，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民族鲜明的个性特点。从历史上看，贵阳人从未甘居人后，在中华大地上建功立业的仕人，史不绝书。《贵士名贤》收入的部分贵阳古代名人事迹，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康熙年间的周起渭，任《康熙字典》总纂，批阅浩繁卷帙，赅续中华文脉，功莫大焉。光绪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是当时社会维新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陈夔龙在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时，曾临危受命任留京八大臣，后历任四川总督、



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系风雨飘摇中清王朝的股肱之臣。为巩固维护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贵阳仕人亦有突出贡献。乾隆年间的清军名将朱射斗，在川藏一带边境地区，为抗击印度的侵袭蚕食，统兵抗敌，身经百战，身受九伤，杀敌无数，去世后入祀昭忠祠，赐谥“勇烈”。鸦片战争时期，时任天津知府的石赞清，在清廷溃逃之际，独自前往英军阵营，据理维护中方利益，被英军扣押。石赞清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贞不屈，怒斥英军及其统帅，列数他们的侵略罪行，绝食三日，但求一死。英军统帅对他的气节深感敬佩。而康熙年间任台湾诸罗知县的周钟瑄和嘉庆年间任淡水同知的李嗣邨，政声清亮，政绩卓著，至今为台湾人民尊敬纪念。民国初期，官至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铃对中国古代建筑学贡献厥功至伟，他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和文化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数百年来，许多朝廷命官履职贵阳，把他们的个人际遇与贵阳山川风物紧紧融为一体。贵阳历史的款款前行，蕴含着他们个人生命的跌宕迁变。明正德年间的兵部主事王阳明，是贵州建省后，以贬谪之身来到贵阳的。他却在这里悟成大道，成就心学，使贵阳的山中一洞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圣地，举世共仰。而当时贵州先后两任主管教育官员，提学副使毛科和席书，与王阳明结谊深交，并敢于担当，为他开坛讲学，使阳明心学得以根植贵州，流布四海。王阳明去筑 80 余年后，时任贵州巡抚江东之有感守仁先生昌明儒学，开一代贵州学风，在贵阳南门外河边，王阳明最喜流连处兴建甲秀楼和浮玉桥，鼓励贵州学子科甲挺秀，求仕报国。甲秀楼今已成为旅游者必去打卡地。清末贵州学政严修，毫不泥古守旧，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在任三年，引入西方科学书籍，推动书院改革，启贵州现代教育先声。在贵阳出生成长的张之洞，亦是武汉大学的创办先驱。多所中国名校，与贵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化人，早年都有寒窗苦读，遍览群书的人生经历。目的虽在学以求仕，但也涵养了丰满的精神生活和诗情画意的娴雅情致。数百年来于贵阳

过往的文人雅士，与天下文人一样，以才情为这片土地平添雅趣，诗书画作的成就斐然。稍微缺憾的是由于地理阻隔，这些作品影响力多囿于地域。假以时日，如海内外人士对贵阳历史文化多有了解，定会像喜欢贵阳的秀丽河山一样，喜欢贵阳的人文故事。明代万历年间的画坛名家杨龙友，世人称其画作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雅去其佻，独破天荒，直接比肩同代画坛巨匠董其昌。明崇祯年间的吴中蕃，不仅主笔两修《贵州通志》，被后世史家高度评价，其诗词更是名满天下，旷世诗才被《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及黔北巨儒莫友芝赞赏有加。清中晚期的孙竹雅，诗、书、画三者皆精，尤其擅长画竹，借竹之刚直、虚心、高洁的品质，表达出文人高贵而淡泊的人生志趣。民国初年去到北京的姚华，诗、书、画、印皆精彩纷呈，名动京华。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等文化名人与他交谊深厚，姚华被称为民国早期北京文坛的“一代通才”。女书法家萧娴一扫闺阁娟秀之习，作品气势磅礴，沉雄高古，被誉为近代女书法家第一人。现代书法巨擘陈恒安学术造诣精深，精研甲骨、金文、竹简、帛书和文物鉴定；书法诸体兼备而尤以篆隶见长，章法考究，朴厚沉雄，雅俗共赏，成贵州书界一代宗师。还有宋吟可、谢孝思等一批画坛耆宿，皆以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和建树，支撑起贵州艺术，使贵州艺术不逊于国内任何省区。

近代以前，中国科技不兴，贵阳亦然。自李端棻等倡导新学，别开风气之后，贵阳科技人才辈出，为国家发展贡献出贵阳智慧。徐采栋是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贵州人，他不仅为贵州现代高等教育竭尽心力，还为铝工业和磷化工等贵州两大工业支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年从贵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的罗绳武，也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他和徐采栋一起跋山涉水，贵州铝、磷工业的成就也有他一份沉甸甸的功劳。我国营养学研究的开创者罗登义教授，在贵州的教学科研经历长达70年，桃李遍及全国农业科学领域。

以上提及的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在《贵士名贤》一书中都有专篇详解。而这只是选入名贤的一部分。当你捧读这本精心编撰的读物，就会明白贵阳前



贤怎样用自己的生命轨迹编织出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篇章。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数百年贵阳风雨兼程发展前行的局部和缩影。特别是当代，千百万贵阳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正在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贵士名贤》一书是历史的注脚和文化的滋养。我们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续写下无愧先贤的灿烂华章。

## 水西彝族女政治家奢香

奢香（生年不详，卒于 1396 年），彝名舍兹，又名朴娄奢恒。她是彝族恒部扯勒君亨奢氏之女，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陇赞·霭翠之妻。霭翠病逝后，因儿子年幼，奢香摄理贵州宣慰使（贵州宣慰使司位于贵阳）一职，在贵州各级土司中有极高威望。

奢香执政期间修筑贵州通往四川、云南的驿道，设立水西龙场九驿站，沟通了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交通，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与繁荣；兴办宣慰司学，聘请汉儒传授汉学，推动了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奢香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作的努力深得明皇帝朱元璋赏识，封其为“顺德夫人”，称“胜得十万甲兵”。奢香病逝后，朝廷特遣专使祭悼。其家乡大方县现有奢香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一、奢香来归

明洪武元年（1368），明朝初建，天下初定，但归属明王朝管辖的地域只有中原、江南和闽广等地。此时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等行省，贵州全域皆土司，有 200 余家土司。水西土司霭翠在元朝末年曾被封为四川行中书省左丞兼顺元等处宣慰司，统领水西 48 部，是当时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

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用兵取得胜利，北方形势趋于稳定。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部署南北两路大军向四川进军，不到一年



时间迅速平定四川。随着明军节节胜利，贵州土司逐渐归附明朝。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思州、思南两土司即已归顺明朝。至明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贵州宣慰使霁翠、同知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

霁翠作为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首领，得到朱元璋的特别对待。明洪武六年（1373），“诏贵州宣慰使霁翠位居各宣慰之上”（《明实录》）。贵州宣慰使辖地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市、安顺市，以及贵阳市西北。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霁翠是明时级别最高的土司之一。

奢香何时嫁给霁翠，并无史籍明确记载。据《明实录》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奢香率领“所部土酋来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因此，奢香至少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前就嫁给了霁翠，此时霁翠已任贵州宣慰使，地位尊崇。但因霁翠年岁渐老，要维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管理如此庞大的土司48部，已是力不从心。奢香聪慧、干练，深得霁翠信任，于是放手让她参与管理事务，并把率领“所部土酋”千里跋涉进京这样的重任交给她。奢香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得到了朝廷丰厚的回赠，“赐文锦、绮、帛及珠翠、如意冠、金环、文绮裘衣”等，荣耀还乡。



奢香夫人

## 二、摄政水西

《明实录》有关奢香的记载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带领土酋入京进贡开始，因此，至少从明洪武十七年（1384）开始，奢香就开始管理水西的事务。

明洪武二十年（1387），奢香再次进京，“贵州宣慰使霁翠妻奢香等进马二十三匹”（《明实录》）。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奢香没有进京，而是由她遣使进京。这年三月，“霁翠妻奢香遣把事阿白等进马”（《明实录》），表明此时霁翠已把全部事务交由奢香管理，并且得到朝廷认可。到了十一月，《明实录》记载已由“霁翠妻”改为“水西土官奢香遣使进马”，霁翠逝世，奢香正式摄政水西。

独立管理水西的奢香遇到了关系水西生死存亡的大事。据《大明一统志》记载，贵州都督马叶（据《明实录》，马叶为马焯，时任贵州都指挥使同知）意欲“尽灭诸罗，以为郡县”。为了挑起事端，马叶对地位高贵的贵州土司之首奢香极尽侮辱，“裸挞之”。马叶想借此“激诸罗”，以便有理由消灭水西各部。受尽侮辱的奢香以其超人的意志和政治智慧，允诺众人向天子控诉此事，以此平息众怒，没有挑起事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月，奢香带领儿媳奢助等人借进贡朝廷之机，进京向当朝皇帝朱元璋陈述水西“守土之功”，痛陈马叶罪状。明太祖问：“我为汝除之，何以报我？”奢香慨然回答：“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愿刊山开驿以供往来。”明朝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贯通中原通往云南之通道，稳定西南边陲之统治，急需打通贵州前往四川、云南的驿道。因此，奢香向朝廷允诺修建驿道，深得朱元璋肯定，于是将马叶下狱，封奢香为顺德夫人，并给予丰厚的礼物。

## 三、开龙场九驿

奢香回到贵州后，一面宣扬朝廷的威德，使人心安定，一面履行诺言，亲率各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棘，开辟了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



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境)、六广(今修文县六广镇)、黔西、大方到毕节二铺迢迢 500 余里,史称“龙场九驿”。根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贵州图经新志》及《贵州通志》等书的记载,龙场九驿所经路线指:龙场驿(今修文县城)、六广驿(今修文县六广镇)、谷里驿(今黔西市素朴镇至谷里镇)、水西驿(今黔西市东南 2 里)、奢香驿(又名西溪驿,今黔西市西溪)、金鸡驿(今大方县城南 30 里)、阁鸦驿(今大方县北竹园乡一带)、归化驿(今大方县双山、归化镇)、毕节驿(今毕节市头铺附近)。

龙场九驿所经之地,历来为绿林草莽横行之地,防御极为艰难。奢香设法



明代奢香夫人修建龙场九驿上的蜈蚣桥

自筹经费、自备人马，沿途防守、巡逻，使这条通道得以安全通畅。200 年后的万历年间，游历贵州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黔志》中写道：“贵州南路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唯西路行者，奢香八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千辄皆其自辖，虽夜行不尽盗也。”龙场九驿的修建对打通西南通道，巩固边疆，利泽后世，具有重大价值。

#### 四、千古流芳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奢香病逝，明朝廷特遣专使祭悼。《大明一统志》将其列入“列女”，令其事迹永载史册。“列女”是中国古近代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堪称典范的女性进行表彰的称谓，是国家引导、标榜的女性价值观的体现。朝廷将奢香列入国家史志《列女传》，是对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作巨大贡献的肯定。

曾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之一吴国伦有诗赞奢香：

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官。  
承恩一诺九驿道，凿山刊木穿蒙茸。  
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焚道犹同风。  
西溪东流石齿齿，呜咽犹哀奢香死。  
中州男儿忍巾帼，何物老姬亦青史。  
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  
帐中坐叱山河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明清以来，奢香公忠体国、刚毅坚定、宏阔高远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水西人，感动着南来北往的各族人民。从彝族民众的口头传颂到文人的诗文纪念，对奢香事迹的弘扬绵绵不绝。迄今，其家乡大方县的奢香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园旁建有奢香博物馆，是西南地区第一个以民族历史人物命名的博物馆。



## 智略兼备的水东女杰刘淑贞

刘淑贞（生卒年不详），又名淑真、贲珠。水东（今贵阳开阳县）人。明贵州宣慰司同知宋钦之妻。

宋钦生年无文献可考，卒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宋钦因“平寇保境有功，授昭勇，时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加镇国上将军，抚四川等处行省参知政事”。明洪武五年（1372），与水西宣



开阳禾丰水东文化陈列馆前的“刘淑贞雕像”

慰使霭翠等土官率众归附明朝。明廷改八番顺元为贵州，赐宋蒙古歹为宋钦，授怀远将军，世袭贵州宣抚司同知，领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洪边、陈湖等十二马头，治贵州城（今贵阳）。明洪武五年（1372），宋钦升贵州宣慰司同知。明洪武十四年（1381）逝世。

宋钦去世后，刘淑贞代领宣慰司同知职，成为水东洪边十二马头首领，曾多次进京进贡贵州方物和贵州马，深得朝廷信任。刘淑贞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奢香遭遇马叶“裸挞”之奇辱时，迅速报告朝廷，为水西赢得了和平与安宁，朝廷因此封刘淑贞为“明德夫人”，以表彰其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之精神。《炎徼纪闻》《弇山堂别集》《明史》《皇明史概》《皇明经济文录》等史籍对其事迹皆有记载，称其“多智”。其家乡开阳县建有明德广场纪念刘淑贞，广场中央塑有刘淑贞像。

## 一、洪边十二马头之首

贵州宣慰治所设于元明两代时期的贵州城，贵州宣慰使霭翠的辖地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市、安顺市和贵阳市西北。贵州宣慰司同知宋钦的治所亦在贵州城，辖境包括今贵州省贵阳市的开阳县、乌当区东部、花溪区东部，以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龙里、贵定两县和福泉市的西部。宣慰使官阶从三品，为正职；宣慰司同知官阶正四品，为副职。但二人各自管理各自区域，没有上下级之分，一般以鸭池河为界，河以东即为水东宋氏，河以西即为水西安氏。

宋氏十二马头，包括洪边里、耻里、弟里、忠里、信里、孝里、廉里、巴香里及龙里县境的羊场司、大谷龙司和小谷龙司，即“八里三司”及王潘里，由宋氏宗亲负责管理。每个马头都设有总管，负责管理数十个村寨，征收田粮、赋税。

宣慰使维持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向朝廷进贡方物和得到朝廷回赐礼物的方式。《明实录》记载，宋钦两次入朝进贡地方特产贵州马和方物。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实录》记载，宣慰使是刘淑贞之子宋诚，刘淑贞已



归政，但仍是水东宋氏核心人物，多次进京朝贡。

## 二、深明大义促进民族团结

据明代著名史学家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贵州都督马叶“欲以激怒诸罗为并爨”。为了挑起事端，马叶对贵州土司之首奢香“裸挞之”。马叶想借此“激怒诸罗”，以便有理由消灭水西各部。马叶的行为激怒了水西各部，各部准备起兵反叛。正值剑拔弩张之时，刘淑贞深明大义，让各部“无哗”，少安毋躁。她对大家说，我替你们把事情原委告诉天子，如果天子不听，“反未晚也”。刘淑贞进京的时间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以进京朝贡的名义，带着家乡的土特产，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最爱的贵州马。她向朱元璋陈述了奢香的遭遇，朱元璋请她回去邀请奢香进京。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月，奢香带领儿媳奢助等人借进贡朝廷之机，进京向当朝皇帝朱元璋陈述水西“守土之功”，痛陈马叶罪状，并提出愿修驿道，通畅交通，保境安民。两位格局高远、心胸豁达、意志坚强的卓越女性，用她们高超的智慧化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绝代双骄。

## 三、进贡贵州马

贵州马体格矮小、体质结实、行动敏捷、温驯而具悍威，毛色以栗、骝色为主，尤善翻山越岭。其主要分布于贵州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地，因主要产于贵州的西部和中部，故又称黔西马匹。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贵州马。相传明洪武四年（1371）七月，四川大夏国王明升投降明廷并进贡十四名马，其中有一匹马颜色纯白，出自贵州养龙坑，传说此马出生时非比寻常，是天龙与地马结合而成。朱元璋认为这是上天所赐的英物，有神保护它，于是亲自撰写祝策，并隆重祭祀马祖。朱元璋骑着这匹马到清凉山，“蹶云而驰，一尘不惊”，令他非常愉悦，赐马名为“飞越峰”，并命令御用画师绘图珍藏。

贵州马曾大量进贡入京，贵州境内则出现了专门靠养马为生的群体，俗称“养马苗”。据《贵阳府志》记载，养马苗在今观山湖区金阳大道野鸭塘的养马寨，明清时期称“养马苗”或“养马”。《明实录》中关于刘淑贞进京朝贡的记录有三条，都是以宣慰使宋诚母亲的身份进京朝贡贵州特产和贵州马。

第一次是明洪武十五年四月戊申（二十九）（1382年6月11日），“贵州宣慰使宋诚母刘氏来朝贡，赐以纱罗袭衣，米三十石，钞三百锭，寻又赐衣三袭，遣归”。刘淑贞和儿子宋诚一起入京城朝贡，朝廷赏赐给他们米三十石、钞三百锭、衣服三套。

第二次是明洪武十六年九月乙丑（二十五）（1383年10月21日），“贵州宣慰使宋诚母刘氏淑贞，普定知府者额妻适约来朝，诏赐绮钞”。刘淑贞再次进京。

第三次是明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辛巳（三十）（1392年3月23日），“是月，贵州宣慰使宋诚母刘氏赴京贡马，谢恩。赐刘氏银三百两，锦十匹，从人把失等钞有差”。刘淑贞赴京贡马。

刘淑贞一次次进京，不仅带去了贵州的特产，也带去了贵州的风土人情。在京城，她接触并了解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见识，使她在帮助奢香时能站在国家的高度，有智有谋，很好地帮助奢香稳定局势，为水西、水东，乃至整个贵州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促进了黔地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 崇尚儒业的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昂

宋昂（生年不详，卒于1470），字以眺，号省斋。明贵州卫（今贵阳）人。明正统七年（1442），袭贵州宣慰司同知。

宋昂是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斌之子。宋斌虽为贵州宣慰司同知，但乐于同文士交游，喜读书，常恨自己只知习枪弄棍，不晓诗书，因而督促其子宋昂、宋昱攻书习文，还特地聘请廖驹（福建人，字致远，随亲属戍守贵州都匀，学博工诗，有《强恕斋诗集》行世）教读诸子。宋昂与其弟宋昱诗艺大进，诗名渐起。

宋昂虽为贵州宣慰司同知，却崇尚儒学，喜近文士。他收集经史典籍，被当世人称为“文翁”，购进经籍图书若干供学子阅读，所部多为其所教化。民国《开阳县志稿》载：“所部有为乱者，昂必自咎，改行惠政，不遽加诛，而乱者亦自革面，以故夷民辑和，部内无事。”宋昂与其弟宋昱合著《联芳类稿》刊行，罗圯（字景鸣，明成化进士，官至南京吏部侍郎，著有《圭峰文集》行世）为之校点审定，并作序。因此，宋氏兄弟的诗作在全国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罗氏在序中论及贵州建省后百余年间文教振兴、人才涌现的实绩，对宋氏兄弟的诗作及影响给予了中肯评价。他说：“以余所闻，贵州宣慰使宋以眺，则于文章诗赋，攘臂敢为之，间能流传四方。其意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宁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清初，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特选录宋氏兄弟诗作各一首，并在《静志居诗话》中做了很高评述。引用宋昂诗作中数联秀句，论云：“坝篴迭奏，风韵翩翩，试掩姓名诵之，以雅以南，莫辨其出于任味侏离也。”据

明嘉靖《贵州通志·艺文》记载，其诗作主要有《答越存古》《秋江送别杨知事》《送赵逊敏东归》《征师凯旋宿宣慰司官署》《贵阳出师》等。

《答越存古》：归欤何必思凄然，瘦马频嘶稳著鞭。采药难寻蓬岛路，垂纶却忆鉴湖船。远林啼鸟笙歌沸，小店繁华锦绣连。珍重故人怜契阔，迢迢双鲤寄华笺。

《秋江送别杨知事》：江水澄清树叶丹，临岐人送柏台官。十年帷幄参机务，一旦云霄振羽翰。风静洞庭高浪远，月明扬子暮潮寒。京华到日春光好，花柳无边马上看。

《贵阳出师》：金印垂鞍事远征，霜威凛冽路澄清。寇公门下多英俊，范老胸中富甲兵。旌节漫随霞彩动，戈矛争向日光明。风春二月城南陌，伫听诗歌狎狷平。

宋昂袭贵州宣慰司同知 42 年，宽于待民，严于律己，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实事。明正统八年（1443），与宣慰使安龙富重修城内宣慰司学。明天顺元年至八年（1457—1464），其建万松亭，补修宣慰司学。明成化二年（1466），其又出资建济番桥，这座桥就是今天花溪大桥的前身。

宋昂庶子宋炫，字采廷，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其诗盛于明嘉靖年间，著有《桂轩拙稿》传世。



## 贵州明代文教鼻祖王训

王训（生于明永乐初年，卒年不详），字继善，号寓庵。祖籍河北昌黎，明初徙居贵州卫（今贵阳）。明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诗人。旧志载，王训在18岁时向明宣宗朱瞻基上《保边政要》八策，得到明宣宗的赞许。又载，明宣德十年（1435），王训中云南乡试。由此可以推知，王训应当生于明永乐初年。

王训是明代贵州早期教育和文化发展的开拓者，西南巨儒莫友芝认为，王训是贵州“开草昧之功”的第一人。

### 一、建贵州第一座官方图书馆

明王朝于洪武元年（1368）建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理，政权基本稳固，明廷开始逐步推广边远地区的教育。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明宣德八年（1433），佥事李睿奉命到贵州建立府学、卫学。当年建成平越、安南、都匀、普定、威清、平坝、黄平等卫学。次年，贵州设置提督学政，总揽全省教育工作。正统初年，经左都督吴亮举荐，王训被任命为贵州宣慰司儒学训导，因教法严谨，培养人才不断增多。明正统六年（1441），贵州提学副使李睿认为贵州宣慰司儒学应成为各府学的榜样，校舍不能过于破旧，建议维修儒学，所需经费由官员捐献，王训尽力捐资维修儒学。经过一年多时间，贵州宣慰司儒学为之一新。明正统十四年（1449），王训升任宣慰司儒学教授。为了促进贵州教育的发展，让更多学子有读到更多图书的机会，他在儒学校舍后建起一

座藏经阁，收藏朝廷赐书和其他书籍。这座藏经阁是贵州第一座官方图书馆。

明正统十三年（1448），王训被调至军中参与麓川（今云南陇川）之战，战争结束后仍然返回贵阳，任宣慰司儒学教授。为鼓励生员学习，他在儒学大门旁竖立石塔两座，一座镌刻本省赐进士题名，一座镌刻本省乡贡题名，将中试者的名字辑录在石塔上，以激励后进。王训立足于培养地方人才，开创性地建立图书馆、竖立石塔、创立严格的教法等，在贵州教育史上具有开创之功。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称赞其“教法严整，文化以兴，足于绵蕞后来，著龟多士”。

## 二、军旅生涯以诗记事

王训不唯从事教育，还深通兵略。明正统十三年（1448），兵部尚书王骥再次奉命率15万大军征讨麓川，云贵两省集结大批兵力参战，王训亦被调至王骥军中。麓川战役起于明正统四年（1439），当时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请求增兵，朝廷向湖广、贵州、四川调集兵力与思任发作战。这一仗前后打了三次。他目睹明军的腐败，军中行贿受贿成风；运粮的千余马匹不知去向，军官强令士兵背负过于沉重的粮食跋涉，不准休息，有士兵因无法忍受而自杀，主将却漠然置之；将领被敌人杀死割去头皮，主帅却不知敌军在哪里。此段经历对王训影响较大，他创作了一些诗篇，叙述了战争的残酷和军队的腐败。如《程番五首》之一：“瘦马轻鞭控朔风，山如列戟路如弓。穷荒未必尧封到，绝域曾劳汉史通。暴客尚存悉逆旅，奸谀不死恨英雄。玉关牢落天门远，谁献平蛮第一功。”诗人感叹奸邪当道，自己的军功被抹杀，只能在荒凉之地安身，再也没有为国立功的机会。之二：“百战休题马上劳，烽尘久不到征袍。曾于丹徼提三尺，羞向青铜见二毛。壮志于今成潦倒，芳名自在属英豪。”诗人回顾曾在南方边疆作战，原是壮志满怀，如今头发由青变白，落到潦倒的境地。这些诗浑然一体，风格苍凉、悲壮、刚劲，格律得当，思想、艺术水平很高。



### 三、贵州诗坛“开草昧之功”第一人

王训博览群书，著有《寓庵文集》三十卷和《孙子注解》《东庵记》《东坡月潭寺记》等著作。他是当时贵州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其诗作有《程番五首》，以及《朝阳洞》《真趣亭》《无边风月楼》《南庵》《嘉瓜颂》《送陈昌归隐东山》。其中《送陈昌归隐东山》是体现王训诗才的佳作：“百里花封早挂冠，东山深出还盘桓。公卿不入新梦来，父老犹思旧任官。鞭犊誓耕云半亩，闻鸡常卧日三竿。不应海内思霖雨，却使苍生望谢安。”王训作品大多失传，唯有《黔诗记略》有少量收录，其诗雄健有骨，苍劲悲凉，如《南庵》：“净度招提旧接茅，地偏应不近尘嚣。山腰倒接城边路，水口斜通阁外桥。深院落花无客扫，空门掩日有谁敲。忘怀好接莲花社，分付山僧早见招。”

王训晚年获封武略将军衔，在贵阳城北白崖山（今省人民政府后面的八鸽岩）隐居。白崖山建有读书台，台下用石垒成院子；引泉水为水池，种满花竹，花竹间放置棋桌琴案。王训常与客人吟咏其间。官至山西巡抚的贵阳人徐节和程番知府江澡都曾到此拜访过王训，并留有诗作。

王训逝世于贵阳城北白崖山，享年约 80 岁。

## 直言敢谏的卫学训导詹英

詹英（1413—1484），字秀实，号止庵。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四川会川（今会理）卫学训导。

明永乐十一年（1413），詹英出生于贵阳一书香之家。他8岁入学，过目成诵，书不再读。詹英青少年时很受巡按贵州御史器重，常与其长时间交谈，御史认为詹英的才能绝不是只会读经书的学生。詹英向御史建议，应在贵州设立武生科目（学习军事、武术的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朝廷批准，贵州从此有了军事教育。17岁时，詹英赴云南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以后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第，被分发到四川会川任卫学训导。上任后，詹英深感会川“地僻人夷，疏于德化”，于是严立学规，选拔俊秀，以身立教。会川学校校舍颓败，詹英倡导捐俸，地方官绅纷纷响应，学校得以修葺一新。经过詹英的努力，会川“人知向学，贤才倍增”。

詹英曾向朝廷上“边事十三条”，均被采纳，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只因云南麓川（今云南陇川）发生战事而搁置。明英宗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把持朝政，云南麓川思任发叛乱，王振想通过炫耀武力，“示威四海”来提高个人威信，借以震慑朝中的反对派，兵部尚书王骥知王振心意，就极力主张讨伐，朝廷遂命王骥督军远征。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间，明王朝三次征讨麓川。因王骥治军无方，贪婪腐化，苛扰地方，乱杀无辜，残害人民，所以无功而返。明正统十三年（1448），明廷集结十五万大军第三次征讨麓川，历时一年，始



终无法消灭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反而“馈饷不继”，王骥无奈，只得与思任发孙子思陆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金沙江畔立石碑，“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三次麓川战役，劳民伤财，耗虚国库，天下骚动，引起了一批官员的不满。据《明史·王骥传》载，远在京城几千里外的詹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义愤填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以会川卫学训导这样一个小官身份，大胆上《陈言征麓川略》疏，矛头直指王骥贪婪腐化、残害人民、兵败受禄的丑行，并将矛头进一步指向把持朝政、为所欲为的权宦。奏疏除《明史》所载外，清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詹英》也载：王骥等将运输军粮的一千多匹军马挪为私用，以士兵代替马匹背负沉重的军粮在险峻的山路上行走，一些士兵因不堪重负而自杀。王骥、官聚等高官搜刮的财物多达一二百扛，供他们役使的民夫竟有五六百人之多，朝廷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詹英的奏疏上达朝廷，由于宦官王振一手遮天，左右朝政，王骥等人的劣迹非但不被追究，反而命詹英到王骥军中效力。皇帝批示：“詹英有见识，去与总兵官杀贼。”这无异于把詹英送到王骥等人的屠刀之下，詹英愤然赴京申诉。只因土木堡一战，明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也就无人过问詹英的申诉，他只好回到原职。

詹英只是一个官卑职微的从八品教官，他敢于上疏弹劾权势显赫的王振、王骥等多名高官，可谓是有担当、有胆识的正派官员。令人疑惑的是，会川距麓川千里之遥，詹英并未亲历战场，他如何知道前方的情形呢？直到数百年后的1954年，贵阳城西出土詹英墓志铭，人们才从中窥见端倪。墓志的作者是詹英儿时的好友王训，王训曾以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之身应征参与麓川战役。他了解并痛恨军中高层的腐败，詹英奏疏的内容或许就是来自王训。

景泰初年，詹英升任云南河西县学教谕。不久，其因父丧回籍守孝，期满赴京，吏部推荐其任御史，詹英以年老推辞，辞官返回贵阳。晚年的詹英除过着“徜徉林下，以琴书诗酒为乐”的生活，还常常周济穷苦亲邻。

明成化二十年（1484），詹英病逝于贵阳，享年71岁。其著有《止庵集》

(已佚)。

1954年，与詹英墓志铭同时出土的有詹英之子詹木，儿媳越氏，孙詹恩、詹惠，重孙詹云章的墓志铭。

詹木，詹英长子，字从正，生于明正统十年(1445)。詹木幼时读儒家经典，因科场不顺投身军伍，以军功任贵州卫百户，后为总兵官幕僚。他还曾游历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山东、河北等省。明弘治十六年(1503)，詹木病逝，享年58岁。其获封大理评事。

詹恩，詹木长子，字苾臣，别号玉屏，生于明成化十年(1474)。詹恩幼读诗书，明弘治八年(1495)乡试中举，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大理寺左寺副，为官清廉。明正德元年(1506)，詹恩病逝，享年32岁。

詹云章，詹恩之子，字天文，号笔山，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世袭祖父贵州卫百户，克勤克慎，受士卒爱戴。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詹云章逝世，享年60岁。



## 心学圣人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因曾在浙江绍兴阳明洞侧筑室养生、讲学，被称为“阳明先生”。

明正德三年（1508）的春天，一位被谪贬的京官来到今贵阳以北 40 公里的龙场，在这山重水复之处，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开启了贵州新的学风，其思想对中国、日本，乃至东南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画像



龙岗书院



《自题山水画作》

## 一、直言获罪，谪贬龙场

王阳明为何被发配到僻远荒凉的龙场呢？这要从他步入仕途说起。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王阳明随父至北京，游历居庸关、山海关等地，到塞外纵观山川地貌。18岁时，王阳明到江西拜访了著名理学家娄琮，与他探讨朱熹理学。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王阳明就西北边事向朝廷上书。明弘治十三年（1500），其被任命为刑部主事。王阳明后因病回浙江余姚，两年后病愈，出任山东乡试主考，随即调任兵部主事。这个职务很适合喜欢研究军事的王阳明，但不久之后的一场政治风波，改写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明正德元年（1506），15岁的朱厚照即位，太监刘瑾及张永等8人横行不法，人称“八虎”。“八虎”诱导小皇帝朱厚照游乐无度，荒于朝政，朝廷原有的兴革举措全部停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22名官员冒死上疏，要求惩办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然而朱厚照却下令逮捕戴铣等人，王阳明上奏营救，结果被廷杖40，打得死去活来，投入大牢。他在诗作中痛说了当时的心境：自己从一个心怀天下、专一修心的人一下跌落到黑暗的大牢，心里只有无尽的悲伤。

次年，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城）驿丞，这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吏，照料因公务往来的人马。王阳明来到贵州龙场驿后，在贵州前前后后待了三个年头，产生了阳明之学，由此形成的学术思想是其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

## 二、寻得东洞，躬耕自给

贵州龙场在贵阳西北的万山丛林之中，杂居着彝、瑶、苗等少数民族，偏僻闭塞，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初到龙场的王阳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求生之路。他先是与随从自建简陋的草庵栖身，特别作诗《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不久，他在驿站东的龙岗山寻得一处山洞，当地人称为“东洞”，冬暖夏凉，王阳明觉得这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想起家乡的阳明洞，于是他将东洞改称“阳明小洞天”，也就是今天贵阳修文的阳明洞。



在龙场驿站，最大的困境是不时断粮。王阳明开荒种地，躬耕自给，虚心请教乡民，并以诗记录耕作的常识。他很感慨这段经历，写下《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他还开辟了一个园子，取名“西园”，常躲到西园浓密的树荫下读书和思索。西园伴随王阳明度过了许多孤寂的白天黑夜。王阳明还时常到附近的山上打柴、担水，虽然艰难，却也乐在其中，他把这些经历和情怀都写在《采薪二首》中。西山采蕨时，他攀援山岩登上峰顶，总会遥望远方的故乡，思念亲人，想到奸佞窃据朝政，自己被流放荒凉之地，倍感凄楚，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采蕨》：“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 三、龙场悟道

《易经》是王阳明长期研读的儒家经典，也是他思想的渊源之一。在静谧的龙场，王阳明每日端正坐姿，凭记忆整理过去所学。在龙场著《五经臆说》，以新的观点重新审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创立“心即理”“知行合一”心学，并萌发“致良知”的思想。他在给友人顾东桥的信中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王阳明的学说，不是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不是产生于他那“水乡泽园”的故乡，而是产生于穷乡僻壤的贵州龙场。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在谪贬龙场之前，他虽然博览沉浸于佛道的典籍中，但数年并无多大进步。他来到龙场，一个由繁华京城突然流落到偏僻龙场的京官，在这里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心境自感悲凉。他自知仕途无望，沉冤难申，万念俱灰，对着石墩哀叹：“吾惟俟命而已。”在绝望中，淳朴善良的乡民帮他盖屋，给他衣物食品，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鼓起了与命运抗

争的勇气，更是感到“良知”的可贵。他在小山洞里玩味《易经》，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得到了“悟道”的灵感，新的思想由此产生，创立了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心学。

#### 四、荒野舌耕，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龙场建“龙岗书院”讲授心学，传习第一批弟子。其《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问答》，为王阳明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他教学专以致良知为主，远方学子闻风而至，贵阳诸生陈文学、汤伯元、叶子巷，湖南学子蒋信、冀元亨、刘秉鉴等莘莘学子皆至龙场求学于门下。在“夷居异俗”的地方讲学，王阳明感到无比欣慰。他在《诸生来》诗中写道：“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膺。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岵。”《诸生夜坐》一诗则描述了当时师生间其乐融融的情景。

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时，正值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丞，他礼聘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席书是四川蓬溪县吉祥乡人，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字文同，号元山。席书明弘治元年（1488）中举，明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任山东郟县（今山东郟城县）知县，后历任河南按察司佾事、贵州提学副使、福建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佾事巡抚湖广。明嘉靖六年（1527）二月，席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同年三月卒。席书著有《大礼集议》。王阳明应席书之邀，到贵阳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因王阳明用浙江口音讲学、吟咏，民间受其影响，故“闻里巷歌藹如越音”。

#### 五、传播王阳明学说

王阳明学说主要是通过书院传播，他在贵州办龙岗书院，讲学文明书院，离开贵州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贵阳创办阳明书院、正学书院，继续传播王学。在龙场期间，王阳明到过贵阳、黔西、凯里、玉屏、镇远、施秉和黄平等地，行经之处，游玩名胜，传播讲解“致良知”学说。在其影响下，贵州相继建起



书院 20 余所。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王阳明获特赦，出任江西庐陵知县。闲暇之余，偕弟子在青原山讲“良知之学”，一时间大江南北的王门弟子不远千里而来，青原山成为王学研讨中心，庐陵也因此被誉为“理学之邦”。后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南、赣、江、漳等地，开启江西剿匪、平定广西等地的漫长岁月。在平乱剿匪中，王阳明讲学地遍布江西、广西、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北京、山东等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江西吉安阳明书院（原九邑会馆、青原会馆）、赣州通天岩洞、大余县道源书院等。明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浙江绍兴建稽山书院，开展大规模讲学活动，学者翕然从之，其心学思想更是得到空前传播。

## 六、以诗文言志

王阳明在龙场的生活，可谓充满色彩，他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吟咏，抒发内心的感触，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诗文。《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是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五经臆说序》和《五经臆说十三条》写出了他的胸臆之见，实为他创立新说的发端。他在贵阳还时常游玩于乡间田边溪旁，有感而发，其诗作中藏匿着弥足珍贵的史料，留世的《观傀儡次韵》，考证了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的傀儡戏（也称木偶戏）至少在明代中叶就传入贵阳。

王阳明一生著文甚多，有 3 篇收入《古文观止》，其中《瘞旅文》和《象祠记》是在贵州所写；在贵州写有 130 首诗，后来集为《居夷诗》。特别是《瘞旅文》，文辞凄感动情，脍炙人口，作为古代散文名篇，与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合称“祭文三绝”。贵州“三人坟”也因王阳明这篇出类拔萃的《瘞旅文》而有名，并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七、离黔重返仕途

明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离开贵州，先后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

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王阳明离开贵州再返仕途，面对纷繁的矛盾和复杂的事务，处理得游刃有余。随着官越做越大，他肩负的职责也越来越重，但他无论是任军队统帅，还是地方大员都成竹在胸，得心应手，这和他在贵州的历练和思想的飞跃不无关系。

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今江西大余）。明隆庆年间，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其著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 聚徒讲授心学的马廷锡

马廷锡(生卒年不详),字朝宠,号心庵,世称“心庵先生”。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与孙应鳌、李渭并称黔中王门后学“理学三先生”,著名的黔中王阳明学说光大者,也是一位教育家。

马廷锡祖父马和,父马实,子马文标,孙马彦鳌皆中举人。马廷锡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乡试中举。次年,王阳明弟子蒋信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在文明、正学二书院讲授阳明心学,选择优秀学子入学,马廷锡受学于门下,卒然有成。

### 一、弃官再次师从蒋信

马廷锡后至吏部应试,出任四川内江知县,任职两年,在任内为民洗冤案,革除弊政,公正廉明,多惠民之举,政声良好。但他自认为对王阳明“心性之学未彻”,遂弃官奔赴武陵蒋信所办桃花冈精舍,再次师从蒋信。蒋信很有学问,世称“道林先生”,他离任贵州提学副使后不久,在家乡湖南武陵建桃花冈精舍聚徒讲学,终日弦歌不辍。蒋信又置学田若干亩,以资助远道而来就读的学生。

马廷锡在桃花冈精舍刻苦学习阳明心学长达数年,学有长进。之后,他告别恩师回归故里。这时的马廷锡已是满腹经纶,他在担任几任地方官后,选择辞官归隐。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底,蒋信在家乡病逝,马廷锡远赴湖南为其治丧,并为蒋信建祠塑像。

## 二、渔矶湾建栖云亭

贵阳城南的南明河左岸有渔矶湾，茂林修竹，渔歌唱晚，风景清幽。马廷锡在渔矶湾建起栖云亭，静坐其中，潜心研究，力求参透领悟王阳明学说精髓。同时，他也招徒授课，传以阳明学说，使简陋狭小的栖云亭成为当时贵阳研究、讲授王阳明心学的中心。马廷锡常以“必极静清以至于极定，始长觉长明以至于长存”而自警。马廷锡构筑的栖云亭后来发展成为渔矶书院。

## 三、主讲书院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江西金溪人王绍元任贵州巡抚，到贵阳后耳闻目睹马廷锡的研究和讲学，深受感动，觉得地处西南边陲的贵阳有马廷锡这样的学者很难得。他见栖云亭狭小破败，第二年便在栖云亭的基础上建渔矶书院，扩大了规模，内设主静堂、栖云精舍。王绍元以马廷锡笃信好学，是精通儒学宗旨的大儒，上疏向朝廷推荐，聘马廷锡主讲渔矶书院。渔矶书院在马廷锡主持下，前来学习的生员越来越多，有的学生不远百里负笈而来，渔矶书院一时学子云集。当时的渔矶书院盛况，可比肩蒋信所建湖南武陵桃花冈精舍。

明隆庆四年（1570），贵州巡抚阮文中、布政使蔡文、按察使冯成能等地方官员接连以“真儒”向朝廷举荐，马廷锡坚持不出仕。直至万世和来贵州任提学副使，马廷锡见万世和是阳明先生再传弟子，志同道合，又见巡抚阮文中、布政使蔡文、按察使冯成能等都是饱学练达之士，于是接受他们的聘请主讲文明（今市府路15号）、正学（初设在文明书院附近，后迁至城东贵州巡抚署侧）两书院。冯成能又在城东建阳明祠，称之为阳明书院。马廷锡在这几家书院讲学，前来听讲的学子常常有数百人，这种盛况可以和当年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龙冈书院和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盛况相媲美。后来，渔矶书院成为马廷锡的生活起居之处。

马廷锡讲授的具体内容未见于文献记载，但从他的师承关系推断，应是王



阳明“格物致知”“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等学。此时距王阳明贵阳讲学已过去 60 余年，之所以仍然坚持王学，是王学并非空谈，而是实用之学。

#### 四、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弘扬者

马廷锡自桃花冈返回贵阳，研究和讲授儒学长达 30 余年，培养了许多学生，开创了贵阳的一代学风，他的讲学活动对贵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深远。其所著《渔矶集》《警愚录》已佚，仅遗《登山》《渔矶》两诗。《登山》诗：“为学如登山，且欲跻其巅。望道如望洋，谁能涉其渊。振衣上高台，善也风泠然。兹行良有得，不在山水间。知音苦辽绝，俯仰复何言。”《渔矶》诗：“悠然坐矶石，尘虑忽以祛。垂纶不设饵，渊鳞方跃于。亦知君子心，在适不在鱼。君不见，沙边鸥鸟解忘机，物类浮沉宜不殊。”马廷锡献身教育，直至逝世，有“理学升堂，清恬励世”之誉。他对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弘扬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南明河畔渔矶湾

## 尤精吏治、著作等身的郭子章

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又自号蠃衣生。江西泰和人。其在贵州任巡抚十年。

明隆庆二年（1568），郭子章乡试中举，明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历任广东潮州知府、四川提学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福建布政使、贵州巡抚等官。

### 一、稳定贵州局势

万历年间，贵州局势不稳，战火不断，尤以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杨应龙与朝廷对抗为最，朝廷年年征讨，无一不惨败而归。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征讨播州，在白石口中埋伏全军覆没。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发兵征讨杨应龙，数千官兵在飞练堡悉数被歼，江东之被罢官。面对年年惨败，朝廷紧急调派福建布政使郭子章接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带病星夜兼程，于是年六月十三日到达贵阳，随即与先期到达的监察御史宋祖兴，按察使杨寅秋，以及布政使、都指挥使等官员审视省情，一致认为情况十分严峻，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贵州虽为一方省，但财政不如江南一州府，难以支撑战争；二是兵员严重不足，贵阳可用之兵不满五千，地方一名总兵官手下士兵不过百余人；三是省内府州县官员缺额甚多；四是贵州安氏土司与播州土司世代有婚姻关系，如果他们联合对付朝廷，贵州将难保全。是年七月，杨应龙率军攻陷綦江，



明军死伤无数，贵阳距播州很近，土民惶恐。面对极度困局，郭子章奏明朝廷，先从邻省调拨饷银，招募士卒，并任用称职官员；后让按察使杨寅秋向水西安疆臣陈说利害，又派人到镇雄争取安尧臣，应许安疆臣在平定杨应龙后归还播州所侵水烟、天旺两地以酬功，得到了安氏的出兵支持；同时筹措军饷，激励士气，不仅稳定了危局，还为整个战役的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郭子章任职贵州的同时，朝廷着手组建以李化龙为统帅的征播大军。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李化龙出任湖广、四川、贵州总督兼四川巡抚；朝廷特别设置偏沅巡抚，拱卫湘西、黔东，保障后勤畅通，由江铎任巡抚；湖广巡抚支可大率一军由东向西威慑杨应龙的军队；郭子章负责贵州军政事务。

布置停当，李化龙率主力由重庆向播州攻击前进；郭子章指挥官军一部及安氏土司部队由南向北夹击。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明军分八路向播州挺进，经过近四个多月的战斗，于六月六日攻陷播州最大的据点海龙囤，杨应龙自焚。杨氏二十九代，七百余年的统治结束。

郭子章劳心劳力，既要稳定和恢复地方秩序，又要在此基础上，轻徭薄赋、协济赈济，疏浚河道、修路架桥，设府县学、添置学田，推动贵州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充分展现出了郭子章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治理能力。



郭子章

对待水西安氏问题上，郭子章多次坚持己见，甚至不惜辞官。播州之役后，总督王象乾不同意归还水烟、天旺两地。郭子章上奏坚持要兑现承诺，如不同意，愿罢官去职。大臣吕邦耀又弹劾郭子章受贿纵容奸贼，郭子章更加要求罢官去职。朝廷最终同意归还安氏土地。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川官员认为安尧臣冒袭镇雄土知府，欲对其用兵。郭子章则认为安氏平播有功，而且十年前安尧臣入赘镇雄时，四川说安陇同族，十年后却说非我族类，还责怪贵州。朝廷采纳了郭子章的意见，以平播前功，授安以土知府。所以贵州百姓为其建生祠七所，水西安氏则建有怀德祠，与诸葛亮、关羽同祀。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郭子章的父亲、继母尚在世，生母在其两岁时去世，他全凭继母罗氏悉心抚养得以成人。那年，郭子章已是65岁的老人，再不回家尽孝，恐会遗憾终身。于是他第九次上疏请求致仕（退休），皇帝批示：“郭子章久习边事，本难听其遽去，但屡疏陈情，词意恳切，准回籍养亲，以俟起用。”虽然获得批准，但拖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郭子章才得以与巡抚胡桂芳办理交接。这时，郭子章已在贵州整整十年。贵州诗人谢三秀作《送青螺郭公俞告还豫章》为他送行，诗云：“淡烟芳草送征轮，自是高堂有老亲。定省百年蒙圣主，安危万里仗劳臣。陶潜赋就宁因菊，张翰归欤不为莼。出处于公关世道，还看白发照麒麟。”这首诗感情真切，非一般应酬之作可比。

## 二、为贵州留下重要史料

郭子章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官吏，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在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等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宦辙所至，随地著书”。他一生的著作多达七十五种，七百余卷。在黔任职期间著有《黔记》《黔草》。

《黔记》六十卷，属私家所著的贵州地方通志，全书十九万字，是研究贵州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人物传记只收录人物在贵州的事迹，但对前任江东之则采用其同门好友邹元标撰的传记，详叙其平生，并喟叹江中丞抱恨已歿，



而我不能为他申冤辩白，“诚愧之矣！诚愧之矣！”郭子章还和当地绅士将江东之未完成的甲秀楼工程修建完成。他还在《黔记》中专门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作《理学传》，对黔中王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他本人年轻时曾在求仁书院拜胡直为师，与邹元标同门。而胡直曾问学于王守仁门人欧阳德、罗洪先，所以郭子章宗王学，属江右王门一系，以“慎独”“戒惧”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故他为学不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和家国兴亡。他试图融合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认为格物致知的“格物”是格物之本，身心意志为本，家国天下为末，强调道德修养。

《黔草》三十七卷，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平播之役的奏疏，是研究播州战争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其余各种论述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郭子章一生勤于著述，在他回乡的当年，父亲去世，在守孝的三年中仍然笔耕不辍，著有《苦草》六卷。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里，他著有《养草》七卷、《圣旨日记》五卷，这两部书都是研究郭子章及万历年间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有文献学学者统计，郭氏一生著述不下百种，凡任官之处，均有著作，兹列最重要的几种：《闽前草》六卷、《芜关则例》三卷、《瓜仪志》十卷、《留草》十卷、《粤草》十卷、《圣门人物志》十二卷、《潮州府季考录》四卷、《韩山校士录》三卷、《赌戒》二卷、《蜀草》十卷、《浙草》十六卷、《两浙由票便览》十一卷。

### 三、在贵阳刻印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

郭子章是一个善于接受和学习新生事物的官员。明朝中后期，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更好地在中国传教，绘制一幅标注西方文字的世界地图，引起很多中国有识之士的兴趣，希望能有标注汉字的版本。利玛窦几经修订，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完成并出版标注汉字的名为《山海舆地全图》的世界地图，远在贵州的郭子章获得一份。利玛窦是郭子章任潮州知府时，通过肇庆知府王泮认识的洋朋友。此前，中国士大夫

的地理知识来自《尚书·禹贡》《山海经》及各代地理沿革，对世界地理不甚了解。郭子章获得《山海輿地全图》后，仔细研读，完全接受了这一新的知识，决定推而广之，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郭子章亲自组织在贵阳刻印《山海輿地全图》。当时中国的印刷技术主要是刻板，难以印出大幅的世界地图，郭子章的办法是将其分割刻印成书，并亲自作序。在序言中，郭子章对輿图及其作者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中国的高级官员如此盛赞一个洋人及其著作，在当时是会遭保守人士猛烈攻击的。郭子章刻印《山海輿地全图》，让贵州的官员、士人接触到世界地理知识，拓宽了视野，成为贵州西学渐入的滥觞，其功不可没。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郭子章在家乡去世，终年76岁。



郭子章所编《黔记》



## 明代天末才子谢三秀

谢三秀（生卒年不详），字君采，一字元瑞（或作玄瑞），又字芝房，晚年自号萍隐丈人。贵州前卫（今贵阳）人，明代诗人。

谢三秀青年时代，因别具诗才，得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官员的器重。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作万里游，足迹遍及东南各省。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赴北京参加次年会试，临别作《留别开府青螺郭公》赠郭子章，诗云：“客情秋色共苍苍，耐可离筵菊正黄。为访杜蘅先过楚，敢云词赋重游梁。孤猿夜啸千峰月，匹马寒嘶万里霜。前路总令知己在，怜才谁似郭汾阳。”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谢三秀与同乡杨师孔（字愿之）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谢三秀落榜，杨师孔得中。是年夏，二人同游北京西山、黄金台等名胜。秋天，谢三秀取道京杭大运河南下，到江西临江拜访辞官居家的诗人、戏剧家汤显祖，作《汤祠部义仍先生召集玉茗堂赋谢》诗一首。汤显祖亦作《养龙歌送谢玄瑞吴越游兼呈郭开府君》《又送谢玄瑞游吴》《春夜有怀谢芝房》等诗见赠。在江南，谢三秀还先后结识了王穉登（字伯谷）和江南著名画家、诗人何白（字无咎）等人，相互间有诗词唱和。大约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谢三秀离开江南返回贵阳。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贵州担任巡抚近10年的郭子章告老回江西泰和原籍，谢三秀写诗表达了对郭子章的知遇之恩和眷恋之情。郭子章的继任者胡桂芳，左右参政谢存仁、马煜如，学政韩光署等都是诗人，对谢三秀亦加

青睐，相互间也有唱和。这一时期，贵阳诗人越玉岑、越其杰、余兴贤等，以及从省外回来的李时华、杨师孔等，都与谢三秀有诗文往来。

明代晚期，贵阳城南沿南明河逐渐成为官绅的别墅区，谢三秀笔下的《越郡丞玉岑公江阁二首》《仲夏越汉房孝廉溪园对月》《夏日集薛文叔孝廉西岩放舟川上作》《越郡丞南园小集次韵》《李刺史承明吟望亭》，留下了当年南明河的景象。

谢三秀酷爱游历，回到贵阳不久便出游云南，在路上写下《三月晦日小箬道中》《迤澄桥晓望》《石佛寺借僧寮瀹茗》《普定圆通寺登飞翠阁二首》《种花吟赠顾叟》《安庄夜闻警》《叠水止小憩歌》《关岭马跑泉》《痘泉》《怀归》等诗。

明万历四十年（1612）秋，谢三秀以贡生赴京，国子监肄业后，获得官职。在京城，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并在和友人的聚会中留下不少诗篇。后谢三秀离开北京，到浙江天台，数年后返回贵阳。天启初年，谢三秀经历了贵州宣慰使



谢三秀《雪鸿堂全集》



同知安邦彦和永宁宣抚司奢崇明的叛乱。战乱平定后，谢三秀与同乡好友越其杰同至南京。时贵阳杨文骢（字龙友）与不少贵州籍诗人亦在南京，大家相与宴集唱和，杨文骢有《春日同谢君采先生，唐大来、熊庭阶、李卓如、蔡湘渚诸词人游燕子矶》诗；谢三秀有《玄武湖同仁看藕花踏月夜归有述》《冬夜来子鱼、薛千仞、范漫翁、唐大来共集小斋》等诗，记叙了在南京的一段岁月。

遗憾的是，此后谢氏活动无人知晓，留下团团迷雾。

谢三秀毕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诚如他在给侄子谢上选（字文若）的一首诗中说“我独工诗不厌穷”。他因在诗词创作上成就卓著，时人有“正始遗音”“天末才子”之称誉。其所著除《远条堂稿》外，还有《雪鸿堂诗集》，录诗千余首。谢三秀游历东南时结交的诗友李维桢（字本宁，官至尚书）为之作序，序称谢诗“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备具”。又说：“整而不滞其气，雄而不亢其旨，深而不晦其致，清而不薄其辞，丽而不浮，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备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远条堂稿》刻就，官至吏部尚书的王祚远是贵州普安人，也是谢三秀的朋友，欣然为该书题词：“读余友君采氏所为《远条堂稿》，若近若远，若浅若深。若建万石之钟，撞之以莛；若舞长空之雪，御之以风。隐见出没，造微入化，即杂之北地信阳、长沙、京口诸名集中，无以辨也。”贵州诗人吴中蕃也说：“先生之诗冲融淹润，绝无鬼趣器习。”

《雪鸿堂诗集》《远条堂稿》已佚，经傅玉书、莫友芝收集共存180余首，刻成《雪鸿堂诗蒐逸》，又载入《黔诗纪略》，另有散文《东山记》一篇传世。

## 为官润民不润己的潘润民

潘润民(1571—1641),字用霖,号朗陵,晚年自号味澹居士。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明代诗人,官至云南左布政使。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潘润民乡试中解元(举人第一名);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任礼部主事,升礼部员外郎、郎中;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奉派到广东任督粮道副使,摄布政使事。当时广东已是明中央政府的重要赋税收入地,但尚无健全的赋税制度,一些不法官绅相互勾结,侵害百姓。潘润民奉命按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赋役全书》,使赋税征收有章可循,阻止了侵害百姓的行径,获得“潘副使润民不润己”的赞誉。潘润民在广东一年多,因为勤政清廉,升任四川布政司参政。

在四川参政任上,潘润民负责建昌的军事防务。明天启元年(1621)夏,潘润民辞官回到贵阳。九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因拒绝明廷将其军队调往朝鲜,杀四川巡抚徐可求等20余名官员,公开举起叛明大旗。在很短的时间内,奢崇明攻占重庆、泸州、遵义、合江等重镇。贵州宣慰使同知安邦彦与贵州西部、云南部分土司趁势而起,相互声援,一时势成燎原。贵州宣慰司军队迅速攻下平坝、安顺、毕节等地,进而合围贵阳。当时贵阳大部官员已奉命进京,留有巡抚李耘、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学佾事刘锡元等,守城军队仅3000多人。李耘、史永安立刻召集回籍乡官潘润民、杨师孔等人,组织军民分别把守各门。在围城之初,潘润民以千金助军饷。次年一月,历经10个月的围城,贵阳城内粮绝,



牲畜乃至树皮草根都被吃尽。潘润民在自己的住房周围堆满干柴，一旦城破，全家自焚。他同时写下《围城诀命》诗：“婴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眼枯。烽火连云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为怜豢养垂三世，遑恤伶仃有二孤。力尽自甘抛一死，昂藏宁肯负吾躯。”这首诗是贵阳当时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在守城军民几乎濒临绝境时，巡按御史史永安作《饮血歌》以自勉，潘润民亦作《围中次史磐石侍御韵四首》和之，诗中“四郊密垒腥膻恶，十月重围鼠雀无”“千家已烬烟逾惨，万骨成陵涕欲流”，写出了当时贵阳城内的一片凄凉景象。十二月，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率部驰援，击退水西军，贵阳解围。据《贵州通志·前事志》载：“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孤城卒定。”

明天启四年（1624）秋，潘润民被重新起用为河南参政，不久，改任广东巡按使。因贵州西部及云南东部的明军与水西的战争仍在继续，到广东后，潘润民又被任命为云南右布政使，兼负曲靖一线的军事防务和后勤补给，参与会剿水西的军事行动，后因病回到贵阳。明崇祯十二年（1639），潘润民再次被起用，任金沧道副使，上任仅一个多月，又调云南任左布政使。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潘润民在酣睡中逝去，终年 70 岁。

潘润民著有《味澹轩诗集》若干卷，在贵阳被困时毁损。其子潘驯凭记忆恢复了一部分，加上搜集战乱后所作，共 90 余篇。《黔诗纪略》收入 70 篇。

潘润民的诗风格质朴，声律工整，功夫深纯，其作品多为感情的真实流露。除贵阳被围时的作品外，他晚年所作《喜盘江铁桥成》《喜盘江江西坡等城以次落成》等诗作成为珍贵的史料。

潘润民之子潘驯、潘骧皆是诗人，后世子孙，七代十二人皆有诗集，编成《潘氏八世诗集》若干卷，人谓“二百年风雅不坠”。

## “诗书画三绝”的杨龙友

杨龙友（1596—1646），名文骢，以“龙友”为字，又号山子。贵州卫（今贵阳）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弘光政权右佥都御史。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文学名著《桃花扇》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的呕心之作，它借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出了南明一代的“兴亡之感”。这幕历史悲剧，处处扣紧一把扇子，这把扇子是侯、李定情之物，是人事沧桑的见证，写出了“情”和“感”。当侯方域被迫出走之后，抚臣田仰强逼李香君为妻，香君拒而不从，一头撞在地上，飞溅的鲜血滴滴洒向扇面。杨龙友看了血扇，深表同情，便在血滴之间，补衬些翠枝青叶，画成了一枝折断的桃花，引出了这个足可令人哭一回、笑一回的故事。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龙友出生于贵阳南明河畔的石林精舍，一个园林景色秀丽、书香气息浓厚的地方。其父杨师孔是个有学问、善书画的人。杨龙友少负不羁之才，文章、剑术皆擅，尤耽书画，意有所会，即伸纸泼墨，如风驰电掣，不能自休。他自幼癖嗜山水，10岁时即从父登临泰山，朝观日出暮谒月，为烟峦翠霭所迷。明天启四年（1624），合家随父移居南京，住在“二水中分”的白露洲。杨龙友时年28岁，对秦淮秋月，流连忘返。他偕同父亲畅游天台、雁荡，湖光山色，月影松明，冲惟相狎，恰如读旧书，见故人。他遍历江浙山水，情随景迁，跌宕风流之气大为抒发，于是为诗、为文、为画，成



为誉满江南的风流才子。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杨龙友免不了有些风花雪月的事，因此被牵扯进《桃花扇》的剧中来。剧中的杨龙友，风度翩翩，风流自赏，是一个能将“三山景色供图画，六朝风流入品题”的名流，偶尔作画于媚香楼，便博得香君一笑，其画作被赞为“真真名笔”。《桃花扇》中的杨龙友，被描写成一个看不分明、说不清白的奸诈小人，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杨龙友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真实的杨龙友是一个“得诗书画之中三昧”的奇才，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是一个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奇男子。

杨龙友的诗，奇丽瑰异，被列为“崇祯八大家”之一。他早年的诗，大都收入《山水移》中。后期的诗，收在《洵美堂诗集》。杨诗脍炙人口，每吐一语，无不与秋峰竞秀，掷地作金石声，不少诗作被收入明末付梓的《八大家诗选》。

说到杨龙友的画，南京城里无人不知，“虽片楮尺幅，人争宝之”，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他作画，能“纳天地灵秀之气”于胸中，“奇者移而幻，巧者移而淡，俊者移而深，丽者移而幽，奔而峭者移而静且远”，自然、逼真、悠远而得神韵。执明末画坛牛耳的董其昌，见了《山水移》中的画，大为惊叹：“杨龙友生于贵筑，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龙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见其止。”画兰竹是杨龙友的一大绝技，他一生中不知画了多少兰竹，以兰竹自比，抒发超凡脱俗的情怀。



杨龙友《仙人村坞图》

杨龙友的书法，功力深厚而有创新，字如其人，有潇洒之气。他的字从颜体入手，以章草为本，融入米南宫笔意及杨太师、董其昌布白之法，字体方正，豪放俊逸。诗、书、画三者成就了杨龙友的艺术人生，现《杨文骢诗三种》及《杨龙友书画集》均已出版，可见其“诗书画三绝”。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龙友乡试中举，同年娶马士英之妹。马士英、阮大铖与阉党余孽勾结，遭人唾骂，杨龙友也被牵连进来。诚如《明史·杨文骢传》所说：“然其父子，以马士英故，多为人诋讟。”事实上，杨龙友并没有因马、阮飞黄腾达。他6次进京会试，都因不合时宜而名落孙山，38岁时始入仕途，做了个不入流的华亭县教谕。几年过去了，他才好不容易补了个知县，但不久又因营救“复社”文人得罪了阮大铖，成了罢职县令。

清顺治元年（1644），弘光政权建立，杨龙友受命监军京口，观长江之胜，以金山踞于大江之中，地控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奏请筑城防御，阻止清兵南侵。不久，杨龙友升迁兵备副使，分巡常州、镇江二府军务。正当此时，清兵大举入关，长驱南下，扬州陷落，史可法就义，人民惨遭杀戮，清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城事件——“扬州十日”。及至清兵临江，杨龙友驻扎金山，扼长江天堑与清军隔江对峙。清军以竹木编成大筏，置灯火于筏上，夜半放至中流，大举来攻。杨龙友下令以炮轰击，清兵一败涂地。

然而，清军以破竹之势，席卷江南，乘迷雾潜渡偷袭，迫岸时明军方知，仓皇列阵于甘露寺，遂被清军所败。南明隆武元年（1645），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立隆武政权，杨龙友任兵部侍郎，不久任闽浙总督。南明隆武二年（1646）六月，衢州告急，杨龙友提兵驰援。七月，清军蜂拥而至，几路进攻福建，郑芝龙不战而走，吴易兵败被俘，杨龙友独木难支，被迫退守蒲城。他与福建兵备副使孙临合兵一处，欲夺仙霞关以为据点，但关隘已被清军所夺。经过一场血战，杨龙友、孙临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被清军所俘。清军主将贝勒博洛再三劝降，二人宁死不屈，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八月二十五日壮烈殉国，时年50岁。杨龙友的妻妾、子女及侍从全家36口，一同赴难，正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



丹青”。

蒲城人民慕其气节，为之举哀，将其忠骨埋于大树之下。之后，孙临的侄子寻得杨龙友和孙临遗骸，举行火化，以衾被相裹送往安徽桐城，葬于城东 30 里处的枫香岭，后人称“双忠墓”。

## 主纂《贵州通志》的著名诗人吴中蕃

吴中蕃（1619—1696），字崧生，号滋大，一号大身，晚号今是山人。贵州前卫（今贵阳）人。明末清初诗人。

孔尚任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对同时代人的作品多有挑剔，更瞧不起贵州人。他在《官梅堂诗集序》中写道：“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至于黔、贵，则全无。虽天生之才，其聚散多寡之数，不可得知。大抵诗之所在，即才之所在也。”他以诗来衡量人才，认为江浙人才最多，山东、河北、河南次之，山西、四川再次，福建、广东、云南尚有，而贵州却无，于是觉得“黔中无人”。

后来有朋友从贵州来，带给孔尚任一本诗集，题为《敝帚集》，是吴中蕃的作品。他漫不经心地翻阅诗集，兴趣越来越大，竟至爱不释手。读完之后，他深感抱愧贵州，提起笔来为《敝帚集》作序。他写道：“先生为人，余无从悉其概。观其诗，则身隐焉文之流。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兹果得《敝帚》一集，杂体千余首，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知其中未尝无人……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岂非盛事！”

孔尚任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他认为吴中蕃的诗歌水平，可与当时全国著名诗人并论，且吴中蕃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杜甫相似，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相似。



所以，吴中蕃“取法于上，仅得其中”，诗歌水平自然高，即使中原的博学之人，也未必能超过他。孔尚任的好友，著名诗人、戏曲家顾彩在序《敝帚集》时说：“读其诗，若颜、若谢、若陶、若杜，盖才大学博，郁郁不得志于时之所为；想见其人，亦今之商於之四皓，香山之九老，衣冠甚伟，迥非时辈矣！”顾彩认为他的诗像诗人颜延之、谢灵运、陶渊明，其人又像秦汉间隐居在商山的四位情操高尚的隐士。

《敝帚集》一扫外地名士对贵州的偏见，使天下知道黔中有诗、黔中有诗之大才，使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吴中蕃家住贵阳城郊石板哨芦荻寨（今花溪天河潭风景区）。吴氏世代为书香门第，祖父吴淮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子科解元（举人第一名），官至户部郎中。父亲吴子祺，明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任兴宁知县，以才干闻名。其家与贵阳名门越氏（越其杰）、杨氏（杨师孔、杨龙友）、潘氏（潘润民、潘驯）为世交。因有家学渊源，他能诗善文，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因战乱未能入京应试。他外出远游，足迹遍于江浙、直隶、京师，多与高人韵士往来，“转益多师，故学行皆有根底”。明亡后，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王朝”，辗转来到安笼（今安龙县），吴中蕃被起用为遵义知县，不久升重庆知府、吏部文



吴中蕃

选司郎中。

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入黔，永历帝逃往云南，吴中蕃弃官还家，隐居贵阳城中梦草池，以诗文自娱。清廷以云南知府相召，吴中蕃辞而不就。平西王吴三桂为云贵总督，以“复明”号召遗民反清，吴中蕃信以为真，遂入吴三桂幕府。后来吴三桂称帝的野心暴露，吴中蕃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拂袖而归，重返故里。及至吴三桂死，其孙吴世璠继立，想招吴中蕃出山，派人前来威逼。吴中蕃佯装疯癫，将友人方以正赠他的珍贵端砚猛掷于地，断为三截，使者见他已疯，不再相逼。吴中蕃将断砚拾起，重新补缀，深感痛惜，于是作《断砚草》，表达他不愿随波逐流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康熙年间，贵州两次编修《贵州通志》，均聘吴中蕃为总纂。先是曹申吉任贵州巡抚，聘吴中蕃、潘驯主纂《贵州通志》，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成书，凡三十三卷，附有舆图，《土司》后记有少数民族和人物风俗画，是为《贵州通志》（康熙）前志。后因“三藩之乱”，志书刻版多有散失，遂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再修，由贵州巡抚卫既齐主修，吴中蕃、李祺为主纂，刘子章、周起渭等五人为分纂，比前志多了一卷，志目有所调整增补，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付梓，是为《贵州通志》（康熙）后志。

吴中蕃一生著述宏富，经史之书有《四书说》，文集有《听古集》《响怀堂集》《文集续编》，诗作有《敝帚集》《腐草》《断砚草》。他又删订了《坡仙集》《明文选》《选明高杨张徐集》《曹能始诗集》《袁海叟集》《韵会》，并将谢三秀的诗辑为《雪鸿堂诗选》。《敝帚集》集诗千余首，是吴中蕃诗的代表作。“敝帚”二字寓有深意，吴在自序中写道：“世有王朝蔡中郎，而后《论衡》乃不徒作。有石蕙袁中郎，而后文长可以不死。俯仰人群，千古一遇，是帚也，徵独人敝之已矣！”

吴中蕃生活在风雷激荡、世事多变的时代，颠沛流离，漂泊一生。他不愿随世浮沉，与时俯仰，“愿为江上独立之青峰，不愿为天边弄影之明月”，写出许多沉郁、幽怨、饱含愤慨的作品，故“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



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他的诗，一记战乱，一记山水，亡国之痛、生民之苦皆有所记，直抒情怀，“见其然，言其已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喊出了“谁能从沸汤，一为扬清波”的呼声，“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

## 《康熙字典》首席修纂官周起渭

周起渭（1664—1714），字渔璜，又字载公，别号桐埜。贵筑县（今贵阳）人。清代诗人，《康熙字典》修纂官之一，詹事府詹事。

周起渭出生于距贵阳市花溪 28 公里的黔陶乡骑龙村，从前是白纳长官司驻地。这里有一座小山岗，林木苍翠，岗前是一片飘香的稻田，有小桥流水、荷塘月色。树丛之中有座石谱寺，环境清幽。寺边有一口清泉，水极甘冽，据说



周起渭

人喝了这泉水便会聪明起来，故称之为“聪明泉”。周起渭早年在石谱寺读书，做官后捐资重修此寺，人称“桐埜书屋”。书屋里现陈列着周起渭的生平事迹介绍及著作、字画，还挂着他穿朝服的画像。

周起渭先祖周可敬为白纳长官司长官，父亲周国柱为贵阳府生员。周起渭自幼聪明伶俐，14 岁时所作的《灯花诗》传诵一时。22 岁时他参加贵州乡试，名列榜首，成为解元。贵州巡抚卫既齐爱其才，令其参加《贵州通志》编纂。总纂吴中蕃为贵州有这样年轻有为的奇才感到无比欣慰，作诗一首赞扬他：“欲觅替人欣已得，可知倒履自难禁。



愿将绝俗超凡事，慰我相期无限心。”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周起渭进京赴考，中三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了京官。他初为翰林院检讨，后升侍读学士，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顺天学政，受命参与编纂《皇舆表》和大型类书《渊鉴类函》。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帝下诏编纂《康熙字典》，以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玉书和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总纂官，修纂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贾国维等合力完成，周起渭衔名第三。《康熙字典》的编纂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大壮举，其收字47035个，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故时至今日《康熙字典》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在俗文学研究如敦煌学领域，它是研究者手头必备之书。周起渭以学识渊博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为皇帝讲经，兼记康熙皇帝言行，继又升任詹事府詹事，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詹事府原是为辅助东宫太子而设的机构，设有满、汉詹事各一人，



花溪骑龙村桐塋书屋

秩正三品，负责朝会、春秋二季经筵、编修实录、圣训及国史，并随皇帝出巡。周起渭在京为官 20 余年，成为清朝最后一任实际掌管太子宫的官员，即雍正帝之师。

周起渭初至翰林院时，同僚瞧不起这位来自贵州乡间的进士，以为他生于遐荒，不娴声律。值馆试，周起渭一挥而就，即兴而作《万寿寺大钟歌》。他以歌行体述说了北京万寿寺永乐大铜钟铸造原委，引出了明成祖朱棣篡夺皇位骨肉相残的史实，进而抒发明朝“帝王子孙无所处，血溅长陵一抔土”的历史感慨，立意高远，构思精巧，气势不凡，震撼人心，在座大惊失色，从此诗名鹊起。其所作《泛舟西湖夜半始归》七绝，脍炙人口，诗云：“天边明月光难并，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此诗颇受推崇，被认为“较东坡别是一格”，“断句入耳，有终身不能忘者”。周起渭的诗歌尽得神韵，营造出优美的意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在京师“异军突起”，“拔戟成一队”。康熙皇帝问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当今“诗人为谁”，陈称史申义和周起渭。一向傲视诗坛的毛奇龄，对周很青睐，他在《稼雨轩诗集序》中写道：“贵阳周先生以接天之才，力持大雅……昔所称风雅之宗，领袖群彦者，非先生欤！”周诗数百首集为四卷，初名《回青山房》，后改名《稼雨轩》《燕山尘土》，最后定名为《桐埜诗集》。周起渭把黔诗推向京师，饮誉海内，西南大儒郑珍对其极为推崇，在《书桐埜书屋图后》中写道：“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谢三秀）。国朝二百年，吾首桐埜翁。雪鸿宦不达，桐埜寿未丰，天欲文西南，大笔授两公。谢诗春空云，周诗花林虹。吾以二公较，尤多桐埜雄。”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周起渭病逝于京师，享年 50 岁。他死后无嗣，灵柩由其父周国柱和其弟周起谦运回贵阳，葬于花溪区骑龙摆桥山下的松坡。其墓现被列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将北京樱花巷的公馆捐作贵州会馆，贵州人进京赴考时，多寄宿于此。青岩镇思潜村蒙贡寨的高车桥，因系周起渭捐资修建，周官居詹事府詹事，故名为“官詹桥”。



## 治理台湾的有功之臣周钟瑄

周钟瑄（1671—1763），字宣子。贵筑县（今贵阳）人。清台湾诸罗知县、荆州知府。

台湾省嘉义市为古诸罗县城，诸罗知县周钟瑄创建的城隍庙至今保存完整，庙中供奉着周钟瑄的神像。在当地人们的心中，周钟瑄是一个造福人民的“神”，他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台湾地区编印了一本《台湾先贤先烈专辑——周钟瑄传》，把周钟瑄、阮蔡文、陈梦林三人称为“诸罗三贤”，并举行了三贤“圣像开釜”仪式。几百年过去了，台湾人民对周钟瑄开发之功铭刻在心，深切怀念。

周钟瑄，清康熙十年（1671）生于贵筑县白纳长官司驻地。他与周起渭同宗，按辈分是周起渭的叔叔，而年龄比起渭小。周钟瑄幼时父母双亡，靠叔父抚养成人。他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相继做了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顺天督学周起渭的幕僚，后补官为福建邵武知县；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转迁台湾诸罗知县。

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归附清朝，清王朝设立福建省台湾府。当时的台湾府只有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诸罗县地广人稀，境域辽阔，南起新港，北至基隆、淡水、花莲等地，大约占台湾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县境多山，以诸罗山得名。

诸罗土著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结合为许多番社，大头目称阿莫，以下有阿四、老加、大宇、吞仔等小头目，大抵还处在氏族、部落阶段。他们

过着原始生活，不知稼穡，诸罗 34 社土番以捕鹿为生，“民不火食，以草蒙面，以鹿皮蔽身”，谓之“生番”；诸罗山、哆啰囷、新港军等 6 处，“番汉错居”；开化、善化、新化、安定 4 番，多是福建泉州、漳州、福州移民。番社赋税为 2 ~ 2000 两银不等，各番社岁派鹿筋、鹿皮、鹿茸、豹皮若干，“官以通事为纳贿之门，通事得借官为苛索之路”。周钟瑄上任后，一面奏请将赋税“酌减十分之二”，一面勒石禁止一切苛索，减轻人民负担。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周钟瑄召见各番社阿莫，以酒肉款待，再三抚慰，阿莫大为感动，率 3000 余人归附。周择平地安置番民，授田土，给牛具、种子，教民以稼穡，发展农耕，人民安居乐业。当地百姓感其恩德，为之立祠塑像，每逢生辰之日为之庆贺，盛赞其为“周公”。



台湾嘉义市城隍古庙内供奉的周钟瑄神像



台湾气候炎热，又多台风暴雨，降雨多集中在台风季节，十月至次年五月则又干燥无雨，旱涝之灾使百姓不堪其扰。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兴修水利，故周钟瑄认为治理诸罗“最加意者，莫如水利”，于是捐俸倡修“陂”（筑堤蓄水以供灌溉）和“圳”（引溪泉以灌田）。首功当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引八掌溪水，开道爷、将军二圳，筑诸罗山大陂灌溉田亩。弥陀寺石碑记载：“诸邑城南数里许，有柴头港等十七庄，素称沃土而缺水，民以灌溉为艰，前邑侯周公钟瑄，为民开凿，引水筑陂，灌溉之利，甲于一邑。”他亲自踏勘，悉心筹划，筑陂修圳百余里。他在任期内，修筑了诸罗山、柳仔林、八掌溪、双溪口、西双潭、马龙潭、鹿场、打马辰等 16 陂，以新营庄大陂 20 公里最长。陂、圳建成后，诸罗旱地多改为水田，种植稻谷一年两熟，“三年之间，田谷倍收”，“民已富庶，地益丰腴”。

诸罗原无县城，周钟瑄到任后，环设木栅 680 丈，设东、西、南、北四门，城中建衙署、馆驿、城隍庙，成为台湾最先兴建的城池之一。他建仓储谷，捐资修县内粮仓，又新建下加冬庄、六门庄、半线庄、淡水等仓。他在诸罗至府城必经之路上架设木桥，又修西出澎湖、东出笨港的水道，以利交通。

“兴教淑士”是周钟瑄的又一大建树，“广励教化，使邑之人，明知学之为贵而群趋焉”。他在县城建学宫以供讲学，仿文翁治蜀奖掖学士，在番社设社学 4 所，“择熟番子弟之秀颖者入学读书”。他又在乡间办义学，择师教诲，置学田以养学，还提倡民间办私塾，文教日渐兴起。

周钟瑄认为诸罗新辟，资政缺乏要览，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创修《诸罗县志》，周钟瑄为主修，陈梦林为总纂。“陈梦林字少林，福建漳浦人。少发愤读书，留心经济。康熙二十五年，客游贵州，以贵州籍应试，学使拔第一。”《诸罗县志》编纂严谨，“存其所信，去其所疑”。全志共 12 卷，分为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志 12 门，并将周著《生番归化记》附入。《番俗图》中，有番民乘屋、插秧、获稻、登场、赛戏、会饮、舂米、捕鹿、捕鱼、采槟榔 10 图，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土民的生产、生活。

历来言台湾地方志书者，多推崇《诸罗县志》，称其为“台湾方志中之第一”。

周钟瑄任满离去，继任官员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清康熙六十年（1721），激起了朱一贵起义。义军发展到30余万人，波及台湾全境，清廷急调闽、粤之军镇压。事平后，总督满宝、巡抚曹国材以周钟瑄在台湾有政声，保举他以吏部员外郎身份署台湾知县。周到任后，平定粮价，安定民心。总督满宝主张将朱一贵等斩尽杀绝，周再三劝阻，声称“俱属良民”，只因官府所逼才铤而走险。巡抚曹国材主张清查田土以增赋税，周则认为“台湾居海外，宜宽以之，不可操切”。在他的治理下，台湾社会安定，人民颂声悦耳。

清雍正六年（1728），周钟瑄离开台湾，改任荆州知府。清乾隆八年（1743），周钟瑄因事被人诬陷，发配军台（清廷设在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邮驿）。其时，他已72岁，遂奏请以其子明德代戍，周钟瑄归故里就养，赋闲著书。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周钟瑄卒于故里，享年92岁，葬于花溪骑龙金鸡坡。



## 能诗善画的武状元曹维城

曹维城（1683—卒年不详），字价人。贵筑县（今贵阳）人。贵州唯一的武状元。

曹维城家居贵阳城南常平仓（今曹状元街）。曹家不仅是行伍人家，更是武举世家。曹维城的父亲曹元肃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武科进士，从二品副将；儿子曹石，清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武科进士，也是从二品副将。曹维城幼时便学习武术，涉猎兵书，天赋甚高。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时年19岁的曹维城参加贵州武科乡试，中武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外场武科弓箭、步箭、舞刀、掇石；文科策问、文论、默写武经，均名列前茅，即中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20岁的曹维城考取武状元后，先被任命为御前带刀侍卫，后官至云南副将，有良好的政绩。

曹维城武艺高强，尤其擅长长剑及画戟，“长剑倚青天，高门列画戟”是其形象而具体的写照。他虽是武状元出生，但没有武夫骄横跋扈的作风，更没有豪门显贵的傲气。他性情豪迈豁达，俊雅斯文，能诗善画，与当时贵州著名诗人吴中蕃、朱文、瞿脉、潘德征多有交往，诗酒唱和，论诗作画，有奇士之风。广顺朱文《曹价人状头招饮，以诗见嘲，因和之以诗》其诗开头即说：“我爱曹公子，风流多蕴藉。二十夺状头，三十称诗伯。”说明曹维城30岁时，诗已经写得很好。

曹维城不到40岁就辞官返乡，一直住在常平仓。他著有《飘然子集》，未

刊行，已佚，仅存《初秋登黔灵赠瞿脉上人》二首，分别载入《黔诗纪略后编》《贵阳府志余编·文征》。其一：“黔山精舍好，相对有名僧。道悟无生妙，禅参最上乘。茶煎涧中水，香霭佛前灯。不许凡尘到，云岚护几层。”其二：“居与佛庐近，探幽不厌频。开来天外寺，隔断世间尘。檐敞风烟细，窗虚笔砚新。白云常在处，从尔问禅真。”诗词描绘了深山古寺的宁静幽雅和表达了诗人远离尘世的情感。

曹维城之子曹石，字乖崖，清雍正二年（1724）中武进士，官至御前侍卫，副将。曹石虽为行伍，亦爱诗文，曾跟从贵阳周起渭学诗。其著有《秋烟草堂稿》3卷，录各体诗180余首，多为吟咏山水，怀念故交，抒发情感之作。其词句清新流畅，极少雕琢和缠绵之意。其咏唱贵阳名胜古迹老鸦关、东山、富水、南堤等处的诗作，流传一时。如《东山秋望》云：“天空地旷浩无边，万里苍茫落照前。猿鹤自驯山自老，一声长啸破秋烟。”《雪中饮南堤小楼》云：“几树丹枫抱小楼，一时风物更添幽。聊将残雪三冬梦，寄与梅花一片愁。白石桥边流水外，黄茅屋低玉溪头。鹧鸪裘典临邛酒，谁识相如是倦游？”



## “山水观我”的书画家邹一桂

邹一桂（1686—1772），字原褒，号小山，又号让卿，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人。清代著名画家、诗人，曾任贵州学政。

邹一桂祖父邹忠倚，清顺治九年（1652）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父邹熙森，工书画，家藏名画极丰。受家庭熏陶，邹一桂年轻时除攻读四书五经外，酷爱绘画，其妻恽兰溪也善绘画。邹一桂科举屡试不第，直到清雍正五年（1727）中二甲第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仕途亨通。其历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官至内阁学士，加赠尚书衔。

清雍正十年（1732），在云南道监察御史任内，邹一桂上疏奏请严禁地方官与不法之徒勾结，私自蓄养女奴，以此获取奸利，并提出给违者以失察处分，雍正皇帝准其所请。清雍正十三年（1735），在担任贵州学政期间，邹一桂又上疏请求整治科场弊端。清乾隆七年（1742），邹一桂转任礼科给事中，湖南巡抚许容因诬陷弹劾粮道谢济世被撤职，后许容又被任命为湖北巡抚。邹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邹一桂上疏要求将许容撤而复出的理由诏示天下，“以平舆论，以明赏而维国法”，乾隆皇帝被迫收回成命。清乾隆十年（1745），邹一桂迁太常寺少卿，上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镣，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

匡床以束其身，铁箠以直其项，观音圈以挛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匡床无异，请敕严禁。”乾隆皇帝批准废除了这些酷刑。见到刑部的监狱里已经判决的犯人与还未判决的关在一起，犯人有串供机会，外加有其他弊端，他上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乾隆皇帝予以同意。清乾隆十一年（1746），其任大理寺卿，办案认真，反对草菅人命，多次纠正冤案、错案，并对监狱管理进行整顿，严禁各监狱以非刑折磨犯人。清乾隆十四年（1749），皇帝下诏各大臣举荐深明经学而又品德高尚的儒生，邹一桂举荐无锡著名学者顾栋高，顾荐举第一，被朝廷录取。清乾隆十九年（1754），在礼部侍郎任内，同部侍郎张开泰徇情保举邹一桂之子为国子监学正，事发张开泰被革职，邹一桂被降三级留任。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授内阁学士。



邹一桂《山水观我》——黔灵山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邹一桂获准辞职回乡。乾隆南巡时，赐“画禅颐寿”匾额。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其赴京祝皇太后寿辰，第二年从京城返家，卒于东昌途中，享年86岁，赐祭葬，加赠尚书衔，国史馆立传。

邹一桂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山水画和花卉画。邹一桂能诗善画，尤擅工笔花卉，间作山水。其山水效法宋人，花卉学恽南田，清润秀逸，别具一格。他曾精心绘制百种花卉，每花题一诗，集成《百花卷》进呈乾隆皇帝，深受赞赏，乾隆皇帝为《百花卷》题了百首绝句。邹一桂复写一卷，恭录御制于每种之前，而书已作于后，藏于家。他的诗画作品有《小山诗钞》《大雅堂续稿》《百花诗卷》《小山画谱》，以及选评《本朝应制琳琅集》，主持修撰家谱若干卷。他的传世绘画作品有《春华秋实图》《五君子图》《秋出萧寺图》《芙蓉蓉图》《蔷薇朱藤图》《红桃白梨图》《太古云岗图》《玉堂富贵图》《万笏朝天图》《仿宋元集萃册》等。

邹一桂任职贵州学政6年，与贵州山水结下浓厚情缘。清雍正十三年（1735），他被任命为贵州提学使，沿途写生，描绘楚黔山川景物，后来在此基础上，画成《楚黔十三景》一册。在贵州任职期间，游历贵州山川，任满回京以后，凭借自己对贵州山水的深刻印象以及众多的写生稿，以游记形式描绘出湘黔大地名胜古迹的画册——《山水观我》。他在序言中写道：“人不观山水，山水日起而观人。”这本画册洋溢着文人画家的气息，诗与画的组合让观者产生无限的诗意思象。画册共绘湘黔山水22帧，作品依次为《穿石》《清浪滩》《辰溪》《马嘴岩》《黄绕山》《天柱县》《相见坡》《玉屏山》《石阡》《关索岭》《飞云岩》《鸡公岭》《帮洞》《铁锁桥》《白水河》《九里箐》《葛镜桥》《东山》《黔灵山》《云崖洞》《照壁山》《涵碧潭》，除前5幅绘湖南风光，余17幅皆绘贵州景色。画作构图或雄壮或奇险或开阔，设色或水墨或浅绛或青绿，均为兼工带写、形神并重的写实之作。《山水观我》通过实地考察的形式进行绘画，每一幅画在构图上都以现实风光作为依据，从构图与技法上，都给人们非常丰富的呈现，展现了200多年前贵州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风貌，堪称贵州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 黔中大儒理学大师陈法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又字圣泉，晚号定斋。清朝贵州安平（今平坝县）人。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

陈法少年立志求学，参加科举考试，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乡试第二名，同年秋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平坝第一个进士。他早年仕途不顺，宦海沉浮 30 余年。晚年无意仕进，清乾隆十四年（1749）遇赦归里，清乾隆



陈法

十七年（1752），陈法任贵山书院山长，从此潜心讲学，著书立说，为贵州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说起陈法不得不提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创建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在明代阳明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是贵州创建最早的高等学府，清末改制为贵州大学堂。书院的山长或主讲一般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或名家大儒，贵山书院是贵州教育史上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建筑规模宏大、培养人才兴盛的书院。从清雍正十一年（1733）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 170 年间，先后共有 40 多名山长，其中最著名的山长



是贵州人陈法、艾茂和福建人张甄陶，称为“贵山三先生”。“贵山三先生”中，陈法主讲贵山书院近20年，时间最久，成就最大，堪称贵山书院的“山长之冠”。

陈法任山长伊始，首要之事是整饬规制，革弊鼎新。他亲自制定《贵山书院学规》九条和《贵山书院学约》十四条，对贵山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原则、读书之法、考查之法、奖惩之法等做了详细规定，将书院的教学活动纳入规范管理，对学生读书、为人、处世等提出了要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他认为要把“明义理”作为学生求学的首要目的，“义理”就是合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为学先明义理”即做学问应该先学做人。他反对心怀功利而读书，认为“读书在明义理，不惟博取科名”“读书先须打扫心地干净”，要求学生潜心理学，去除利禄之心。他还强调“为学不只读书”，读书只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and 途径，学习的目的在于“修身”，才能更好理解“义理”，不应死记硬背。陈法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发展和成就，经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把贵山书院推到极盛，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后来书院为贵州培养出了两个状元。在其教学思想的影响下，开黔省书院教育一代新风，为之后的掌教者树立了模范榜样。

《贵山书院学约》十四条：一、为学须先明义理；二、义理即日用事务当性之理；三、为学不只是读书；四、《大学》规模宏远；五、读书先须收敛身心；六、读书应循序而有常致；七、读书在明义理，不惟博取科名；八、其学也为己，其仕也为人；九、士为俗，不可医；十、穷经将以致用；十一、学有根底，则文为有用；十二、读书要有感发兴起之处；十三、读书先须打扫心地干净；十四、学者先器识而后文艺。

陈法不拘泥于讲学，长期执教中，善于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一生著述颇丰，涉猎广泛，除了教育，在理学、易学，甚至在治水方面都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醒心集》堪称他教育方面的代表作，其好友陈宏谋在该集中作序称：“吾宗定斋先生，主黔南书院讲席时，以儒县理学之书，恳恳为诸生言之，既知所向方矣。复取四子书中尤切近者，为文以为明之，名之曰《醒

心集》。”该书为清代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体系。陈法曾任山东运河道、江南庐凤道、淮扬海道，与黄河、淮河以及运河打交道，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总结历代治河经验，结合亲身实践在清乾隆十年（1745）著成《河干问答》一书。《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称《河干问答》是清代治河中非主流派的著名代表作，对其价值做出高度评价，“书中对黄河夺淮之害有深刻论述，并提出了黄淮分流、黄河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等主张；反对‘黄淮合流’‘筑堤束水’和‘蓄清刷黄’之说，并首先提出‘沙见清水而沉’的论点，对黄河高浓度含沙水流特性有独创性认识”。他提出的改漕运为海运的建议，到光绪年间也得到实施。清代是易学研究大发展时期，张甄陶著有《周易传义拾遗》，艾茂著有《易经入道集义》，而陈法所著的《易笺》八卷被称为是继王夫之《周易外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力的易学著作，亦是我省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学术专著。此外，陈法在理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在《明辨录》中，对程朱、陆王之异进行了深入研究。

除了传道解惑，陈法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藏书。清乾隆十一年（1746）黄河决口，河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因为白钟山辩枉，55岁时被流放。被贬途中，以骆驼负书万卷相随，日夜精读研习。任书院山长时，他将两年的收入共二百金全部捐给书院，作为诸生求学的费用。由于当时黔地相对闭塞，图籍稀缺，陈法数次派人前往京师购置内版图书贮之院中，供师生披览研读，贵山书院因此成为当时贵州藏书最为丰富的书院。

陈法为官清正廉明，为教更是倾尽全力。他以自己深厚坚实的学问功力和师表先范的人格魅力训诲诸生，启迪后进。其对贵州教育的贡献，在清乾嘉时期即被学界肯定。道光年，准陈法入祀贵州名宦乡贤；民国时期，又载入《贵州名贤像传》。陈法这样的乡贤名师，能堪为其任，堪称楷模，当之无愧。



## 台南民俗人文的缔造者蒋允焄

蒋允焄（生卒年不详），字为光，号金筑。贵筑县（今贵阳）人。清台湾分巡道道尹、学政。



蒋允焄在台期间捐出了自己的薪资，在法华寺旁兴建了一所新的学堂——南湖书院

蒋允焄于清乾隆元年（1736）中举，次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他曾任浙江余姚、甘肃秦安、直隶怀安知县，山西晋州知州，升江西九江知府，后调任福州、漳州、台湾知府，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又调任汀漳龙巡海道道台，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其间在台湾任职最久。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蒋允焄调任台湾知府，对推广大陆文化，促进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经济建设、交通发展、水利兴修，特别是建造园林、寺庙道观、桥梁、书院等均有很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受台湾民众景仰。

蒋允焄上任时，台湾府治所在台南，他认为无论在何处做官都是人生的短暂经历，要珍惜时光，不慕名利，遂以“雪泥鸿爪”的典故为名，建鸿指园于衙署旁，将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刻石立于园内。自己写一篇《鸿指园记》抒发胸臆：“署西偏，广可数亩，古榕三株，蟠根屈曲，志称榕梁，枝叶层翠，又称榕屏，旧四合亭址也。岁久且芜，予就而新之。芟荒涂，凿深沼，护花栏，砌曲径，别作堂宇以为游观。中列三楹，盛宴会也。左缚小亭，备游憩也。右架层榭，凭眺望也。夫古人流连景物，偶然寄之，去无所贪，来无所恋。汉水岷山，陵谷变迁。欧阳公尝讥杜预、羊祜汲汲于名，是不著于苏氏雪泥鸿爪之说为足尽其义也。予台阳守土，几历两载，思海外风景吏民相安，百堵皆作，成于不日。所谓偶然而留，亦为其可留者耳。园既成，取以额之，因书其微指于此。”

蒋允焄在台南建鸿指园，并不是简单地建造一所园林，而是将江南的园林艺术带到宝岛台湾，让台湾人民欣赏和了解祖国的园林艺术。蒋允焄自认为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雪地上留下的鸿爪。而这“鸿爪”，今天却成了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海峡两岸文化的一脉相承。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蒋允焄在台湾台南地区捐出俸银，带头新建堰



岸桥和德安桥，造福当地人民，并“筑长堤，广一丈五尺，上广八尺，高六尺，延袤八百余丈”。为此，台湾民众特立《大老爷蒋重修德安桥记》碑以作永久纪念，碑仍存台南大南门外碑林。

台南城南法华寺旁南湖，为台南自然风景区，年久失于治理，积淤甚厚。蒋允焄发动民众清淤疏浚，修建台榭亭祠，恢复其风景游览，使之成为台湾赫赫有名的佛教圣地，并作《新浚永康里南湖碑记》以记其事。《台湾县志》载有《半月楼篇》一文：“半月池，即南湖也。知府蒋允焄浚之，又建半月楼其上，端午之日，竞渡于此。阖城男女，逐队以观，极一时之盛。”同年，在台湾分巡道任上，蒋允焄鉴于分巡道衙署内只有澄台、斐亭等基础建筑，空地较多，便陆续修建了权月楼、鱼防槛、从桂径、延薰阁等 13 处名胜。这些名胜构思不凡、布置巧妙，而命名则更显出他的学识渊博及独具匠心。

蒋允焄来台前是漳州知府，他一向重视教育，尤其是对书院的建设。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将漳州丹霞书院讲堂、书舍进行扩建，“宽其庭宇，中构一堂”“筑书舍三间，建门二重，绕之以墙”。清乾隆三十年（1765），他用同样的方法，把台湾台南府学宫以西的海东书院择地重建，还捐出俸银在法华寺旁建造讲堂，修建学舍，建成南湖书院。

在台湾任职期间，蒋允焄对教育很重视，无书院的地方，他兴建书院；书院损坏、破败的，他组织重修；经费困难的、难以开办的，则拨出公款补助。他还进行过一次“清士籍”行动，此举改变了台湾的教育状况和性质，是台湾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他发现下属中有少数办理文案的人并不称职，社会上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冒充科举出身私自开馆授徒，误人子弟。他决定把这些冒牌先生清理出去，以正台湾教育，同时引进真正的有学之士，办好教育，为台湾培养人才。

蒋允焄根据民众的信仰和需求，重建或新建一些寺庙道观，其中供奉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神祇。台湾有一传说：某年，有人拟在大冈山上修建佛寺，取名昭峰寺，报请知府蒋允焄批准。蒋允焄在察看地形之后准予修建。他吩咐

负责修建的人说：“此山很高，运瓦上去不容易，尔等只需将瓦运至山下，到时本府将会派人代运上山。”待瓦运齐山下后，蒋允焄传出话来：某日某时本府台将借助神力，使瓦飞上山顶。消息传出，四面八方的人纷纷齐聚山下，前来观看蒋老爷“驶飞瓦”。不久，蒋允焄到了，对来观看的人们说：“要看驶飞瓦，请每人顺手带一二片瓦上山观看。”不到一个时辰，人们争先恐后地到了山顶，山下的瓦也被全部带走，并按指定地点放好。这时，蒋允焄才对大家说：“飞瓦已借大家的手上山了。我要说的借助神力，就是借大家的力量来完成飞瓦任务。”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欢笑不已。

蒋允焄在台期间，总共兴建了七寺八庙，如药王庙、水仙宫、风神庙、龙神庙、天后庙、武庙官厅、万寿宫等。其中不少至今都是台湾的历史名胜古迹，是台湾旅游的重要看点。台湾社会的历史民俗，很多就是通过这些场所生根发芽的。

台湾山多地陡，雨水又多，所以洪水泛滥是常事。对古代台湾同胞来说，出行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因为经常遇到陆路不通的情况。为此，蒋允焄做主大力兴建路桥工程，以便民众出行。据统计，蒋允焄在台期间，通过个人捐款和募集资金的办法，主持修建了木桥6座，水路通道门15座，构筑堤坝800余丈。

蒋允焄任职闽台16年，政绩卓著，深受民众爱戴。史评：“蒋允焄历任台湾府道，清平无事，政和年丰。”其离任时，台湾民众立长生禄位，供奉于台南药王庙。蒋允焄在漳州“两任十载，百废俱举”，百姓勒石竖立“去思碑”以表怀念之情。



## 清廉自持、诗礼传家的周奎

周奎（1741—1822），字照域。贵筑县（今贵阳）人。清代学者。

周奎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做人嶙峋磊落，治学严谨，艰苦卓绝，成为一方表率。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贵州巡抚贺长龄以周奎事迹格外感人，疏请入祀乡贤祠，并撰写《乡贤教谕周公传》，称赞他虽身历极端贫苦而不改其志、力学而有成的精神；清廉自持、乐善好施的品德；严于家教、教育子孙成才的风范，并以之勸勉贵州学子。按察使吴振棫亦作《乡贤周照域先生传》。

### 一、忍苦力学

周奎家本书香门第，祖父时家道中落，陷于贫困。家中仅有茅屋两间，破败不能蔽风雨；荒山几亩，耕地贫瘠，常以菜根作食。周奎少年时代，终年只能穿短单衣，无棉衣裤御寒过冬。父亲常以忍苦力学为教诲，谓虽奇穷而不可废读，并督促其执经问难，坚持苦读。清乾隆二十年（1755），父亲病逝，年仅14岁的周奎与母亲尽力奉养80余岁的祖父。冬天寒冷，周奎便天天外出捡拾干柴、挖掘树根，烧火给祖父取暖。一弟两妹尚年幼，周奎常背负弟妹上山打柴、下地割麦，以分担母亲的操劳。劳动中稍作休息，周奎便拿出随身携带的书籍诵读，往往忘记饥饿和疲劳。晚上母亲纺织，燃麻秆照明，周奎亦在亮光下读书，从不间断。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祖父、母亲先后病逝，不到20岁的周奎，5年中3次治丧，哀痛万分，辛苦万状。

乡人萧晟见周奎贫苦而力学，便召入其家读私塾年余。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1)，周奎补为县学生，得食廪饩，生活开始稳定，更加勤奋攻读，同时节衣缩食，先后为两妹出嫁办理嫁妆。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周奎乡试中举，即筹措路费赴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不想竟名落孙山。为节省往来旅费，他留居京城，一面教读，一面治学，准备再次应试，结果仍然落第，只得回乡。

## 二、设馆教读治家尤严

回到贵阳的周奎在乡设馆教读。清嘉庆六年（1801），其任贵州开泰县教谕，教导学生先行谊，后文章，特别注重思想品德和操守教育。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以年老辞职，在家课读子孙。周奎性格坚毅、廉洁，责任心极强。在乡教读时，特别注重生徒的思想品德和操守教育。周奎很重视家庭教育，治家尤严。他在《家训》中教育子孙要诚实守信、真诚待人、自强自立、勤学上进、吃苦耐劳，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做品德高尚的人。在其严格教育训迪下，其子际华，清嘉庆六年（1801）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历任河南辉县知县、江苏兴化知县、泰州知州等官；次子际钊，清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刑部山东司主事，后回籍掌教贵阳贵山、正习书院；孙项，清嘉庆十五年（1810）进士，翰林院编修，后任江苏常镇通海道。子孙在外做官，周奎常寄书诫诲，要求他们“努力自效，毋忘贫贱”。

## 三、以己之力建花溪园林

周奎长期居住在花溪，这里景色幽雅，自然风光秀丽。他以己之力，先后在花溪河畔麟山建楼，龟山筑阁，蛇山遍植松柏花草；在河中垒石为坝，蓄水成潭，疏浅渚为洲，修空地为屿，奠就花溪园林风景的基础。周奎去世后，其子孙仍然尽力培植修葺花溪园林，开辟道路，为地方民众提供了一个游览休憩的去处。《麟山记》石碑至今仍立于花溪公园麟山脚下。

清道光二年（1822），周奎病逝于家，享年81岁。其著有《立命篇》《励学篇》《来西录》《麟山记》《家训》等。



## 骁勇善战的“朱虎”朱射斗

朱射斗（1724—1800），字文光，号辉亭。贵筑县（今贵阳）人。云南普洱镇总兵，四川川北镇总兵。

朱射斗祖籍山西洪洞，曾祖时入黔定居贵阳府贵筑县。祖父朱继昌，县学诸生。父亲朱成林，荔波营把总。朱射斗兄弟三人少时随父母居住荔波。其父病逝后，奉母回贵阳，一面就读私塾，一面练习骑射，虽然年少却有远大志向，后因家贫只得放弃学业，入贵州提标后营当兵习武。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随安顺提标后营从征缅甸，以军功授外委（下级军官）。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又从征大小金川等地，以果毅善战、足智多谋渐有名声，受到将军阿桂所赏识，以战功先后任贵州平远协把总、新添营千总、荔波营守备，湖北施南协都司、襄阳镇标右营游击，广西宾州营参将，贵州平远协副将，赏戴花翎。



朱射斗

金川之战历时数年，朱射斗身经大小

战斗 188 次，连带 9 伤，率军攻破碉楼 12 座，获军械器杖无数，积功受赏 13 次。清乾隆五十年（1785），他升任湖南镇筴镇总兵，后又调任云南普洱镇总兵。普洱镇是边陲重镇，辖地内民夷杂处，私贩违禁品是当地一患。朱射斗严于巡察，“抚绥得宜，民皆向服”，老百姓安居乐业；对部队管理“恩威并济，军容整饬，训练有方，民不骚扰，士皆用命”，境内秩序安宁。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朱射斗进京觐见皇帝，率部从征噶尔喀，驰赴西藏；翌年，先后调任福建福宁镇，四川川北镇总兵；清乾隆六十年（1795），朱射斗率部回师贵州参与云贵总督福康安部镇压黔湘苗民起义；清嘉庆元年（1796），因击杀义军首领石柳邓（贵州松桃人），嘉庆皇帝颺琰赏其干勇巴图鲁号（军功赏赐封号，勇士之意）；清嘉庆四年（1799），已年逾 75 高龄的朱射斗，奉命参与四川总督魁伦会剿川、楚、陕流民起义；清嘉庆五年（1800）初，义军在冉天元率领下由定远渡嘉陵江拟进入川西坚持长期斗争，朱射斗率部众 3000 追击至蓬溪高院场，陷入义军 8000 之众的重围，激战中遇坎坠马，仍手刃 10 余人战死，时年 76 岁。听闻朱射斗战死，嘉庆皇帝十分痛惜，下诏照提督议恤，赐二等轻车都尉世袭。清嘉庆八年（1803），入祀昭忠祠，赐谥“勇烈”。

纵观朱射斗生平，他因镇压过农民起义而被诟病，后来几乎不被人提及，而拭去其身上的历史尘埃，后人也要正视其参加过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平定过制造分裂的土司叛乱的历史，率部驰援西藏等，其功过应该是分明的。今贵阳中华中路与富水路间有街名“勇烈路”（王家巷），因曾经建有朱射斗的祠堂而得名。



## 一心为官、一心向民的周际华

周际华（1772—1846），原名际岐，字石藩。贵筑县（今贵阳）人。周际华在多地为官，刊印贵阳最早的女诗人合集。

周际华是周奎之子，其父曾任开泰教谕，赴京参加礼部考试，留京7年。周际华与家母生计艰难，他便一面在学馆教授蒙童以赡养母亲，一面求学于贵山书院。因居住花溪，其家离城30余里，他每日半夜便动身赶到城里书院，下学后疾行回学馆传授蒙童，饥饿或太过疲劳时，便在田间地头稍稍休息。

### 一、开仓济民

嘉庆三年（1798），周际华乡试中举人，三年后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因要赡养父母，请求改任教授。清嘉庆七年（1802），其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到任时恰逢遵义旱灾，饥民争相抢夺粮食，社会动荡不安，周际华请求县令胡德英开仓放粮。可是县令胡德英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请示上级，待批示后再作决定。周际华则认为，遵义离省城贵阳300里，公文往还要六七日，况且上官批准与否还不得而知。这六七日的的时间，不知多少人要饿死，不知多少家会家破人亡。于是他劝知县说：“擅自开仓放粮，不过是丢官问罪，但可以救活很多百姓，为救百姓，何惜一官。官丢了，还可设法恢复，不应成为履行职责的障碍。”好在胡德英也是一个有担当的官员，他听从了周际华的建议，果断开仓济民。百姓的恐惧之心得以消除，社会秩序回归正常。数日后天降甘霖，灾情缓解。秋粮

收获后，所放之粮还归官仓。

## 二、疏浚河道

清嘉庆十四年（1809），周际华因母亲病故，守孝期满，补官都匀府教授。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被保举为知县；清道光六年（1826），选任河南辉县知县。辉县境内有卫水、峪河、东石河，时常发生水灾。县内有明万历年间辉县知县陈必谦开凿的一条新河，开凿新河引卫水东流，再至县南，转而向西南流入卫水。这是消除卫水水患，且能够灌溉两岸农田的利民措施。然而，200余年来未经疏浚，已形成严重壅塞，丧失灌溉功能。峪河原修筑有红石堰以防洪水四溢，红石堰年久失修，峪河淤塞；东石河泥沙壅积，河床高于平地。每至汛期，卫水、峪河、东石河、新河不能泄洪，县境成为泽国，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周际华到任之初，走遍县境，勘察各条河道，率先捐出薪俸，号召县民出资并参与疏浚河道和堰塘。周际华组织县民就近分段承担疏通和加深工作，定时完工，并开凿60余丈的新河道将东石河与新河连通，经过周际华和辉县全县人民的努力，最终疏浚了河道，从而摆脱了水患。

## 三、振兴教育

周际华任辉县知县期间，发展生产，振兴教育。周际华鼓励县民种植桑树4万株，其他树种15万株，并对每户所种之树登记造册，时时派人去检查。桑树成树后，辉县的蚕桑业随之兴起，民众大获其利。经济发展后，周际华便着手教育方面的建设，他出资购买房屋，用于扩大辉县百泉书院规模，并为书院拟定《学约十条》，鼓励学子向学。同时又办义学10余所，分别教授优秀的乡民。乡贤是当地人的表率，起着教化激励当地民众的作用，周际华将辉县乡贤邵子高、孙公和、姚文献、耶律文正、孙复峰等人的祠堂一一修复，此举团结和教化了当地民众，对引导民心向上起到重要作用。

任职兴化知县时，周际华最为关注的是地方教育，于是拨款资助该县文正书



院。为振兴一方经济，他出资设局，购置2部机床，30辆纺车，聘请有经验的纺织能手担任教师，教10岁以上的民间少女学习纺织，并供应原料和饮食。民众生计有所改善，安居乐业。同时，打击盗贼，维护社会安定。

#### 四、修峡石险道

清道光十一年（1831），周际华调任河南陕州知州。从澠池进入陕州，峡石驿道是必经之途，其中有40余里的陡峭险峻山路，来往商旅经常发生翻车折轴事故，于是有人做起乘人之危的勾当，雇劳力背负商人货物走过险途，以此获取重利，也不乏趁机劫盗财物之徒。周际华到任伊始便倡导州民捐银8000余两，雇用千余人凿平险要，并购地将路拓宽。在动工之初，不法僧人为了自身利益，鸣钟召集不法之徒阻碍施工，周际华将此一千人逮至州衙，严加惩治，排除干扰，仅两个月，陡峭险峻的山路成为平坦之途。在施工过程中，出土一块碑，其上记载雍正年间总督王士俊修峡石驿道之事，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今福泉）人。事隔百年之后，又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周际华再次修峡石驿道，陕州民众及商旅对贵州人的为官无不称道。

#### 五、实地勘察灾情影响

清道光十五年（1835），周际华因亲戚朱树出任河南布政使，按制度须回避，奉调江苏。离任之前，恰逢辉县遭遇蝗灾和大水，他亲赴实地勘察灾情，请求上官缓征赋税。上官以十年前就已免除过州民的欠税，民不至于太穷困为由，拒绝缓征。周际华再次呈文向上官报告实情：“今年从春到夏，庄稼尚未长成就遭遇蝗灾，继而又发生水灾，民之流亡，十室有九，有关部门不敢上报蝗灾，但又不忍心不报，只好选择上报水灾，报请缓征……民方得以喘息……对贫困已极的民众强征赋税，必会激起民变，发生民变有关部门也会被追责，这对国计民生都无好处。要巩固国家的根本，必须做到尽善，民情是可悯的，也是可畏的。”周际华在离任前，还不忘关心民众的疾苦，直言不讳，难能可贵。

## 六、治理兴化，进言林则徐

清道光十七年（1837），周际华调任兴化知县。兴化与盐城、阜宁、东台、泰州、高邮、宝应、山阳等县均是黄河故道、淮河、长江下游之区域，河网密布，水患频仍，兴化处诸县之中，地形低凹，犹如釜底。其西面是高邮湖，也是南北漕运、盐运的必经要道。每年汛期到来，兴化遭受水患较之周围的州县尤为严重。各河道都设置水闸，汛期是否开闸排水入江，事关各县利害，对盐的生产及运输也有影响。因此，开闸泄洪的权力集中在两江总督之手。周际华到任后，针对汛期实情及各方利害关系的协调，特向两江总督林则徐呈递报告，并附绘制地图。报告说：“兴化县就像处于锅心，西、南、北三面受水，东面通海却地势偏高，水不能即时排放，范仲淹做兴化县令时所修的范堤，在特大洪水时，像侧翻的锅，溢出的洪水淹没大量农田，时间长达数月。即将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获，全都被水漂走，村民们只能住在自建的窝棚内，到年底饥寒交迫，只能束手待毙，其惨状我实在不忍说下去。漕运河道最便于排水的是人字河，因为运盐设拦江坝，不肯开闸泄洪，实则是因开闸后，水流湍急，不利于运盐船牵挽。后又奉总督批示‘待扬州长生庵水位到五尺以上，府厅迅速上报请示，不得擅自开闸’。而请示往返需十多天，这十多天，水天天上涨，水势是不能等待的，一旦洪水涌向下游州县，对盐运不过是十四里水程的牵挽之费，比较下游七州县庄稼房舍，盐场设施被淹，亿万生灵性命处于险境，国家不仅要免除赋税，还要投入巨大的财务赈灾，哪个损失更大？我谨将绘制的下游地图一并呈上，恭请上级审视利害，如果总督林公（则徐）能批准三沟闸水位到一丈二尺，知府与同知可开闸放水，无须请示。如蒙批准，请刻成石碑，成为永久的制度，这对国家赋税，人民生命财产都有好处。”林则徐看到呈递的报告后，立即采纳了周际华建议。从此，七州县的民众免受长期水患之灾。



## 七、请赈饥民

清道光二十年（1840），周际华调江都兼署泰州知州。自古以来，江都沿江地区连年遭遇水患，民众痛苦不堪，然而江都系漕运重镇，富庶之地，盐仓、粮仓积蓄甚富。是年水灾，周际华为民请命于两江总督裕谦，得粟九万石以赈饥民，使沿江的数十万民众得以重生。次年十月，英军攻陷定海、镇海。英国军舰直入长江，沿江两岸民众惶恐不安，唯独江都安宁。人们说这得之于周际华“请赈之力”。不久，周际华任泰州知州，管理泰州水坝，因江防有功，保举加同知衔。

## 八、刊印贵阳唯一的女诗人合集《枣香山房诗集》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周际华子周頊出任常镇通海道。按制，父子不能在同一省份为官，周际华须回避，遂于次年退休回籍。周际华回到故里，常与老友许西池交往，他发现许家的几个女儿和孙女都别具诗才，尤其是长女许秀贞（号芝仙）不仅能诗，也善绘画，画风在元代画家倪瓒、明代画家沈周之间。许西池教女儿拜周际华为师，当周际华看到许秀贞的《枣香山房诗集》，极力鼓励刊刻问世，诗集中还收入许氏女儿遇贞、淑贞、梦贞，孙女芳欣、芳晓、芳盈、芳素及知府刘春台女儿刘起凤的作品。周际华承担编订并作序，在序中极力主张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在他的倡导下，20余名官绅欣然为《枣香山房诗集》题词。正是周际华的开名，为后世留下了贵阳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诗人合集。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周际华病逝于贵阳，享年74岁。

## 才德兼具的学者诗人傅潢

傅潢（1773—1837），字星北，号筱泉，又号松眉。贵筑县（今贵阳）人。学者、诗人，清广西全州知州。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傅潢生于贵阳书香之家。其祖籍江苏，明成化年间，其先祖傅恩官居湖广布政使，后殉难于荆州，从此子孙流寓湖北、湖南两地，最终定居贵阳。傅潢天资聪敏，对诗尤有兴趣，在其父教导下，6岁时诵读《毛诗》（西汉时毛亨、毛萇辑注的《诗经》），就能解悟，13岁开始创作诗歌，16岁便能写出工整而富于艺术性诗歌。

### 一、以洪亮吉的人格学问为终身楷模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贵州学政洪亮吉读到傅潢的诗作，对其诗才大加赞赏，立即将19岁的傅潢补为县学生员。洪亮吉在任贵州学政之前，已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傅潢入县学后，洪亮吉亲自将他带入经学领域。当时贵州各府、县学条件简陋，缺乏书籍，洪亮吉购买经、史、通典、文选等充实各府书院，为贵州学子研读经史提供条件，傅潢自然是其中的受益者，对这位导师的学识人品极为景仰。清嘉庆三年（1798），25岁的傅潢游学湖南，先后在新宁、清泉居住，历时4年，学益精进。

清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因敢言直谏，奏疏洋洋数千言，锋芒直指皇亲国戚及其党羽，损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也隐约有埋怨皇帝处置不公的意味，



遭到严厉的处罚，先是被判死刑，后又改谪戍伊犁。洪亮吉被流放的第二年，京畿地区发生大旱灾，皇帝亲自祈雨，却无济于事，于是下令清理冤狱，放回那些久被充军的犯人，洪亮吉获赦返回原籍常州。

在外游学的傅潢得知洪亮吉获赦后，立即整装前往常州看望恩师，见到这位数千里外赶来的贵州弟子时，洪亮吉感慨地说道：“过去我在贵州任提学使，得到优秀的人才翟锦观，其余都未能通晓我的学说，你回去后为我传播。”

返回贵阳后，傅潢以洪亮吉的人格学问为终身楷模，就学于“悦山先生”翟翔时。翟翔时是贵阳著名学者、诗人，他教的学生考中举人，参加会试的有百余人，步入仕途的有数十人。翟翔时于经学尤长《尚书》《左氏春秋》，教授学生“严谨有法，经义各制，各相其材”。因得洪亮吉及翟翔时的教诲，傅潢“学行咸有矩则”。

## 二、为官廉洁勤勉

清嘉庆八年（1803），傅潢被任为贵定教授，作《诗义长篇》二十五卷。第二年，他参加乡试，仅中副榜，遂北京游学数年。在此期间，傅潢与著名诗人、书画家张问陶，学者包尔赓、陈云交游。当时王引之任河南学政，王引之与其父王念孙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在王引之的官署中聚集的多为当时著名学者。张问陶、陈云是王引之的好友，他们推荐傅潢承担校阅校勘，这使傅潢得以遍览珍贵的典籍并作《筱泉笔记》。清嘉庆十三年（1808），傅潢任国史馆誊录，次年改任八旗教习官。清嘉庆十五年（1810），应顺天（今北京）乡试，其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同年返乡特别取道江南，至常州祭扫恩师洪亮吉之墓，流连三日才离去。

傅潢归故里后，主讲于贵阳正习书院，历时八年之久，深得贵州巡抚曾燠敬重，曾燠委托傅潢校订自己的著作《赏雨茅屋集》末卷。清道光二年（1822），傅潢选授直隶博野知县。当年博野县大雨成灾，米价因之飙升。傅潢奉命赈恤灾民，亲自为灾民发放救灾粮食，救活了不少百姓，后改任满城知县。总督蒋

攸铈只听说过傅潢的名声，但对其是否清廉还有待考察，于是借诉讼案件，暗中派人以钱财贿赂，但遭到傅潢的严词拒绝。傅潢由此获得总督蒋攸铈信任。清道光四年（1824），傅潢经蒋攸铈保荐改任丰润知县，上任一年，丰润县蝗灾大起，为了不使虫灾蔓延，傅潢率领民众到田间捕杀蝗虫。但布政使仍以救灾不力，欲将傅潢撤回省城，幸因总督明察，坚决反对，傅潢才免遭不白之冤。清道光十一年（1831）后，傅潢先后任广西兴安、苍梧知县，全州知州；清道光十四年（1834），任百色同知；次年任广西同考官、全州知州。傅潢为官廉洁勤勉，每至所任州县，清查旧案，平反冤狱，缉捕盗贼，招募乡勇，民众对其政绩甚为称道。

傅潢一生涉猎广博，好与名人交游，因此其著述方正典雅，尤以经史见长。其主要著作有《庭训》四卷，取材先秦诸子及汉宋著名学者格言以教导子孙，书分《志学》《修己》《与人》《接物》四目，近似《颜氏家训》，又有《诗集》十六卷。

道光十七年（1837），傅潢准备调任西隆知州时，突患重病，病逝于广西桂林，享年64岁。



## 保境安民的台湾淡水同知李嗣邨

李嗣邨（生年不详，卒于 1839），字衡峰。贵筑县（今贵阳）人。他主持纂修的台湾《淡水厅志》二卷，为淡水历史上第一部志书。

李嗣邨于清嘉庆九年（1804）乡试中举；清嘉庆十五年（1810）成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清嘉庆二十年（1815），充实录覆校官；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补内阁中书，充国史馆方略馆分校官，兼办稽查房事务、文渊阁检阅。他以勤于政事、自奉俭朴著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李嗣邨出任福建平潭同知。

清道光元年（1821），他调任江苏兴化知府。时兴化因灾减收，饥民遍地，粮价腾贵。李嗣邨带领部属巡视所辖州县，掌握灾情，一面设局赈济，一面率官吏、士绅、富商捐资，大量购粮平糶市场，粮价迅速下降，民心始安。事后，百姓为之立“平糶碑”于府署，以赞扬救灾之功。其后回任平潭。平潭地处沿海，时有海盗出没，抢劫渔民、商旅。李嗣邨到任后，募士勇缉拿海盗首恶，处以极刑，沿海治安好转。其后任福建乡试内监试官，升任建宁知府，调任福宁知府。

清道光九年（1829）九月，李嗣邨调补台湾淡水厅同知。淡水是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处之地，烧杀掳掠的事不时发生，治安混乱，治理难度大。李嗣邨在任期间，平息纠纷，查禁械斗，消除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积怨，和睦相处；又在厅之四面设隘寮 48 座，每寮设隘丁 10 至 16 人，加强巡防，保一方平安；又多次捐资购米赈济灾民，并鼓励百姓搞好农耕。他主持纂修的《淡水厅志》二卷，为淡水历史上第一部志书。清道光十五年（1835），他以病乞休回籍。归家后，

其受贵州巡抚贺长龄聘，督修贵阳尚节堂。李嗣邺勤谨、负责，并捐银 500 两，尚节堂建成后，颇受乡人称赞。清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李嗣邺病逝于贵阳家中。



## 勤政爱民的云南巡抚张日晷

张日晷（1791—1850），名日暄，字东升，号晓胆、默庵，晚号松庐。贵州清镇（今清镇市）人。清代名臣，云南巡抚。

张日晷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严母的教导下，他磨砺心志，奋发图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中举。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日晷再战文场，荣膺进士，就此步入仕途。离开家乡时，母亲拉住张日晷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居家侈，累在一家；居官侈，累在百姓。”这句话令张日晷刻骨铭心，之后成为他的为官之道。

张日晷先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在翰林院的四年间，他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撰写。其学识才华为嘉庆、道光两朝皇帝所赏识，道德、文章亦被朝臣同僚所敬仰。

清道光元年（1821）之后，张日晷先后担任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湖南、河南乡试正考官。典试期间，他选贤与能，唯才是举，“所得多知名士”。

清道光九年至道光二十六年（1829—1846）间，张日晷先后担任四川叙州知府、成都知府、建昌（今西昌市）兵备道、浙江盐运使、四川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等职，所到之处，惠政善举甚多，广受百姓好评。

在叙州任上，适逢府属筠连、雷波等地遭受水灾。张日晷闻风而动，迅速赶往灾区，当夜宿在破庙内。第二天，他勘察地形，带领百姓疏浚水道，使灾情由大化小，民众的损失降到最低。在对待灾民的问题上，他苦民之苦，急民之急。



张日晟

他广设粥棚，周济灾民，又秉承母意，捐银千两办励节堂，安顿无依无靠的寡妇，使其免受冻馁之苦。在张日晟的惠政下，叙州数万百姓幸免于难。

任成都知府期间，张日晟“锄强暴，治讼狱，动合机宜，民以神仙称”。人谓其善于鉴别选拔人才。在主持成都府试时，张日晟无意中看到一份被阅卷官“批抹”的考卷。由于深谙考场弊端，觉得其中大有问题，为了公平正义，不埋没人才，在其干预下，经过重试，发现这位罗文光考生才华横溢，识见高远，于是将其拔置第一。

张日晟对地方经济十分关注，当得知成都地区民众对种桑养蚕热情不高时，他感到有些困惑。在其心中，蜀锦美艳绝伦，扬名天下，不仅是百姓生存的依托，而且是地方经济的生命线。为引导民众种桑养蚕，振兴地方经济，他亲自撰写《树桑百益书》，并兴办养蚕讲习所，培养民众养蚕技能。在其大力推动下，种桑养蚕户日益增多，收入亦随之增加，经济效益在第二年就体现出来了。

张日晟调任四川建昌（今西昌市）兵备道时，正值雅安春荒，粮价猛涨。他立即筹银七千两，派干员到外地购粮出售，并根据灾民的经济情况，分别售以减价粮和救济粮。与此同时，他在官署中收养灾民丢弃的孩童，不仅使他们免遭冻馁之苦，而且教他们谋生技能。

有感于建昌文教落后，跻身科甲者不多，张日晟置田产，建学校，购书籍，聘名师，招生教学。为了营造文化气氛，加深民众对教育的认识，他还在学校周围“创建文庙、奎阁，以壮其观”。不久，教育的成效显现出来，向学之风



勃然兴起，考取功名者日益增多。士民感其恩德，“奉公长生位祠之”。

张日晷审案谨慎，一丝不苟，凡州县上呈的审理案件，必亲自审阅，发现疑窦，笞令重审。他常告诫部属：“执法者应以怜悯为重，切忌苛刑重典，滥杀无辜。”在四川按察使任上，他“廉平持法，大小之狱，必得其情，一时平反者众，民至今能道其事不衰”。这种办案风格被人誉为“平恕公匀，鲜生冤狱”。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黄河中牟段两次决口，受灾面积达二十五个州县，洪水淹至开封城墙下。时任河南布政使的张日晷督令关闭城门，堵塞进水缝隙，退水时，又率领民众赶修城堤，并不顾自身安危，亲临指挥抗洪，终使开封免遭淹没之浩劫。为了安置因洪灾拥入开封的灾民，张日晷在开封五门外的空地捐廉修建房屋安置灾民，并为他们购食物、药品及衣服。这些修建的房屋俨然形成村落，被灾民称为“太平庄”。朝野对此赞誉有加，然而张日晷淡然置之。他对下属说：“官更多尽一份心，灾民多受一分惠。”河南虽然连年水灾，赖张日晷竭力拯救，灾民活命者实多。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日晷升任封疆大吏——云南巡抚，赴任途中，惊闻母亲病逝，急如星火返乡奔丧。张日晷对桑梓感情很深。对其而言，清镇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青年时的奋斗历程。这里是他生命的起点，亦是他灵魂归依之所。守孝期间，他常流连于故乡的寻常巷陌，触摸岁月的流痕；也曾徜徉于林园池馆，寻觅逝去的流光碎影。为了培植风景，记述文物，他前后捐银七千两为故乡修城阁、建书院。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日晷就任云南巡抚。在任上，他勤于政事，亲民爱民，偕总督共同上疏，“免各铜厂民欠无着工本银六千余两”。次年七月，思茅地区“游匪滋扰，沿及近申猛地，逼近茶山”。官军多次围剿，仍无效果。张日晷偕总督再次上疏，调集“各镇弁兵兜剿”，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病中张日晷仍不忘乡邦文化，他强撑病体，为《安顺府志》（清代清镇隶安顺）审定文稿，并捐修志费银二百两。同年八月，他病情加重，不幸逝世，时年59岁。

在任成都知府期间，他利用告假回家的时间在河道旧址不惜“费累千金”，

重建清镇河堤阁，谁知阁楼刚建成后不久便遭洪水冲毁。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张日晟生母支氏逝世，他将母亲从云南运回清镇安葬，守孝期间，与同窗旧友重游河堤阁旧址，决定捐资重建，易阁为塔，建于河畔地势较高处。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动工，六月塔成。该塔为七级封闭式锥体石塔，高21米。时任县令李隆萼题“梯青”二字，含“塔势呈梯形，环青山绿水”之意，故名“梯青塔”。二级塔基正面嵌刻有张日晟亲笔撰写的《新建梯青塔记》。河水自东而西，绕过石塔而流，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民国年间，石塔被列为清镇八景之一，即“塔耸青云”。2003年，梯青塔被列为贵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日晟著有《庶常集》《编修集》。他自幼喜爱书画，有《篝灯课子图》



《芸馆读书图》《红渠馆诗》《思勤积庆》《省身》《巡边》等绘画作品多幅及手书《训子琐言》一帙传世。其行书五言联：“潇洒书于卷，风流墨一池。”不狂不滞，风神动人，是大家手笔。其还有公文底稿集《默庵公牍手稿》等，既可供欣赏，又是研究其生平的好材料。

梯青塔



## 高扬民族气节的天津知府石赞清

石赞清（1805—1869），字次泉，一字襄臣。贵州黄平县人，在贵阳成长。清工部右侍郎。

晚清时期，京、津一带盛传这样一首民谣：“为国为民天津府，刚毅不挠胸有主。”这里称颂的“天津府”，指的就是曾任天津知府的贵阳人石赞清。“刚毅不挠胸有主”，讲的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在强敌面前，石赞清“贞亮守死”，凛然难犯，以此扬名天下。

石赞清幼时父母双亡，他由以编竹笠为生的伯父抚养长大。清道光十八年（1838），其中进士，在直隶（今河北）阜城、献县、正定、卢龙等地任知县，以政声卓异升芦台抚民通判、永定河北岸同知、顺天府治中及通永道、霸昌道的道尹。清咸丰六年（1856），他出任天津知府，为官清正廉洁，治水害、平物价、办书院、整治社会秩序，深得民心。民间有事诉于官府，他能秉公判案、执法，被誉为“石一堂”。

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十几艘战舰分三批北上，于八月攻陷大沽炮台，直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廷骧弃城逃跑，英法占领天津城外望海楼一带。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敢与英法交战，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代表，与英法使者在天津城南海光寺谈判，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时任天津知府的石赞清，在英法联军进犯面前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在天津府大堂前，置两口大水缸于两旁，对天发誓：“如果夷人敢入府威逼，我与妻子



石赞清

一同死于此地。”他作为一介文官，手无兵权，在清军望风逃窜的情况下，只能坚守忠贞，以死报国。

清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入京换约，取道天津，途经大沽口时，守将僧格林沁激于义愤，开炮轰击。英法以此为口实，组织联军再次占领天津，总督以下各官纷纷逃散。石赞清傲然挺立，坚持不离府署，声称“取吾头以往，官舍不可让”。他不顾个人安危，乘车前往联军兵营，义正词严地警告侵略者，大义凛然，威不可犯。联军派500名士兵闯入知府衙门，把他挟持到军营，石赞清毫无惧色，怒斥英法侵略

中国，绝食三日，以死相抗。天津民众闻讯，集十万之众围困英国轮船，高呼“还我石父母”。民情汹汹，英法联军难以控制局面，怕事态扩大，只好将他释放。石赞清执意不依，对英军将领说：“我是怎样来的，就怎样回去。”英军迫于形势，仍以500名士兵将他护送回府。天津被占数月，石赞清始终不离府署，视死如归，高风亮节，以此名扬于天下。

石赞清坚贞不屈的事迹受到朝廷嘉奖，清咸丰十一年（1861），他升任顺天府尹，人民赞颂他“屹然谈笑誓强夷，义色英声动天地”“古人立朝峻风概，黔国虽小今有人”。清同治元年（1862），他兼任刑部右侍郎，又任各省举人补行复试阅卷大臣，同年授直隶布政使。清同治四年（1865），他代理湖南巡抚，次年擢太常寺卿。清同治六年（1867），他升宗人府丞，次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清同治八年（1869）九月，石赞清卒于京师，享年64岁，归葬于贵阳北郊红边门外宅吉坝。黎庶昌《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铭》赞曰：“公



由县令，扬历中外 30 余年，皆以清正爱民称著，而天津治绩尤异，百姓歌之曰：  
‘为国为民天津府，刚毅不挠胸有主。’及海疆变起，群吏望风解鞬，公独以  
二千石守死自效，不为外侮所屈辱，天下高其节，竟以比汉典属国苏武云。”  
黎把石赞清比作苏武，恰如其分。



石赞清书画

## 奉命考察西藏的陈钟祥

陈钟祥（生于1810年，卒年不详），字息凡。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贵阳。赵州、钦州知州，诗人。

陈钟祥曾外祖父董半舫原籍江苏吴县，到贵州龙里做知县，外祖父、母亲也跟随到贵州，后定居贵阳。父亲自号“镜湖散人”，曾在贵州某府做幕僚，并设馆教书，留有诗句“夜静卧闻鱼读月，昼长坐对鸟谈天”“湖平得月开妆镜，山远凝烟幻画图”传世。母亲有教养、有文化，陈钟祥在3岁时就由母亲教识字，诵读唐诗。

### 一、仕途有建树

清道光十一年（1831），陈钟祥考中举人。他之后两次科考失败，后应邀到山西巡抚处做幕僚。清道光十六年（1836）冬，他受聘到一所专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左翼宗学，在这里做了4年的教习。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其获优贡待遇，取道四川北上京师，正式步入仕途。经过朝廷考核，他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河北某地任职，因其母远在贵阳，又改分到四川。他先后在四川青神、绵竹、大邑任职。在绵竹任职期间，陈钟祥收集到康熙时期所刻的《论语孟子说》和宋代学者张南轩的《文集》，并将其刊刻行世；重修绵竹古楼。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钟祥被任命为四川



大竹知县，不久调任金堂知县。清咸丰二年（1852），其被派往河北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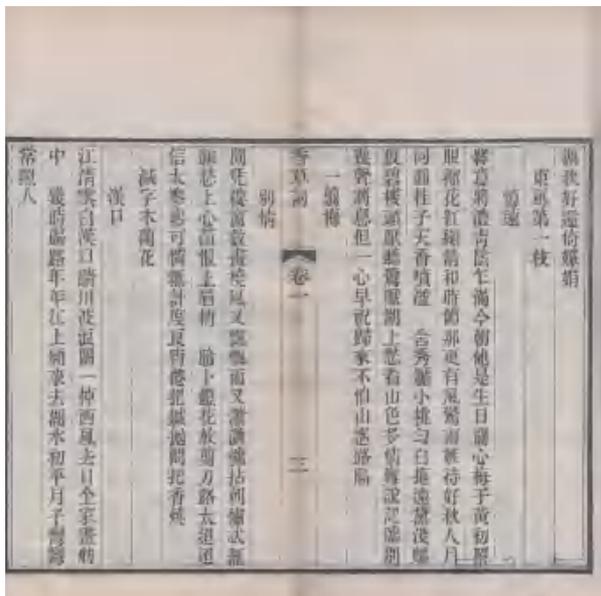
次年十月，陈钟祥任沧州知府。沧州本是汉、满、回多民族杂居之地，是一个不易治理的州府。战争使沧州治安混乱不堪，清廷的残余部队和土匪对当地民众威胁极大。陈钟祥到任后，迅速了解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向上呈报《沧州失守后地方情形状》，陈述了沧州战后的现实情况，提出若干治理措施，体现了陈钟祥在政务上的才干。

清咸丰五年（1855），陈钟祥调任赵州知府，他将赵州的石刻、古建筑著录成《赵州石刻全录》，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次年冬，其参与中俄在天津的谈判。清咸丰八年（1858），英、美、法、俄四国要求在中国口岸和内地自由通商，陈钟祥又奉命至天津参与外交交涉，他为上司拟写了《为钱方伯密陈海口情形状》，陈述了实际情况并做了详细的分析，所述及的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翌年，他回到赵州任上。

## 二、记录西藏见闻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陈钟祥奉命到西藏察木多。西藏的奇异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激发了他的诗兴。他的诗从原来的酬唱、纪行、抒怀扩大到反映社会现实。如《催乌拉并序》的序中说：“蕃众男妇僧俗皆供役，每汉蕃官兵过境，沿站蕃官头人则分户计口派役或出牛马，或供男妇皆呼为乌拉。”诗云：“乌拉不辨人与畜，蕃僧蛮婢马牛逐。官邮但见传牌来，纷纷供给汉蕃役。君不见蓬首垢面诸酪奴，鸦头叉手欢腾呼。朝来负乘竭辛苦，混沌入幕同野处。又不见牦牛弩马千百屯，百觔一豆复何有。但咬山头枯草青稞根。”这首七言古风反映了西藏农奴的悲惨生活，也流露出诗人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藏语称驻藏大臣为“安本”，下级文员为“破本”，下级军官为“马本”，士兵为“甲米”。陈钟祥所作《破本甲米》一诗，反映驻藏大臣的尊荣和下级官员、士兵的疾苦；《索赏需》谴责了藏官以赏乌拉为名，勒索过往官兵中饱私囊的丑行；《卜天葬》介绍了藏民天葬、地葬、水葬的习俗；《跳歌庄》描写藏民舞蹈。



陈钟祥《香草词》

他在西藏仅半年时间，却对西藏有这样深刻的了解，并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

### 三、以诗文记事

清道光十一年（1831）的夏天，贵阳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陈钟祥作五言古风记述当时的洪灾，序中说：“辛卯夏仲黔城淫雨半月，月望之夕大水骤至，民之被灾者千百家，以诗记之。”诗中说：“前望南明河，兼天白浪浪。长桥杳然断，危楼渺中央。”这些诗文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水势和灾情，对受灾人民寄予深切同情。清道光十二年（1832），科考失败后，陈钟祥送父亲遗骨回浙江安葬。随后，他游历楚、豫、齐、蓟、吴、越等地，写下数十首纪行、抒怀的诗歌。

陈钟祥尤爱贵阳的山山水水，黔灵山是他经常游历的地方。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打算再次进京参加次年的考试，离筑前特别备好酒菜邀友到黔灵山游玩，后写有散文《游黔灵山始得圣泉记》，又将所作诗精选出九十首，编成他的第一部诗集《辛壬癸甲草》。



任职绵竹期间，陈钟祥重修绵竹古楼，为古楼仿昆明大观楼长联作楹联一副：

楼前揽古，千载事陡上心头：慨东鲁诗书，西川俊杰，南朝冠冕，北伐烟尘，  
修业勋名，过往已尽为陈迹，茫茫汉宋而还，阅几许沧桑，就当年危阁，半椽  
都归榛莽；

池上兴怀，四时景翻来眼底：看春泥掠燕，夏沼游鱼，秋树鸣蝉，冬山积雪，  
飞潜动植，俯仰皆自在流形，落落颜曾以后，得这般胸次，凭此处方塘，一亩  
俱见渊源。

四川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地方，很多诗人入川后，都会从大自然中获取艺术灵感。陈钟祥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其楹联、诗歌创作日臻成熟，艺术风格也有所改变。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是他最佩服的人物，他特别到三苏故乡眉山凭吊，还为三苏祠写了一副楹联：“拜堂堂父子三君，文章与北宋争传，中原雄视无他手；看滚滚江流一去，人物是西川特出，山水英奇在此眉。”以后，陈钟祥有不少楹联问世。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钟祥遭遇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女儿、儿子、母亲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便运送母亲的灵柩回浙江安葬。清咸丰二年（1852），陈钟祥丁忧期满，到贵州拿到官文，返回浙江到父母墓前拜别后，赴京重返仕途，被派往河北军中。

清咸丰九年（1859）以后，陈钟祥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作品，他将诗集《燕晋草》《南归草》《蜀游草》《康邮草》《祥琴草》《出山草》《东航草》《橐笔草》《牧沧草》《燕南赵北草》（二卷）十种汇编成《依隐斋诗钞》十二卷；词作编成《香草词》五卷，请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写序；又将杂文编为《夏雨轩杂文》二卷；楹联合编成《楹帖偶存》；日记取名《岷江纪程》。陈钟祥的《香草词》声誉最隆。民国时期，贵州省省长任可澄在《香草词·序》中说：“（贵州）道咸以来词学始盛，其褒然成帙，各体皆备，实以陈息凡先生《香草词》为首。”

## 一生兵戎、著述等身的傅寿彤

傅寿彤（1818—1887），原名华赓，更名昶，字青余，一字玉叔，号澹琴。贵筑县（今贵阳）人。学者，清河南布政使。

傅寿彤从小跟随父傅璜学习，少年时其母典当金钗购了一部阮元编辑的经学丛书《皇清经解》供他阅读，经学本是傅家学问的根基，能通读并理解《皇清经解》这部集经学之大成的巨著，要有深厚的功底，正因家学渊源，傅寿彤青少年时便异于常人的学问。



傅寿彤

### 一、治理地方

2016年9月，河南省南阳市出土了一通《南阳太守傅公政绩碑》，碑高2.2米，厚0.2米，宽0.76米，为“合镇绅民公立”，时间为“同治十三年九月”。南阳太守傅公即贵阳人傅寿彤。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26岁的傅寿彤中乡试第二名。乡试考官为编修何子贞，特书“实事求是”四字赠之。清咸丰三年（1853），其与丁宝桢同科进士，丁宝桢二甲，傅寿彤三甲，选翰林院庶吉士。时值太平军捻军起事，傅寿彤经常与同僚谈论战局形势及攻防之计，户部



右侍郎王茂荫以傅寿彤“知兵”而举荐，朝廷便授予傅寿彤记名知府，发往河南治兵。傅寿彤到河南后，以军功特授检讨。他曾奉命守归德，力挽颓局，设伏击退捻军。朝廷因傅寿彤“战功卓著”，简授其归德知府。

清政府夺取河北、河南大片土地，这大片土地上的府、州、县经过战争的摧残都已满目疮痍。另一个来自贵州，被派往沧州任知州的陈钟祥在其《沧州失守后地方情形状》中，将当时的惨状陈述得很清楚。

清咸丰十年（1860），傅寿彤从归德调任南阳知府后，勤政爱民、实干担当，兴学校，劝农桑，训士卒，理词讼，内剔积弊，外遏贼氛。他认为“南阳为中州门户，其东南九十里有钜镇曰赊旗，与郡城成掎角”。为了防御捻军，“不有守，乌乎战，不有砦，乌乎守？”于是傅寿彤根据当地地势，倡议兴筑赊旗店寨墙。由于与当地绅民因修筑寨墙收厘金发生冲突，触怒上司，傅寿彤被革去南阳知府职务。清同治二年（1863），傅寿彤恢复原职，再次担任南阳知府，南阳之民举相贺曰：“还我父母矣！”傅寿彤一回任南阳知府，即对清咸丰四年（1854）知府顾嘉蘅修筑的城池大修，在南阳城东、西、南、北4座城门外修筑4座独立的寨堡，俯瞰状如梅花，因此被称为“梅花寨”或“梅花城”。同时，他主持修筑外城墙连通4寨，周围18里，建空心炮台16座。外城凭借梅溪河、温凉河、白河河流天险环护，形成梅花寨。内城靠护城河拱卫。有人认为，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内城、外城的传统构筑方式，同时结合南阳特殊的自然地形，因地制宜地构筑了这一既有防卫，又有防洪、航运功能的城市防御工程，充分展示了傅寿彤的才能。

清光绪元年（1875），傅寿彤调河南按察使，不久升布政使。时值黄河中下游泛滥，水灾之后，河工需款较大。经傅寿彤竭力筹划，款项得以解决，使修复堤坝工程迅速完工。清光绪三年（1877），北方又遭饥荒。河南受灾70余县，灾民众多，急需赈灾款救济。但时间短促，朝廷主管财政度支大臣不准截拨京饷和漕运款项接济；而原定河南负责的西征协饷（镇压捻军和西部回民起义的军饷），朝廷又不断催缴。河南地方大员前任巡抚李庆翱，布政使刘齐

銜也因办赈失职被弹劾丢官。傅寿彤正好再署河南布政使。在此情况下，他日夜操劳，苦心筹划，急得须发俱白。他先设置粥厂收养灾民数十万，又严饬所属州县也设置粥厂，救济灾民，暂缓灾荒。清光绪四年（1878），傅寿彤回任按察使，却受到御史孔宪谷以其办赈不力，不善于处罚下属官吏参奏。虽经巡抚涂宗瀛保奏无此事，仍得旨交部议处。不久，傅寿彤自行挂冠去职。

## 二、著述等身

傅寿彤辞官后，便将家安于湖南长沙，筑园于长沙定王台侧，终日与郭昆涛、郭嵩涛、李垣、朱守敬、王闿运等名士诗酒往还，悠游林下。

傅寿彤平生奉行王阳明知行合一之学，崇尚朴学。其著有《十六国方域考》《洪北江先生年谱》《古易殊文记》《周官源流考》《三国志音论》《十六国年表》《汴城筹防备览》《归德寨堡图表》《古文辞》各一卷，《易源》《书地略商》《二十四节气证》《孝经述》各二卷，《论语偶笔》《湘漓别志》各四卷，《孔庭学裔》《澹勤室诗》各六卷，《古音类表》九卷，《石经异文考》十卷。傅寿彤的书法家从何绍基，篆、隶、行、楷四体均工，其运笔走腕尤得何绍基真传。在他一生兵戎政务之中，索书者甚多，墨迹大多遗留于三湘各地，视为珍品珍藏。

清光绪十三年（1887），傅寿彤逝世于湖南，享年 69 岁。



## 翰墨昭彰、名重一方的孙竹雅

孙竹雅(1819—1884),名清彦,字士美,号竹雅,别号竹叟、烛哑、烛亚、古滇逸士、漱石斋主人等。云南呈贡人,其卸任后居住于贵阳。清书画家,兴义、安顺知府。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孙竹雅出生于云南呈贡县书香世家,少学诗文、工书画,聪颖好学,但科举之路不顺,只考中秀才。其20岁娶蒋氏,得夫人助专事文艺。清咸丰七年(1857),云南回民起事直逼昆明,廪生孙竹雅投笔从戎,襄赞赵德昌军门幕府。清咸丰九年(1859),黔地战火遍地,孙竹雅追随调任贵州总督的赵德昌入黔,襄理文牍。其后自领一军,屡有军功,被保荐为同知、知府,委署兴义、郎岱、都匀、安顺等府厅,官至安顺知府,他为官清正廉洁,有“清贫太守”之称。

清同治十年(1871),郎岱厅司马孙竹雅用行、楷二体书写《郎岱木城碑记》,为高2米、宽1米、厚0.14米石灰岩砧刻而成。该碑刻较详细地记述了郎岱城变迁兴建史,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清同治十二年(1873)春,孙竹雅应兴义下五屯乡绅之请,为筹建中的笔山书院书丹刻碑,写下了4块石碑、约6000字的《学书枝言碑》,是贵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法与书论合璧,成为“兴义笔山书院最后的文化遗存”,是“黔西南有史以来文化品位最高的石刻”。

孙竹雅入黔后活动多在贵阳,卸任后仍居住在贵阳。后人撰联概其一生:一生绘丹青,于书于画于诗于文,承先启后翰墨昭彰,誉满滇黔艺坛流芳百世;



孙竹雅作品



数载为官宦，且攻且御且剿且抚，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荣哉朝廷史册彪炳千载。

宦迹之余，孙竹雅工诗文，精书画，在咸同、光绪年间享誉滇黔两省。“篆、楷、隶、行、草，无一不精，尤精行草。大到六米高的臂窠书，小到蝇头行草，无不流利而劲挺”；绘画功夫“山水人物、花卉竹兰、翎毛虫草无一不精”。孙竹雅尤擅画竹，被誉为“贵州画竹第一名家”。他对荆竹、方竹、筇竹、兰竹等都有咏诗，意境高雅，富于哲理。其传世之作以《画竹册》为精品，名《平安花信图册》，共画竹 24 幅，今存 15 幅，每幅画上都分别题诗，或生发画意，或借题发挥，使诗、书、画三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上述作品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孙竹雅的书画遗墨仍留存至今的主要有两类：一是摩崖、碑刻、额坊，除《学书枝言碑》是其代表，著名的还有《郎岱木城碑记》《郎山说》等。滇黔名胜多有所题，有昆明三大牌坊额题“金马”“碧鸡”“忠爱”，昆明翠湖额坊“春醉蓬莱”（赵款孙书），呈贡县牌坊额题“太和玉璧”“紫气东来”，兴义石刻“西南屏障”、摩崖“盛世桃园”，沿河乌江摩崖“惊涛拍岸”，织金保安寺匾额“云洞天开”。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贵阳东山与黔灵山“赵款孙书”的“龙”“虎”摩崖。二是藏于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图书馆等单位 and 民间的书画。孙竹雅原纸真迹，有题画诗词、跋文、序言，代表作品有《平安花信图跋文》和《石竹谱序》；书法作品有《书赠达庵大哥军门杜甫〈秋兴〉第八首墨迹》和《书赠统之贤弟太守米南宫除夕节所进春节帖子墨迹》。

清末至今 100 多年间，以孙竹雅、孙竹荪、孙书农为代表的贵阳孙家，在诗文书画上名重一方，是贵阳有名的书画世家。孙家后人编撰出版了《孙竹雅孙竹荪书画作品集》。

## 主纂方志杰作《畿辅通志》的黄彭年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陶庵，晚号更生。贵筑县（今贵阳）人。学者，清湖北布政使。

黄氏一门四进士，伯父黄辅相、父亲黄辅辰和黄彭年均道光年间的进士，其子黄国瑾于光绪年间也中了进士。黄辅辰是清代循吏，为官清廉正直，刚正不阿，凡利国利民之事挺身而出，敢作敢为，时人称之为“硬黄”，《清史稿》有传。

黄彭年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为官清廉，颇有父风，热心于教育。同治初年，其父任陕西凤彬盐法道，陕西巡抚刘蓉知黄彭年博学多能，聘其主讲关中书院，“讲明实学、广置书籍、严定课程”，士风为之一振。清同治十年（1871），直隶总督李鸿章聘黄彭年主纂《畿辅通志》，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他扩大书院规模，增建斋舍 24 间，经李鸿章批准将万卷书楼划归书院，立《万卷楼藏书碑记》和《莲池书院增修讲舍碑记》于院中，声名远播。清光绪八年（1882），他以政绩卓著授湖北安襄郢荆道，继改粮储道。次年，黄彭年迁湖北按察使，在任期间，他拒绝馈赠，严禁胥吏勒索，结案 40 余起，使 10 余桩大案平反昭雪。清光绪十四年（1888），其调任江苏布政使，值江苏旱涝灾害，他平抑粮价，筹款赈灾，疏浚吴淞江、白茆河，设学古堂，聚名士讲经世之学，“风气为之一变”。

黄彭年学识渊博，诗文皆擅，有《陶楼文集》14 卷、《陶楼诗钞》4 卷及



外 2 卷传世。黄诗多有感而发，明白如话，平易近人，淡雅流畅，平中见奇，忧民伤时之情溢于言表。他还长于史志，精于舆地，著有《东三省防务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略》《运铜考略》等书，最受人称道的莫过于《畿辅通志》。



黄彭年

古代称京师附近为“畿辅”，清代以畿辅为直隶，故“畿辅”为直隶省之代称，包括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全省，是全国首善之区。乾隆年间所修《畿辅通志》未臻完善，140 余年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再次倡修。黄彭年德才兼备，知识广博，精于史志，重视文教，故被聘主纂《畿辅通志》。他建志局于莲池书院，网罗才俊，广征博采，史书、圣训、方志、诸子百家及文集杂著靡不甄录，又令各府州县将档册、采访资料上报，然后分类纂辑，详加考释，历 16 年而成书。《畿辅通志》卷帙浩繁，凡 300 卷，有帝制、纪、表、略、官绩、列传、杂传、识余等部分，以略为主体，包括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等门类。此志体例严谨，记事详尽，考证精细，足补前志之漏、纠前志之谬，成为清代名志，被誉为“通志巨擘”。

清光绪十六年（1890），黄彭年改任湖北布政使，卒于任上，享年 66 岁。

## 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筑县(今贵阳)人。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变法的宗旨是“革旧维新”,设议院“采天下舆论”,制宪法以“明立国之本”,兴学堂以“广开民智”,求富强以“工商为先”,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以期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法慷慨捐躯的故事也广为传颂,而密保康、梁、谭的李端棻却鲜为人知。其实,李端棻是变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军人物,只不过因为变法事属机密,许多内幕不为世人所知。诚如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所写:“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提拔为礼部尚书。”

李端棻家住贵阳城北长春巷,他幼年丧父,与母何氏相依为命。叔父李朝仪是个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的好官,先后出任大名知府、永定河道、山东盐运使、顺天府尹等,视李端棻如己出,关爱有加,故端棻立身行事深肖叔父,大义凛然不可犯。舅父何中宪是个有学问的人,教李端棻诗词古文,称赞“苾园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尽瘁”。李端棻弱冠时补博士员,清同治二年(1863)成进士,入翰林院。他曾出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廩总督,



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被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官居二品。

清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衔典试广东，考生中有一个英俊少年，年方十七，气宇轩昂，才华横溢，文章颇能“熔经铸史”，他就是广东新会的梁启超。阅梁启超考卷后，李端棻惊诧莫名，不禁拍案叫好，如此少年，竟有这般学问，这般见识，“将来必有大用”，于是取为举人第八名。言谈中，李端棻知梁启超胸怀大志，忧国忧民。李端棻的叔父李朝仪有一女名李蕙仙，未曾婚配，他欲将堂妹许配梁启超，但鉴于主考官的



李端棻

身份不便开口，便托同考官王镇江做媒。王亦有一女，年方妙龄，本想许配梁启超，但已受李端棻所托，不便再提，只好一笑作罢。两年后，梁启超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从此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聚首，两人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志同道合。梁启超回广东，值康有为在广州设馆于万木草堂，研读中西学术，梁启超听了他的言论，自感科举推重训诂辞章实为“无用旧学”，于是拜康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康、梁与李端棻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致力于“维新变法”。

康有为一连六次上书皇帝，终因人微言轻，“大臣阻恪不能上达”。早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倾一腔热血写成了《上清帝第一书》，满以为

可请礼部尚书徐桐转呈，三诣门下，终未获见。其他人也婉言拒绝不肯代陈。若不是李端棻密为引荐，极力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维新派人士很难进入朝廷的决策圈，恐怕连那“百日维新”也未必出现。

事虽隐秘，而当事人了解最为深切。康有为在《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写道：“上（指皇帝）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徐致靖）及李苾园尚书所荐”，“时李端棻尚书荐奏甚力”。

维新派以兴办学堂为要务，通过教育广开民智，树立新风，培养国家需要的奇才异能之士。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二，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强调“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方略，以学校为“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开设算学、英文、舆地、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县设小学堂，府州设中学堂，京师及各省设大学堂，培养“致用”而不空谈的新人才。为使教育“推而广之”，他设藏书楼（图书馆）供人阅读，创仪器馆（科学实验室）推广科学技术，开译书局引进外国图书，广立报馆以开舆论，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知识、技能，谓之“五纬”。他认为采取如此举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雪？”此举集中体现了维新派社会变革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而又切实可行的文化教育改革的纲领。虽然以前有不少人欲改革教育，但或支离破碎，或流于空谈，而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则被皇帝采纳成为国家决策，并在全国施行。从此，兴办学堂蔚然成风，各省的大、中、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朝廷还令管学大臣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废科举，兴学校”，开启了近代教育，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但仅百日即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训政”后，以李端棻“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定罪，“发配新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揭开了李端棻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秘密，证实了李端棻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



变法虽然失败，而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主张却依然不废，由此掀起的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遏止，影响了百年来中国的教育与文化，李端棻功不可没。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回贵阳，已近古稀之年，仍意志不衰，不忘“萌发新政要施行”。他主讲经世学堂，月课以“卢梭论”和“培根论”为题，课余与学生谈论“进化论”“天演论”和“三权鼎立论”。守旧的人作打油诗骂他“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他坦然相对，自撰一联贴于学堂：“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貌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将原贵阳府学改为贵阳中学堂，继又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即今天贵阳一中前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端棻卒于贵阳，享年74岁，葬于贵阳东郊大关口（今永乐乡大关村），墓志铭为梁启超所撰。

## 贵州华氏三代儒商

华联辉（1833—1885），字圣坞。贵州遵义人，清同治元年（1862）举家迁居贵阳。实业家、华氏企业创始人。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皆为商界精英，为国家、民族及贵州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华氏祖孙三代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作为黔商领袖，深受世人敬仰。

华联辉，清道光十三年（1833）出生于遵义一耕读之家。祖先世系江西临



华之鸿

川人，清康熙年间，祖上来黔行医，落籍于遵义南乡平水里（今团溪）。清同治元年（1862），华联辉举家迁居贵阳。落籍于贵阳后，他一面读书一面经商，在仁岸（今仁怀茅台镇）开“永隆裕”盐号，在永岸（今四川叙永县）开“永昌公”盐号，在贵阳开“永发祥”盐号，成为贵州首屈一指的大盐商。他曾说：“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乎仁圣立达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否则，虽富贵何益？”他还出资刊印《六事箴言》《菜根谭》诸书分赠亲友，以励德行，萌发了



印书传播文化的思想。

时值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盐政，华联辉被任命为盐法道总文案。华联辉“稽案牍，考成法，延请官商之熟于盐务利弊者”，历时5月之久，最终制定了《官运商销法》。然而四川盐务积弊太深，改革必然会损害那些从盐务中大获其利的官吏、商豪的利益，自然招致胥吏、富商、豪贾的抵制，他们造谣惑众，多方掣肘，意欲破坏盐务的推行。那些首鼠两端的商人坐而观望，不肯领运川盐。面对各方阻力，华联辉亲赴各岸（运销食盐的口岸），向商人们“开说利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岸领运的商家缴纳本金40余万两，从而使官运大行其道。《官运商销法》施行后，每年为国家增收白银200万余两，大大地缓解了四川的财政危机，且有益于民生。由此，华联辉声名鹊起，西南商界无不闻其大名。值得一提的是，华联辉在四川盐法道任职数年，从未领过薪金，其人格之高尚，尤令人钦佩。

茅台村的制酒业自乾隆皇帝以后因盐运兴盛起来，“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然而在咸丰年间，黔北战乱，数十家酒坊毁于兵火，茅台村夷为废墟。清同治元年（1862），华联辉在茅台村买了一块土地，建立成义烧坊，重新生产茅台酒。

华之鸿，字延仪，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贵阳，26岁时以附贡生被选为仁怀厅儒学训导。任教期间，他常“通函合江、重庆，购阅报章，留心时事”，接受维新思想。他遗传了父亲华联辉的聪明才智并胸怀抱负，将家族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使华家成为贵阳的豪门巨富，“华家的银子”之说由此而起。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华之鸿辞职返回贵阳，重整家业，集中心力经营盐号。华之鸿继承了父亲的商业才干，加之勤奋实干，生意随之兴隆起来，其经销的袋装盐逐渐占领了贵阳盐业市场，分店亦遍布贵州各州县，家财亦膨胀起来。同时，他继承经营茅台成义酒坊，所产回沙茅酒均交永隆裕盐号经销。1915年，其产品由贵州公署选送，委托黔人乐嘉藻带至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览，“贵州茅台”遂享誉全球。

华之鸿牢记父亲遗教，认为“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福祸当善自选择”。他选择投身公益事业，兴办学校。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与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等，将原贵阳府学改为公立中学堂，迁到雪涯洞后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前身。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受贵州巡抚庞鸿书的委托，他与唐炯开办优级师范专科，以后又与任可澄创办宪群法政学堂。他还投资创办遵义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息烽底寨两等小学堂和贵阳私立志道小学。

“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后于全国各省以后。而欲传播新兴知识，惟依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书局，则可继续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基于以上理念，经过深思熟虑，华之鸿决定创办书局，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将其命名为文通书局。文通书局创办的时间，仅晚于商务印书馆，比中华、正中等书局都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华之鸿委托友人田庆霖率学员两人赴日本采购印刷机械。在东京采购了全套铅印设备后，田庆霖将其用船运回国。待铅印设备安装完毕并运行成功后，华之鸿又派田庆霖率工人赴日本购买一套石印设备及两部石油动力引擎。

1911年秋，耗银20万两的文通书局正式对外营业。这是贵州第一家使用动力机械的新式印刷企业，也是贵州近代民营工业的成功代表。是年10月14日，华之鸿在《贵州公报》公布了文通书局的创办宗旨与业务范围。在这篇近代贵州民营印刷企业诞生的宣言中，华之鸿谈及将以“促进文明，开通风气”为宗旨，将以最新的设备、最佳的服务，务求成物精良，客户满意。

文通书局初期，职工约百人，拥有当时贵州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及印刷技术，能印五彩博物图、地图、古今书籍、学堂凭照、银票、商标、广告，能承接洋式书籍装订，自制电镀铜膜、花边字钉、凸版、玻璃版，以及接办照相放大等业务。其印刷的彩色广告之精良，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书局出版的图书，不仅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华之鸿创办贵阳文通书局，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开业

占有省内市场，还远销邻近省市，营业额亦逐年递增，1921年竟达30万元之巨。

为了保证书局印刷用纸之需要，华之鸿决定创办造纸厂，派田庆霖赴日本购置造纸机器设备。在田庆霖的主持下，经过不断探索与试验，纸厂不仅生产出上乘的“抄贡”“抄光”“混同”纸，还造出洁白光亮、韧性好的“庆霖纸”。

华问渠，字永源，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于贵阳，华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亦是出类拔萃之辈。他接手父亲的事业后，向政府索回“征为军用”的永丰纸厂，将其改名为“西南造纸厂”，1943年又与四川中元造纸厂合作，改组为“黔元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淞沪会战爆发，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各大书局纷纷迁往西南，因机器难以搬迁，出版事业处于停顿状态。在此关键时刻，华问渠以振兴战时文化、服务桑梓为己任，将田产、房产变卖，扩大文通书局。文通书局在贵阳设总管理处，在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设立分局。当时国民党教育部统一出版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大东书局、文通书局7家联合组成“中小学

教科书 7 家联合供应处”，文通书局跻身于全国 7 大书局之一。

这一时期，文通书局形成了一个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书局。书局成立了编辑所，以贵州籍学者马宗荣为所长，以谢六逸为副所长，后由顾颉刚、白寿彝分别继任所长和副所长。文通书局还成立了一个由 112 人组成的编审委员会，汇集了国内知名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及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有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苏步青和陈建功、桥梁专家茅以升、地质学家乐森璋、内科专家张孝骞、热病学家李宗恩、卫生专家朱章庚、林学家皮作琼、农业化学专家罗登义、物理学家张永立等；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有哲学家冯友兰、教育家张奚若、社会学家吴泽霖、地理学家张其昀、文学家梅光迪、翻译家曹未凤、史学家肖一山等。书局编委会可谓全国一流。

文通书局出版了文学、历史、社会、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 200 多种图书，还有各种教科书、字典、辞书、手册。其中，著名的有肖一山主编的《经世社会丛书》、谢六逸主编的《新闻学丛书》、谢六逸与马宗荣主编的《大学丛书》、张永立主编的《应用丛书》、朱章庚主编的《公医丛书》、吴泽霖主编的《苗夷研究丛书》，曹未凤最先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在文通书局出版。文通书局还办了刊物《文讯》，介绍图书及出版动态，先后由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岑家梧、臧克家等担任主编，在出版界颇有影响。



## 政声卓异、独爱贵阳山水的颜嗣徽

颜嗣徽（1835—1902），字义宣，别号望眉。贵筑县（今贵阳）人。清归顺直隶州知州，学者。晚清贵阳“黔南六家”之首的著名诗人。

本系孔门高足、德行首科，后被尊为复圣颜回的七十七代裔孙。早在清朝雍、乾时，其曾祖颜中樑从湖南衡州（今衡阳市）举家迁居黔省省垣贵筑（今贵阳市）。其先居住在颜家巷（今之民权路），后家族日渐兴旺恢宏，遂在新城普定街购地创建新宅。清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二十六日，颜嗣徽就出生于贵阳这个新兴的名门望族。

清同治九年（1870），颜嗣徽中庚午科乡试第一名，荣登解元。清光绪二年（1876），其奉檄到广西，历任迁江（今广西来宾市）、归顺（今广西靖西市）、雒容（今广西鹿寨县）、凌云、苍梧等县知县；历充光绪壬午、己丑、甲午（1882、1889、1894）等科广西乡试房考官。他政声卓异，誉满粤峤。

颜嗣徽家资富有，藏书很多，他博览家中藏书，自小就有大志，诗文写得很好。他常与当时贵阳名士如钱衡（华民）、杜梦龙（子明）、黄诗聘（子衡）、文天骏（云衢）等交往，与贵阳钱衡私交特别深厚。清同治十三年（1874），颜嗣徽与钱衡同客京师，整日谈诗论字。钱衡离京南下，两人同至济南，游大明湖，赋诗纪事。清光绪二年（1876），钱衡公差返黔，两人又聚于贵阳。后钱衡病逝汴梁（今开封市），颜嗣徽出资为谋善后，使遗体得归葬故乡，并搜集钱衡遗稿，辑成《芋岩诗钞》一卷刊行。

## 一、赋诗纪事，出资创修地方志

颜嗣徽独爱贵阳的山水，其《登贵山绝顶望南北诸峰》描绘了贵阳周边群山在晨曦落霞下的神秘及雄姿：“北登贵山顶，云表插碧峰。千仞势一落，蜿蜒走长虹。左涵栖霞岭，右拓相宝宫。元气接混茫，烟霭春濛濛。荷笠蹑微径，披襟当太空。眩晃迎晓日，呼啸激天风。灵菌茁萌芽，野花歌欹红。远视不能辨，一色蔚蓝中。超举形神释，跋涉腰脚慵。怀抱五岳志，追逐九老踪。手挈金鸦锄，采采菖蒲茸。”该诗曾被数家选集刊载，被诗界普遍认为是描写“贵山”最好的诗歌创作之一，给后世直到近代民间或学界的许多学人对有关“贵山”具体山峰的所指，或具体坐落的位置，或贵阳的得名依据等，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或有趣的故事。

颜嗣徽著有《望眉草堂诗集》十二卷，贵阳人陈田辑《黔诗纪略后编》及周鹤辑《黔南六家诗选》也采录有他的诗。其还著有《望眉草堂文集》五卷、《乔梓联吟》一卷、《联语》一卷、《仿玉溪生体别集》一卷。他在迁江、归顺两县（州）任内，出资创修地方志，自任总纂，成《迁江县志》四卷、《归顺州志》六卷。

## 二、勤政爱民

苍梧是一个经常遭受水患的地方。颜嗣徽在任知县期间，一次又遭水灾，民间田舍多被江流淹没，他闻讯后带着病体驰单骑在田野间，遍访民间灾情，了解百姓疾苦，并请于上司开仓以粮食赈救贫民，当地百姓得以渡过难关。他政绩卓著，百姓无不称赞。在凌云任内，因地处边荒，崇山峻岭，瘴雨蛮烟，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的妻子及家人因病殇而死者达五口。颜嗣徽在其所著《乔梓联吟》自序中，有“一家遭殇，五口罹殃，悼亡制哀蝉之音，殇幼堕童鸟之泪”的悲痛语句。人生遭受如此巨大的伤痛，他仍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深得人们爱戴。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颜嗣徽积劳而逝于归顺任上，享年67岁。其灵柩运回故里贵阳，安葬于城西南外阁老寨的颜氏祖莹。



##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阳。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

清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清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官至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署理)、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逝世后赠太子太保,谥“文襄”,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任上扶持创办大量新式工厂和新式教育,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和近代教育基础;编练新军,推动了军队近代化;所著《劝学篇》是晚清官员必读文章,其中所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拟定《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是中国施行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基础。其著作被编为《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等。

### 一、生于贵阳六洞桥

张之洞的父亲张镛自清嘉庆十八年(1813)考中举人后,先后参加了6次会试,皆未考中。根据清制规定,3次以上未考中进士者,朝廷采取“大挑”的办法,从这些举人中间选取优异者出任各地县级官员。清道光六年(1826),张镛在举人大挑中列为一等,“分发贵州以知县用”,至此在贵州为官30余年,张之洞跟随父亲,生长于贵州。

那张之洞究竟生于贵州何处呢?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张镛履历信

息，张镛于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署理安化县（今德江县）知县，十一月署理威宁州（今威宁县）知州；清道光十二年（1832）授安化县知县。据《贵阳府志》，清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张镛赴任贵筑知县；清道光十四年（1834）未离任；清道光十六年（1836）升补古州（今榕江县）同知。又据《清实录》记载，就在张镛赴任古州同知时，他被御史刘梦兰向朝廷参了一本，称他在任贵筑知县时，在六洞桥买了一处房产，生活靡费，离任时将房屋高价抵扣需补交库银。此事经时任巡抚贺长龄查实，上奏称张镛素无奢靡之事，已如数交清库银，后任已经接收，没有用房产抵作库银之事。张之洞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出生，此时父亲张镛刚赴古州任职，其家仍居住于六洞桥，张之洞即生于此。

## 二、长于兴义，初显才华

清道光二十年（1840），张镛授兴义知府，带着家人来到兴义府署所在地安龙，在此工作生活长达10余年。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仅11岁的张之洞写出名满天下的《半山亭记》，其非凡才华令人惊叹。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据《兴义府志》记载，张镛在原兴义府试院旁建十八先生祠，年仅12岁的张之洞代父作《十八先生祠堂记》，并为祠堂撰写楹联“杀身以成仁洵称志士，临难毋苟免不愧先生”，流传至今。12岁的张之洞才华横溢，普安县县署有知足斋，张之洞写有《知足斋记》；普安县龙溪砚极有名，张之洞作有《龙溪砚记》。13岁时，张之洞又作《吊十八先生文》，文中“铜驼星散，谁谈明帝之诸陵；宰树霜清，共识忠臣之古墓”，气魄宏阔，远非一般13岁少年可比。

在安龙的少年张之洞，还著有《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一书，是士子们备考科举的范本。他还参与了父亲张镛纂修的《兴义府志》校对工作，《兴义府志》是贵州五府名志之一。

张之洞少年时代的老师张国华、贵天乙、曾叙笏都是兴义府本地人士，进



士敖国琦是贵阳府人、举人黄政均是贵筑县（今贵阳）人，贵州人文孕育了张之洞最初的成长。清咸丰二年（1852），年仅15岁的少年张之洞参加顺天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一时引起轰动。

### 三、高中探花，同年情谊

清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与贵州人李端棻双双考中癸亥恩科进士，张之洞荣膺一甲三名（探花），李端棻也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二人在翰林院同事三年，志趣相投。二人同是清流派，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事件中，二人皆主战，有相同的政治主张，除同乡、同年之情外，又增添了同志之谊。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在北京困顿数月的梁启超即将启程离开北京，欲赴上海寻找新的出路。时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给自己的同年好友，时任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写了封信，向他郑重推荐时年仅22岁的青年、堂妹夫梁启超，这封信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戊戌变法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进呈《劝学篇》，阐释自己的变革主张，深得光绪帝赞许，广为刊印，在京城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而李端棻在京城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掀起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运动。李端棻很快因戊戌维新被革职谪边，张之洞虽仍是朝廷重臣，但他们的私人情谊依然深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因戊戌变法被贬谪的原礼部尚书李端棻获赦免并“开复官衔”，北上进京谢恩。经过湖北武昌时，张之洞挽留“小作盘桓”，由此可见二人情谊并未因李端棻被贬谪而受到损害。此时的张之洞仍是湖广总督，在湖北等地大力推行新政，建学校、办工厂、修铁路、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难以估量。而李端棻是赦免回籍的前礼部尚书，曾经的踌躇满志已无再展才华的机会。回到贵阳的李端棻感慨万千，为张之洞赋诗一首《寄赠张香涛同年》，其中“贵贱交情今乃见”，是他历经宦海浮沉后感念挚友的肺腑之言。

#### 四、封疆大吏，洋务领袖

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事吃紧，张之洞临危受命，由山西巡抚出任两广总督。此时同年好友李端棻在京城出任御史，上奏朝廷：指出镇南关（今友谊关）应重点防守，“距省千三百里，恐呼应不灵，宜移提督驻太平府以资守御”。张之洞到任广东后，请老将冯子材出山，率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成为中法战争中的重大胜利之一，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辞职。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之间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使张之洞意识到中西方不仅是武器的较量，亦是人才的竞争。中法战事平息后，张之洞加快推进洋务，逐渐成为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后新一代洋务领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主张。张之洞在广东筹设枪弹厂、枪炮厂，开矿务局、铁厂，办织布局，购买军舰，整治水师，开设水陆师学堂等。他还筹办机械造币厂，建成广东钱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币厂，对广东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间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前后三任湖广总督总计达14年之久。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在武汉建立汉阳铁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提出修建卢汉铁路（后改名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武汉逐渐发展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还创办了汉阳兵工厂、湖北织布局、汉阳机器厂、大冶铁矿等一大批近代工厂，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张之洞也因此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

张之洞重视教育，早年任湖北学政时办经心书院，任四川学政时办尊经书院，任两广总督时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培育具有新学思想的人才。他创办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建立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农务学堂，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张之洞创办了大量近代学堂，培养了大批新学人才。他还率先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等，极大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是国家近代化的重要推手，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打下了时代发展的



基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擢升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

## 五、心系贵州，于黔有念

张之洞与贵州渊源深厚。据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幼年丧母，是庶母魏氏抚育他长大，情谊深厚，魏氏是贵州人。张之洞少年时生长于贵州，成人后与贵州联系亦紧密。他18岁娶妻石氏，石氏是都匀知府石熙之女。石氏是直隶滦州人（今河北滦县），与张之洞一样，石氏的父亲石熙在贵州为官，石氏生长于贵州。石氏去世后，张之洞继娶唐氏是贵州遵义人唐树义之女。张之洞的姐姐嫁给了都匀知府鹿丕宗之子鹿传霖，鹿丕宗是直隶定兴县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赴贵州做官，鹿传霖随父至贵州，在贵州长大。清同治元年（1862），鹿传霖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

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张之洞听闻贵州财政困难，在例解协饷外，再增加协款一万两。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称此举是张之洞“于贵州有念旧之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特邀黔中大儒、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山长、笔山书院山长雷廷珍前往武昌两湖书院讲学。雷廷珍敬仰张之洞，在担任严修创办的贵州官书局董事时，曾刻印出版张之洞所撰《书目答问》。受邀后，雷廷珍立即前往，令人遗憾的是，船行至重庆，雷廷珍猝然病逝于船上，未能再续佳话。

时至今日，在张之洞少年成长地安龙，少年张之洞所写《半山亭记》刻石仍存于招堤半山亭，张之洞纪念馆正在建设中。

## 不以官显、书艺彰名的袁思韡

袁思韡（1838—1888），字锡臣，又字樾岩，号稚岩，癯道人，青柗散人，双印斋主人。贵阳修文人。清代书法家。

袁思韡父亲袁如凯，是清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曾做过广西怀集知县。袁思韡自幼聪慧好学，得其父悉心教诲，18岁以第一名考取贵阳府学生员，显



袁思韡

露才华。清同治九年（1870），袁思韡乡试中举，后两次会试落第，在京教馆，以书法、绘画、诗词、音律知名京师。其后以举人录为内阁中书舍人，参与修纂《玉牒》，叙功授知府加盐运使衔分发广西补用，因其兄袁花畲任官广西，依制兄弟不能同省为官，遂回贵阳赋闲。而后，袁思韡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清光绪十四年（1888）故于广州。

清光绪三年（1877），受丁宝桢、唐炯及贵阳官绅委托，袁思韡与罗文彬主持重修扩建阳明祠，摹遗像及题词佳者刻石砌置壁间，有唐炯、罗文彬《重建王阳明先生祠堂记》碑刻记其事。祠



中还有石碑两方，左侧立有复制的王阳明朝服线刻大像石碑，右侧立有复制清隆庆二年（1568）明穆宗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敕书，由袁思韡重书石刻。左隅立有一碑，刻着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赞王阳明的七言绝句：“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享堂两壁恢复了诗书木刻，内有王阳明的《训士四条》《谕俗四条》。堂外为两重庭院，两侧长廊墙壁嵌有王阳明的《矫亭记》、家书文稿和线刻燕服画像，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清代学者考证、游览祠堂题咏及捐资修建阳明祠人员姓名等石刻共数十方。这些石刻系金石家罗文彬于清光绪五年（1879）精选墨本，由书法家袁思韡双钩上石，他俩一时被世人赞为双杰。

袁思韡不以官显，却以书艺闻名于世。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而他却会试不中，一生给人做幕僚，流连于山水与书法艺术之间，却因此成就了他历史文化名人的机缘，得以流芳千古。袁思韡能文工诗，著有《双印斋诗稿》；绘画以花卉为主，画风淡雅；书法以小楷见长，兼善行草，“笔法近米芾，颇有潇洒出尘之慨”，为同治、光绪年间以来黔人书法之首。

袁思韡书法现存有黔灵山九曲径的“赤松归隐”和“叠翠”摩崖石刻。他在东山寺山门外左右壁上石刻草书“栖霞岭”三字，每字半米许，气势雄健，苍劲浑厚，如游龙走蛇，在“文革”中被毁坏，现已恢复。

袁思韡与夫人杨氏合葬在今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曹官村新堡寨西北600米处。土堆坟，碑高2.45米，宽1.1米，碑石镌刻“清故盐运使銜广西补用知府袁公暨原配杨淑人莹”字样，碑阴镌刻有袁氏夫妇的简要生平。

## 贵州楹联大家刘韞良

刘韞良（生于1844年，卒年不详），字玉山，号我真氏。楹联大家。

刘韞良父亲是翰林出身，由普定迁贵阳，定居三块田（今龙泉巷），大门上曾竖有“翰林院”匾额。清同治七年（1868），刘韞良乡试中举，清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为殿试第七名，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期满后，授云南恩安（今昭通）知县。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性格孤傲，不愿同流合污，后因得罪上司，被参劾革职“永不录用”。

刘韞良在断绝仕途之后，漫游各地十余年，足迹西至崆峒，东到大海，北达长城，南抵镇南关。他登名山数十座，泛舟南北江河湖海；观光老子、庄子、刘向、霍光、司马相如、赵孟頫、唐寅等历史人物故里；凭吊信陵君、屈原、周勃、韩信、刘备、周瑜、陈琳、曹植等人的墓和若干帝王陵；游览众多著名寺观、亭台楼阁、关隘、历史事件遗址。所到之处，他都题有楹联。

清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刘韞良返回贵阳后，因通晓医理，便以行医授徒为业。他自题医馆联：“满眼尽疮痍，惜未能奋志匡时，良相竟辜天下望；毕生空潦倒，笑无妨恒心学艺，贱巫同被世人呼。”从中可以看出他被罢官内心很不平静，感慨亦悲凉。刘韞良曾自题生圻联一副：“有生有死，有死有生，大数也难敌天拗；无去无来，无来无去，真神端不古今磨。”可看出其对生死看得很透彻。



## 一、联语巨著《壶隐斋联语类编》

刘韞良著有《壶隐斋诗集》二十卷，《壶隐斋联语类编》十二卷，《牂牁群苗杂咏》《禽言杂咏》《俚俚解颐》《俚语谐律》各一卷，《牙牌令》二卷。其中《壶隐斋联语类编》十二卷，每类为一卷：一至四类为贵州名胜、关河、古迹、祠宇，凡是贵州境内名胜风景、古建筑、关隘、河流湖泊、桥梁、渡口、城门、水井、名人故居、私家园林、会馆、书院、祠宇所题楹联均归入；五类和六类为历览、怀古，为游览省外各地所题楹联；七至十一类为题咏、酬赠、庆贺、哀挽、短杂，多为应酬之作；十二类为游戏。该书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全书有 2353 联，堪称联语巨著。

刘韞良常以楹联方式发泄胸中怒气，一吐为快。《壶隐斋联语类编》反映社会现实深刻，每每切中时弊。对于贪官污吏、阿谀小人，刘韞良无情地予以鞭挞。如题某官厕所：“掩鼻过之，谁把贪夫污代洗；染指出矣，人将显者粪争尝。”他对社会丑恶现象亦是大加讥讽，如题洋烟馆联：“神易昏，鬼易迷，过瘾忙要开灯，似人已枯非人矣；价又高，钱又贵，设法更难赊账，求他不应奈他何。”寥寥几笔，如同一幅漫画，勾勒出一个鸦片烟鬼的形象。刘韞良借写看戏，把古今真真假假，相互欺诈的勾当揭露得畅快淋漓：“古亦戏尔，今亦戏尔，装古今人把戏，场中何人始作俑者；你也闲了，我也闲了，趁你我得消闲，局外大家且往观乎。”但凡生活中的小事，一经刘韞良写出来，便十分精彩，幽默之中见深刻道理，比如他写的剃头铺对联：“快快轻轻，且替他刮了皮毛，现出十分真面目；干干净净，要等我弄些手脚，换成一副好须眉。”做件衣服本是常事，但他也要借此把“名公”骂上一句：“巧巧轻轻，让贱侬口夸组织；颠颠倒倒，笑名公胸味经纶。”像这样小中见大的楹联，《壶隐斋联语类编》中数以百计，该书不失为中国联语文化的一朵奇葩。

## 二、恢弘气势的甲秀楼长联

刘韞良游历各地十余年的经历，使他对人生和世事的认知皆心有独到，胸

中格局自然与众不同。刘蕴良所作甲秀楼长联原文为 206 字，联曰：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娇，北带巴衢；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那中原半壁。却好把猪拱箐扫，乌撒碉隳，鸡讲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闾里，锦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凌牛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忆秦通棘道，汉置牂牁，唐靖且兰，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了旧迹千秋。到不如月唤狮冈，霞餐象岭，岚披凤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图烟景。恍觉蓬州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此联比昆明大观楼长联还多 26 个字，不仅文字优雅华丽，还将甲秀楼美景呈于读者眼前，大开大合、纵论古今，胸襟开阔、气魄雄伟。另外，该联不单以字多闻名，更是以恢弘气势取胜，堪称千古一绝。

甲秀楼长联的具体写作时间已无可考，长联最初只在贵阳文人中流传，并未公开发表。1915 年，刘蕴良投稿《贵州公报》，于当年 1 月 24 日刊载在该报《文苑》栏内，题为《甲秀楼楹联》，署名为“我真氏刘蕴良稿”。这是甲秀楼长联第一次公开发表。此后，众多楹联爱好者对长联提出了这样那样的修改意见。其中，贵州现代楹联大家向义（向知方）的修改最为知名，他删去了长联中原有的繁赘字词和部分生僻典故，上下联各减少了 16 字，全文变为 174 字，长联由此显得更加精练。1982 年，向知方先生修改的版本由贵州著名书法家王尊华先生书写，悬挂于甲秀楼底层大门两侧。

甲秀楼长联与昆明大观楼长联、成都望江楼长联鼎足而立，成为中国名胜古迹三大长联。今天，甲秀楼长联依然是甲秀楼的一道亮丽风景。



## 博雅多能、为官有贤声的罗文彬

罗文彬（1845—1903），字植庵，亦作质庵、遂庵，自号香草园主人。贵筑县（今贵阳）人。清末史学家、书画家，云南永昌知府。

罗文彬家居贵阳田家巷，自幼明敏，读书勤奋。清同治九年（1870），其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官礼部仪制司主事。清同治十二年（1873），罗文彬终养回籍。

### 一、参与编撰《平黔纪略》

《平黔纪略》是贵州近代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由罗文彬与华阳王秉恩合撰。全书30卷，记叙清咸丰四年（1854）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间，清政府镇压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用兵的全过程。体例仿通鉴，以年为纬，以月为经，按月记叙，每年为一卷。其目的是“以奏折为凭，取备他日国史方略采择”，书中保存了许多当事人和当时的奏章公牍，为后人研究那一段时期贵州军事、政治、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该书体例严谨，文字简洁，分门别类，贯穿首尾。罗文彬认为咸丰、



罗文彬

同治年间贵州各民族起义失败的原因是：“起义军并无长技远志，意在争土田，毁城垣，掠食货耳。胜则群趋，败则各遁。无旗帜、营垒、行列、号令，此其短也。”他的结论与现代史家的评论几乎一样。罗文彬在贵阳还参与了《贵州通志》的编纂。

## 二、《香草园日记》纪实

罗文彬学识渊博，著述甚多，除《平黔纪略》《盐法志》《云南全省舆图》《山川水道考》外，另有《家礼便览》《香草园集》《香草园日记》等。尤其是《香草园日记》对贵州贵阳事实记载较多，于地方文献大有裨益。该书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可补正史之缺，如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戕杀一案，记载详实，并对李鸿章在此事件中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记叙道：“微文相砥柱中流，挺然以一身当其冲，彼族无厌之求，得步进步，大局不堪设想。若非李鸿章于水尽山穷之时，另劈一路，妥为解围，则决裂必在顷刻，中国疮愈未复，亦非上策。”在日记中，罗文彬对贵州人都很推崇。他记述了贵阳人石赞清在天津知府任上大义凛然，痛斥英国兵的爱国精神。如实记载织金丁宝桢为官清正廉洁的事迹，他写道：“丁宫保到蜀，仅随带衣箱二，所过沿途州县，只许供给米数斗、肉二十斤。接事后，凡总督以下陋规及节、寿，皆不许受其馈遗。”他的这些记述，查阅和使用大量的原始材料，详实可信。还有在贵阳发生的一些事，如缅甸贡象过贵阳、贵阳地震等，在《香草园日记》中均有记载，是一部了解光绪初年贵阳人和事的珍贵资料。

## 三、著述颇丰富，为官有贤声

罗文彬擅长书法，尤精秦篆、汉隶，其篆书为贵州莫友芝后第一人。其小篆有手抄本《诗经》和《史晨后碑》屏、《朱子格言》屏，绘画有梅、兰、竹、菊册页等传世。

罗文彬与贵筑县人、书画家袁思韡主持修建阳明祠。清光绪五年（1879），



应四川总督丁宝楨之聘，其赴四川参与盐政改革，著有《盐法志》。清光绪八年（1882），遵义唐炯任云南布政使，邀罗文彬到云南编撰《云南全省舆图》《山川水道考》，这些史籍经过严格考据，记述详实。清光绪九年（1883），其入京仍到礼部供职，因熟于典礼制度，故朝廷之册封、赠谥等事务，均由罗文彬酌定，然后上报。清光绪十三年（1887），其任会典馆纂修官。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充主客司掌印官。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升授铸印局员外郎，奉旨铸皇后及珍、瑾二妃金玺并篆文。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出任云南永昌知府。到任之初，罗文彬向上司提出修城垣、浚水道、办团练、课蚕桑、兴学校、联保甲等要务的实施构想，极受上司嘉许。后他又逐一落实戡盗贼、省刑罚、薄税敛等利民之事。罗文彬担任永昌知府近两年，境内大治，民众称好。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罗文彬病逝于云南昆明，享年 58 岁。

## 选派贵州学子留日的巡抚林绍年

林绍年(1849—1916),原名资举,字赞虞,号健斋,晚号榆园。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代名臣,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

林绍年父林星海(1814—1874),字景畴、锡九,号寿田,国学生,候

选布政司,敕授宣德郎,诰赠光禄大夫。林绍年自幼过继给伯父林景桐(1808—1826,字梧樵,国学生,诰赠光禄大夫),自幼苦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其后任清光绪六年(1880)会试与清光绪八年(1882)顺天乡试同考官。清光绪十四年(1888),林绍年改任御史。他为人耿直正派,刚一上任便公开上疏劝谏,力阻慈禧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直言道:“生人罢弊,当以俭化



林绍年



天下，使疆臣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虚帑贾怨，未足以言智。请下诏停输，还所进奉。”但一意孤行的慈禧太后拒谏，朝中一些官员也纷纷指责林绍年，林因此被贬外调。但林绍年此举颇有古诤臣之风，升沉不问、利害不顾，名噪一时。

清光绪十六年（1890），应两广总督之邀，林绍年出任广东四大书院之一的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林绍年主政书院三年时间，书院学风、文风为之大变，呈现气象万千、欣欣向荣之势。

林绍年离任端溪书院山长后，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外放为云南昭通府知府，随后调署云南府。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升任贵州按察使，这是他第一次来贵州。次年他又迁云南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授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周云祥率众抢占个旧厂，并攻占个旧县署和临安府城，林绍年和总督丁振铎均受处分。林绍年与云南按察使刘春霖统军收复石屏州及临安府城后，刘春霖著赏给头品顶戴，林绍年著加恩开复处分。清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林绍年调署贵州巡抚。

这是林绍年第二次来贵州。因他在贵州任过按察使，时间虽短，但是了解贵州情况的。在施政中，他大量复制在云南施行的各种措施，紧锣密鼓地出台兴革之举措。他上《筹办黔省事宜折》，提出“治黔方略”。代理贵州巡抚仅一年时间，林绍年上呈涉及经济、教育、军事等事由的奏折达 20 件。为排除阻力，推行新举措，其一次上奏裁撤贪腐昏庸官吏达 14 名。其主要举措如下：

接受新式教育。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林绍年效仿张之洞，一年之中考选和选派三批士人及官员共 151 名到日本留学或考察，此后在民国时期逐步显露出来的一些贵州名流政要，如兴义王伯群、贵阳周昌寿、安龙张鸿藻等，都受其惠泽。同时，林绍年在全省范围内对旧式书院全面改革，倡办新学堂。筹办客籍学堂，使外省来黔人员的子弟有学堂可读。应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

任可澄、华之鸿等请求，将贵阳府中学堂改名贵州官立通省中学堂，拨公款作为经费，还将膏火费、学田等收入作为补助。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提出“高悬高等之名，而无高等之实”，将贵州高等学堂改为贵州师范学堂简易科。都匀知府潘家恂奉命在鹤楼书院旧址创办都匀府官立中学堂，兴义笔山书院转型为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校内增办师范传习所等。

重视女子教育。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十一日，林绍年上呈《请乘时振兴女学事》一折，言“富强之源，女学亦居其半”。贵阳资善堂开办女子初等小学堂，达德、广益等学堂也开设女子学堂，各地创办私立女学不断涌现。他还提出重罚缠足陋习，以此来筹集兴办女学的经费。

清理“插花”积弊。林绍年认为“苗疆之难治，非种族之不齐，实地界之不正也”。各县插花地、飞地造成行政管理上的不便，形成经济交流与发展的阻隔，甚至变成盗匪的藏身之地。林绍年到任后，将插花地、飞地划拨作为一项重要事务来实施，后任继续推进，破解了长期困扰贵州的“老大难”问题，加强了政府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稳定，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裁撤防营、整顿军队。林绍年在云南裁汰绿营军，整顿和训练团练。到贵州后，以贵阳左营参将署箭道修筑房舍开办将弁学堂，招收绿营裁撤武弁、在省候补将弁世职等，为贵州培养了下级专业军事人才。

兴办蚕桑实业。从云南来贵州途中，林绍年便有心“沿途查勘土地”，“抵黔后，又查知前抚臣潘霨购浙桑尚有存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林绍年奏请朝廷批准，“力赞其事，拨专款扶持”，将贵阳原经世学堂斋舍创办为蚕桑学堂。从此，贵州开始了农业教育。堂内学生两年毕业，培养既能从事理论研究，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堂外学生则主要学习实际操作，半年毕业，主要培养技术人才。

林绍年任职贵州期间，几乎每个月都有施政举措出台，遗憾的是有若干举措还来不及实施，即移广西巡抚。之后，林绍年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其又因得罪庆亲王奕劻，称病退出军机，外出任河南巡抚。



宣统时，其任民政部侍郎，后告病回乡，1916年，林绍年病逝于福州故里。贵州名贤耆宿姚华、刘显治、夏同龢、陈光焘等20多人联名送去一副挽联“遗爱在西南，富水贵山思节钺；大猷垂竹帛，房谋杜断惜丝纶”，以唐代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为例，深切地表达了对有功于贵州的林绍年的思念和敬意。

## 雄直清刚、学问博通的陈田

陈田（1850—1922），字松山。贵筑县（今贵阳）人。清末翰林院编修，学者。

陈田为贵阳世家子弟，其弟陈矩、陈灿均有名于世。清同治八年（1869）乡试，陈田与弟陈灿一同应试，陈田中第一名，陈灿中第二十七名，陈氏兄弟一时称誉贵筑。清光绪十二年（1886），陈田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陈田

### 一、聚毕生精力，贡献中国及贵州传统文化

清光绪十二年（1886），莫芷升、黎受升正辑录清代贵州诗人作品，将汇编并作纪略，邀陈田参加。陈田心系乡梓，不辞艰辛，力任其劳，增辑考订，经数月成《黔诗纪略后编》30卷。全书收集400余名贵州诗人的诗作3000余首，并一一为之作传证，甄别流派，述其生平、撰著、遗闻、逸事，成为黔中文献巨著。《黔诗纪略后编》与莫友芝（贵州独山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学者、诗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和书法家）所辑《黔诗纪略》



合成全璧。之外，陈田又有《纪略补》3卷传世。

陈田回到京师，公余之暇，又以己之力，搜补前人逸诗，穷“十七年之精力，编辑《明诗纪略》一书，录诗凡四千家，成书凡二百卷，搜罗宏富，采择精详，足补朱彝尊《明诗综》之阙而正其误，为数百年来选明诗者所未有”。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评价陈田所编《明诗纪略》是“罄一家之财力，聚一生之精神为之”，而对陈田的评价是“学问博通而声名黯淡者”，誉为清一代文士。（见钱钟书《石语》）

这两部诗选，倾注陈田大半生精力，是他对中国及贵州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

## 二、痛陈袁世凯妄图篡政之阴谋

陈田生活的时代，正值清末多事之秋，朝廷懦弱。时袁世凯从山东巡抚调任直隶总督，飞扬跋扈，气焰一时，并与庆亲王奕劻勾结，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田时任吏科给事中，目睹国家危难，忧心如焚。其因对奕劻、袁世凯所作所为极度痛恨，便向朝廷上书，痛陈其奸，揭发其“揽权纳贿”，结党营私，“阴谋篡窃”之劣迹，请予以严厉惩处，以弭患未然。但上书以后，当权者慈禧太后未予理睬。一年后陈田再次上书，揭露袁世凯妄图篡政之谋，并指出袁世凯不宜留在军机处之六不可，切中时弊，为世人之不敢言。陈田上书，奕劻、袁世凯惶惶，有所收敛。不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掌权。载沣对袁世凯等之所为早已不满，得陈田书，正中下怀，即发出上谕，勒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陈田名声大振，受朝野正直之士所敬仰。

后陈田深感个人之力量终究改变不了清廷的腐败和无能，引退寓居北京，以诗文自遣，留下《周渔璜先生年谱》《陈给谏遗诗》等著作。1922年，陈田逝世于北京。

## 多学博才的陈矩

陈矩（1851—1939），字衡山。贵筑县（今贵阳）人。清末民初学者。

陈矩早年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上。清光绪十四年（1888），陈矩由监生考取实录馆誊录，随驻日本国大臣遵义人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使馆整理文案，三年后回国。清光绪十七年（1891），他前往云南探视其弟陈灿，因参加当地平乱，以军功荐擢知县。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被调往四川，先后任合州、石泉、三台知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升天全州知州，两年后调回成都。辛亥革命后，他曾署理四川犍为县征收局长、代理县事。

### 一、编纂多部贵州地方志

1913年，陈矩回到贵阳，受聘国学讲习所所长及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为培养国学人才不遗余力。在任内，陈矩研究中国经史子集和诗古文辞，广泛征集古旧图书，充实图书馆藏。1919年，他倡议续修《贵州通志》，任续修贵州通志局分纂，专门从事贵州地方志编纂。次年，他又主纂《都匀县志》，设志局于贵阳，搜集文献，汇录各种访册、访稿，历时三年，纂成《都匀县志稿》23卷40余万字，分地理、大事、营建、食货、官师、人物、艺文、杂志等门类。1925年，他开始总纂《修文县志》，遗憾的是《修文县志》未完成，陈矩便去世了。1936年，陈矩任贵州省文献征纪馆专任编审，自任《金石志稿》编撰，并参与撰写《黔贤事略》。

陈矩尚有著述《洪度集》（唐薛涛著，陈矩校刊）、《宋播州杨氏昆仑策



马图题记》(编)、《乙未英美教案》三札(未刊稿),以及散见于书刊中的诗文《黔中杂韵》《白水岩观瀑歌》《磬园居士传》《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等。

## 二、诗作在日本受推崇

陈矩尤以诗见长。其早年所作《秋柳》七律四首流传日本,为日本士大夫所赞赏。当时日本女才子藤野真子对其《秋柳》诗最为推崇,评价说“神韵可比王渔洋”,还将这四首诗用草书抄录,粘贴于居室壁上,时时吟咏。此事一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佳话。由于陈矩的诗已先声夺人,因此陈矩随黎庶昌一到日本便结交不少朋友,如日本朝野名士中村正直、向闪黄村、重野成斋等人。中村正直把自己的著述编为文集,他亲自到使馆,请陈矩为之作序,并相赠家藏明代贵州理学家孙应鳌《督学文集》(该书后来收入《黔南丛书》出版)表达谢意。陈矩平生所作诗文收入《灵峰草堂集》,包括《悟兰吟馆诗》《东瀛草》《滇游草》《东瀛文稿》《入蜀文稿》,文章多为游记散文。

## 三、广收图书古籍刻印传世

陈矩性喜游历,足迹遍及全国以至海外,并有搜奇嗜古之爱好。每到一地,除登临山川、饱览自然之壮丽外,陈矩必寻求当地图书古籍,以一得而后快,还尽量收集到手,刻印传世。他出使日本3年,共搜获日本国金石遗文4000余种,遗书百余卷,宋元善本书200余卷,名人著述未刊稿500余卷,回国时尽悉带回,影印为《灵峰草堂丛书》百卷和《中国逸书百种志》,以补黎庶昌《古逸丛书》之阙。他在日本时,曾佐助山东人傅云龙纂成《日本图经》30卷。

## 四、精于金石考古通经学

陈矩亦精于金石考古,并注重搜集、研究。他著有《日本金石志》《石鼓全文笺》《皃氏为钟图说补义》《商周鼎钟两种》及《贵州通志·金石志稿》,均有较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志乘志金石有五良焉:一曰通六书之变假,二曰较

(校)经籍之异同,三曰知輿地之沿革,四曰补史传之阙误,五曰识制文之体例。”可谓精到之识见。陈矩又通经学。他对宋代刘敞的《孟子外书》进行详尽的考证,成《孟子外书补注》行世。后他又将补注《孟子外书》所得纂辑为《孟子弟子考补正》,两次刊行于成都,风行海内。时人认为此书“有裨圣教”“厥功甚伟”。1913年后,陈矩回到贵阳,又收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朱彝尊《孔孟弟子考》、郑珍《驳朱竹垞孔子门人考》合为《孔孟弟子辑录》一书,并附以己之《孟子弟子考补正》刻印行世。陈矩还为明代贵州理学家孙应鳌《淮海易谈》作校勘,并阐发原书旨要。

## 五、为官与百姓情深如家人

陈矩为宦四川近20年,勤政严明,慈爱对待百姓,在当时川西一带口碑甚佳。时人评价“善政异绩,美不胜书,尤以在天全任知州时最为显著”。天全地处川西,连年久旱无雨。陈矩到任后,亲自带人深入大山之中,处处踏勘,寻找水源。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中,有人找到一股泉水,他便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发动全州百姓,采办石料,开工兴建成一条长400余丈的石渠,引水下山,灌溉田土数千顷,使全州自此“八垓无饥馑”。在天全三年,陈矩与百姓情深如家人,而百姓也尊敬他如父母。天全产奇石,陈矩曾作《天全石录》一卷以记其事,也借此寄托对天全的眷念。

1939年,陈矩病逝于贵阳。



## 滇缅边界勘界大臣陈灿

陈灿（1853—1923），贵筑县（今贵阳）人。云南迤南道道员。

翻开中国近代史，呈现出一幅幅血迹斑斑的画面：英占香港、九龙，窥视我云南、西藏；法据安南（越南），覬覦我广西、云南；俄蚕食新疆、东三省，先后霸占我154万平方公里领土；德租借胶州湾，修筑胶济铁路，企图独霸我辽东半岛；日占台湾，又取代俄国，成为东三省的主人，妄图南下亡我中国……然而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总有民族精英应时而起，勇于担当救亡的重任。在中英勘定中缅边界的交涉中，黔人陈灿面对凶残狡黠的英方代表，沉着应对，不惧恫吓，据理力争，其维护国权的铮铮风骨赢得了国人的敬仰。



陈灿是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进入仕途后，历任吏部主事、

陈灿

云南知府、道员、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时人对其事功业绩、个性人格评论道：“生平具雄直清刚之气，大气凛然不可犯，经济文章复兼有之，故所至有声。”

在云南任知府和道员时，陈灿鼓励民众植谷种桑，发展经济；他重视教育，创建经正、道成、宏远 3 所书院；他续修《云南通志》240 余卷，用以保存地方文献；他筹款扩修敬节堂，以此抚恤孤寡老人；他严格训练团练，以维护地方治安；他兴修水利，以消除征江水患……然而陈灿最被人钦佩的是在中英会勘滇缅边界中，据理力争，维护国权，保护我国的边境土地不受侵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兵侵占了云南片马等地，激起了当地景颇族、傈僳族、汉族、白族等人民的愤怒，民众在土把总左孝臣的领导下，进行武装反抗，打击了侵略者。在“片马问题”还未解决之时，英人又掀起风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英勘定中缅边界。中方代表由军门（提督）刘万胜及迤南道道员陈灿担任；英方由司格德任勘界总办，觉罗智任会办。中英滇缅分界事宜，原本由中国驻英大臣薛福成与英外交大臣在伦敦订立条约，划定边界。两国本应遵守条约，然而由于时间久了，英人横生枝节，想借勘界之机，侵占我国更多的领土。陈灿接任后，迅速赶往鄙阿，住宿南卡江边，然后与英方会办觉罗智会面。两人首先订立禁令：“只许于附近边界线登山查勘，不准混入内地……”为了不让英方弄虚作假、浑水摸鱼，陈灿不顾自己身体，跋山涉水，与英方逐段勘绘定线，垒石竖木，一一标记。勘绘之际，突然发生英方人员曹大林和医生被中缅边界缓冲区佻人杀死的事件。陈灿、刘万胜预感英方将借此寻衅，立即赶去询问。然而英总办司格德不肯罢休，想借此事要挟中方，企图使刘万胜和陈灿在边界划分时“通融些”。面对司格德的传话人，陈灿义正词严地指出：“曹大林及医士到猛董（地名）赶街，既不听劝阻，又不准保护，复枪毙野佻（佻人），以致激怒众野佻将他戕害，一切始末情形，均已向司（格德）总办说明，于我们有何干涉？即令有干涉，也只是我与军门（指刘万胜）承担，断不能牵涉界务。这段边界，中间是野佻地方，这边是中国云南边界，那边是英国缅甸界。我们不能越野佻地方侵占英国缅甸界，请司总办也不要越野佻地



方侵占中国云南边界，办理就平允了。”

英方见中方态度强硬，加上自己理屈，只好大事化小。之后，英方歪曲事实，力争鄙阿以下各村寨，但陈灿坚持条约，摆事实、讲道理，剖原因、辨是非。英会办觉罗智动辄要挟，大声恫吓，想将南哈河内混指为英方国土。为此，陈灿四处搜求证据，据理驳斥对方的无理要求。双方最终达成定义：仍以南哈河分界。这次交锋，英方不仅没占到便宜，还领略到陈灿的厉害。正当陈灿与觉罗智会勘南段界务时，觉罗智见孟连一带“田坝纵横数十里，南腊河灌溉膏腴”，侵占之意顿起。他欺陈灿是一介文官，难于跋山涉水，便要挟要一同登山指线。陈灿毫不退缩，与其遍历险阻之地，确定边界线，毫不示弱，使觉罗智无计可施，一无所获。行至打洛时，英方忽然提出“照会”，声称南卡江以东镇边、孟连等地驻有中国军队，说这些地方按《中英缅甸条约》应属英方管辖。陈灿根据薛福成与英方签订的条约界图，当面向觉罗智指出这些地方在中国的红线界内，中国驻军理所当然，毋庸置疑。陈灿就此“照会”英方，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然而英方不顾事实，坚持中方撤军。陈灿斩钉截铁地说道：“今日即觉罗智亲持手枪向我轰击，亦决不撤兵！”司格德见所派文案无功而回，亲自进行恫吓，但陈灿始终坚持条约规定，毫不退让。在回复司格德的“照会”中，陈灿严正表明“本国沿边分驻之兵，均在本界内，并未越界，决无退回之理”的立场。面对陈灿这位不怕死的硬汉，英方的各种伎俩和图谋都一一挫败，中国的大片河山得以保全。

1937年4月，中英勘界委员梁宇皋、张祖荫途经孟连所属的孟马时，前往凭吊清勘界大臣刘万胜及迤南道道员陈灿，“因感激两公不屈不挠之精神，及保疆土之决心”，在孟马路旁树碑纪念。碑高两丈四尺，上方镌刻“气壮山河”四个大字，足可彰显刘万胜、陈灿的雄直清刚之气及维护国权的高尚品质。

附：《中英滇缅勘界纪念碑》：光绪二十五年，中华甘肃西宁镇刘公万胜、云南迤南道陈公灿，奉钦命与英钦差大臣司格德，会勘滇越南段南定河至拜桑一段界务，因双方视界歧异，各不相谋，而两公又以国家疆土尺寸轻让，争持

/ 贵 / 士 / 名 / 贤 /

尤烈。翌年春至孟马，遂停勘而归。厥功未成，然而两公之赤心捍国，亦足以辉昭百世也已。本年皋等奉使续勘，经过斯土，缅怀前哲，爰刻兹石，以志景仰。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梁宇皋、张祖荫敬立



## 不随流俗的何威风

何威风（1853—1918），字翰伯，号东阁、藻皇、药嫦、药道人等。清镇市人（清代属安顺府）。清末知名诗书画大家。

何威风才华横溢，诗文、绘画、书法皆有显著成就。孤傲耿直的个性让他贫困潦倒，爱国忧民之心也使其备受尊重。何威风的个性与其家庭氛围和成长经历分不开，他出身于书香门庭，其祖何端为道光翰林，曾祖何炜、高祖何易为乾隆翰林，其父何瞻斗为优贡。父亲何瞻斗，咸丰年间为岩上庄总甲，秉性倔强耿直，对贪官污吏极为痛恨，也因此招来嫉恨。时值连续三年涝灾，农民颗粒无收，而官府催税急切，农民苦于无粮交税，迫不得已就将田中残存的稻穗交给官府，希望官府体谅灾情，减免公粮。没有想到这反而触怒县宰，迁祸于何瞻斗，诬告其嚣张违法，聚众抗粮，后何瞻斗被判处死刑。年幼的何威风跟随母亲逃至安顺，艰难度日，生活贫困，庆幸何威风自幼即得到母亲教诲，知家世，明大理。

何威风幼时爱好读书，聪慧过人，勤学苦练。成年后的何威风才高学富，名满京师。翁同龢为朝中重臣，赏识何威风的才能，举荐于庆亲王奕劻，庆亲王问其治国之道，何威风当面痛斥清政府腐败，因此不被起用。翁同龢惜才，后来又向岑春煊制军推荐何威风，岑春煊重视其才干，与张鸣岐并重，一起共事了几年。后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苦留何威风，此时的何威风对朝廷的昏庸无能、尔虞我诈已经深恶痛绝，终是托病坚决回乡。何威风有诗《读史》云：

不帝中原亦不臣，英雄终竟得奇横。

王徐钱窦皆天授，自古乘时亦拥兵。

此诗当为何威风明志之作，可见其个性极其刚直，厌恶阿谀奉承，不屑于通过科举途径求得飞黄腾达，也不愿意干谒诸侯求得扬眉吐气。

何威风自小家境贫寒，无钱读书，但是这并没有泯灭他的才华。他路过崇真寺时，听到安顺名士郭春帆在上课，就悄悄听了多次，几月后写下诗作登门求教。郭春帆看他一表人才，遭遇凄凉，便资助衣食书本等帮助他读书学习。何威风天资聪慧，勤学苦练，诗文绘画大有长进，花卉草木，山水竹石，凡是看到的都可以模拟成图，惟妙惟肖。成年后，因个性使然，虽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却不失本性。他绝意仕途后，放性自然，保持自我，在诗文、绘画、书法方面皆有显著成就。

何威风的绘画，其特点在于构图常出人意表，造型多夸张变形，喜用水墨，不假色彩，笔墨简逸潇洒，重在抒发性灵，其不少作品无论立意还是技法，都敢于打破俗套，标新立异。据说清代贵阳状元赵以炯买了一把杭扇送给慈禧太后，请何威风书画扇面，何威风在扇的一面画桃柳图，题七律一首。诗中有一联“柳色青于名士眼，桃花红似美人心”，慈禧非常欣赏，称“文雅风流，当代无双！画如其人，画为心声”。近代中国时局动荡，国运艰危，何威风人生起落，理想破灭，心境变幻。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晚年时，其画风转变，日趋走向成熟，并攀上了艺术高峰。其传世代表作《骏马图》《松下问童子图轴》《凤之自写真图》《鹰扬图》等皆为晚年之作。

何威风还擅长书法。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翁同龢盛赞“藏力于内，筋骨显然。雄秀潇洒，遒劲挺拔”。何威风先学王羲之《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又学欧阳询、颜真卿的字帖，后研习秦汉魏晋碑版。其集聚众家之长，又能变化出新，笔力雄健，潇洒自如，自成一家。因在书画方面的造诣，其与明末名震京师的另一位黔人杨文骢被誉为“北龙南风”。

何威风的诗歌主要有咏物、感时、写景、题画等，格调高雅，风格清淡。



何威风作品

其咏物诗追求神似，注重对物的神态进行渲染，往往寓情于物，尽显诗人情感。在广州，他倍感祖国山河之绮丽锦绣，热爱生活之情油然而起，便作《咏荔枝》一诗：

荔枝如火雨如丝，暮霭炊烟入望时。  
我效坡翁啖三百，岭南小住也相宜。

面对劳苦大众，他充满深切的同情与叹息，在其《蜒姑》一诗中有强烈的表现：

蜒姑自小沧波住，打桨停橈日日忙。

非是阿侬偏爱水，一身生计在舟舡。

近现代书画大师姚华高度评赞何威凤“诗书画三绝”，是贵州300年来继杨龙友、郑珍、莫友芝后少见的书画家。

何威凤以凤为名，以凤入诗，以凤为画。他的绘画作品以凤最多，以画凤最为精湛，亦最为世人所推崇。

纵观何威凤的一生，才艺极高，却怀才不遇，纵然潦倒，却不失本真，保持自我。他借堪称百鸟之首的凤表达自己非凡出众的才情与清高傲视的品性，可谓一身孤傲行立于世，万丈豪情化为孤凤长鸣。



## 以书法闻名于世的严寅亮

严寅亮（1854—1933），字弼臣，号剩广，别号碧岑、阳坡山民、阳坡居士、武陵居士。贵州印江人，定居贵阳。清末民初书法家。

清咸丰四年（1854），严寅亮生于贵州印江县农场乡南阳坡村（今印江县峨岭街道黔溪村）。其幼年入私塾，聪敏早慧，勤奋好学，尤好书法，14岁便能提笔书匾联，尤以其所书榜书大匾“竹筠松茂”传颂乡里。清同治十二年（1873），严寅亮入思南府学，选补弟子员，接受传统教育。三年后，严寅亮赴省城乡试未中。清光绪十五年（1889），其赴贵阳乡试，中己丑恩科举人，后授四川候补知县。次年，他赴京会试未中，习业于国子监，继授馆于某侍郎家。不久，他考中清廷宗室官学教习，兼国子监南学斋长，继续深造经史训诂之学及诗古文辞。

清光绪十七（1891）年九月，颐和园重建竣工，诏谕书法家书写颐和园匾额。严寅亮受翁同龢之嘱，书就“颐和园”三字献上，京城善书者啧啧称赞，慈禧太后朱批“录用”并召见嘉勉，赐龙纹镶边玉章“宸赏”一枚，后又命他书园内殿堂、楼、



严寅亮

阁匾额 18 方，对联 23 副。严寅亮均以行草秀逸书就，一时名噪海内。此后，他几度参加会试均未得中，遂回家乡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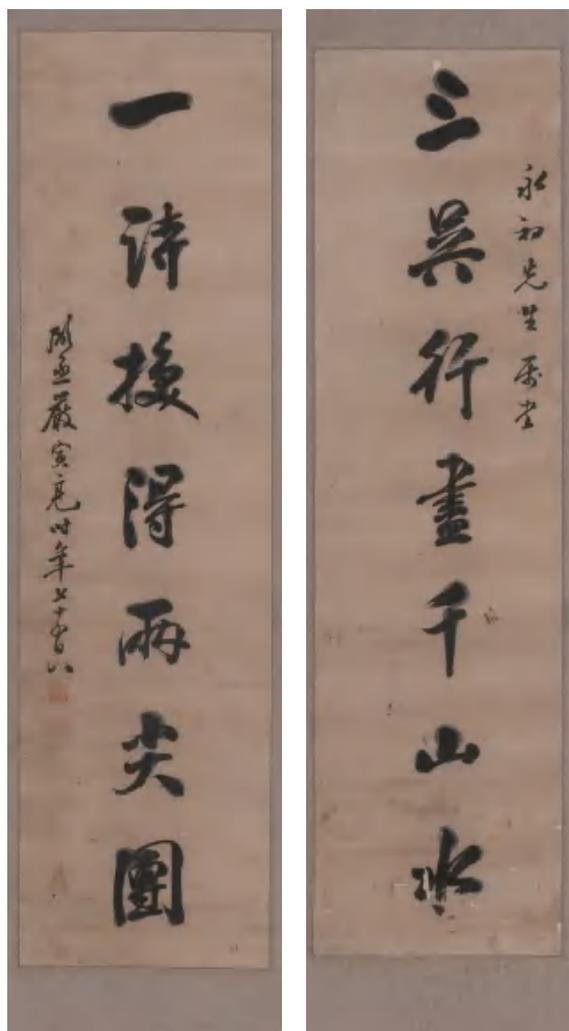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寅亮从印江来到贵阳，主讲位于府城北门的正本书院。次年，其又应邀到铜仁主讲铜江书院。严寅亮博学多识，教学认真，备受学生尊重。在铜江书院执教五载，桃李遍及黔东各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寅亮辞去教职，经四川、陕西、山西至河南参加朝廷特许的科考，经评选后以盐大使留京候用。其间，他与京师名流学士多方来往交流，又到琉璃厂、荣宝斋等地观赏临摹历代名家书法法帖，得其神韵，学养日增，书艺益进。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严寅亮以知县加同知衔分发四川。在四川期间，蜀中旧友将他临池若干编墨迹石印成《剩广墨试》一册，分发同好。时任成都知府、贵州清末名士陈矩在书中题跋“碧岑道兄书，娟秀中饶风骨，殆集唐宋诸家之长……铁画银钩，辉映霄汉，莫不艳羨”。题跋对严寅亮的书法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辛亥革命后，严寅亮回转家乡印江，授徒研书，并约集乡人以故居旁奎阁作为校址，创办印江正基初级小学。

1913 年，他应尹笃生校长聘，到贵阳担任省立贵州师范学校教职。才一星期，又奉委为龙里县知事，屡辞不准，只好去龙里担任县知事职，一年余就坚持回贵阳教书。从此，他定居贵阳，先后在贵阳国学讲习所、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贵州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任教，讲授国学、习字等课程。其旧学根底深厚，古文、诗词、书法皆佳，虽是名人却无名人习气，且勤恳认真，深得学生敬重。严寅亮执教近二十年，有时一日在数校上课，每周多达二十几个课时，呕心沥血，其立志教育始终不渝的精神，在当时的贵阳教育界传为美谈。

严寅亮一生以书法著称。其书上探金文小篆，近学欧阳询、苏轼，融会贯通，发扬创新，自成风格。每当握管挥毫之时，正襟危坐，一点一撇，一横一竖，聚精会神，认真细致。他的书法特点，“在于取碑帖之长，融欧苏刚柔之美，上探篆籀，还刀法于笔法，不囿一格，秀媚中饶有风骨。各体兼能，楷行尤精”。



严寅亮对联左

严寅亮对联右

“楷书雍容大度，体势轩昂，运笔不涩不浪，布白自然疏朗。”“行书潇洒自如，无做作之态，无险怪之笔。”

1930年，严寅亮在贵阳与杨覃生、王蔬农、桂百铸等十二位名流组成“郅社”，每月聚会一次，切磋学术，以诗词、寿文、书画、篆刻为主，各显其长，精工制成屏、联、堂、幅，轮流互献，共祝遐龄，一时传为佳话。1931年，严

寅亮因年老体衰，辞去各校教职，就此封笔，不再创作书法作品。

严寅亮的著述，除《剩广墨试》外，还有《严氏家训》《严寅亮年谱》，校勘廖袭华所著《古本大学释议》《进藏日记》，校勘赵幼渔所著《赵鳖生文集》。

严寅亮“书法可比东坡、道德可比庐陵”，在国内名胜古迹处留下的墨迹甚多，如成都的“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广州的“中山公园”“梦草堂”，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修文“阳明洞”，黄平的“飞云洞”，黄果树的“观瀑亭”等。严寅亮不仅以书法闻名于世，文辞也甚佳，所书楹联多为自撰。原贵阳市大西门外卢焘的母亲墓园慈园石刻联：“春晖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园。”黄果树“观瀑亭”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只此数则，足见其文采与翰墨并辉。1923年，滇军二次侵黔。目睹滇军在黔纪律废弛，烧杀掳掠，敲诈勒索，横行霸道的恶行时弊，他写下了“遍地荆榛兵作匪，满山豺虎盗为官”诗句。

1933年，严寅亮因痼疾复发，医治无效，逝于贵阳，享年79岁，葬于原籍印江。



## 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雷廷珍

雷廷珍（1854—1903），字玉峰。贵州绥阳人。经史学家、教育家，贵州经世学堂创办人之一，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后，民族灾难深重空前，先后涌现出一批爱国先贤，如津门严修、贵筑李端棻、绥阳雷廷珍等，为挽救中华民族垂亡，他们深入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认为“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选育人才要“敦品励学，讲求实用”，即民族复兴必须从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体系，从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入手。国家的兴衰治乱，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之本源，乃在于学校之教育培养。

清光绪十四年（1888），雷廷珍考中举人，他精通经史，服膺于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他对科举之弊痛心疾首，放弃了仕进之念，全身心投入经世之学，回到贵州后在家专心著书。雷廷珍不迷信古人，敢为人先，打破传统，提出“以时中为宗旨，以大同为依归”，大胆将西方先进思想和学术引进来“合炉而冶”，以改造中国传统经学。他认为要把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引进课堂，“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他以实学的治学理念，践行于教育事业，以至声名大振，刚走进贵州的严修感叹“不意于黔中乃见大儒”。

清光绪二十年（1894）底，天津严修提督贵州学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修开设贵州官书局，首开贵州官府印行图书之例，成为黔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场所，还聘雷廷珍主持书局。官书局的开办与运营，



雷廷珍

不仅疏通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的传播渠道，更是贵州出版印刷事业的发端，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贵州官书局成立后，陆续刻印了王阳明的《尊经阁记》、张之洞的《輶轩语》、田雯的《黔书》、张澍的《续黔书》等图书。除了刻书，贵州官书局还经营贩售他省刻印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贵州交通梗阻、信息闭塞，而广大民众渴望新知识，了解文化新动向的需求的问题。

严修主张学校教学必须学兼中西，“师夷长技”，把改革书院的教学和课程视为当务之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倡议“变通书院”，选择省垣离学政署较近的学古书院为重点。当时，贵州师资、

设施都不具备为天下先的条件，众人对改革书院旧制颇存疑虑。然而，雷廷珍积极配合严修，与严修召开了各书院山长和学师会议，争取大家支持，并征得省府各官员同意，决定将贵阳学古书院作为改革试点。严修欲选雷廷珍为书院山长，对雷廷珍说：“先生屈就山长，并非我一人的主意。省、府、州、县各长官，也倍加推崇。细数黔中人才，非先生莫属。”雷廷珍应承山长之职，积极参与筹建事宜。从选调各属高才生，组织考试，聘请良师，增加经费，添置设备，到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奖惩条例，雷廷珍均参与筹划。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阳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并选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名入学经世学堂。雷廷珍作为堂长，拟定了学堂章程，后经严修修改后定为《学古书院肄业条约》十二条，是一份较为完备的教学改革管理章程。



学堂课程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并讲授时务、政要等。雷廷珍主持书院期间，传导“与时变通”的理念，他认为算术在上古属于“六艺”之一，是士的基本素养，今人不可耻习算学，多次将算学题作为选考内容，鼓励学子加以钻研。雷廷珍不仅主持党务，还要主讲经学。雷廷珍在贵阳讲学，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赞赏。他提倡教学和研究经学，都必须通经为体，追本溯源，匡时为用，著有《经学正衡》《时学正衡》《声韵旁通》《文字正衡》《时义列传》等书。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任满后离开贵州。次年戊戌变法失败，保守势力抬头，雷廷珍慨然于新旧学的纷争，又厌倦于政治的腐败，黯然离开了经世学堂。在学生刘显治等人的邀请下，他来到兴义，被礼聘为兴义笔山书院山长。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再三邀请雷廷珍赴武汉执掌两湖书院，雷廷珍在北上至重庆途中不幸病故，临葬绥阳。

贵阳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被视为开黔省新教育之滥觞。雷廷珍的功绩在于开拓了贵州的近代教育，使清末民初时期的贵州出现人才喷涌的现象。贵州经世学堂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培养的40多名学生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兼备中西文化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贵州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成就，如黄干夫与同仁创办了贵阳达德学校，姚华成为北京京华美术学校的首任校长，周恭寿曾任民国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等。经世学堂成为贵州传播西学之摇篮，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阵地，虽已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但雷廷珍对贵州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奉献精神 and 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垂范千秋。

##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别署花近楼主。其原籍江西崇仁,其父陈炳煜以举人大挑来黔任知县,遂定居贵阳。诗人、书法家,清末直隶总督。

陈夔龙幼时居住在贵阳铁局巷。其8岁丧父,全靠母亲纺织纱布维持全家生计,并教子女识字。清光绪二年(1876),19岁的陈夔龙在乡试中解元。此后数次会试落第,他便往投四川总督丁宝桢处作幕僚。清光绪十二年(1886),其再次赴京会试,终成进士,授兵部主事,深得兵部尚书荣禄赏识,又得李鸿章信赖和倚重,不久晋升郎中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夔龙任顺天府丞。六月中旬,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北京民众火烧大栅栏的洋货店,京城金融中心四恒钱庄焚毁。慈禧太后怕引起更大的骚乱,紧急召见陈夔龙,要他立即筹措资金借给四恒钱庄,并限期三日内办妥。陈夔龙四处奔走,终得户部拨银百万两,拨借四恒钱庄,避免了大规模骚乱。由此,陈夔龙以“办事得力”受到慈禧太后的看重,被派参加是月十七、十八、十九日三天清廷举行的将与八国联军宣战的会议。

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八国联军一路打到北京。慈禧太后惊慌失措,准备出逃。当时陈夔龙已改任他职,但仍为其准备“西幸”马车200余辆,因此更得慈禧太后信任。“两宫西幸”后,陈夔龙凤闻洋人指名要庆亲王奕劻出面议和,时奕劻在怀来养病。陈夔龙便火速联络在京的7名官员联合上奏慈禧,要求立



即派奕劻与八国联军媾和。慈禧太后接奏折后，立即派奕劻、李鸿章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陈夔龙等八人亦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陈是唯一的汉人），并补授顺天府尹。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陈夔龙出任河南布政使，李鸿章认为朝廷外交人才奇缺，奏请留待议和完毕再让陈夔龙前往河南上任。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陈夔龙奉命为慈禧太后回銮修建辇道。工程未完成，陈夔龙便被任命为漕运总督。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改任江



陈夔龙

苏巡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其任命为四川总督，后改任湖广总督，次年到职接任。清宣统元年（1909），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 一、勤于政务整顿吏治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陈夔龙调任河南巡抚。到任后，他大力整顿税额征收弊病，设立清源局，赋税渐次清楚，为治理黄河提供了财政支持。

陈夔龙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积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处事认真果断，使衙内案无积牍，幕府清静、门少杂宾，办了一些实事。当时吏治腐败，贪污盛行，不少官员中饱私囊，“谒天下之膏脂，供一己之挥霍”。陈夔龙深感“公帑有限，岂能长此滥支”。于是，他开始大力整顿吏治，破除情面，严禁滥支，并将前有兼差者，一律厘剔以昭核实，“开怨同僚弗顾也”。他又与度支部商议，推动开办保商银行，以缓解华洋各商的困难，及时解决了前几任总督一直未能

解决的华商亏欠德商银一千一百万两的款项，维护了外商在中国的合法利益。

清宣统二年(1910),陈夔龙又奏请裁撤了海防支应局、淮军银钱所、练饷局、筹款局、印花税局;在天津设立财政总汇处,设四股,每股设坐办、帮办各一人;次年又合并为军政、行政两股,使直隶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渐走向近代化。在当时,直隶各地有不属“正项”税的差徭款,是强加于地方社会的额外负担。清宣统三年(1911),咨议局做出决议,要求废除差徭款。陈夔龙深知差徭款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早就想进行整顿,此次咨议局决议一出,便立即转发,严令各州县官绅会同清理,违者严惩不贷。此项举措对直隶税制改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二、洁身任事，修复京城及古迹

陈夔龙曾竭力修复北京城和姑苏名胜寒山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掳掠,使北京城的建筑遭受严重破坏,急需修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定于十月还宫,为了慈禧太后回北京,京城也需要修复。陈夔龙是顺天府尹,熟悉北京情况,修复京城的任务,慈禧太后就交给了陈夔龙办理。陈夔龙接受任务后,商得同办官员的同意,严格规定“不准索取包工回扣,经费一律用于维修工程,所派员司,一律自备车马”。洁身任事,不辞劳苦,历时三月,工程完竣,修复了京城,旧貌大为改观。同年冬天,陈夔龙调任漕运总督。到任未及一年,继京城修复后,他又捐廉银一万两,倡修北京正阳门城楼,得到清政府支持,陆续筹集经费三十万两银,将正阳门城楼维修一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夔龙任江苏巡抚时,捐银千两,重修苏州名胜寒山寺,重新修建了殿宇,铸造了一座重达四千多斤的巨钟,悬挂于新建的六角重檐钟楼上。寒山寺原有文徵明草书唐朝张继七绝诗《枫桥夜泊》,因风雨剥蚀,字迹不清。陈夔龙又请清朝末年的朴学大师俞樾重书,令人刻碑立于寺中。



### 三、助力家乡文化发展

陈夔龙虽为显赫官僚，但终不忘贵州养育之情。他曾言道：“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虽然他反对废科举，办新学，但出于对家乡的情感，依然为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捐银四千两。他竭力保存、收集、刻印贵州地方文献，出资刊刻明代贵州杨龙友《洵美堂诗集》《山水移》；清代贵州郑珍《巢经巢诗文集》；贵州周起渭《桐埜诗集》《黔诗记略后编》，对保存贵州地方文献有卓越贡献。

### 四、善诗工书法

陈夔龙是名重一时的诗人、书法家，著有《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鸣原集》《江皖道中杂吟》《五十三参楼吟草》《丙子北游吟草》《把芬庐存稿》《梦蕉亭杂记》《游庐纪程杂记》《水流云在图记》等。《梦蕉亭杂记》记载了他宦海沉浮近 50 年的经历，从光绪到宣统两朝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都有记录，史料价值很高，常被治近代史者参考援引。陈夔龙本身秉性及事迹，在该书中也一一显现。《水流云在图记》一书图文并茂，图 72 幅，文字是陈夔龙自撰，所记为幼时至 50 岁开外的经历。其书法以楷书为主，工整清丽，技艺精湛，90 岁高龄时仍挥毫不断，有不少墨宝传世。民国间出版的《近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也收有陈夔龙的书法作品。他一生以“律身唯一俭字；治事唯一勤字；待人唯一恕字”自律。

辛亥革命后，陈夔龙结束宦官生涯，寓居北京德租界。1912 年，他由北京移居上海孟德兰路（今江阴路）。闲居中，其拒绝袁世凯的委任，亦未参加伪满宫廷活动，时常与上海遗老组织“逸社”，幽游林下，诗词唱和，饮酒听戏。陈夔龙思想保守，曾表示：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三种戒条使之晚年蔽聪塞明。1948 年，91 岁的陈夔龙去世。

## 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的赵以炯

赵以炯（1857—1906），字仲莹，又字鹤林。贵筑县（今贵阳）人。贵州第一位状元。

赵以炯生于宦宦之家，幼年时因社会动荡，其父赵国澍时任青岩团务总理，因不时随官军外出征伐，便将他送至贵阳外祖父陈振家寄养。陈家是书香门第，



居住在南明河甲秀楼旁，往来多是文人，使赵以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其大舅陈一珙系清道光五年（1825）举人，镇远县教谕；二舅陈一珩系国学生；三舅陈一珍为处士。这样的家庭环境，为赵以炯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

清同治二年（1863），赵国澍阵亡。赵以炯返回青岩，由母亲陈氏及长姊赵以兰授读辅导。7岁时，赵以炯随本家赵辑五发蒙；清同治六年（1867）入私塾，先后受教于府学庠生出身的吴竹堂（登桂）、顾伯芴、高杨华。赵以炯自幼就聪明好学，加之陈氏教子有方，使得赵氏家风为乡邻敬仰。清光绪二年（1876），

赵以炯



赵以炯和其弟赵以燊入读贵阳贵山书院，受前任贵州学政韦伯谦及黄芷衡教导。在此期间，赵以炯学识渐长，写出《何谓儒家之教》等心得，深得韦伯谦赞许。清光绪五年（1879），赵以炯中乡试第十名，其三弟以炳为经魁（乡试第三、四、五名称“经魁”）。此后，赵以炯又受业于“西南世儒”莫友芝之弟莫庭芝。

## 一、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赵以炯与弟以燊赴京会试，均中进士，赵以炯为钦点状元。明清时期，状元多出自江南地区，贵阳青岩赵以炯殿试中获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成为云贵两省第一位状元，这对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至少国人对贵州文士刮目相看。贵阳人李端棻在京城时任监察御史，特撰联祝贺：“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又值贵阳城东有名胜莲花池君子亭重修一新，李端棻又题一联：“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清波，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状元得意正归来。”中国驻日本公使的贵州名贤黎庶昌（遵义人）撰文赞：“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始以状元及第魁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以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黎庶昌在《赠赵殿撰序》中说：“自顺治甲申迄于今上戊子，凡三百四十五年，举状元者九十八人，东南大省、县或至数人，而西南边徼之地至乃合数行省旷数百年而不得一与，又何其难也！”“夫黔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气郁积蓄久，而于仲莹发之。”博学多才的赵以炯以厚实功底为贵州争得荣誉，用博学才智改变了士林认为“黔地无人”的看法。清光绪十五年（1889），其兄赵以焕中进士，官至江苏丹阳知县。

## 二、能文工书善诗

赵以炯在殿试上所作的文、诗及联语，堪称佳作。如对光绪皇帝（一说考官）亲自所出“东津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为摘星汉”的题联，对以“春牡丹，

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其试帖诗《赋得“报雨早霞生”得生字五言作韵》，主考官评价为“刻画工巧，藻不妄抒”。其策对《中庸不可能也》的评语则是：“绝不矜才使气而轩豁，呈露题蕴自阐发无遗，知洗练之功深矣。”在《历代状元殿试策对观止》中，赵以炯所作策对被评定为：“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之处，的确不亚于别的状元策。”

赵以炯能文工书善诗，但无诗文集，只有零星篇章传世。其少时曾作《咏刺梨》诗一首：“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其才华已现于笔端。他年轻时有自吟诗一首：“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曾为同乡颜嗣徽著作《乔梓联吟》题诗，其一：“银鞍白马锦丝鞭，裘带翩翩美少年。觅句携囊逢李贺，醉书濡额有张颠。”

### 三、辞官回青岩办学

赵以炯中状元后，授职翰林院编修。清光绪十四年（1888），赵以炯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官；清光绪十七年（1891），提督广西学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会试同考官；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母忧回籍，其间他积极反哺家乡的文化教育，主讲贵阳学古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京复职，不久辞官回青岩办学，为家乡的莘莘学子传授知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赵以炯病逝于青岩，享年49岁，葬于青岩镇南约3公里的摆早村岔河寨状元坡。其墓立有牌坊型青石墓碑，墓碑上刻有“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原任翰林院编修广西提督学政四川同考官赵公讳以炯字仲莹大人之墓”“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吉日立”等字样。另有楹联一副：“水秀山明，人文蔚起；龙盘虎踞，帝道遐昌。”



## 贵州新学的开拓者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今天津)人。清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教育家、改革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任贵州学政。

严修是贵州新学的开拓者,改革书院、创办官书局传播新学。严修在贵州改革之时,正是李端棻在京城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之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上奏请开经济专科。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上奏举荐严修为经济特科人才。贵州与北京,严修与李端棻,为贵州新学进步,接踵前行,他们是开拓者,也是领路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朋园认为,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清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清光绪三十一年),思想渐次输入,人才始起”。

### 一、出任贵州学政

学政全称“提督学政”,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每省一人,主管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学政由中央直接选派,“以进士出身之侍郎、京堂、翰林官、詹事、科、道及



严修

部属等官充任”。其地位略低于巡抚，位列布政使、按察使之前，不受地方官员管束，直属中央，可保证其在主持各级考试时不受地方影响，做到公平公正，任期三年。

清光绪二十年（1894），34岁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出任贵州学政。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激战正酣，尽管上至光绪帝，下至普通百姓，都表现出积极主战的态度，但《马关条约》依然毫无悬念地签订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出路。具有新学思想的严修此时出任贵州学政，使他有实践自己的教育改革理想。

初到贵州的严修立即拜会了贵阳三大书院（贵山书院、正本书院、学古书院）院长。在随后开始的教育改革中，书院进行了重大变革，这直接影响了贵州的士子们，也使贵州在清末进行的教育变革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 二、创办贵州官书局

早在离京赴贵州前，朝廷便要求严修到贵州后要“严坊刻”，即筹办书局。自咸同战乱后，各地文教古籍遭受严重破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率先在各地创办书局，刊印书籍，传播文教。

离京之时，严修携带了14箱书，这些书籍日后大部分都捐赠给初建的贵州官书局。从北京到贵州的途中，到达湖北武陵时，贵州镇远人、翰林谭启瑞来见，谭启瑞的父亲谭钧培也是翰林，曾担任多省巡抚，官至云贵总督，谭启瑞随父游学各地，见多识广。他向严修建议在贵州设官书局，仿天津例，购销图书。谭启瑞的家乡镇远是水陆码头，交通重镇，他建议购买书籍可走水运到达镇远后，再走陆路，书籍的运输基本能够保障。

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刚到贵州的严修就与贵阳知府文海商量“设局购书”之事，商定拟购书局书目。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即开始购书，书局开始运行。书局选址在车家巷资善堂，贵阳知府文海早先曾借款在这里试办图书销售点，较为宽敞。因书局经费困难，严修捐银1000两，并将自己从



北京带来的 14 箱书的绝大部分都赠送给书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贵州巡抚嵩昆上奏朝廷，“于贵州设书局”，贵州官书局正式设立。贵州通儒、举人雷廷珍出任董事。严修亲自拟定书目，选派雷廷珍赴上海选购图书。书局除购买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大量购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学书籍，以及维新派人士的著作，如《几何原理》《泰西新史览要》《海国图志》《盛世危言》《公车上书记》等。除购书销售外，书局还刻印一些图书。据严修《使黔日记》记载，刻印的图书主要有《书目答问》《尊经阁记》《先正读书诀》《算书》《提要总序》等。



《蟬香館使黔日記》

书局集购运、刊刻和销售于一体，是贵州最早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所购买或刻印的书籍与全国新学发展同步，甚至走在前列。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刊行后，书局立即在贵州代卖，贵州得以了解最前沿的时代资讯。

贵州官书局的书籍不止在贵阳销售，还销往或赠送给省内各地书院、学校、官员等，让新学之风吹遍全省，使各地学子眼界大开，为日后贵州人才蔚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改革贵州学古书院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刑部侍郎的贵州人李端棻将自己的奏折递交给了朝廷：“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广设学校、报馆。”这就是影响巨大、奠定中国近代教育学制基础的《请推广学校折》。奏折通过各地报纸传遍全国，

远在贵州的严修也得到了奏折。在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1896年9月28日）的日记里，严修记下抄写《请推广学校折》一事。在《请推广学校折》的影响下，严修以学古书院为试点，进行新学改革。书院制定了书院章程、肄业条约和山长学规，形成了一套规章制度。另聘请著名学者雷廷珍任书院山长（院长），由全省各府州县选拔40名高才生入学学习。

雷廷珍，贵州绥阳人，曾多次游历京师，思想开明，严修称其为“黔中大儒”。雷廷珍主持中学课程教学，严修亲自主持西学课程教学，中学西学并重，首开贵州新学风气。学古书院学生日后大多成为影响贵州乃至全国之重要人物，如贵州首任教育厅厅长、贵州大学创办人周恭寿；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姚华；贵州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贵阳达德学校创办人黄干夫；辛亥革命烈士、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提出首开国会的熊范舆，以及刘显治、欧阳朝相等，都是贵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中国教育通史》称“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在清末书院改学堂中是领风气之先的”。

#### 四、奏开经济特科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即将离任的严修向朝廷上奏“设经济特科”，提出从6个方面入手，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一内政、二外交、三理财、四经武、五格物、六考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此事得到批准，但还未来得及施行，便发生戊戌政变，设立经济特科一事遭搁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再次推行，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第一名袁嘉谷，也是云南省唯一一个状元。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施行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取消，经济特科亦未再举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严修即将离任。为表达对严修的敬意，学古书院山长雷廷珍与全体学员为严修立碑，严修婉拒。严修首提“黔学”，强调中西学并重，激励贵州学子要继续开拓贵州风气，做到“讲中学以通经致用，



讲西学以强国富民”。

## 五、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贵州学政期满后，严修回到北京。历经戊戌政变后，严修回到家乡天津，筹设南开系列学校。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严修与张伯苓决定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易地建新校舍，改私立敬业中学堂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学校根据南京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改称“南开学校”。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共同创办南开大学，录取第一批学生96人，周恩来是保送生。为支持学校的建设，严修捐赠购书款2000美元及中文图书30余种数百册。1922年，严修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他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 建树良多的开明士绅乐嘉藻

乐嘉藻(1867—1944),字彩澄,又写作采澄、采丞、彩丞、采臣,一字孟潜。贵州黄平人,生于贵阳。清末民初学者、社会活动家,贵州辛亥革命重要人物,贵州谘议局首任议长。

乐嘉藻父亲乐永隆,字海平,商人,清同治年间由贵州黄平县辗转迁居省垣,居今贵阳市黔灵西路。



乐嘉藻

乐嘉藻是清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以高才生入选贵阳经世学堂,渐识西学。1895年,他赴京会试,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十八省松筠庵会议及公车上书,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科学教育,乐嘉藻名列上书人之一。两次会考后,他遂专攻经世之学,热心阅读新书报,常与平刚、彭述文等聚议新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与麻江举人周恭寿、贵阳贡生杨映阶、诸生陈鉴湖等创办“同志会”,旨在研究新时代教育制度与方法。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他与于德楷、李福田、李子良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外雪涯洞筹组创立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乐嘉藻任协理，实际上办学一应经费、教员、教务、图书设备，“除少数学费，概由乐嘉藻负担”。再如聘请学校教员等事，亦由他延聘。当时贵阳无新学，尤其是数算格致（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老师，乐嘉藻与学校总理于德楷商议，经耐心真诚的邀请，聘请学堂附近武备学堂的三名日籍教师就近兼课，还节省了一半薪酬。国文、历史科目则请张铭等人担任教员。学校后来招收了甲、乙两班，为贵州日渐勃起的新学教育培育了第一批本省师资。

清光绪三十年（1904），乐嘉藻与平刚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会”，并任会长。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其主办贵州初级师范简易科学堂。同年，乐嘉藻与于德楷、唐尔镛、周培艺发行《黔报》，其任主笔，宣传革命宗旨。这一年十一月，乐嘉藻参与张百麟等三十余人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集会，成立自治学社，以“学会”之名而行“革命”之实，学会的宗旨是“合群救亡”。次年，乐嘉藻自愿将历年收藏新旧图书，计值银两千两和所受先辈遗银三千两一并捐出，交贵州提学使柯劭忞验收，以助贵州图书馆创立。清宣统元年（1909）秋，乐嘉藻被推选为贵州省教育总会会长、贵州首届谘议局议长。是时自治学社党人平刚办乐群小学鼓吹革命，剪发辫以示反清，当局急欲杀之。乐嘉藻及时给予经济援助，平刚得以逃往日本，幸免于难。清宣统二年（1910），乐嘉藻以提倡新学为己任，赴日本游历并考察学务，费数千金购置图书、标本、仪器等运回贵阳，供同好研读、实验。1911年，乐嘉藻出任贵州优初两级师范学堂堂长。

辛亥之秋，武昌首义。四川保路、云南光复消息相继传来，乐嘉藻参与调停贵州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两党矛盾。11月2日，乐嘉藻与两党主要负责人张百麟、蔡岳、陈永锡、朱焯、周培艺、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贵州巡抚沈瑜庆从众反正未果。11月14日，陆军小学校、新军率先举事，沈瑜庆缴权，贵州光复。同日，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乐嘉藻任枢密院枢密员，负责管理总务股事。后来乐嘉藻当选为中央参议院议员，准备出发之际，唐继尧

率滇军入黔，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乐嘉藻只得避祸出行。其间，乐嘉藻还撰写了《贵州党争事略》及《辛亥日记》，记录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具体情况。

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天津设立商品陈列所，乐嘉藻任陈列所所长，负责征集送展产品，筹组国产商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16年，其以巴拿马赛会直隶协会代理会长名义，赴美国旧金山出席博览会介绍中国商品，贵州茅台成义、荣和两家烧坊产的“茅台酒”入选参展产品，“茅台酒”被评为世界名酒，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和奖状，从此蜚声中外。之后，他又赴日本考察实业，归国后陆续任中央农商部主事，移居北平，一度任北平艺专教师等职。60岁后，从未受过任何建筑学专业熏陶训练的乐嘉藻，凭借一己之力，将其一辈子收集的中国建筑史资料进行整理，潜心研究，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建筑史》三卷。全书共十八章，附录作者生平简介、图片资料，该书作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后学参阅。抗日战争爆发后，乐嘉藻欲回贵州生活而未能成行。1944年，其在北平逝世，享年77岁。

乐嘉藻勤于撰写，视日记为日课，数十年未尝中断，且所记甚为详细，长者达两三千字。乐氏日记保存良好，现存七十七册，起于清宣统二年（1910），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以年份或内容名之，如《庚戌旅行日记》《辛亥日记》《元年旅行日记》《三年旅居日记》《巴拿马博览会调查录》《七年寓京日记》等，收入由贵州文史馆整理的《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乐嘉藻可谓“有商业眼光的读书人”，或“有文化的革命家”。其百年前所写的日记，殊具史料价值，一些细节堪称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绝佳材料。书中除关于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人的记载外，更多的是参观南洋劝业会，以及到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寻访典籍、字画、古董，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所见所闻，无不记录。循其日记，不仅能了解其人其事，更能从中窥见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变迁。乐嘉藻一生著有《贵州党争事略》《香雪堂文》《香雪堂诗》和《中国建筑史》等。



## 树今生之范、育明日之师的尹笃生

尹笃生（1870—1920），名于忠。贵筑县（今贵阳）人。贵州著名教育家，贵州省省立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访我于梦草池边，话旧六年，心迹光明清似水；吊君在雪涯洞口，怀人九月，文章歌哭冷如冰。”这是贵州著名书法家严寅亮对尹笃生一生做出的评价。从1912至1920年，尹笃生在贵州省省立师范学校主持校务，8年的执教生涯，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把贵师从一个每况愈下的学校打造为当时的贵州第一学府，被誉为“贵州师资的摇篮”，培育了一批教育人才。

尹笃生生于贵阳一个贫寒的家庭，因生活艰辛，启蒙较晚。尹笃生6岁时父母双亡，祖母钱氏做针线活儿赚点小钱度日，一针一线含辛茹苦养育尹笃生。尹笃生13岁才得以入私塾，师从塾师曾文笙先生。笃生15岁时，祖母钱氏也不幸去世了。刻苦好学的尹笃生被曾文笙先生看好，曾先生便周济他的生活，供他继续读书。生活的艰难让尹笃生很懂事，他十分感恩恩师曾文笙先生大义，于是更加奋发努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26岁的尹笃生参加贵筑县生员考试，高中第一名秀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阳贵山书院改称贵州大学堂，尹笃生考入学堂学习。两年后，该学堂改称贵州高等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在贵州考选留日官费生，公开考送公费留日长期学生20名，在贵州高等学堂考选8名，尹笃生当选，获得官费生资格，成为赴日留学的首批贵州官费生。尹笃生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习

师范教育。攻读六年，于清宣统三年（1911）毕业，1912年1月回到家乡贵阳。

尹笃生回筑后，即被委任为贵州省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因学校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停办，学校师资另谋生路，学生大多返乡休学。停办期间，学校教室、教学设备都是些旧物，多有残损破坏，此时是贵师最艰难的时期，尹笃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尹笃生上任伊始，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首要举措是选聘教师，完善学校设施，召回学生。尹校长“依靠黔人”办学，决心“以黔人之力，振兴贵州教育”。他相继聘杨映阶、萧协臣、萧子友、黄子久、官馥滋、黄进甫、刘尧冥、桂百铸、严寅亮、李俶元、杨覃生、陈廷棻、王延直、黄耀初、向知方、丁宜中、王漠、金华西等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的名师为各科教师，杨孟辉、萧子友担任学监。1913年底，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后，学校仅剩一间教室，他奔走呼吁，申请得到护军使署拨款添修校舍。一年多时间，他亲自监工，节约开支，建成教室宿舍，并购置了不少图书和教学仪器。1915年春，为便于第一期学生实习，他创设贵师附小于大兴寺。1916年春，贵师第一期毕业学生只有23人，在尹笃生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1920年，毕业学生200多名，遍布贵州各县，学校声誉蒸蒸日上，报名投考者十分踊跃。

执教期间，尹笃生在全国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方针。他结合留日所学，根据贵州实际，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通盘设计，制定了贵师的训育方针、训练目标、训练任务、训练要求、训练范围等。他还制定校训、校歌，使贵师形成了严谨、重教、勤学、朴实的学风。训练方针包含了“德、智、体、美”的内容，在训练任务中又提出“有劳工身手，具健全体魄，有欣赏艺术的情趣，有爱好自然的兴趣”的要求。尹校长在1912年初就制定了包含“德、智、体、美”的贵师训练方针，而且还在训练要求中提出“劳动化”，在训练任务中提出“有劳工身手”，以强调“劳动教育”，可以说，“德、智、体、美”教育方针和“劳动”教育理念诞生于南明河畔的贵师。

为保证学校教学质量，尹笃生主持的贵师对招考录取学生十分严格，公平



考试，择优选录，不徇私情。贵师为省立公费生待遇学校，每年来报考的学生非常多，是应录取名额的十倍以上。为杜绝说情，尹笃生组织了贵师阅卷委员会。阅卷评分后，学生试卷统交尹笃生一一复核，依得分次序录取。有一次，贵州督军刘显世、政务厅厅长何麟书给尹笃生来函，为某一考生说情。还未看完，尹笃生便拍案而起，撕碎来信，抛掷于桌，愤然说道：“宁可撤职不当校长，也决不能滥竽充数。”尹笃生对此解释道：“师范学生毕业后要为人师表，所以必须严格，我们应为千秋万代后人负责。”

在尹笃生和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贵师被打造成“贵州师资的摇篮”，为国家、为本省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如贵师毕业生张敷荣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谭勤余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贵阳师院、贵州大学教授；萧文灿留学德国，回国后任贵阳师院院长等。

尹笃生品德高尚，专心办学，贫穷不能夺其志。他的学生赞誉尹校长从受任接办贵师到不幸逝世，“无一日不在校，无一事不自理，不但不干预政治，连家事都不甚注意”。1920年10月10日，时年50岁的尹笃生将生命定格在贵师的创办史上。尹笃生死后，家中一贫如洗，贵师同学会募捐以赡养家属，并在校园内为之立纪念碑，纪念碑上的内容即严寅亮先生所书写的高度评价。时过境迁，纪念碑今虽不存，但尹先生的事迹已被载入贵州教育史。

## 达德学校的领航人黄干夫

黄干夫（1871—1935），名禄贞，字伯廉，号干夫。贵州安顺人。教育家、实业家、画家，达德学校创始人之一。

达德学校位于今贵阳市大十字旁，学校最初源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的算学馆，由黄干夫、凌秋鹗借贵阳忠烈宫创立。达德学校的创立在贵州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黄干夫功不可没。

黄干夫是王若飞烈士的大舅父，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四八”烈士黄齐生的胞兄。黄干夫出生在普通农家，父亲却十分重视教育。黄干夫的父亲曾经这样说过：“我不识几个字，一生上当吃亏不少。大儿子拿去读书，小儿子拿去学生意。”黄干夫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刚强朴实的父亲，更幸运的是在他的求学生涯中，先后遇到三位对他影响深远的至亲好友。第一位是黄干夫的外祖父王紫霭，他是一位乡村塾师，通文史、喜丝竹、爱歌唱，黄干夫从小就受到外祖父的文化熏陶，幼时喜欢绘画，常画花鸟虫鱼，由此打下了一定的绘画基础。第二位是黄干夫的表哥彭雨生，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常常从传教士那里把数理化书籍带回家中研习，黄干夫对这些书籍尤感兴趣，在表哥的指导下学到了不少数理化知识，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更有激情。第三位则是贵州近代新学的先驱严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督学黔中，下大力对贵阳学古书院进行改革，并更名为贵州经世学堂。改革之初，严修在全省范围内选拔优秀学生40人入学，黄干夫因算学优秀成为经世学堂第一届学生。值得一提的是，



经世学堂课程设置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教授英语、天算、格致等西学。当时，严修开设了资善堂书局，并且捐赠了自己从天津带来的全部书籍，书局又陆续购置了不少经史典籍及维新人士编发的报刊等，这些图书资料及新知识，深深影响了黄干夫，让他大开眼界。黄干夫在校期间刻苦学习课程，严修在《谭香馆使黔日记》中对黄干夫的评价极高：“普定黄生禄贞，气平静与人无争，心思缜密，尝以己意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又以纸为地球，界画如法。其于格致之学，性尤近也。惜无名师为之前导，又无仪器图书以资其用，使久于京沪楚鄂之区，所造远矣。”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世学堂被解散。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干夫邀集凌秋鹗、贾渔卿、聂竹书等人在贵阳城南忠烈宫创建了算学馆，黄干夫任主讲，讲授数学、格致（理化）科目。两年后，在黄干夫的组织下，算学馆扩大规模，同时又发起成立了贵阳达德书社。达德书社的社员大都是当时文教界知名人士，他们分科讲学，并购进当时京沪新出的书报阅读，相与讲习。清光绪三十年（1904），书社成员共同开办私立小学堂。当年，黄干夫被官派日本留学考察，在日本相中一批教学仪器，于是致信凌秋鹗，请他竭尽全力务必筹集购款汇到日本。经过多方努力，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这批仪器运到学校，此时正好是第一期学生毕业，遂将这批仪器公开展出，校内外人士均可参观，一时间轰动贵阳。当时著名维新派官员李端棻在贵阳，亦前往参观，极力赞扬。李端棻对黄干夫说：“吾方以毫庆，何期喜见乡村之兴乎？”展出之后，学校建立仪器室，也是黔省小学最早的教具仪器室。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私立小学堂为达德学堂，黄干夫被公推为堂长，把“智、仁、勇”作为达德学堂的校旨，把“好学”“力行”“知耻”作为达德学堂校训，以此对师生严格要求。1912年，达德学堂更名为达德学校。

达德学校不仅是贵州开办最早的新式小学，而且也是第一个打破旧礼教束缚，敢于率先招收女学生，聘请女教师上课的学校。达德学校提倡科学民主，主张女子不缠足，开贵州风气之先，成为贵阳反封建的一面旗帜。老师们除了



黄干夫先生创办达德学校时的照片

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外，更着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自由、平等的先进思想。因此在辛亥革命时，达德学生自发组成武装巡逻队保卫贵阳。在袁世凯称帝时，达德学校率先响应云南发起的讨袁运动。达德这种关心政治的校风正是黄干夫及同仁孜孜不倦的教育成果。在当时贫穷落后的条件下，达德学校从幼儿班办到中学，兼办有女校，学生最多时达 1500 人，规模宏大，为贵州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就是杰出的一员。

黄干夫不仅是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实业救国”的践行者。1912年5月，黄干夫被任命为贵州实业司司长。为发展贵州实业，他创办了《贵州实业杂志》鼓吹实业救国并开办实体。他在大办职业教育的同时设立劝工局，分编织、木工、



金工、陶工等不同类别，招收男女学生。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他牵头创办了青岩陶厂、农事实验场、商品陈列所及省会公园等。此外，黄干夫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丹青高手，以画人物著称，兼攻山水。著名绘画艺术家谢孝思这样评价他的画：“山水揉南宗北派，笔墨沉着，构境清新，不滞三五格调。”他遗留的作品数量较多，其中山水画有《溪山深秀图》《风泉琴韵》《无边秋色入窗棂》《家山春望图》《云山飞泉图》等。

##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者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谱名启纶，字桂辛，自号夔公。贵州紫江（今贵阳市开阳县）人。民国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中国古建筑学奠基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一个集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出版家及学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清同治十一年（1872），朱启钤生于河南信阳，其终身自诩“贵州紫江朱启钤”。其原籍江西新余，祖上于清康熙间迁居贵州，到朱启钤已是第七代。其父早逝，朱启钤随母亲依靠外祖父生活，受教于三姨父瞿鸿禛，受其影响和提携最大。

朱启钤一生经历清后期、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自清光绪十九年（1893）步入仕途，直至1921年脱离政坛，致力实业建设和开发，同时搜集历史文献及整理，并进行个人著述。

### 一、振兴实业

清宣统二年（1910），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其推荐朱启钤任津浦铁路北段督办。朱启钤开始从事实业建设，并充分显示出他的实干精神和办事才能。1916年，朱启钤代徐世昌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成为近代著名企业中兴公司的实际领导者。该公司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官督商办的山东峰县中兴矿局，20余年后成为中兴煤矿公司。1912年，中兴公



司与津浦津路局签订互惠运煤合同，虽获益巨大，但矿难不断。1916年，朱启钫代行董事长职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主持制定了《中兴煤矿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几年内就使该公司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矿公司。次年，朱启钫又被选为总经理。至1928年，公司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多种经营的实业，先后开办了中兴轮船公司等10余家企业。七七事变后，朱启钫拒绝做亡国奴，并与日伪周旋，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抗战期间，中兴煤矿公司始终未被伪政府有效利用。

在兴办实业上，朱启钫投资了交通、新华、汇业、盐业、金城等银行，永利盐号，怡和、永安、裕元纱厂，上海水电公司，光华公司，大成及华成盐业公司，启新洋灰（水泥）公司，华宁矿业公司，北京电气公司，震华制造电气机械公司，开滦煤矿，开源垦殖公司，五一公司，合兴造林公司等企业。

1949年中，解放大军打过长江，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通过章士钊致信时任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朱启钫，劝他留在大陆。他欣然接受，遂留在大陆，并与公司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等商议，决定将公司在香港营运的10余艘轮船、9艘货轮调回大陆，为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贡献。

## 二、北京城近代化的开创者

朱启钫是对北京旧城做科学规划，并进行最大规模改造的第一人，被尊为“北京城近代化的开创者”。他在任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时，就聘请外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定北京局部改造方案，同时，出资整修坐落在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

朱启钫对北京的改造计划始于1913年。他发现社稷坛这座皇家园林已经完全荒废，于是萌发了将之开辟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想法。次年，朱启钫即发动北京绅士、商人捐款，利用城内各处拆除的建筑材料，将社稷坛修整、改建，开辟为公园并对外开放，以方便民间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并命名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此后，中央公园成为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一所公园，

园内还逐渐修整了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景点。在开辟中央公园的同时，朱启铃认识到有必要对北京旧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有秩序的改造。他向袁世凯递交的《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获得批准，得到袁世凯的授权和支持，并授予他一把特制银镐，准其“拆去旧城第一砖，使交通永便”。有此授权，朱启铃便立即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亲自兼任市政督办，主管和主持北京城市建设和规划，1915年6月16日，正阳门改造开工典礼上，朱启铃手持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启动了北京首次旧城改造工程。正阳门的改造打通了北京城的中西轴线，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朱启铃先后主持完成了辟北京西苑为新华门，拆旧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掉皇城城垣，改造与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推进南城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工程。朱启铃对北京旧城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造和建设，不是盲目地乱拆乱建，而是作为一名古建筑学者有计划、科学地修整和改建。1914年，朱启铃在紫禁城内开办古物陈列所，在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保存历代留下的文物。他所创办的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故宫博物院保管、修复、展览的功能。1946年，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朱启铃为故宫博物院的开拓、建设、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启铃主持北京旧城改造时，曾筹措资金对紫禁城等进行实测，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镈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对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以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进行了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精密图纸，为北京留下了首批珍贵的古建筑实测资料。该项工作历时4年，于1944年完成，此举保存了大量故宫及北京古建筑资料，为以后的维修保护奠定了基础，朱启铃为之作出极大贡献。



### 三、创立中国营造学社

朱启铃在修整改造北京旧城、皇家林园和一些古建筑时，积累了很多中国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增强了他对古建筑的浓厚兴趣。这方面，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并带领当时中国古建筑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古建筑学及其研究竭尽全力。

1919年，朱启铃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人李诫所著《营造法式》钞本，便对这部中国古代建筑专著十分珍视，他借出该书，出资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校订后于1925年正式出版。《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成为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本，为古建筑研究人员和建筑工匠提供了形象的感性认识材料，至今一直为国内外建筑界所重视。1928年，朱启铃在北京倡导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文献，专门撰写了《营造学社缘起》，向社会明确营造学社的研究及工作方向。1930年2月16日，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朱启铃亲任社长，著名学者李四光、陈垣、李济、马衡、叶瀚等及建筑界名流应邀加入。此后，他又先后聘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主持营造学社法式部和文献部的工作，大大推动了营造学社的工作。

### 四、北戴河海滨开发奠基人

著名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北戴河的发展和建设，离不开朱启铃。1916年夏，朱启铃第一次来到北戴河时，就深刻认识到北戴河是中国的，中国人有必要先组织起来以“争主权，拒外人”，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海滨地区。1918年7月，他发起组织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出任会长，负责海滨的地方公益事业以及市政管理、建筑规划、税务收支、开发建设等事宜。朱启铃带头捐赠大洋1000元，之后全国政要及实业界人士在10年间的捐款达到44000余元，朱启铃个人捐款捐物折算后也有20000余元。朱启铃利用这些资金，主持修建长达22公里

的道路 36 条；新建桥梁、涵洞 160 余座；新建医院一所、小学一所和莲花石公园；在海边修建了三处游泳场；设苗圃、引良种、种树 50 余万株；还设立了邮局、电报局和自来水厂等公用设施，并重新整修了当地的名胜古迹。朱启铃及公益会集海滨的建设、行政、治安、环保于一体的举措，为后来的北戴河海滨发展成为现代化城镇和北方最大的旅游避暑胜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朱启铃每年“暑期必往”，他与北戴河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联峰山买下一块地，建成别墅一座，名之“蠡天小筑”，并在别墅的附近选了一块吉地作为朱家的茆地，准备百年后埋骨于此。

1999 年，为表彰朱启铃开发北戴河的贡献，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由朱氏海内外亲友集资，在北戴河联峰山朱家坟内建起了一座“蠡公亭”，亭内竖朱启铃半身铜像一座，石亭古朴典雅，铜像庄严肃穆。亭子东侧立有秦皇岛市及北戴河区人民政府为纪念北戴河海滨开发奠基人朱启铃的《蠡公亭记》石刻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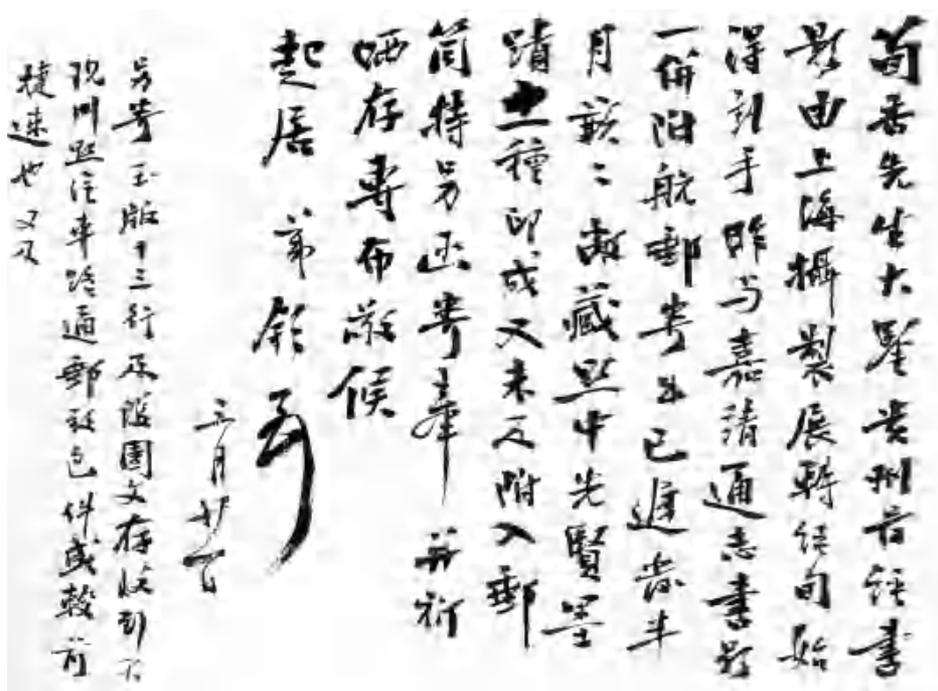
## 五、中国近现代著名收藏家

朱启铃一生注重实学，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家、出版家，校刊编印的古籍文献和个人撰著丰富，种类繁多，计编印的文献有《营造法式》《园冶》《梓人遗制》《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髹饰录》《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清内府藏刻丝绣书画录》《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哲匠录》《李仲明营造法式》《漆书》《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个人著述有《存素堂丝绣丛刊》《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蠡园文存》和《紫江朱氏家乘》（稿本）；主持出版有《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撰写《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讲词》《王府井大街之今昔》《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元大都宫苑图考》（与阚铎合作）等文。他收集整理的有关贵州人和事的资料有《贵州碑传集》、《黔南丛书》（第



八辑中的《陶楼诗钞》油印本)、《杨剑潭先生遗诗》、《芋香馆诗》，乾隆《开州志稿》，民国《开州志稿》《开州志补集》《黔南游宦诗文征》《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录》(著录黔人文献有400余种)。1950年，朱启钤将其收藏的明朝岐阳王李文忠家传文物56件捐给国家，其中《吴王墨敕》《张三丰画像》《平番得胜图》等均属国宝。1953年，他又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周易正义》等619部图书，以及《孙文恭公遗书》等689部贵州地方文献。他还先后将其大量藏书、手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省图书馆。

1964年2月，朱启钤因病逝世，享年92岁，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朱启钤书法

## 逻辑学研究的先行者王延直

王延直(1872—1947),原名怀彝,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筑县(今贵阳)人。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诗人、书法家。

王延直少年时就读私塾,后入县学为秀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提学使严修在贵阳办经世学堂,亲自到各府州县选拔学生,王延直被选入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延直参加恩科乡试,与弟和叔同榜中举,传为佳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延直入选贵州派往日本官费生赴日留学。

在日本期间,王延直读到十时弥著的《论理学纲要》,“论理学”是借用汉字对英文“logic”的意译,他认为与中文称之为“名学”相比,“论理学”更为恰当,遂在之后的行文著述中采用“论理学”这一名称。在研究论理学中,王延直把中国名学与西方论理学加以融会贯通,“名学”即逻辑学,是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便人们正确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的科学。但在中国,研究者少之甚少,而王延直对之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并着手编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论理学著作,定名为《普通应用论理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延直带着这部书稿回到贵州后,担任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政法学堂的教习,得到了传播逻辑学的平台,尽心尽力地撰著、讲授和修改《普通应用论理学》。他在这部书的《自序》中说:“予之纂著是书也,起乙巳(1905)秋,迄壬子(1912)夏,阅岁凡七。中间担任是科教授者凡十九次,稿凡十易,而后仅仅得此。”



1913年，王延直赴任云南蒙自道道尹，将《普通应用论理学》书稿带到云南印刷出版。这册书由贵阳伦理学社发行，云南印刷局代印，在昆明印刷出版，并由开明书店等发售。该书为16开铅印本，共200多页，采用分章论述的写法，因印量很少，久之便湮没无闻。



王延直

王延直自蒙自卸任后回到贵阳。1922年底，因政局关系，南明共济会将南明中学交政府办理，校产归公，次年春，改名为贵州省立第二中学，王延直任校长。不久，王延直调任贵州榕江县知事，后调黔西县知事。

1927年，周西成主黔时期，其任省政府秘书长。1929年，其再任黔西县知事，受诬而身陷囹圄。后因社会舆论而被释放，王延直遂绝意仕途，赋闲在家，以诗会友，作“诗钟”以度日，著有《穆若庠诗钟选》行世。

1982年，1913年出版的王延直著作《普通应用论理学》被云南逻辑学者发现，立即引起中国逻辑学界重视。是年在贵阳召开的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年会上，大会认为该书内容丰富，体系严谨，演绎推理部分更是有特色，是中国早期逻辑学重要代表作，而著者则是近代研究逻辑学的先行者。

王延直研究训诂学，精通《说文》，擅长书法，以篆书为精，气势苍雄，风格独具，曾为华之鸿神道碑篆额。贵阳现代著名书法家陈恒安是他的及门弟子，其侄孙王萼华，均得其真传。

1947年，王延直病逝于家，享年75岁。其著有《普通论理学讲义》《普通应用论理学》《穆若庠诗钟选》等。

## 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夏同龢

夏同龢（1874—1925），字用卿（用清），又字季平，号狮山山人。贵州麻江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状元。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曾居住于贵阳云岩区团结巷，此街因此更名“夏状元街”。

夏同龢是中国状元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第一人、中山大学前身广东官立法政学堂创办人、《天坛宪法草案》起草七理事之一，对中国法政近代化有重要贡献。

### 一、贵州历史上第二个文状元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同龢踏入了北京会试考场，和从全国各地奔赴京城赶考的万名举人一起参加会试。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9日）清晨，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戊戌变法的主考官光绪皇帝就“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发问，夏同龢就这四个问题首次提出“法则治”的理念，稳健、慎重地指出要使国家振兴，最重要的是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否则变法只能是一纸空文。殿试两天后（6月11日），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同样是科举精英的进士康有为和举人梁启超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试图使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变



夏同龢塑像

革。6月12日，所有的贡士齐集东长安门外，变法并没有影响既定的程序，刚在头一天宣布变法的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变法在推进，但状元的头衔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夏同龢成为贵州千年科举史上出现的第二位文状元，也是贵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历史的迅速转变将这一荣耀定格。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授修撰一职，进入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对于在戊戌变法这个非常之年产生的状元来讲，夏同龢注定将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

## 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

清光绪三十年（1904）初，已是四品官衔的翰林院修撰夏同龢上奏朝廷请求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足见其心胸开阔、志存高远。法政

速成科专为准备进行立宪改革的清政府培养急需的法政人才，得到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同年春，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学成回国后担当起推进中国宪政改革重任的使命，夏同龢东渡扶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在中国相对封闭的千年科举史上，作为知识精英的最高代表，夏同龢的留学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动接受近代理念，实现士绅阶层近代化整体转变的开始，似乎也预示着科举考试制度即将走到终点。

一年后，夏同龢顺利从法政速成科毕业，他的学业成绩得到了校长梅谦次郎博士的高度赞赏，认为他“试验之成绩甚优”。他的考试文章《清国财政论策》被全文刊登在日本《法律新闻》上。在由法政大学所编写的《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中，这篇文章也作为唯一一篇考试文章被全文收入。

清光绪三十年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1908），法政速成科前后办班共5期，先后共有约2000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继夏同龢之后，更多的进士进入速成科学习，其中包括两名状元骆成骧和刘春霖，夏同龢作为先行者无疑是他们的表率。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如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沈钧儒、汤化龙等。

### 三、编写中国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著作《行政法》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在日本的夏同龢接受了《法律新闻》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到“将来回国以后将怎样谋求国家的改良进步时”，夏同龢表示“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力自强”，并认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就是能广兴法政学堂，使普通民众都能拥有法律知识，使所有的民众都能依法办事，以此谋求国家的富强。

为实现法政救国，首先要向古老的帝国输入近代法政理念，身在日本的夏同龢着手为国人编写一部介绍日本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实践的书籍——《行政法》。全书约15万字，系统介绍了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现行日本行政体系，书中所阐述的近代行政法学思想和行政理念，即使到了百年之后的今天也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和启发性。该书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出版，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知识的书籍。此书一经出版即获得读者认可，后分别由中国书林、池田九段印刷所等多家出版机构印刷出版。

夏同龢的《行政法》是《法政粹编》丛书的第三种，这套丛书全部由夏同龢所在的法政速成科第一班的学员们编写，该班学员还编写了《法政丛编》丛书，两套丛书共计30余种书籍，涵盖了近代法政的各个领域，全部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出版，并转销国内，后成为清末刚刚兴起的高等教育机构法政学堂的教科书。两套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介绍近代法政学说的丛书，为促进国人思想的近代化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基础。

#### 四、创办广东官立法政学堂

夏同龢留学回国后，随即前往广东，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会面。岑春煊盛赞夏同龢“器识宏远，学术通明，于东西各国政治皆能悉心讲求”，特向朝廷上奏请他出任法政学堂监督，“必能有所裨益”。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广东省课吏馆改为法政学堂，夏同龢出任监督（校长），这使广东官立法政学堂成为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的第二所法政学堂。这是一所专门为广东培养新式官吏的学堂，学生由需要进行近代法政思想培训的在职官吏和有意谋求官职的已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组成。清光绪三十二年及至民国元年（1906—1912），夏同龢担任监督6年，聘用大批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教员，如朱执信、陈融、古应芬、汪祖泽等，这些人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此举不仅为学员带来了近代法政理念，还带来了革命思想。

夏同龢的开明领导使学堂氛围活跃，各种新思潮兼容并包，得到了积极追求进步的新青年的青睐，陈炯明、邹鲁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法政学堂师生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等都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除革命者外，法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法政人。曾是法

政学堂教员，后为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的汪祖泽曾撰文回忆称：当时广州地方法院，院长、各庭庭长全部都是由法政学堂或者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后法政学堂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从清末到民国，法政学堂对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广东近代法政的发源地，法政学堂所在街道因此更名为“法政路”。

同时，夏同龢还曾兼任两广师范学堂监督，并兼任广东地方自治讲习所所长，他努力普及法政教育，以教育家的责任感担当起了推动广东民众思想近代化的使命。

## 五、担任宪法起草理事

1912年，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法政学堂教员陈融出任校长，而夏同龢则先回到贵州，后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来到北京。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7名理事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年轻委员们中间，已近不惑的夏同龢是旧功名最高的人，但他并不保守，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的看法。

就在夏同龢兢兢业业参与宪法起草期间，当时在保定军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血气方刚使他们无所顾忌地宣泄着对袁世凯的不满，最终他们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夏同龢听说此事后，不畏风险，果断出手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军校毕业后，王天培一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宪法起草期间常发生议员出走或辞职之事，夏同龢顶住风险与压力坚持完成了全部会议。1913年10月底，历时三个半月的宪法起草宣告完成，但因袁世凯的阻挠而未能施行。这是一部以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为基础编定的宪法，因在天坛起草，又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 六、后世纪念

1925年，夏同龢在北京劈柴胡同家中去世。至今犹存“两街道一故居”纪念他：“两街道”分别指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团结巷的“夏状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条街道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法政路”，因夏同龢在此选址建起法政学堂而得名；“一故居”指在他的家乡麻江县高枳村狮山脚下的故居，原有亲笔写的“状元第”匾和“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楹联。其故居于1999年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列为国家第三批免费开放博物馆，2018年被评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驰誉京华的艺术大师姚华

姚华（1876—1930），原名学礼，字重光，又字一鄂，晚号茫父，别署莲花庵主，人称弗堂先生、秋草诗人。贵筑县（今贵阳）人。清末民初学者、书画家、诗人。

姚华是继明末杨龙友后享誉贵州乃至全国的“画书诗三绝”的艺术大师，



姚华

在文字、金石、词曲、画史、画论、戏曲诸方面亦有极高的成就。绘画大师陈师曾在评价姚华的画作时，曾说：

“姚重光的山水画，既善于继承历代大师的优良传统，又善于师法自然。”

姚华的学生郑天挺亦有同感，他谈到老师的艺术观时说：“先生论画，必欲胸无古人，目无今人，以为胸无古人则无藩篱，目无今人则无瞻循。”

刘海粟先生在《姚茫父书画集》序言中亦说：“近四百年来，风气渐开，名人辈出，兼擅画、书、诗者，于古人必称杨龙友，于今人则咸推姚茫父先生。”



姚华，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日本，攻读法政，学成归国后在邮传部任职。民国建立后，其被选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之后投身教育，先后在中华大学、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讲授国文、书法、国画等，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姚华一生涉猎甚广，天资颖异，自幼生长在“峭峰攒簇，乌江逶迤，青龙腾舞”的贵州，心中蓄积着千丘万壑、碧溪绿水。40岁后，他东上泰山，南游西湖，扬帆海上，名山在胸，归来后潜心攻习山水、花卉、古佛、仕女。他曾传神地描摹敦煌佛洞的壁画断片和唐代刻砖，再付之版刻，颇受时人喜爱。姚华早年攻习宋代黄庭坚、米芾的字体，20岁后致力于唐代颜真卿书法，民国之后他的书法体韵又变，师法汉魏，得其神趣，显得高峻古朴。姚华是中国近代转型期间的文化人，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同时自觉地接触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且有着很高的造诣。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他编纂了《邮政沿革略》，翻译日本岩良英所著《邮政行政论》，之后曾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以中国五言诗的形式翻译成《五言飞鸟集》，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姚华不仅才华过人，而且侠骨铮铮，令人敬仰。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帝制，姚华拍案而起，赋诗讽刺这位窃国大盗。1926年3月18日，北京市民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姚华以诗悼念死难学生，以表对执政当局的愤怒。

姚华平生所交大都是名重一时、蜚声中外的艺术家、文学家。姚华客居北京多年，与其常相往来的书画家有陈师曾、陈叔通、陈半丁、王梦白、周印昆等，戏剧表演家有梅兰芳、程砚秋、王瑶卿等，学者、文学家有梁启超、王国维、郑振铎、徐志摩等。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逸闻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姚华、陈师曾与北京琉璃厂同古堂的艺人合作，在铜墨盒、铜镇纸上作画、题诗并雕刻，然后出售。这些器物典雅精致，一时被士人争相购求，被视为艺术佳品。据说有一次，鲁迅被一个破墨盒吸引住了。墨盒上刻着山茶花，花枝正面立着一只鸟，怒目圆睁，凶相毕现，使人感到凶恶恐怖。盒上还刻着一首诗，

诗曰：“压断千寻立，山茶一树栽。自时寒鸟舞，犹自雪中来。”画及诗的署名都是姚华，鲁迅知道姚华是大画家，觉得墨盒虽破，但画好、诗亦好，尤其这鸟画得生动，令人玩味，跳出了历代画家喜欢画鸟侧面的窠臼，于是购买回来，称之“怪鸟”，放在案头赏玩。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随行当翻译。泰戈尔在北京与国画界的中国朋友聚会时，梅兰芳向泰戈尔介绍，在座的齐白石、陈半丁、姚华等人都是他的老师，他指着姚华说道：“我爱画人物、佛像，曾画过如来、文殊、观音、罗汉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

1925年，姚华年届五十，梁启超为其写五言长诗祝寿。在诗中，梁启超对姚华寄居京城莲花庵时的生活有生动的描述，说他闭门创作，一切随缘，百事不操心，靠着“半秃笔几管，破碎墨几块。挥汗水竹石，呵冻篆分隶”。尽管当时条件极差，姚华毫不在意，闲时唱昆曲与京剧，吃饭时手里拿着唐画砖，睡觉时怀中抱着南宋画家马和之的画，平时与好友周印昆鉴定碑文的真伪，又常与好友蹇念益饮酒谈心……梁启超的诗给我们描绘出一个穷且益坚、乐观向上，在艺术领域无怨无悔地执着追求的姚华。

1930年，徐志摩前去拜望姚华，并向他索求诗稿，令他不能忘记的是，姚华不因左臂残废而气馁，不因家境困窘而沮丧，仍然豪情满怀地在艺术的海洋中求索，每日作诗、书画，以此愉悦性情。当姚华操着浓重的贵阳腔说“没法子呀，要吃饭呀”，徐志摩面对此情此景心中感到十分难受。徐志摩历来对姚华的人格及才华十分欣赏，他在文章中对姚华的诗画曾如是评价，“茫父先生的心是玲珑的”，“茫父先生在他的诗里，如同在他的画里，都有他独辟的意境”。

姚华对中国书法的一大贡献是他独创的颖拓。颖拓是对古代碑石、摩崖的临写，对临或背临，可比原本放大或缩小；填墨在廊外，字迹留空白。姚华曾将一幅《秦泰山残刻二十九字》的颖拓赠给友人陈叔通。叔通视为至宝，曾请一些名人鉴赏题词。马叙伦的题词是：“……贵筑姚茫父所为笔拓泰山石刻残



文二十九字，入目突然如睹古拓。茫父善绘事、刻石，皆有独造，乃使精此，可谓三绝。”郭沫若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贵阳姚茫父颖拓》作序时写道：“规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规摹金石刻画者，能可不谓之画乎？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他还在序文后感慨地说道：“茫父不朽矣！”

1930 年 6 月 8 日，姚华这位“声名冠绝燕京”的艺术大师，因脑出血逝世，享年 54 岁。

## 博学多闻的桂百铸

桂百铸（1878—1968），名诗成，字百铸，号蓬头陀，晚年自号百蕙堂主。贵筑县（今贵阳）人。桂百铸是贵州黔剧的创始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桂百铸乡试中亚元（举人第二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赴京会试，虽未成进士，但以策论《俄罗斯侵略海参崴》授予学部主事。民国初，其在教育部任职，后回到贵州，历任护国军第二兵站站长，贵州省省长公署教育科长，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贵州文献征辑馆副馆长，以



桂百铸

及云南宣威，贵州独山、息烽、定番（今惠水）等县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当选为贵州省人民代表，并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主席。

桂百铸从政之余，喜钻研文学艺术。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时人论其“以诗、古文辞、书、画、琴、棋名于时；而于琴兴、画理、书谱、棋经，诸所涉猎，辄臻绝诣。其于绘事，独有神解，耳目所得，施之腕下，无不妙肖自然”。桂百铸围棋棋艺极精，他的棋友有袁荇之、阮敬斋、徐廷栋等，“有人对弈，便忘寝食”。其著有《百蕙堂集》，未刊。



## 一、山水画尽显筑城风光

桂百铸自幼从其伯父桂炎廷学画。到北京后，他与名士姚茫父等交游，画艺日精。姚茫父对于他的画很推崇。他所作之画，多有姚茫父题跋。在北京时，他经常到海王村（今琉璃厂）纵观古书画。他喜收藏古画，家中藏有元赵孟頫所画《八骏图》条屏4幅，此乃世间珍品，历代鉴赏家、收藏家在画上加盖印章竟达117个之多。他兴到之时，偶一展玩，轻易不肯示人。

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书画南迁。院长马衡应贵阳书画艺术界人士之请，在贵州省艺术馆举办“故宫博物院书画在筑展览”。消息传出，桂百铸欣喜若狂，他说：“吾辈学人，遇此千载一时之会，或游古今萃聚之藪，轻易放过，竟等虚生。”他聚精会神，终日观摩鉴赏，不肯须臾离去。桂百铸后来写成《观故宫书画展记》一文，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桂百铸博览古人名作，于国画造诣极深，尤工山水。中年以后，阅历既多，于家乡山水，一丘一壑，独寄深情，便跳出前人窠臼，另辟蹊径，师法自然。贵州山川壮丽，既不同于江南的清丽，也有别于北国的浑朴。所谓筑国风光，实在令人流连忘返矣。桂百铸腕下所出，多为巨制长卷。他在《筑国山川图轴》中题云：“戊辰家居，作画自遣。暇时则于南山丛杂处寻粉本，盖欲效尊古（黄鼎字）老人也。此幅指为某山某水，执笔时并无成见。然谓其绝非筑国山川，岂可得乎？”

民国二十七年（1938），桂百铸作《花溪揽胜图》。次年，他费时3个月，作《蒙台华氏别业图卷》。这两幅长卷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作。他用传统国画笔法，把家乡的自然真山真水表现出来，既感生机盎然，又觉古朴清雅；题跋有序有议，有景有情，堪称桂百铸的代表之作。他的《筑国山川图轴》《飞云问道图轴》《望云图》《麒麟洞》《长江三峡》《黔灵春色》等均为国画中的精品。

## 二、书法自成一家

桂百铸工书法，亦自成家。他与同里姚茫父结交最早，在北京时又同住莲花庵古寺中，以兄事姚茫父，每日学书作画。故其书风，融碑铸帖，多参姚茫父笔意。他所书《姚茫父先生传》字幅，苍劲古朴，可算他书法代表作。此字幅现与《花溪揽胜图》《蒙台华氏别业图卷》均藏贵州省博物馆。1964年，文化部曾将桂百铸书法作品选送日本展出，获得好评。在诗词方面，现存有《百蕙堂诗集》《百蕙堂词曲散编》《百蕙堂题画诗词集》等。

1927年，桂百铸与李紫光、景筱南等集资在贵阳三道坎（今中华中路）开设一书画店，取名藩锦山庄，由王小穆任经理。该店业务除收购并销售古今名人书画外，还为喜爱桂百铸等人作品的人士，开辟了沟通交流的渠道。

## 三、尤长古琴

桂百铸作为士大夫出身的传统中国画家，集琴棋书画于一身。他在精通书画的同时，对中国古琴也有很深的研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古琴专家。早年，桂百铸从其伯父桂炎廷学琴。他家中藏有一张古七弦琴，名东坡琴，系明以前物品，制作精美，音极清越。寇子春系贵阳古琴名家，他家中也藏有古七弦琴一张，系明潞王所制，世称潞琴。在寇子春影响下，桂百铸琴艺日进。后来他又获《琴学进鍼》一书，潜心钻研，尽得其法，达到“指与弦合，弦与音合，音与意合”的境地。他善弹《平沙落雁》《鸥鹭忘机》《羽化登仙》《归去来辞》等古曲，喜弹《广陵散》一曲。每当夜深人静时，正襟危坐，抚弄一曲，妙趣无穷，自得其乐。邹质夫所作《水调歌头》一词，前有小序说：“苏文忠（苏轼）生日，应丁亥诗社之约，集大觉精舍（位于今云岩区电台街的华家阁楼）楼上，酒罢，百铸先生取所藏东坡琴弹之。”其琴技之精及琴音之美妙，倾倒众人。1956年，北京古琴研究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查阜西、管平湖、关仲航等来筑，曾与桂百铸研究古琴源流及技法，桂百铸多有独到的见解。中国古琴学会将其



所弹《水仙》及自谱的《归去来辞》《平沙落雁》录制保存。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家代表团来贵阳访问，桂百铸与洞箫专家谢根梅琴箫合奏古曲《平沙落雁》及《归去来辞》，得到国际友人赞赏。

#### 四、贵州黔剧的创始人之一

桂百铸早年在京时与梅兰芳、王蕙芳等大师交游，奠定了他在戏曲方面的修养。抗战时期，他常邀王百雷、张汝舟、侯辑夫夫妇到家演唱昆曲。解放后，桂百铸任贵州文琴梆子戏研究会主任。他创作过许多文琴坐唱的本子，常在家举行文琴坐唱晚会，后参与组织贵阳文琴会演，并在此基础上，将文琴坐唱的形式搬上舞台，参与组建了黔剧团，成为贵州黔剧的创始人之一。

1968年2月23日，桂百铸病逝于贵阳，享年90岁。

## 以德为本的“德昌祥”创始人刘辅臣

刘辅臣（1878—1925），又名刘运昌。湖南衡阳人。贵阳百年药号老店“德昌祥”创始人之一。

提起贵阳老字号，“德昌祥”赫赫有名。“德昌祥”取自两位创始人杨德轩（又名金祥）的“德”字和“祥”字，以及刘辅臣（又名刘运昌）的“昌”字，寓意“以德为本，业昌人祥”。创立之初即立“恪守诚信，以德为本”的堂训，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体现了两位创始人的格局和智慧。

晚清光绪初年，贵阳最早的药材店只有熊万元堂、乾元堂、保元堂等少数几家，且品种单一、数量不多，质量也不稳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熊万元堂药店招了一个叫刘辅臣的学徒。刘辅臣是湖南衡阳人，父亲是清朝的一名武官，后战死沙场，给刘辅臣心灵造成极大创伤，打消其读书做官的念头，他立志从商学技，带着父亲的发辮来到贵阳安葬。清光绪二十年（1894），刘辅臣投奔贵阳益寿堂药店做学徒，他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制药配方和工艺，学徒3年后，又投奔到熊万元堂。

在熊万元堂，刘辅臣结交了贵阳人杨德轩。二人同为学徒，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成了很好的朋友。刘、杨二人因在药店收入微薄，又感到药行前景可观，决定联手创业自立门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人借得银子100两，在贵阳慈善巷8号创办药铺，命名为“德昌祥”。两人各有所长，刘辅臣擅长技术，如药材加工、炮制，是药材方面的专业人才。杨德轩则比较擅长经



营，是一个经营型的人才。杨、刘两人通力合作，艰辛创业，以药材批发为主，重点经营名贵细料药材及全国名贵中成药，坚持物美价廉，薄利多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收获了良好信誉，深受老百姓信赖。至1924年，资本已达5000多元，成为全国有名的大药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刘辅臣花4500元巨资在汉口购买药材，返黔途中遭遇军匪抢劫，恶徒见药材无利可图，纵火烧毁了全部药材。刘辅臣悲愤交加，回筑后一病不起，于同年10月去世。

面对濒临破产的德昌祥，刘辅臣长子刘绍先义无反顾地继承父业。他辞掉工作，向师父杨树清借得900元，与二弟刘干中，以及杨德轩之子杨竹屏、杨绍周等人，开启了艰难的二次创业。凭借德昌祥良好的商誉，以及第二代经营者的勤劳智慧，德昌祥不仅在“参、茸”等精品名贵药材方面生意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引进大量的国内品牌。历经艰难的“十年生计”，德昌祥终于恢复元气。

创业难，守业更难。在动荡的年代，德昌祥几起几落。1935年，为扩大营业，确保利润，德昌祥在大十字建成三层楼房称为“德昌祥参茸燕号”作为新的营业门面，由于建筑风格独特，该楼成为当时贵阳市标志性建筑。1938年，业务不断扩大，在贵阳九华宫建成德昌祥药厂，使用贵州名中医王聘贤提供的秘方，专门制造“妇科再造丸”和“男用补天素”两种中成药，由于药疗效甚佳，远销19个省市。1939年，德昌祥再次遭遇灭顶之灾，日机“二四”轰炸贵阳，德昌祥损失惨重。1945年，德昌祥在被毁旧址重建平房，专营由德昌祥制药厂生产的成药，兼营人参、鹿茸、燕窝等名贵药材。1946年，内战爆发后，国家经济全面崩溃，群众购买力极低，德昌祥经营受到影响。1949年，贵阳解放时，德昌祥资本只有2万元，从业人员13人，生产面积仅有120平方米，生产工具只有两个铁碾，完全靠手工制药，实为一小作坊。1955年11月，德昌祥完成公私合营改造，更名为“公私合营贵阳德昌祥制药厂”，在政府的扶持下，生产规模不断壮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1967年，其更名为“贵阳制药厂”。2000年12月，该厂恢复“德昌祥”名，成立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延续

至今。今天的德昌祥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除了妇科再造丸、杜仲壮骨丸等主打产品外，依靠贵州丰富的药材资源，德昌祥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

回首过往，“德昌祥”穿越一个多世纪历史烟云，几经磨难，历久弥坚。而刘辅臣、杨德轩两位创始人以德为本、自强不息的高尚品德是留给德昌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德昌祥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德为本，业昌人祥”至今仍是德昌祥企业文化的核心。100多年来，德昌祥一直坚持以“德”为根、以“德”为本行天下。



## “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阳。中医临床家、教育家。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有一个关于废止中医的动议，顿时引起中医界的不满。在北平行医的施今墨立即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据说当时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疑难病症，请了许多西医来看，治疗均无效果。有人劝他不妨请施今墨来诊治，施拿脉之后，对症下药，果然收到奇效，汪精卫于是给施题词送匾。自此以后，罢黜中医的奇谈怪论销声匿迹。

这个力主弘扬中国医学的施今墨就是贵阳人。他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因父母体弱多病，少年时的施今墨便立志学医。他跟随舅父李可亭学中医，20岁时即通晓中医理论，独立行医。然而他的父亲施誉鸿是个做官的人，认为读书做官才是正途，不由分说把他送进了山西大学堂。不料，他因为反对大学堂“西斋”创始人、外国传教士提摩泰的专横，被学堂开除，不得已转入山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京师法政学堂。

在京城，他结识了革命党人黄兴，加入了同盟会。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施今墨以客卿的身份帮助黄兴制定了《陆军刑法》《陆军审判程序》《陆军惩罚令》等法典，后又在山西参加革命党人组织的“尚志学会”和“尚志学校”。1919年，应顺天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之聘，他出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他见政局动荡，理想难以实现，便决意弃政从医，



施今墨和夫人

不再过问政治。

他原名施毓黔，行医后改名施今墨，意在崇尚墨子的“兼爱”主张，悬壶济世，博施于人，无论贫富贵贱。废止中医的政令取消后，北京成立了中央国医馆，焦易堂为馆长，施今墨为副馆长。国医馆会集中医优秀人才，研究中医、中药，整理中医典籍、资料，改进和推广中国医学。中央国医馆还在许多地方设立分馆，中央国医馆贵州分馆成立于1936年，附设有国医研究所及医学股、药学股和推行股，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教授11人。

施今墨热爱中华医学而能与时俱进，认为中医必须改进，中西医结合、兼容并包、取长补短，乃是振兴中医，使祖国医学不断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1932年，施今墨以自己多年行医所得的资财，在北平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这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院，改变了中医长期以师徒、父子传习为主的传承方式，将其纳入学校教育。华北国医学院首开中西医结合的先河，既开设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金匱要略》《难经》《本草纲目》等课程，又开设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细菌学及内科学、外科学，还增开日语、英语、德语。在教学中，强调中医“辨证施治”的要义，“全面精察，苦心探索”，重视临床经验，但不偏执一说，“博采众家之长”。这所医学院前后办了16期，每期40人，共培养出600多名医师，贵州名中医袁家玘就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

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挂牌行医的中医师必须经过考核。北平成立了中医考核委员会，聘请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做主考官。施今墨、



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四人受聘为主考官，从此声名鹊起，被称为“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在北平有很高声誉，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华北医药界代表，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他在会上提出了《整理中医书籍案》《改革中药剂型案》《兴办中医学校案》《改革发展中医案》等。国民党溃退大陆时，施今墨拒绝离开大陆，并于194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登门拜访施今墨，施今墨被推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和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3年，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施今墨，深情地对他说：“施老先生，我请您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听了施老一番宏论之后，周总理恳切地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的重要财富。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施今墨，勉励这位南北驰名的中医对祖国医学事业多做贡献。

施今墨振兴中医的理想和愿望在新中国得以实现，为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将珍藏的100多个验方献给国家，并把全部心血倾注于中医研究，努力探索中医的改革、发展。“文革”中，年事已高的施今墨被折磨病倒，他的女儿跑去找周总理，施今墨才得以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为表达感激之情，他写了一首五律呈送周恩来和邓颖超，诗中写道：“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冈。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1969年8月22日，施老在京逝世，享年88岁。1983年，《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出版，以告慰一代名医施今墨的在天之灵。

## 以竹为画、以画言志的孙竹荪

孙竹荪（1882—1967），名嗣燿，以字行。云南呈贡县人，生于贵阳。国画大家。

孙竹荪祖父孙竹雅，名清彦，清同治年间来黔做官，遂定居贵阳。孙竹荪自幼好学，但科举屡试不果，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才由秀才选为贡生，从京师国子监肄业，于次年在学部任编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竹荪由吏部分发贵州，任贵州税务局文案兼法审局帮办。清宣统元年（1909），其任贵州威宁县厘金局总办。清宣统二年至清宣统三年（1910—1911），其任贵州麻哈州（今贵州麻江）知州。辛亥革命后，清廷各地官员多被免职。孙竹荪在麻江为官清廉，受当地百姓挽留继续执政。值此新旧政权交替、制度变革时期，他为安定地方做出努力。

### 一、重视发展地方文化教育

民国元年（1912），孙竹荪升任贵州都匀知府，次年，都匀改县旋任知县。

先是孙竹荪之祖父孙竹雅于清同治五年（1866）任都匀知府，在相隔46年后，孙竹荪又来都匀任职，可谓巧合。孙竹雅在任时，曾经筹划续修《都匀府志》，未成而离任，此事遂搁置多年。孙竹荪到任后，便以完成祖父遗愿为己任，延聘八寨（今丹寨）举人欧阳芑衡主持修志事宜。1915年，孙竹荪离任后两年，欧阳芑衡病逝，都匀修志之事停止。对此，孙竹荪时时挂念在心。1920年，都



匀县知事窦全曾与孙竹荪商议后，聘请贵阳学者陈矩（字衡山）为总纂，编修《都匀县志》，并聘孙竹荪任创理，窦本人任监理。历时3年，终将志书完成。这是孙竹荪离开都匀后为地方文化事业所做的一件大事。

任职都匀期间，孙竹荪就十分重视地方文物古迹的保护与维修。他曾修葺都匀文峰塔，并竖碑刻记；保护都匀城明嘉靖进士柳州人张鹤楼所书摩崖，建亭覆之，在岩前凿地为池，引龙井水注入，种植莲花，取名莲花池，成为都匀百姓休憩游览



孙竹荪

之地。他还创办都匀十县联合中学，聘欧阳芑衡为校长，发展地方教育。

## 二、倡体育、护名胜，开创缫丝业

1916年至1919年，孙竹荪调任清镇县知事。在职4年，他提倡发展体育，举行清镇县第一届国民体育运动会，设赛跑、赛马、武术、射击等项目，吸引数十里内的群众来参加比赛和参观。他又倡导农民栽桑养蚕，聘请专业人士辅导、管理，并于城郊建立试验场，全县种桑树百余万株，开创清镇缫丝业。他对清镇境内的名胜古迹，如华盖洞、青龙山等尽力保护、培修。《清镇县志·重修华盖洞记》记载：“县长孙公嗣焯，政务之暇，访古莅之，慨建筑之失宜，爰召地方绅耆，共谋改良，并亲为规划。凡所需费，由公筹发。其为吾民谋者，无微不至。”

1921年，孙竹荪任贵筑县县长兼省长公署秘书。1929年，其任镇远县县长。1932年起，其受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及之后历届省主席聘请，任省政府顾问。1937年，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在贵阳从事地下活动，居住在一间小旅馆，

人身很不安全，孙竹荪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很长一段时间。

贵阳解放后，孙竹荪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擅长绘画，喜欢竹、菊、梅、兰，画承其祖父孙竹雅遗风，并有所发展，自成风格，其画竹为世人推崇。1950年，孙竹荪创作大幅墨竹一幅，将竹叶设计绘成“抗美援朝胜利”六字图案，既表达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又展示其高超的绘画技艺。该画曾送北京展览。孙竹荪赋闲后，常以诗词书画寄托情操，与贵阳名士杨覃生、桂百铸、王仲肃、李紫光、景筱兰等书画交往，诗词唱和。

1967年，孙竹荪病逝于贵阳，享年85岁。



## 贵州现代企业的拓荒者周诒春

周诒春(1883—1958),又名周贻春,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武汉。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政治活动家,北京清华学堂(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38年2月至1945年,周诒春在贵州7年,推动贵州现代企业发展,创建贵阳私立清华中学。

周诒春在贵州的突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积极策划、主持并参与筹建贵州企业公司和贵州银行等企业,推动并奠定了抗战时期及之后现代化企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创建清华中学,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推进贵州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四是为贵州引进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以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储备了一定的科技和管理力量。

1913年,周诒春任北京清华学堂校长,任期4年有余。在此期间,他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学堂校训,视其为“清华精神”,清华大学的许多优良传统就此时期打下基础。1981年,清华大学70周年时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评价:“在所有校长中,他比较热心办教育,认真严格管教学生,力图把清华办好的人。在他的任期内,学校开始兴建早期的‘四大建筑’(即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教学等各方面得到较稳定的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和教育传统基本形成。”

离开清华后,周诒春先后在众多单位、团体任职。如: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并曾兼任校长;北京中孚银行经理;仁立实业公司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董事、总干事；华洋义赈会的常务董事；英美烟草公司的常务董事；曾发起北京市政治学会并主持为该会募捐及筹建图书馆，曾发起组织平津两市的防痨协会。1936年1月，周诒春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常务次长。胡适曾评价周诒春“人格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正是考虑到周诒春的这种人格魅力和重大影响，以及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深厚私谊，抗战期间，周诒春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等职。

## 一、贵州现代企业的拓荒者

全面抗战前夕，贵州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抗战伊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和抗战后方，“开发贵州资源，促进西南建设”成了非常紧迫的任务。当时，贵州的工厂数量仅有50余家，资力微薄而分散。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初到贵州的周诒春全力协助省主席吴鼎昌，采取建立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创办贵州银行等强有力的措施，促进贵州近代金融业和工业的发展，使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周诒春功不可没。

创办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周诒春到贵州后，于1939年6月协助吴鼎昌创建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将中央、地方和商股资金融为一体，用于贵州的建设与开发。贵州企业股份公司集中资金，引进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使贵州的工商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的创建，揭开了贵州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对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贵州省从一个长期落后的省区，开始进入近代工业建设的轨道，为日后贵州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创办贵阳百货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2月以后，日寇侵占我国南方诸省、市，阻断了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中国国际贸易被迫中断。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转口贸易主要在沿着军事封锁线的交界地区和包括贵州在内的大



后方各省。周诒春为达到贵州国货产销和金融通力协作的目的，于1939年创立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该公司规定“运销本国国货为业务，兼营门市及批发”，解决了以前产品货源不足、销路不畅、资金困难等问题。特别是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货联营公司联营，使紧俏商品和大宗日用品部分得到保障，以供后方军需民用，尽了支援抗战之力。

创办贵州银行。为建设贵州金融网络，以适应和促进贵州战时经济的发展，贵州省财政厅于1941年6月7日正式成立贵州银行，由周诒春任董事长。在周诒春等人的努力下，贵州银行迅速发展起来。到1942年，贵州银行已建柳州、衡阳、重庆、独山、兴义、惠水等分支行。由于有了抗战期间的工作成果，到1948年，贵州银行已拥有省内外分支行27家。1942年，贵州银行往来存款增加了200%，活期存款增加了70%，定期存款增加了590%。贵州银行对工矿业的投资和放款，在其投资和放款总额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不仅反映了战时贵州工矿业筹集资金的特殊状况，也反映了贵州金融业和工矿业双方在经营上的现代性的增强。其间，贵州银行为培育基层分支行和社会金融人才，开办业务会计专修班，培养的这些金融人才为贵州以后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创办贵阳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期间，日寇切断了中国与国外的海陆运输线，作为军用、民用的汽油严重匮乏。1941年2月，周诒春发起成立贵阳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燃料全用木炭，不用一滴汽油”。据1944年7月统计，公司成立3年来，每月运输量达20万吨公里以上，“占西南区全区军公物品总量的30%”，对战时后方军民运输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二、创建贵阳私立清华中学

抗战前夕，贵州没有一所大学，据贵州省教育厅1935年统计，贵州省每千人中接受过初等教育者仅5人，位列全国第33位；1940年统计，全省识

字者仅为 9.31%。吴鼎昌入主贵州后，痛感：“必须花大力气，发展贵州教育，走培养人才，造就人才，造物先造人的发展道路。”周诒春非常赞同吴鼎昌发展贵州教育的理念，1938 年，他就率流亡南下的清华学生筹建贵阳清华中学，亲任董事长。他确定民间办学的方式，将校名定为“贵阳私立清华中学”。1938 年 5 月 1 日，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正式开学。

周诒春强调贵阳私立清华中学要继承清华大学的办学精神，以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该校的校训；提出“智、德、体、群、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清华精神”为核心，强调品德教育，他把“清华精神”释义为“爱国、诚实、自立、合作”的精神。

抗战爆发以后，贵阳私立清华中学名噪一时，成绩斐然。如今，贵阳私立清华中学的芬芳桃李遍布中华。但是，每一个校友都忘不了“巍巍大将山下，清青花溪河旁……诚实勇敢，团结友爱，清华精神永志不忘”的校歌，也忘不了他们的创办人周诒春。正如清华大学校友陈宏振对周诒春的评价：“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了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周诒春分别出任过民国政府农林部长、卫生部长，1948 年 10 月辞职。1948 年冬，其迁居香港。1950 年，人民政府派人赴香港接周诒春返回。1956 年，其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58 年 8 月 30 日，周诒春病逝于上海，享年 7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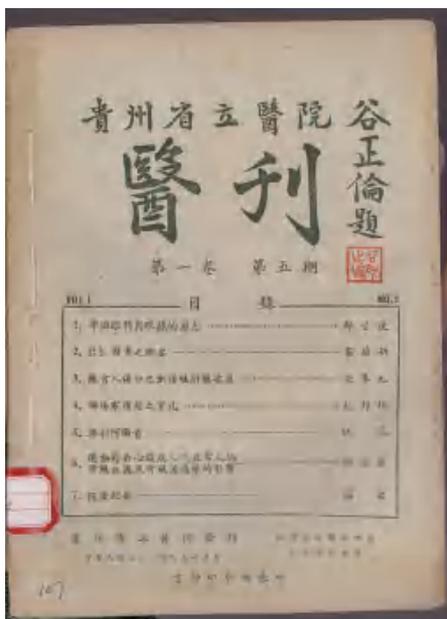
## 贵州第一所公立医院创始人邓文波

邓文波（1886—1961），名光济，字文波，号晴川，以字行。其原籍江西，先世迁居贵州，生于贵阳。邓文波在贵阳传播西医文化，创建贵州省立医院，并任院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邓文波入县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邓文波考取贵州第一批官费生留学日本，先就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补习日语，两年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政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经贵阳人平刚介绍参加同盟会。1911年，邓文波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同年回国。他因在南京被认为是“日本探子”，遭到拘押。获释后，邓文波再次到日本，转而学习医学，就读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1915年，邓文波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和“精勤赏”金牌。此后，他在日本千叶医大附属医院担任外科及耳鼻喉科医生，同时，他也在东京中央高等研究部进修公共卫生行政。

### 一、在贵阳推广西医

1918年，贵州省省长刘显世致函邓文波，聘请他回贵州创建贵州公立医院，同时寄去两万银圆，委托其购买各种医疗器械带回。邓文波欣然接受，购买医疗器械设备后，并约聘千叶医大附属医院医士岩濑妇佐同来贵阳，创建贵州第一所公立医院。岩濑妇佐是日本千叶县人，生于1897。1915年，岩濑妇佐毕业于千叶医士学校，在千叶医大附院当助产士、医士，其作为邓文波的助手一同来到贵阳，后与邓结为夫妇。



贵州省立医院医刊（创刊号）

贵州省公立医院先以城南两广会馆为临时医院，邓文波任院长，省长公署随即拨款 10 万元在博爱路修建医院（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贵阳还很闭塞，市民大多没有接触过西医，前来就诊者不多。经邓文波、岩濑妇佐夫夫妇的不懈努力，精心治愈一些病人后，市民逐渐相信并接受西医，就医者逐渐增多。贵州省立医院的外科、耳鼻喉科病人由邓文波负责诊治，岩濑妇佐则主持妇科诊治。1922 年，邓文波又任省长公署军务处军医科科长。1923 年，

云南军阀唐继虞主政贵州，以滇黔联军

军事会办名义任命邓文波为联军医院院长。经过多年的推广，贵州西医已有较大发展，并成立贵阳市西医公会，邓文波被推选为西医公会主席。为普及卫生、医学常识，邓文波创办并主编《新医药刊》、《卫生》（半月刊）。邓文波勤于研究，著有《中西医临床疗法汇编》《医药卫生论说集》，均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中西医临床疗法汇编》一书于解放后又修订再版。

## 二、开办贵州省妇产婴科传习所

1931 年，邓文波、岩濑妇佐夫妇又开办贵州省妇产婴科传习所，邓文波任所长，岩濑妇佐主讲婴儿接产及妇女儿童保健等。为辅助邓文波开展妇婴医疗工作，岩濑妇佐克服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努力学习中国话，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认真地工作。当时，贵阳百姓多数是请接生婆在家接生，产妇和婴儿遭遇生命危险的不占少数。传习所以新法接生，挽救了不少妇女、婴儿的生命，声名日著。

贵州省妇产婴科传习所开办后，还开展培训班，岩濑妇佐为贵州各县有一



定文化基础，热心于医学的年轻妇女，培训妇产婴方面的专业知识。传习所开办数期，先后培养妇幼医疗保健人才百余人。

### 三、办学鼓励学生向上

1936年，贵州省政府派人接管省立医院，接管人员因敲诈未遂，以“账目不清”为借口，将邓文波投入监狱。经过不断申诉，邓文波于1938年获释，被派往抗日前线服役。抗战胜利后，邓文波、岩濛妇佐在贵阳开设济生诊所，因医术精湛，认真负责，治愈了很多患者的病痛，深受民众的信任。

1949年11月，国民党贵州当局西逃。爱国将领卢涛等人联合贵阳各界人士组织“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贵阳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大军到来。邓文波参与临时治安委员会工作，具体负责治安委员会所设的医务室。

行医之外，邓文波、岩濛妇佐夫妇热衷办学，将部分收入投入贵阳的教育事业，与人合办贵阳私立豫章中学，担任学校董事长。他还筹措经费，设立个人奖学金，以鼓励好学上进、品学兼优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邓文波当选为贵阳市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任贵阳市云岩区人民委员会委员，贵阳市第二届政协委员。1956年，邓文波奉命筹建云岩区人民医院并担任院长。

抗战期间，岩濛妇佐仍然留在中国。1939年，贵阳遭日机轰炸后，岩濛妇佐奋力抢救伤员，又参加贵阳防空医疗组织，抢救受难民众。新中国成立后，她与邓文波首先开设了黔灵西路联合诊所，担任妇产科主任。1953年，岩濛妇佐回日本探亲，并在天津参加日中友好协会。1955年，中国卫生部部长李德全访问日本，岩濛妇佐向李德全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李德全将其入籍申请带回，交有关部门。不久，经中国内政部批准，岩濛妇佐于1956年获得中国国籍，又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帮助下重返贵阳，并任贵阳市云岩区医院妇产科主任。

1958年8月，岩濛妇佐逝世，享年61岁。遵照其生前遗嘱，家人将其大脑捐献给贵阳医学院做研究之用。1961年，邓文波因脑出血去世，享年7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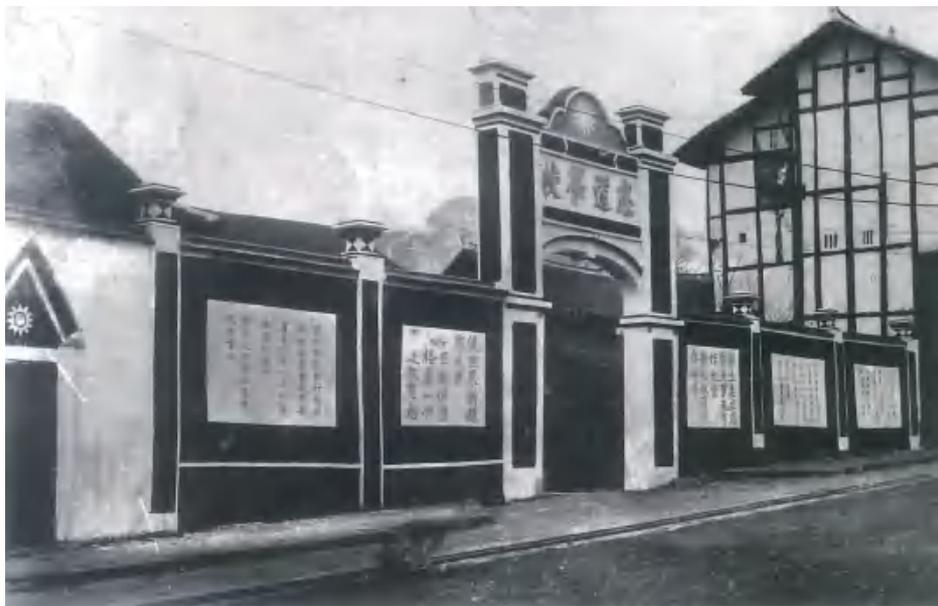
## 毕生献身小学教育的贾功台

贾功台（1886—1968），名光，字功台，以字行。贵筑县（今贵阳）人。其任贵阳志道小学校长30年。

贾功台之父贾国钧，曾任贵州定番县（今惠水）教谕。贾功台自幼入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清宣统元年（1909），贾功台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清宣统三年（1911），贾功台参加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临时学生保卫队第三小队，负责保卫省议会和教堂等处。1912年，贾功台中学毕业，被聘为贵阳私立正谊小学教师。1919年，他到贵阳南明第二分校执教。1923年，南明第二分校更名为贵阳志道小学（后来的老东门小学），贾功台为首任校长，直至1948年退休，任期达25年，他是贵阳教育界任职一个学校职务不变、任期最长的校长。其间，他还兼任县立中学、私立导文中学史地教员。

贾功台任志道小学校长后，把毕生精力倾注于学校，使志道小学成为解放前数十年间闻名全省的私立小学。他的教育思想、办学方法在当时独树一帜，成绩卓著，成为备受尊敬的教育专家。

任职校长之始，贾功台竭力整顿学校，增建教室、图书仪器室、运动场；购置各种仪器、标本、挂图及运动器材；招聘优秀教师，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工资福利待遇（课时报酬、年工加薪、发给制服和津贴、供应午餐等）；重视学生品德教育，要求学生遵守勤学、诚实、清洁、整齐、节俭、孝顺、友爱、尊师、谦虚、礼貌、郑重及讲公德、守纪律、做家务、不说脏话等。数年间，



1949年前的贵阳志道学校

学生增至 500 余人，并成为贵阳优秀学校。

在教师的聘用上，他要求受聘教师不仅要有必要的知识，有好的教学方法，而且还须有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更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垂范。其对所有受聘教师都实行“试教制度”，教师必须经过讲课，批改作业等，证明确能胜任教学工作，方正式聘用。

对学生除了要求切实掌握所学各门课程外，还要求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优良的品德。对学习成绩好的、诚实、谦虚、稳重的学生授予“好学生”奖章，让他们佩戴胸前。故志道小学的学生们都有上进心、荣誉感。经过贾功台数年的努力，志道小学学生大都基础知识扎实，品德端正，志道小学成为众多家长的首选学校。由于治校有方，他的社会声望也不断提高，成为贵阳教育界知名教育人士，蝉联了三届贵阳县教育局会长。1929年，贵州省省长毛光翔聘贾功台任省政府资政；1937年，其当选为贵州参议员。

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贵阳商界清查日货，贾功台亦组织学生参加，

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清查日货时，学生遭到个别唯利是图的奸商的殴打，贾功台对此事不能容忍，立刻前往制止，亦遭奸商暴打。社会各界对贾功台爱国爱学生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当局也通告一定处置肇事奸商。1939年，贵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志道小学疏散到郊区小河村皇经阁，上学不便，学生人数锐减；师资缺乏，生活条件差，学校处境空前艰难。贾功台动员子女二人充任教师，支撑危难局面，保护学校图书和教具，坚持到抗战胜利。回城后，志道小学的状况得以逐渐恢复和改善。

1948年，贾功台退休，校董会特意定做一枚金质奖章，奖励他多年艰苦办学的劳绩，推举他为校董会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贾功台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8年9月23日，贾功台病逝于贵阳，享年82岁。



## 水利高等教育先贤许肇南

许肇南（1886—1960），名先甲，号石枏。贵筑县（今贵阳）人。中国水利电力先行者，教育家、古文字学者。

19世纪中叶以来，张謇、黄炎培、许肇南、李仪祉等水利先贤，他们饱含爱国之情，坚定救国之心，纷纷投身救国兴国的洪流，开启了中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先河。许肇南于日本和美国留学学成后，拒绝重金聘用，毅然返回祖国，报效国家。他出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首任校长，为培养国家急需的水利人才竭尽全力。他一生为科学事业奋斗不已，为国家富强奋斗不已。

### 一、学成归国的水利人

许肇南，清光绪十二年（1886）出生于贵阳，4岁丧父，由母亲谭扬秀辛勤抚育。稍长即入私塾启蒙，由于塾师的引导，他自小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打下了坚实的功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入四川高等学堂学习，开始受到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四川读书期间，他倾向民主革命，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19岁的

许肇南

许肇南东渡日本，立志学习“科学救国”的本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又从日本转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深造，成为贵州省第一位赴美留学生。清宣统二年（1910），许肇南回国投考公费留学资格，与胡适等 143 名考生取得第二届清华公费生赴美深造。其先入威斯康星大学攻电机工程，获得该校学士学位及电气工程师职称，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业经济和经营管理。留美期间，他被留学生推选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又与杨铨、任鸿隽等共同发起，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康奈尔大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

在哈佛大学毕业之际，许肇南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所属的斯坎奈克塔的工厂实习。这家公司拟以重金聘任他为远东总买办，他予以婉言拒绝，打定主意学成即归，报效祖国。当时留美的胡适在日记中有记载许肇南（先甲）远道来访的内容，并作诗送之，“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表达了对许肇南归国报效国家的由衷赞许。

## 二、科教救国的教育家

1914 年许肇南回国，时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在主持全国水利工作时，深感我国水利技术人才匮乏，培养水利人才是当务之急。许肇南在拜访他时，提出了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培养我国水利工程专业人才的建议，这与张謇的想法不谋而合，遂决定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5 年 1 月，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培养水利工程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许肇南被任命为校长。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一所完全由本国人才执教、管理的中国首座工科大学。许肇南任校长后，延请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李协（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为教务部主任，聘留美学者许大雄、沈祖伟（“河海”第二任校长）、顾维精（后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杨孝述（“河海”第四任校长）、张谔实（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刘梦锡（后任中山陵监修工程师）等为专科教师，许肇南亲自教授英文、



经济、簿记、实业经营等课程。

学校初建四年间虽被迫三易校址，却仍从欧美购置专业书籍及大批仪器、设备，相继建立起图书馆、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测量仪器室、水力实验室、材料检验室、图画及模型陈列室、地质矿物标本室、测候所等。

许肇南认为水利事业关乎国计民生，每一位水利工作者都要心怀一颗爱国报国之心。他坚持品德教育和科技教育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因此，学校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革命、民主、自立等综合教育。“河海”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已在北京发轫，《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学校图书室公开陈列，为学生阅读新文化读物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在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该校学生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社会问题》一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闻天因此成为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河海”独特的文化氛围使它成为南京地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1919年5月13日，南京成立学界联合会，许肇南被公推为临时主席和参事长。在他的支持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广大师生始终站在反帝爱国斗争的前列。在任校长期间，许肇南还兼任了南京下关电灯厂筹备厂长的职务。在他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该厂创建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火力发电厂，为中国的电力工业事业开了先河。

经过不懈努力，该校培养出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批优秀水利工程专家，其中有汪胡楨（佛子岭水库总指挥、三门峡水库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水利电力部顾问）、须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总工程师）、陆克铭等，为我国的水利工程教育和现代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 三、潜心修文的古文字学者

许肇南于1921年辞去“河海”校长，后又任广东国立师范学校教授、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秘书、宜昌海关监督署监督。1927年后，许肇南深感当局政治腐败，科学救国理想在现实面前只能变为泡影，从此辞去一切职务，潜心研究

起古文字学，他凭借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著有《家学古获篇》（最初称《咬文嚼字》）77卷和《中庸平义探》《客敦》《梅籀古暗铭识读释略》《简鲟灵集——经篆论证》《继志述事》《札探古董》《馨宋寓斋读书漫志》《国玺释文》等。解放后，许肇南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上海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并翻译外国学者著《上海史》中部分篇章。

1960年12月26日，许肇南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



## 治学主张“博学而强志”的王佩芬

王佩芬（1887—1973），号梦淹，原名葆。祖籍浙江绍兴，其先祖于19世纪中叶迁往贵州，后定居贵阳。古代汉语专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佩芬赴日留学，回国后在贵阳多所学校任教，担任过模范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贵阳县立中学首届校长。其先后受聘担任大夏大学中文系教授、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

王佩芬主要研究汉语声韵、训诂之学及古今汉语语法、贵州苗语和汉语的比较，对自然科学的矿物学、生物学及日文、英文、俄文等也有涉猎。其著有《国文积句公式》《识字法》《贵州方言考》《说文解字部首疏证》《名学津逮》《先秦名理探》《和文猎要》《英文构造及分析图式》《结晶学入门》等，翻译了日本寺尾新博士的《增殖生物学》一书，撰有诗词数百首。

清光绪十三年（1887），王佩芬生于一个商贾之家。其兄王蔬农、王仲肃都是学者，王佩芬少年时即能背诵《说文解字》部首。清光绪三十年（1904），王佩芬考取贵阳府学生员（俗称秀才），又在贵州大学堂就读，入英文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考取贵州巡抚林绍年选送的贵州留日官费生，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博物科（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总称），于清宣统三年（1911）毕业回国。他曾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日文15年，又在贵阳模范中学、南明中学、省立女师等校教授英文、博物、国文达24年。1921年，

王佩芬被聘为模范中学校长。1929年，王佩芬在贵阳地方人士支持下，创办贵阳县立中学于炎帝宫（即今贵阳五中所在地），出任首届校长7年。他为县中提的校训为“敬业乐群”，标语是“科学救国”。他说：“训以敬业，欲诸生之养成其责任心也；训以乐群，欲诸生之养成其团结精神也；以‘科学救国’为标语，欲诸生之悉心研究科学，而应用于民生与国防也。”贵阳县立中学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贵阳市没有中学的历史。

1935年，贵州结束地方军阀主黔的历史。时任贵阳县长曾学孔决定停办贵阳县立中学，而把划定的县立中学经费专款移作他用。王佩芬坚决反对，在贵阳各界人士支持下，县立中学得以保存，曾学孔被撤职。

1936年，王佩芬离开贵阳远赴南京。到南京后，他先在南京宪兵学校教授



日文，后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37年，他随大夏大学南迁贵阳，一直担任中文系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佩芬未随大夏大学回迁上海，而是转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47年，其又转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一度兼任教务主任。次年，他辞去兼职，专任教授，直到1949年贵阳解放。1949年起，王佩芬还兼任私立贵阳程万中学校长。

1949年贵阳解放。第二年，王佩芬辞去程万中学校长职务，专心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他在中学、大学执教多年，讲课生动而诙谐，为人平易可亲，深为学生敬重。在教学中，他主张“宽取窄用”和“深入浅出”。在大学，王佩芬先后讲授过国文、历代散文、古汉

贵阳程万中学教职员最早佩戴的校徽



语、工具书使用法及日语等多门课程。

王佩芬治学主张“博闻而强志”。50多岁时，他开始学俄文，做到能阅读俄文书籍及做简单的笔译。70多岁时，他又开始进行文字改革研究，伏案撰写了《贵州省怎样试行汉语音文的研究》一书。

1973年，王佩芬因病去世，终年86岁。

## “五代师生”聚一堂的陈寿轩

陈寿轩（1891—1969），名应禧，字寿轩，亦作瘦轩、寿萱。原籍山西，先世迁居贵阳。贵州现代著名教育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14岁的陈寿轩入萧协臣、杨伯坚创办的贵阳私立正谊两等小学堂就读，毕业后考入贵州矿业学堂。辛亥革命后，贵州矿业学堂停办，陈寿轩学业中断。他喜爱数学，坚持钻研和自修，21岁时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正谊小学校长萧协臣对其学习精神大加赞赏，破格聘请他任数学



教员。从此，陈寿轩献身贵阳的教育事业。

1917年，陈寿轩参加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现代教育，回国后接任正谊小学校长一职。1931年，陈寿轩任三合县（今三穗县）县长。到任3个月，陈寿轩因看不惯官场之积弊现象，便辞职回到贵阳，省立贵阳女子中学聘陈寿轩为数学教师，1934年，其又任贵阳女子中学校长。1935年，陈寿轩在贵阳师范学校、贵阳私立达德中学、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省立贵阳高中执教。

陈寿轩



## 一、艰难中两次选择正谊学校主持教务

1939年，贵阳遭日机“二四”轰炸后，正谊学校迁到郊区二戈寨，办学和生活都出现了很多困难，校长提出辞职，学校濒临解散。陈寿轩作为正谊学校的首期毕业生，辞去城内教职，自愿到乡下担任校长。迁到二戈寨的正谊学校，校舍只有5间茅屋，学生分散住在村民家中的养牛楼或农具房中，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晚上都与教师们轮流提着煤油灯，在泥泞的山路上走村串寨，辅导学生夜自习。没有食堂，他动员教职工家属每家代办两桌学生伙食，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空袭警报一响，在他和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跑到丛林中隐蔽，警报解除又恢复正常教学。在他的领导下，正谊学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熬过了数年艰苦岁月，坚持到日本宣布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大学教师纷纷返回原地，贵州大学一时缺乏数学老师，陈寿轩被聘到贵州大学教数学，任数学系讲师。数年后，鉴于他优秀的教学方法和深厚的数学功底，学校破例将他升为副教授。1947年，迁回城内的正谊学校因缺乏经费和师资，出现危机，陈寿轩又辞去贵州大学副教授之职，再度回正谊学校任校长。陈寿轩两次回正谊，都是学校处于艰苦困难当中，他选择放弃一切，拯救正谊。陈寿轩尤其重视教学质量，经常检查教师批改作业和课堂教学情况。民国期间的正谊学校学生的成绩在贵阳名列前茅，受到社会的赞誉。

贵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正谊学校经费有了保障，教育秩序维持稳定。次年，正谊、达德、贵阳高中合并为贵阳市第二中学，陈寿轩任校长。1956年后，其先后任教于贵阳第六中学、贵阳师范专科、贵州函授学院。他曾自题小像：“老当益壮，不容稍懈，果对人民有所贡献，虽死犹生，否则生亦是死。”

## 二、钻研教学桃李满天下

陈寿轩从事教育工作57年，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和教师。其学生遍及

国内外，其中不乏名家、专家。他为了使学生在学习数学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积极钻研教学方法，以富于启发性的，简练、风趣的语言让学生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贯通艰深的数学原理。在课堂上，陈寿轩画圆形和线条从不用圆规和尺子，但让人看不出是信手所画，给每位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完课，留在黑板上的就是一个提纲式的教案。他一生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在1956年召开的贵州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他所教的五代学生，萧润生、刘延良、丁传国、李世荣都作为优秀教师与他一起出席会议。五代师生济济一堂，全国都不多见。教育部《教师报》特以《五代师生》为题，报道了这一教坛盛事。陈寿轩一直从事教学，著有《微积分》一书留存，是他一生对数学教学的研究成果。

1969年11月18日，陈寿轩去世，享年78岁。1983年9月26日，他的学生500多人在贵阳举行“陈寿轩先生逝世十四周年悼念会”。曾受业于他的著名学者易家训、秦元勋、越民义等发来电报，沉痛悼念陈寿轩老师。



## 精于脉理的著名中医石玉书

石玉书（1893—1973），名国麟，字玉书，以字行。贵州黔西人。1929年，石玉书到贵阳任职，遂定居贵阳。中医名医。

清光绪十九年（1893），石玉书生于贵州省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6岁入私塾，后从父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籍进士贺静轩避祸来黔，流寓打鼓新场，困境中得石家接济。贺静轩博览医书，精通中医，他将中医基础知识传授给石玉书，先学《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然后熟记验方，再通过实践掌握望、闻、问、切之法。苦学三载，石玉书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在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不少经验。1913年，石玉书又师从本乡杜克犹学习中医。1917年，石玉书在家一边研读中医典籍，一边给乡邻治病。1923年，石玉书在金沙县正式挂牌行医。

### 一、治愈疑难疾病

有一年，打鼓新场疾疫流行，死了不少人，石玉书根据中医典籍和长期给乡邻治病的经验，拟出药方，用大锅煎药分发，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从此在当地有了名气。1924年，黔军毛光翔部途经打鼓新场，部分官兵染患瘟疫，难以继续行军，听说石玉书善于治疗瘟疫，特请至军中为官兵诊治。石玉书亦用大锅煎药分发患者，患者渐渐恢复健康。毛光翔母亲患疑难疾病，求医多年都不见好转。毛光翔专程赴打鼓新场，请石玉书为其母看病，经数周治疗，毛母康复。

从此，毛光翔与石玉书有了深厚的私交。

## 二、在贵阳开办药房坐堂就诊

1929年，毛光翔继任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聘任石玉书到贵阳担任25军军医处长。1932年，毛光翔下野，石玉书离职开办群康药房，坐堂诊治病人。因医德、医术良好，用药简单，收效快，石玉书颇受患者及家人信任。后因与毛光翔的关系，遭缉拿，其远走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石玉书回到贵阳，继续行医。1939年2月4日，侵华日军飞机轰炸贵阳，其所开群康药房化为灰烬。石玉书又竭尽全力，筹资开办天生元药房，以利市民，医业依然如旧。

## 三、投身贵阳医疗卫生事业

石玉书为人耿直不阿，热心公益事业。20世纪30年代，打鼓新场小学教师蓝芸夫等人集资为地方建图书馆，石玉书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套《万有文库》（1000余种）捐赠，充实馆藏。



石玉书

贵阳解放后，石玉书与中医界人士创办黔灵西路联合诊所，任主任。1956年，贵阳中医院成立，石玉书担任院长。他深感老百姓就医看病难，又体会到因中医医疗、教学、研究分离，中医陷于不利于管理和发展的困境，便与夏森柏、罗克聪等老中医在贵阳市人代会上提出《将中医医院、中医进修学校、中医研究所三合一，统一管理，以利于祖国医学发展》的提案。该案受到市人民政府重视，并很快得到落实。1965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以贵阳中医院为教学医院（后改



名为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石玉书除担任医院院长之外，还从事学院的临床教学，他将数十年的行医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和医务人员。他精于脉理，一经切脉，便知患者疾病所在，对症下药，往往使患者很快康复。贵州名医王聘贤曾说：“若识药性，我处可询；凭脉辨病，须求石氏。”

石玉书治病，以内、妇、儿科为主。诊病之法，既注重四诊合参，又因时、因证而有所取舍。他认为人者，血气为本，而脉者，乃血气之先，多数疾病可凭脉而断。他常说：“切脉之初，能知五脏虚实，六腑强弱，形体盛衰，正邪进退，尽在其中，脉象乃客观所见，指下能明，便不受假象所惑乱。”因此，在治疗时，病人一脏有病，他常通过调理他脏进行治疗。如肝有疾，他便调理心肾，每每多获很好的效果。五脏六腑中，他特别注重胆。他的治疗理论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祛邪易，扶正难，若用药有损伤阴阳二气之秋毫，则是药石杀人，医家务须留意”。他用药不拘一格，郁金、丁香相畏之品同方，屡见不鲜；干姜、黄连苦辛之味共剂，视为常事。他主张临症用药轻锐精简，反对广罗原野，故用药味少量轻，其自制药“益气解毒丸”仅用9味药。他用药之轻，药房难以置信，如用一分朱砂治疳积，三分连翘清湿热，二分黄连泻心火，他认为“药量如权，四两可拨千斤”。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石玉书因医术精湛，被大家誉为贵阳“四大名医”之一。

1973年，石玉书病逝于贵阳，享年80岁。

## 贵州医学院院长李宗恩

李宗恩(1894—1962),江苏武进人。内科学家、热带病学家、医学教育家,贵阳医学院首任院长。

李宗恩1920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2年获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1923年至1937年任职北平协和医学院;1937年秋,李宗恩筹办贵阳医学院,任首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宗恩历任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英国医学会及远东热



李宗恩

带医学会会员。1949年9月,李宗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逝世。李宗恩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不仅开创了中国的热带医学研究,成为医学科学家,还在抗战期间创建贵阳医学院,为抗战建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 一、历尽艰辛创办贵医

抗日战争初期,华北、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学生纷纷失学。教育部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一



方面给流亡医学生提供继续就学机会，另一方面奠定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基础。从作出决定之日到招收新生，筹建时间只有五个月，决定要求学院设五个年级，九个班级，课程照旧，同时开课，按时毕业。在当时处于贫瘠落后的贵州创办医院，人才和基础条件都十分匮乏，其艰难可以想见。

1937年12月31日，教育部聘李宗恩、朱章赓、杨崇瑞等教授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1938年1月1日，筹委会在汉口建立，并于1月中旬至2月上旬分别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五处设招生处，招收流亡的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学生，登记者约三百人。

1938年2月中旬，李宗恩由汉口经重庆抵筑。当时的贵阳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城市经济贫穷，破败不堪，房屋陈旧，街道泥泞，交通极为落后，全省一千两百万人口中只有十二名注册医生。抗战前，贵州高等医学教育一片空白，只有省立医院开办了一个妇产婴医科传习所，也只办了一年多。

李宗恩上任后，立即着手延揽人才，搭建教学班子和行政机构。他利用在协和任教多年的资源优势，聘请1926—1934年间各级毕业生教授医科、药科以及某些前期或后期临床的课程，还请到了自北方南撤的多位全国知名教授教前期的基础课，又从卫生部调来一些人担任行政人员。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李宗恩任院长。

当时贵医的教学基地设在阳明路上的一处会馆和一座名为“三圣宫”的破庙里，所有教学设备，包括课桌椅、实验仪器、图书等都要定制、调拨和采购，工作非常艰难。李宗恩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操劳，1938年6月1日，贵阳医学院如期开学。建院初期，大批国内知名医学专家云集学院执教，如教务主任贾魁、内科主任杨济时、神经科教授程玉馨、生理学教授柳安昌、妇产科教授李瑞麟、药理系主任周金黄、内科教授王季午等。

除了专业课程，贵医还设置了人文科，开设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主持这一科的是留德专攻康德哲学的洪谦教授。学校科目按人文科、基础学科、

临床前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次序排列。李宗恩认为，人文科目并非可有可无，它应该居于先行位置，目的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扩大医学生的视野。

## 二、倡导科学扩建附属医院

医学院还有一个教学医院的问题，李宗恩紧接着又为筹建贵医附属医院而奔波。因当时的贵医还没有条件自办医院，李宗恩就找省政府商量借用省立医院，由贵医派医生去充实力量。由于当时人们对新医学缺少正确认识，认为新医学就是“开肚子”，没有人敢以身试“刀”，所以省立医院的外科既无器材，也缺少外科医生和护士。李宗恩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解决一系列问题，半年后，贵医又加办了医士职业科，分别办起了三年制护士班和助产士班，三年后，有了这批专业人才，贵医就办起了门诊部，1941年，门诊部扩充为附属医院。

李宗恩认为要让医学科学在西南扎根，关键在于赢得社会对它的了解、信赖和接受，对大众的科普宣传很重要。为推广新医学，反对落后愚昧，贵医组建医学话剧团深入群众开展演出，李宗恩还作为群众演员上台表演，对新医学开展宣传普及，增强人们的科学意识。

## 三、重整旗鼓力保贵医

1944年冬，日军的一支骑兵进入贵州境内，长驱直入到了独山。紧急时刻，所有与战事无关的直属机关和学校疏散，贵医撤了一部分到重庆，另一部分就留在了原处。

日军投降后，贵医的去向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撤至重庆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海医学院在重庆的校舍，上医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贵医的要求。李宗恩却认为，如果把贵医并入上医，迁往上海，贵医多年为提高边远地区医疗水平所做的努力就落空了，他力主将贵医留在贵阳。最后，在李宗恩的一再坚持下，并得到重庆周诒春先生的支持，贵医又在贵阳重振旗鼓。

贵医创建于抗日高潮，扎根于贵州沃土，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发展于改革开放后。80多年来，贵医人始终铭记李宗恩院长提出的“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的校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博采众长、服务地方、励精图治、团结拼搏。如今的贵州医科大学（原贵阳医学院）在迈向新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学科齐全、结构合理，师资力量雄厚，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省属医科院校。

## 中国一代文化名人谢六逸

谢六逸(1898—1945),原名谢光燊,字麓逸,后改六逸。贵筑县(今贵阳)人。近代文学家、新闻学家、教育家。

1945年8月8日,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即将响起的前夕,我国著名文学家、编辑家、新闻学家、教育家谢六逸教授去世,社会各界在贵阳师范学院举行公祭。噩耗传出,中国文坛为之“同声一哭”,使人有“车过腹痛”之感。茅盾在《悼六逸》中写道:“听到谢六逸兄逝世的消息,有好久总觉得心里空洞洞,说是悲哀吧,也不尽是悲哀;说愤怒呢,也不一定是愤怒——是一种不大可以名状的难受味儿。”叶圣陶作诗一首悼念六逸先生:“交流百辈春江畔,玉树堂前推谢公。谈说从容抽妙绪,教人宛觉坐春风。战中朋好各西迁,公返柯乡我入川。一遇黔灵憔悴甚,最伤此别判人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谢六逸出生于贵阳的一户殷实人家,青少年时代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贵阳模范中学,1917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为日本及欧洲文学所吸引,走上新文学的道路。他读了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生活之花》,深有所感,发表了《我为什么创作》的文章,1919年发表《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接着又发表《文学上的象征主义是什么?》。

1921年,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谢六逸便是第一批会员。谢六逸回国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社外编辑,



“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经文学研究会决议，由他负责编辑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刊》），此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谢六逸甘愿做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把外国文学引入中国，翻译和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雪莱、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1923年，他出版了《西洋小说史》这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从此蜚声文坛。他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尤为精到，翻译了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事记》《万叶集》及诸多日本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编辑了《志贺直斋集》《日本近代小品集》《日本故事集》，著有《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被誉为“研究日本文学的权威”，与周树人、周作人、夏丏尊不分伯仲。

谢六逸擅长随笔，常对人说：“我喜欢用随笔的形式写我自己的感想或介绍国外的著作。随笔与其他的杂文都具有特殊的效能，常常能兴奋阅者的精神。”他又说：“过去的笔记或随笔之类的文字，往往是从‘闲空’里产生的。不过，我自己所写的小品与随笔，恰好和他们相反，几乎全是‘迫切’时候的叹息。”他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后来收入了《水沫集》和《茶话集》，还有《文坛逸话》《夹板斋随笔》《夏夜漫笔》等，情理并茂，娓娓动人。

他把那颗慈祥善良的心，时时奉献给小读者，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稻草人》《母亲》《清明节》《红叶》《鹦鹉》，还翻译了《俄德西冒险记》《伊利亚特》《海外传说集》《罗马故事集》等有趣的书。他有感于当时的儿童文学“并不曾把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滋养品给儿童”，主张“共同研究真的儿童文学，多读几本世界有名的儿童作家的作品”，“使儿童心灵高贵纯化”。他写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以温暖、丰富、启迪孩子们的心灵。

谢六逸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创者。1926年，他受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后即开设新闻学讲座。建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北大新闻系并称中国的新闻教育之始，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谢六逸。他拟定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简章》，主张“新闻即史”，最痛恨“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希望能培养出一批有德、有才、有识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正值《新



谢六逸



日本文学史

生》《永生》遭到禁绝，亟须另创一个有广泛读者的进步报刊，于是有组织天才之称的胡愈之便把这位沉着、持重的“贵州督军”（谢六逸有一外号叫“贵州督军”）请了出来，以“无奇不有”四字方针创办了《国民周刊》。在上海滩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主编的《立报·言林》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他在《开场白》中写道：“本报的标语，有一句是‘五分钟能知天下事’……报纸面积小，小中可以见大。文章不怕短，短中可以见长。篇幅虽然紧缩，品质却已增高，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块草地，从今天起开放，凡对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

谢六逸有过两次重大选择。按说，以他的功底和成就，在日本研究日本文学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他毅然回国，希望把新文学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日本入侵中国后，一些与日本有深交的人被拉拢过去，如周佛海、周作人之类，而谢六逸却毫不犹豫地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倡议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在贵阳组织分会，号召文艺界“将自己经久磨炼的笔锋，刺穿敌人的狰狞面貌”，以鼓舞人心，颂扬抗日战士的英勇。

1938年，谢六逸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曾在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文史研究室主任和社会部主任，在贵阳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还兼任国民党《中



央日报》（贵阳版）研究室主任，又被聘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并兼《文讯》主编。抗战时期，他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忙碌得“几乎连吃饭后的悠闲都被剥夺了”。

“而立之年”即成名的谢六逸，未到“知天命”之年便告别人世，享年 46 岁。他死时家中一贫如洗，棺木是华问渠送的，葬在八角岩下基督教的公墓里，墓碑上写着“谢公六逸之墓”。郭沫若得知谢六逸死于“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之后写道：“然而中国人民是厚道的，将来总有报答他们的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1999 年，贵阳市将谢六逸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谢六逸被列入贵阳十大名人。

## 学养深厚的社会教育家马宗荣

马宗荣（1896—1944），字继华。贵筑县（今贵阳）人。社会教育家。

民国年间，教育家们提出不同的主张。蔡元培主张实行国民教育，李大钊主张实行大众教育，晏阳初提倡乡村教育，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马宗荣则努力倡导社会教育。

马宗荣9岁起，便跟着其舅丁尚固读书，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两三年间，对经籍史地历算诸学多有领悟。后马宗荣考入省立模范中学，1916年，20岁的马宗荣毕业。正值新的息烽县县长走马上任，马宗荣受命任息烽县立两级小学校长。他以振兴息烽教育为己任，一切以当时先进的省立模范小学为榜样，制定规章，改变私塾式的旧教学方法，很快使偏僻的息烽县小学教育大为改观。

1918年，他以公费生资格选送日本学习矿业，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本科。他深感国强民富必须普及教育，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改学教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专攻社会教育及图书馆学。在校期间，他博览世界教育名著，竟至废寝忘食，著有《图书馆序说》一书。1927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所深造，发表了颇有见解的学术论文，与其导师田熊次教授、山作树教授齐名，两年后毕业，被日本岩波书局聘为讲座讲师。

在日本前后11年，马宗荣认真考察了日本的社会教育，并与欧美各国的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及我国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做了比较，形成了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教育思想。他经常到图书馆看书，访问



了一些私家藏书楼，发现我国有许多秘籍和孤本流传至日本，于是告知中国留日学生的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谈，派郑贞文、张菊生前往日本，通过马宗荣与帝国图书馆、丽宗藏书楼联系，将这些秘籍、孤本影印回国，辑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列入商务印书馆的《续四库丛刊》《图书集成》刊行。

1929年马宗荣回国，受聘为上海市教育局督学，兼任中华学艺社常务秘书。次年，他担任私立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社会教育系，又创立两年制师范专科，带领学生摄制了10多部社会教育影片，开办农村社会教育实验区，成为我国社会教育的先驱。在上海的5年间，他又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私立中国公学等校教授。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马宗荣任教育部秘书。马宗荣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建议，认为“学校教育之原则，太单调，太机械，不能适合全民的需要”，“要提倡多角形、光芒式、放射状、复合的社会教育”。1938年他回到贵阳，在由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任总务长兼师范专科主任。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成立编辑所，聘马宗荣为所长，聘谢六逸为副所长。文通书局组建了一个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有112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及知名人士参加。其间，他与谢六逸曾主编《大学丛书》，出版《文讯》。

马宗荣是我国学养深厚，具有理论体系的社会教育家，著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孟子之出处进退观》《王阳明及其思想》《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现代社会教育泛论》《社会教育新论》《社会教育纲要》《社会教育与社会事业》《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等30余部专著，共300多万字。他认为个人应当融入社会，普遍受到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缺一不可。社会教育旨在“直接图民众资质的向上”，可普遍提高社会上民众的教育程度，培养民众的情操，锻炼民众的身体，造成良好影响，使社会不断进步。

他界定的社会教育，其一是“全民教育”，“不分男女，不问贤愚，不拘贫富，不论地位高低，凡属民众，均是社会教育的客体”；其二是“整个生涯的教育”，

包括幼儿时代、少年儿童时代、青年时代、成人及老年时代的教育；其三是“充实人生的教育”，无论受过何种学校教育的人，乃至专家、学者，都要不断扩充知识，充实人生；其四是“多式多样制的教育”，适应各种人的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其五是“利用闲暇的教育”，即业余教育。总之，社会教育是“改善社会全体的教育”，包括德育、智育、情育、美育和体育。施行社会教育需要政府加以倡导、全社会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场、公园、戏院、电影院、音乐厅等公共设施，举办各种展览、演讲、演出及比赛活动，开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利用报刊、图书、影视及多种媒体进行传播，使整个社会的民众受到教育。

1943年，马宗荣奉命前往重庆，筹设中央民众教育馆。他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借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我以为中央民众教育馆的范围，相当于学校教育中的中央大学。”馆成，马宗荣任馆长，结合抗战形势，选定我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作典范，设立“人范馆”，为他们塑像立传，潜移默化地教育人民。1944年1月30日，马宗荣先生与世长辞，终年48岁。噩耗传出，致哀者络绎不绝，贵阳各界举行公祭。许多人写了挽联痛悼他，其中有挽联写道：“方当学易之年，天胡不假；叹道怀才未遇，众所同情。”《贵州日报》出了《马宗荣专刊》，贵阳文通书局举办了“马故所长宗荣先生遗著展览”。



## 成就卓著的数学教育家刘熏宇

刘熏宇（1896—1967），贵筑县（今贵阳）人。贵阳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对我国教材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刘熏宇青少年时在贵阳读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系，1919年毕业。他先后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常德第二师范学校、上海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校任教。1928年，其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数学。1930年回国，刘熏宇在上海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兼课。

全面抗战初期，刘熏宇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受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之邀，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回贵阳任省立高中校长，与著名学者李青崖、谢六逸、蹇先艾、高阳发起组织了“每周文艺社”，以《贵州晨报》为宣传阵地发表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1950年，省立高中与省立贵阳中学、私立中山中学、国立师院附中、伯群中学等校合并为贵阳一中，刘熏宇为第一任校长。他在省立高中倡导和培植的优良学风和校风，成为贵阳一中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代代相传。

### 一、抗战时期坚持办学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到日机轰炸，一些学校解散，一些学校则濒于崩溃边缘，省立高中迁到修文。在战乱中，学校教学经费匮乏，教师数量锐减。



刘熏宇

即使刘熏宇身为校长，也得兼上数门课程。由于经费缺乏，办学困难，刘熏宇日夜操劳，想尽办法维持学校的运转，坚持办学。经他和赵伯愚、刘方岳、蹇先艾、李倬元、杨文山等学界知名教师的共同努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熏宇将省立高中办得卓有成效，省内各地学子慕名投考和转学者不断。刘熏宇在省立高中，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要求都十分严格。他提倡教学相长，讲究学问，教师讲必所长，学生问必有所据，提倡独立思考，有疑必问，反对囫圇吞枣和盲从，要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的民主学风。在抗战期间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省立高中声名大振。

抗战胜利后，刘熏宇带领全校迁回贵阳两江口，而学校原址已为贵州省训团所占。刘熏宇多次交涉，该团拒绝迁址，学校只得暂借其他学校教室和甲秀楼附近的翠微阁、观音寺房屋上课。经过不断争取，1946年终于将校址要回，省立高中才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 二、对我国教材建设作出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刘熏宇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数学》、《开明英语》（与林语堂合编）、《开明活页文选》等，既是开明书店的畅销书，又是当时风行全国的中学课本，被众多学校采用。他所著《解析几何》一书，是他有感于国内学校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大都采用英文本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编写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他既考虑到了英美学生与我国学生程度的不同，又着眼于我国中学教育的学术状况，使这本书成为当时高中学生重要的辅导读物。



他与夏丏尊等合著的《文章作法》，也是当时广为流行的中学生课外辅助读物。

1951年，刘熏宇调任国家出版总署任编辑，次年出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曾负责主持全国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制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文章作法》《初中代数》《数学园地》《数学趣味》《因数与因式》《实用微积分》《代数整式》《正负数的四则运算》《因式分解》《分式和比例》《开平方》等普及性数学课外读物，深受师生和数学爱好者的欢迎。

### 三、成就卓著的教育家

刘熏宇是成就卓著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学者。他的巧妙之处在于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将一个个抽象的数学概念和难题转化为了有趣的故事和生活场景。比如，通过一个小小的购物场景，就能让孩子们轻松理解加减法的运算；借助一场精彩的运动会比赛，巧妙地阐述了速度、时间和距离的关系。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数学知识，还能激发他们的思考和创造力。他是我国“趣味数学”的首创者，所著《马先生谈数学》《数学趣味》《数学园地》等书，在国内享有盛名。

著名作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数学趣味·序》中说：“我一直没有尝过数学的兴味，一直没有游览过数学的世界，到底是损失！最近给我稍稍补偿这损失的，便是这册书里的几篇文章。我与刘熏宇相识后，他便做这些文章。他每次发表，我都读，诱我读的，是它们富有趣味的题材。我常不知不觉地被诱进数学的世界里去。每次想，假如从前有这样的数学书，也许我不会抛荒数学，因而不会相信那画理书上的话。”丰子恺还说，他对《数学趣味》这本书中的“韩信点兵”印象最不好。因为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杂志上时，丰子恺眼睛正闹疾病，医生叮嘱他千万别在灯下看书。丰子恺看到刘熏宇新发表的“韩信点兵”哪忍得住，当晚一口气就看完了。结果第二天，丰子恺的眼睛非常疼，只好再去看医生了。

即使是有高深数理学养的著名学者对刘熏宇的教学方法也是赞赏有加，如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1983年和香港中学生的谈话时说：“有一位刘熏宇先生，他是位数学家，写过许多通俗易懂和极其有趣的数学方面的文章。我记得，我读了他写的关于一个智力测验的文章，才知道排列和奇偶排列这些极为重要的数学概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教授在读书时就接触过刘熏宇的数学教育文章，甚至从中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谷超豪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刘熏宇的《数学园地》，它介绍的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作为闻名全国的数学教育家，刘熏宇的一生为贵州、为国家的教育鞠躬尽瘁。1967年，刘熏宇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 贵州中医药界泰斗王聘贤

王聘贤(1897—1965),名国士,字聘贤。贵州兴义人,少时随父迁居贵阳。贵州中医药界的泰斗。

1980年,明万历十九年(1591)内府写彩绘稿本《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十四卷,呈现在国家中医科学院古文献专家们面前。它的出现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它是国内现存古代彩绘本草中最为完整的稀世孤本。在此之前,世人公认的两部最权威的本草分别是《本草品汇精要》和《本草纲目》,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在很多方面比这两本书更加全面详尽,在药物炮制方面更是集大成者。《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被送到故宫博物院修复,古籍专家们一致认定它是明代宫廷藏书,被鉴定为国宝级古籍。

提起这本书,不得不让我们对一个人肃然起敬,他就是该书的捐献者王聘贤。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聘贤出生于贵州兴义,少年时,就读于兴义高等小学堂(笔山书院)。毕业后,他随父亲王华裔迁居贵阳,1911年毕业于贵阳南明中学。1917年,王聘贤赴日留学,初入早稻田大学;后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再入九州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王聘贤留学日本,本来是学西医的,却因为一场缠绕他一年多的疾病经历,让他改学中医。在九州医科大学医学部学习期间,王聘贤突然患了肠胃溃疡,经西医治疗无效后,王聘贤改求日本“汉方医学”(中医传入日本后的名称)名医木村先生,肠胃溃疡竟然得以治愈。王聘贤深感中医的神奇,于是立下志愿,

决定专攻中医，师从木村先生。

回国后，王聘贤没有立即返黔，而是在浙江、天津等地，师从近代中国名医张锡纯、何廉臣、张山雷等，悉心研究中医典籍并跟随行医。后来，他又辗转湘、鄂、川、桂各省实地采集和鉴识中药。每到一地，他都会虚心向当地中医名医求教，从而医术大进。1930年，王聘贤回家乡贵州行医，开始了他几十年悬壶济世的生涯。

作为贵州一代名医，王聘贤以孙思邈《大医精诚》中提到的“精和诚”来严格要求自己，做个良医是他一生的追求。王聘贤回到贵阳后，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的一家“生生药房”担任坐堂医生兼任药房总顾问。生生药房的老板名叫庾俊生，也是一名医者，且与王聘贤是多年至交。当年王聘贤年纪虽不大，但因医术精湛，名声极响，每天到生生药房的求医者络绎不绝，生生药房门庭若市。他每天14时至16时诊治病患，且只看三十个号牌，号牌总是早早就卖完。病患对王聘贤放弃现成的钱不赚甚为不解。对此，王聘贤说：“治病如绣花，要细要精，方有疗效，只对钱负责，三两分钟便打发病人，非良医所为。”坐诊行医中，他严格遵循传统中医美德，因病施治，从不为了索取高额医药费过度用药。病人上门就诊，无论贫穷富贵，他都一视同仁。遇到家贫的寡妇孤儿，他还经常免收诊金，甚至资助药费。王聘贤说：“医术之优劣，在实地经验，不在弋获虚名，医生之天职是保社会健康，不是谋一人之私利。”王聘贤还严格遵守药物检验制度，每个医方中每味药，都必须由有经验的药剂师逐一核对后，方可发药。他十分重视药材的采购、炮制等，并整理了常用药物四百余种，将各种药物的性质、功效及用法分别印在包装纸上，指导病人正确服药。生生药房因此而生意兴隆，与同济堂并驾齐驱。

王氏师出名门，学有根基，医术高明，用药考究。行医数十年，颇负盛名，对失声、梅核气、吐血、咯血、便血、鹤膝风、水肿、休息痢、慢惊风、崩漏、痛经、闭经等症尤为精到。他结合医疗实践，注意寻求医方，每有所得，即用蝇头小楷录在特制的红格本上，每页皆印有“聘贤医抄”字样，积四十年，得



医方近百万字，凡十八册。在治病过程中，他深感“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必须讲求药物质量，分辨其真伪、良莠、陈鲜，谨慎用药，每次开处方，必加“药物未经检验，拟方备用”字样。他还重视中医理论研究，对古籍考证、药物鉴别、舌诊研究尤有功力，对伤寒六经实质有独到见解，主张“不笃古遵经”“不崇玄说”，并撰写《伤寒论考评》《神农本草经研究录》《解本草纲目拾遗》《金匱蜘蛛商榷》《舌苔之研究》《儿科实验录》。王聘贤在采集全国地道药材及地方草药标本900多种的基础上，还编辑出版了《贵州民间药物》《贵州药用植物目录》《贵阳中医秘验方》《农村常用病中医简便疗法》等书。

医者仁心，王聘贤对贵州中医药的重大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深明大义，胸怀大局，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炸毁了大十字的德昌祥店铺“南药号”后，王聘贤将自己研制的“男用补天素”（今杜仲补天素丸）和“妇科再造丸”药方赠予德昌祥。两种药物药效奇佳，一投入市场即声誉鹊起，成为德昌祥的镇厂之宝。此举不仅让德昌祥得以起死回生，更缓解了市场的药品急需，药品还远销十九个省市。特别是妇科再造丸，它是王聘贤精研四大名方（乌鸡白凤丸、逍遥丸、四物合剂、六味地黄丸），取精华，去不足，创制而成的秘方，肝肾心脾同调，气血阴阳俱补，温养了几代妇女，也是抗战时期名媛淑女的闺中之宝。解放后，他在主持贵州中医研究所工作期间，建立了贵州最早的中草药标本室和中医药文献室，对贵州中医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聘贤一生嗜书如命，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特别是医书。他要是见到一本好书，会不惜代价将其买下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便是其中的一例。王聘贤在一次外出行医中，听说有人要出手一套明朝时期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博学博闻的王聘贤翻阅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深知此书是国家珍贵的医药典籍，不能再让其外流，于是不惜重金赎回此书。在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创建时，他将一生收藏的历代医学书籍、文献数千部，以及全部二十四史和大量的考据、参考书籍无偿赠送，供中医工作者使用，其中包括《补遗雷公炮制便览》。

王聘贤德高望重，解放后，贵州省人民政府聘请他担任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所长和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他还当选为贵州省和贵阳市中医协会负责人。1965年3月5日，王聘贤在贵阳病故，终年68岁。1986年，王聘贤子孙将其珍藏多年的华佗著《中藏经》和李时珍著《七经八脉》等一千三百余册珍贵医学文献资料，捐赠给了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王聘贤手迹



## 辛勤耕耘、诲人不倦的萧文灿

萧文灿（1898—1963），字曜寰。贵州赤水人。其曾任中国数学会贵州省贵阳分会理事长，1948年担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校长，是贵州西方近现代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开拓者。

萧文灿一生从事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留下了丰厚的成果。他在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教书育人30余年，有20多部译著问世，为贫瘠的西南地区引入先进的数学理论和西方科学教育理念，开拓了贵州近现代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的人才，使落后的贵州开始发展西方近现代数学的学术研究和数学的高等教育。

萧文灿出生在贵州省赤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知识分子，母亲娄氏贤惠善良，父母是萧文灿的启蒙老师。萧文灿从小热爱劳动，刻苦勤俭。萧文灿从赤水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贵州省省立贵阳第一师范学院。当时省立贵阳第一师范学院的校长是进步人士尹笃生，萧文灿被尹校长励精图治的精神所感，对于尹校长拒任县长的事也牢记在心。萧文灿也因而放弃了至少两次进官场做官的机会。第一次，1925年他刚从武大毕业，周西成（后任贵州省省长）聘他担任师部秘书；第二次，1940年他刚从德国留学归业，省主席吴鼎昌让他出任县长（任挑一县）。两次邀请都被萧文灿婉言谢绝，转而投身于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中。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他常说的那句话：“从事教育工作要有自我牺牲的蜡烛精神和甘当‘人梯’的高尚情操，才能终生安于教育而不见异思迁。”

无论在条件较好的母校武大，还是在偏远的西昌技专，或是抗日困难时期的女子师院，乃至他当上院长的贵阳师院，以及为新中国教育服务的贵州大学、云南大学等，萧文灿都把教育好学生放在第一位，是一位深受师生爱戴的师长。

1921年，在赤水县教育界前辈付凤珩的鼓励下，萧文灿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师从名师，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数学之旅。在大学，萧文灿攻读数学专业，成为著名数学家萧君绛的得意门生。肖君绛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他对近世代数、代数方程论、群论以及其他数学基础学科的钻研都很深，研究的内容属于近现代数学较为困难的基础研究，萧文灿学习这些课程都获得了优异成绩。时任数学系的系主任是著名数学家黄际遇，黄际遇对萧文灿勤奋好学的精神十分赞许，多次表扬其在数学上的天赋。1937年，萧文灿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数学研究院师从国际著名数学大师B·L·范德瓦尔登，主攻近世代数，并从事新兴学科赋值论的研究，学有所成。留德期间，萧文灿还考察德国国民教育情况，深入大学调研大学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还调研中学数学教育情况，研读有关教育资料，为回国后发展西南地区和贵州教育提供借鉴。1940年，萧文灿归国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萧文灿十分注重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工作理念，在数学研究上成就卓著。萧文灿一生创作和发表了18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创作出版了两本数学著作，编译出版了两本数学专著，并且还有9部创作和编译的著作没有正式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奠定了萧文灿的数学成就。萧文灿主要是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和《中等算学月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前者是学术性刊物，后者是普及性刊物。萧文灿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一共发表10篇论文，其研究内容和方向除了无理数理论外，还有不等式理论、向量代数、无穷大分析、集合论这四个方向。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无理数之理论》是萧文灿独立创作，长达36页。他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发表的论文有独立创作的，也有译文的，都是当时难度较大、较为高深的数学理论。在数学专著方面，1930年，他翻译了英国数学家哈代的专著《纯粹数学》；1933年，他译著的《威斯两氏大代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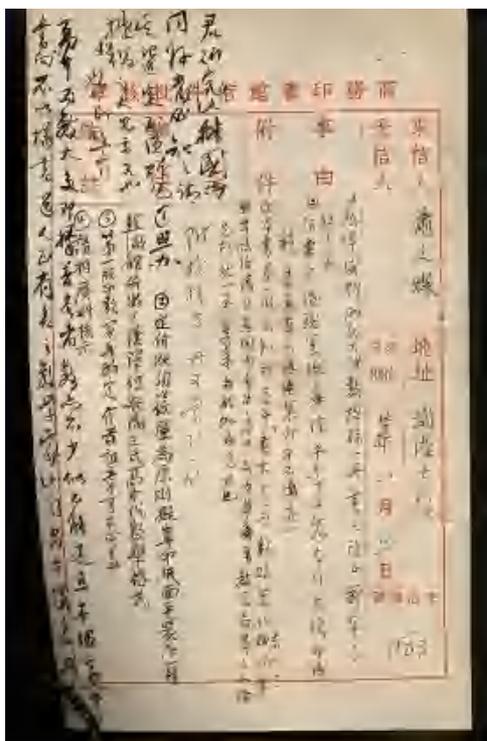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被许多大学采用为课本。而他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首推 193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集合论初步》，这是我国第一本集合论著作。1950 年此书再版，印刷数达到 28000 册，是当时的畅销书，各高校都采用，且受读者喜爱。1992 年，数理逻辑专家张锦文指出：“萧文灿的《集合论初步》对中国数学界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部集合论经典著作，这本书既通俗，又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实在是一本好书！”萧文灿的门生严栋开教授评价说：“《集合论初步》虽书名初步，然此书写得相当深入，绝非科普读物，但又容易懂，可读性极强。即使用 90 年代的观点来衡量，也是一本优秀的读物，这是因为作者功力深，目光远，将此门学问融化在心中，于是下笔如神。”

此外，萧文灿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1950 年，他受中国数学会之托，筹组中国数学会贵州省贵阳分会。1951 年 1 月，中国数学会贵阳分会宣告成立，萧文灿当选为第一任贵阳数学会理事长。1951 年 8 月 15 日至 20 日，中国数学会临时干事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萧文灿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代表有 78 人，选出华罗庚、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曾昭安、萧文灿等 21 人为中国数学会第一届理事。

1948 年春，教育部派萧文灿担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校长。他到任后，通过多种渠道延聘外地教授、讲师，千方百计筹措款项将已停工的图书馆、理化楼建成，添置中外图书和仪器设备，不仅为提高教学质量做了必要的师资和物质准备，更使师生们充满了希望。当他作为校长第一次跟全院学生见面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对大家有三点希望：一是学习，二是学习，三还是学习。”半年后，他会同全院教师一起凝聚集体智慧，提出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办学方针，形成了上下一心办好师院的氛围。师院的办学方针是：以新作风培养新校风；提倡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注意实事求是；以及经济公开、廉洁、实效、关心、团结、服务师生等。作为一院之长的萧文灿十分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1949 年 7 月，教育部在广州召集高校负责人开会，领到了一笔临时措施经费，按当时币值折算合黄金 100 两。他及时组织五人小组专门管理经费，费尽周折

将纸币换成银圆或黄金存入可靠商铺，按月取息发放员工工资直至解放。面对物价飞涨，则将早期购买的大米、食盐及时运回师院存放食用，保证了学生的伙食。临近贵阳解放，形势紧张，萧文灿及时组建师院师生员工互助委员会，清理全院物资财产，保管好重要物资和档案。师生白天上课，晚间巡逻，秩序井然直到解放。通过这些举措，贵阳师院成为贵阳解放前能保证员工工资，能使学生吃饱饭的学校。萧文灿也因此被教职工誉为“师院灯塔”。萧文灿在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最为困难的时期担任校长，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他努力把学校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于今天的贵州师范大学来说，应该记住这位伟大的校长，他的精神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底蕴所在。



萧文灿手迹



## 古生物地质学家乐森琚

乐森琚（1899—1989），字季武。贵筑县（今贵阳）人。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5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首批232名学部委员的名单，黔籍地质学家乐森琚名列其中，跻身共和国科技精英之列。

乐森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于贵阳普定街乐家大院。清末民初，在贵阳有“乐家才子，华家银子”的说法，乐氏家族颇为显赫。其伯父乐嘉藻曾在京参与公车上书，后任贵州省咨议局议长、教育总会会长、贵州大汉军政府枢密员，系贵州著名教育家。其父乐嘉荃系光绪年间秀才，工于诗书，精于鉴别，亦文亦商。其长兄乐森璧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后考取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留学美国攻读化学。

乐森琚自幼受家庭的熏陶，有良好的文化底蕴。1918年，乐森琚由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生进入北京大学。因受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查于地理”的启发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他由预科数学系转入地质系，师从著名学者李四光、何杰、王烈及葛利普等教授，毕业后获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他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当实习生，自此毕生从事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工作。

1927年夏，乐森琚在西南地区做地质调查研究，采集标本200余种，并



乐森琿

在遵义董公寺、十字铺之间发现“十字铺页岩”。这种页岩夹有少量鲕状灰岩，系乐氏首次发现。此次调查后他写成《贵阳附近之二叠纪肋形贝动物群》等论文，对以后探明贵州矿产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次年冬，乐森琿被中山大学聘为地质系讲师，并参与地质调查所工作。教学之外，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实地调查，撰写出《广西南丹、河池、宜山、马平、象县地质矿产》等论文，被中山大学聘为地质系副教授。

1934年，乐森琿赴德国，先后在柏林外侨德语学院、格廷根大学、马堡大学留学，用德文撰写了《中国南部广西省中泥盆世四射珊瑚群》一文，赢得国际地质界的公认，并获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仍任教于中山大学。他于七七事变后回黔，担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为贵州煤矿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地质资料的支撑。

贵州矿产探测团成立后，乐森琿被聘为探测团团长，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蒋溶、罗绳武等技师，深入贵州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共采获矿物岩石、化石标本2000余件，编制报告16种，绘制地形及矿区图30余幅、地质剖面图60余种。根据中国地质人才的现状，乐森琿撰写了《地质学在矿产探测中之应用》一文，呼吁国家多设立地质机构，在大学中建立地质专业，培养地质专业人才，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重视。在乐森琿、丁道衡等黔籍地质学家的长期努力下，贵州大学于1943年设立了地质系，延聘丁道衡为地质系主任，罗绳武、谌湛溪、周德忠等教授负责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学生，为中国地质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乐森琿在贵州省建立了贵州矿产测勘团，与蒋溶合作研究贵州省的地质及矿产，探明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金、银、铜、铁、铝、锰、铅、锌、汞、煤等），强调贵州省的煤、铁、汞、铝四大矿产资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他任职于贵州地质调查所，绘制了《贵州地质略图》和《贵州矿产分布图》。他常说“若全省各地地质都调查完竣，则吾死亦愿足矣”，其对家乡地质事业的深情溢于言表。

新中国成立后，因乐森琿在地质学界及教育界的影响，他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还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此后他更加专注于古生物学、珊瑚和地层学科的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组建黔西探矿队，带队进驻水城实地调查勘测，完成了《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初步调查报告》，成为以后建立水城钢铁厂的主要依据。

1953年，乐森琿执教于重庆大学。他带领学生在川西龙门山调查泥盆纪地质构造时，在一座寺庙的台阶石上，首次发现了胴甲目节甲鱼化石，轰动了中外古生物界，这种化石被命名为“乐氏江由鱼”。他还撰写了《四川龙门山区泥盆纪地层分层分带及其对比》，解决了川西地区泥盆纪形成的问题。

1955年，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专业，经李四光推荐，乐森琿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曾任地质学教研室主任和古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兼任地质学系主任，1964年任地质地理系主任。1978年起，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地理系分开，他担任地质学系主任，直至逝世。其间他参与编写《中国标准化石手册》《中国地层表草案》等著作，讲授“地史学通论”“生物地层学概论”“矿产地层学”等重要课程。他是中国研究珊瑚化石的早期学者之一，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提出分类学与系统演化方面的重要理论。

1981年，他以82岁高龄兴致勃勃地飞往贵阳市，在贵州省委和省科委举办的“自然科学讲座”上做了题为《贵州煤矿研究史》的报告，认为贵州省地下资源富饶，贵州的矿产开发大有可为，并一再表示愿为开发贵州省的自然资

源尽力。他对地质科学的挚爱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感人至深，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豪迈地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为祖国培养地质科学人才而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乐森璿在地质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在教学方面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国古生物学学会会长、第三十二届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1982年，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获得“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周年”纪念奖章。1985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从事科技教育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

1989年2月12日，乐森璿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0岁。



## 贵州地质“活字典”罗绳武

罗绳武（1899—1969），字幼梅。贵筑县（今贵阳）人。地质学家。

贵州开阳磷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开磷集团”）的前身是开阳磷矿，为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全国三大磷矿石生产基地之一，于1958年开始建设，当年被周恩来总理赞为“三阳开泰”。195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三阳开泰》为名，报道贵州开阳（开阳磷矿）、云南昆阳、湖北襄阳三大磷矿基地的资源及建设。“三阳开泰”由此扬名。

今天的开磷集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集矿业、磷化工、煤化工、氯碱化工、氟化工、硅化工、贸易物流、建设建材、物业服务等多元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最大的磷矿石地下开采企业和磷肥行业“三强”企业之一。开阳磷矿的发现者，正是我国知名地质学家，我省地质矿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罗绳武。

### 一、贵州矿业的拓荒者之一

翻开《开阳磷矿志》，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53年，省工业厅罗绳武在金顶山新土沟发现磷矿，并得到证实。”地质学家罗绳武，1919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后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师从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和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诸先生。1925年，罗绳武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返回贵州工作，专事地质，历任贵州省农矿厅、实业厅、建设厅、地质调查



罗绳武

所技正。他带人先后勘察和发现了梵净山印江地区的金矿，万山的汞矿，贵筑和修文的铝土矿，遵义和湄潭的锰矿，威宁、赫章、水城的铅锌矿和铁矿等。

1941年，罗绳武等在黔中地区的云雾山、王比、修文小山坝等地发现了贵阳地区铝土矿。1943年，又于清镇发现铝土矿。现在贵州全省探明的铝资源量的78%集中于此。

解放后，罗绳武遵循章鸿钊“中国之地质调查事业，完全以教育事业做基础的。调查事业无论是开创时代，或是守成时代，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专门人才非由教育不能产生”的训导，

于1951年、1953年、1954年在贵阳开办了三期地质干部训练班，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地质技术骨干。1958年，贵州工学院成立之始即开设地质系，省人民政府专调在省地质局任总工程师的罗绳武任地质系主任。1959年，罗绳武对贵州大地构造进行详细总结。1964年，国家地质部第四石油普查勘探大队以罗绳武的阶段总结成果，编著出版了《滇黔桂石油地质图集》。罗绳武主编了《贵州省岩相古地理图》《贵州之铝土矿》等著作，撰写了大量的地质矿产调查报告，被誉为贵州地质的“活字典”，是贵州省地质矿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贵州的地质事业和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被评为“一等工业劳动模范”。

## 二、发现全国著名的最富特大型磷矿——开阳磷矿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1953年春夏，罗绳武在遵义金顶山脚牛蹄乡之北两公里处的滥田坎，首次发现磷块岩，揭开了贵州省磷块岩矿床勘查工作的序幕。当年又在开阳发现磷矿。

1953年春夏，在省工业厅地质勘测队担任队长、工程师的罗绳武，首先



在遵义市西金顶山脚牛蹄乡之北两公里的滥田坎处发现了磷矿石，并于当年7月，编写了贵州第一份磷矿产出资料——《新发现遵义区磷矿简报》，首先报道了贵州磷矿的发现。他在《新发现遵义区磷矿简报》中对发现贵州磷矿始末做了详细记载：“1938年冬，昆明耐铍铜厂因需耐火材料甚急，派人多处探寻，结果闻昆明县属之中邑村产白泥，试之亦能耐火，乃派人采取万余斤到厂。在1939年春，经地质人员前往调查，又经分析结果，始知为磷矿。此为中国内地（西南地区）首次磷矿的发现，轰动一时。20世纪50年春，笔者调查遵义锰矿时，即拟往探，嗣因解放初期，土匪滋扰未果。在1951年闻四川（金河）在同样地层中，亦寻获磷矿，亦增加本已的信心，确定遵义区的下寒武纪地层底部，能寻获磷矿。同年春夏间，查勘遵义水电工程地质时，乃往遵义城西的下寒武纪分布区域，牛蹄塘一带往探，先后取样数十斤回省，化验结果，证实不谬。”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贵州省地质队工作过的开磷集团退休职工朱维忠，讲述过罗绳武发现开阳磷矿的经过：“当年罗绳武老先生乘滑竿去成都开会，因中途太热，滑竿就停在一片松树林边休息。罗绳武站在树林中观山形，审地势，突然间叫随行的工作人员提着地质锤上山去敲了几公斤石头，带回贵阳去分析研究，研究结果就是发现了开阳磷矿。”

根据新中国初期国家对煤、铝、磷等矿产资源地质勘测的任务和部署，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底将省工业厅地质勘测队撤销，并于1954年初成立省工业厅地质勘测处，由罗绳武任副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该处以省工业厅地质干部训练班毕业生为骨干，先后组建了五支地质勘测队，其中第一地质勘测队由原来的省工业厅地质勘测队更名而成。1954年底，省工业厅地勘处第五勘探队磷矿普查组中的赵应祺、曹金弟等人，按照罗绳武的指示踏勘，发现了开阳磷矿“上磷矿层”后，于1955年11月撰写的《开阳磷矿踏勘简报》载：“根据罗绳武工程师的指示，发现磷矿层分布于洋水背斜的两翼，采样化验结果五氧化二磷（ $P_2O_5$ ）含量甚高，矿层延长约20公里。”

1957年3月，省工业厅地勘处第五勘探队编写的《开阳洋水磷矿石笋沟

矿区 1956 年地质工作总结》记述：“1955 年，贵州工业厅地勘处派赵应祺、曹金弟等前来本区工作 20 余日，了解情况，发现下寒武世磷矿层。在此基础上，1955 年 11 月，地勘处又指派冯济舟等组织普查队来本区工作，发现‘下磷矿层’，地质储量 9580 余万吨，事后写有《开阳洋水矿区普查报告》。”

省地质矿产厅调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专家韦天蛟，在其专著《107 种矿产专述——贵州矿产发现史考》中，这样叙述罗绳武及赵应祺、曹金弟、冯济舟等人发现开阳磷矿的经过的：“自遵义磷矿被发现后，根据罗绳武对含磷地层及构造的分析研究，预测认为开阳地区会有磷矿的产出。为此，省工业厅地勘处于 1955 年 5 月，指派赵应祺、曹金弟等人组成踏勘组，前往开阳洋水一带进行找矿勘查，从而最先发现了该区的‘上磷矿’。省工业厅地勘处紧接于 1955 年 11 月，派出冯济舟等人（普查队）前往进一步勘查，进而在用沙坝一带（首先在用沙坝北面马脑壳、龙洞湾）发现‘下磷矿’的存在，从而使开阳磷矿得以发现。”

开阳磷矿发现并初步评价后，贵州地质局开阳队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对矿区进行了全面普查勘探，扩大了发现范围。1958 年 6 月完成勘探工作，正式探明了磷矿丰富的储量（约占当今全国磷矿总量的 78%）。自此以后，贵州地质局 102 队、贵州化工地质队等单位，相继对矿区进行工作或补充勘探，探明磷矿储量有进一步增长。众多的勘查结果表明：开阳磷矿为“全国最富特大型磷矿产区”。

罗绳武凭借丰厚的科学专业知识，为贵州的矿产事业鞠躬尽瘁。他既是开阳磷矿的发现者，也是贵州矿业的拓荒者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贵阳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是由阳明祠、尹道真祠、扶风寺两祠一寺组成的古建筑群，院内尹道真祠的享堂内环壁上，挂着对贵州开发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贵州二十四名人”的水墨肖像画，罗绳武便在其中。

在贵州开磷集团（原贵州开阳磷矿）成立 54 周年和罗绳武 113 年诞辰的时候，开磷集团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今天的开磷人正在以“负



重攀越、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实现开磷集团第二个“三步走”发展战略高歌猛进。这应是开磷人对贵州地质矿产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地质学家罗绳武和其他发现者的最大慰藉！

## 光明使者花莱峰

花莱峰（1900—1966），字蓬瀛。贵筑县（今贵阳）人。电机工程专家、教授。

1918年，花莱峰毕业于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由贵州省财政厅公费派往日本留学。他先是在东京补习日文、英文，1920年考入福冈明治专门学校学习电气工程；1925年毕业归国，任江苏戚墅堰发电厂工程师，负责发电设备维修；1926年初辞职返回贵阳，服务地方。

民国初年，贵州向美国购买了一套75千瓦的发电设备，准备在贵阳开设



电厂。后因政局动荡，这套设备一直搁置在镇远。1926年，贵州省省长周西成决定在贵阳建设电厂，并于同年9月成立贵州电气局筹备处，任命花莱峰为省城电灯筹备处主任兼总工程师。多年搁置在镇远的发电设备，其机器早已锈坏，而且配件丢失严重。但建设电厂，必须将这套设备运回贵阳。当时贵州没有公路，镇远至贵阳只有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小道，发电设备的运输只能靠人抬马驮。花莱峰亲赴镇远，组织人工，费时数月，终于在1927年将发电设备运回贵阳。花莱峰主持机器的修复工作，

花莱峰



在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专业的刘守愚的帮助下，他们重新绘制锈坏或丢失的配件图纸，就地加工制造，将发电设备修复安装，于当年的9月10日开机发电，贵阳城开始有了电灯。贵阳人第一次享受到“电”带来的光明，全城百姓对于这个稀罕物的到来兴奋不已，津津乐道，花莱峰这个名字由此被贵阳人熟知。

1928年2月，花莱峰任贵州电气局总技师，次年任代理局长。1930年，电气局划归贵州省建设厅，花莱峰的工作也转至建设厅任技正、贵阳电灯厂厂长。与此同时，他也在贵阳私立达德中学、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贵阳私立毅成初级中学等中学任教。同年，他参加中国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团，考察美国的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状况。在贵州建设厅工作期间，他主管公路建设兼任督工处处长，修筑川黔公路赤水威宁段。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日寇在湖南、广东、广西边境集结强大兵力，准备向西推进，包围重庆。为了更好地调运兵力和物资，国民政府决定抢修几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公路，其中就有贵州三穗至广西桂林的桂穗路。当年3月，花莱峰受命为桂穗路三靖段段长。三靖段起于三穗，东至天柱，再南向锦屏与湖南靖州公路连接，全长136公里，为盘山公路，跨河27处。花莱峰到任后，聘请工程人员，组织贵州三穗、镇远等7个县的5万民工，风餐露宿，饱尝艰辛，加紧施工。1941年7月，三靖段如期竣工。

不久，花莱峰转入教育界，先后在贵阳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贵州大学电机系、安顺工业职业学校任教，并创办平坝毅成中学。1943年，贵州大学工学院一部迁至安顺，与安顺实用职业学校合并，改为贵州大学附属工业职业学校，花莱峰任校长并亲自兼任机电工程教师。1945年，其专任贵州大学教授，兼任贵州大学电厂厂长。1949年11月贵阳解放，花莱峰任贵州大学总务长。1953年，花莱峰调往云南大学任教。1954年，其调任昆明工学院电工教研组组长、教研室主任，教学电工学、矿山电气设备等课程。此后，他便一直在昆明工学院任教。在教学上，花莱峰是一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

他在教学直流电机、电工学、矿山电气设备等多门课程中，结合实际、讲解生动，受到学生们的赞许和爱戴。

1966年10月19日，花莱峰在昆明去世，享年66岁。



## 当代女书法家萧娴

萧娴（1902—1997），字稚秋，号蛰阁，自号“枕琴室主”，自署“黔南萧娴”。贵筑县（今贵阳）人。当代女书法家。

广州是我国接受西方文明较早的城市，1915年就建成了12层高的大新百货大厦。大厦落成之日，萧娴随父前往祝贺，写了一副一丈二尺长的巨联，上书“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字体雄放劲健，气派大方，众皆惊讶。她又当场书“壮观”两个大字，端庄秀雅，人们见她只是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不由得拍手叫好。此事在广州引起轰动，她被誉为“粤海神童”，广州宝化照相馆挂出了她的照片，题为“女书法家萧娴”。

其实，萧娴并非“粤海”之人，而是来自西南大山中的贵阳，家住城内金井街（今富水中路）。父亲萧铁珊为贵阳名士，精于诗文书法，是爱国团体“南社”成员。萧娴母亲早逝，3岁时便随父到广州。清宣统三年（1911），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年幼的萧娴便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她常随父亲参加柳亚子、陈去病等组织的南社活动，被称为“南社小友”。孙中山在南社笔会上偶然遇到萧娴，破格把她发展为国民党“特别党员”。

萧娴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宣扬民主、提倡女权，打破了千百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她8岁时即自弄笔端，13岁时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油画，又师从岭南画派名师高奇峰学画梅花，19岁时成为广州书法社会员，书法已见功底。她临写的篆书《石鼓文》、



萧娴

隶书《石门颂》、楷书《石门铭》和金文《散氏盘》都很出色，曾应邀与谭延闿、高剑父等名宿一起为二沙岛风景区题写碑刻。她父亲的友人将萧娴临写的《散氏盘》册页带到上海，册页辗转传到康有为手中，康是碑版体书法大家，见后称赞不已，欣然赋诗，诗云：“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雄。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坵坛。”他认为萧娴书法造诣极高，堪与晋代女书法家卫铄和元代女书法家管道昇并论，可谓“卫管重来”。萧娴后来随父到上海，拜康有为为师，书法更加精进。

1927年，宋庆龄在广州组织书画义卖，筹款支持北伐，萧娴的作品最为畅销，宋庆龄亲自给她颁发了奖章、奖状。萧娴到香港后，辛亥元老、书坛巨擘于右任在报刊上著文介绍“女书法家萧娴”，称其“行楷精良，篆隶奇古”，是“卫



管复生”“女书家中，实罕其匹”的奇女子。萧娴才华横溢，声名远播，在20世纪20年代即成为独步书坛的女书法家，南京、上海、广州、香港的报刊上常刊登其作品，其作品还被收入《海上名人书林》。

1923年，萧娴与德国留学生江达结婚，从此定居南京。江达是工程技术人员，耿直清高，不慕功名，与萧娴情趣相投，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抗日战争爆发，她由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九江、重庆、成都，颠沛流离。她在成都偶遇金陵大学教授王东培，王东培善画野梅，以行草笔法入画，两人成了忘年交，在成都举办了王东培、萧娴书画展。抗战胜利后，她与江达一起回到南京。

1949年南京解放，萧娴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4年，经章伯钧推荐，萧娴与江达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她将南京玄武湖畔的房屋捐出，在百亭子后建小屋两间，小屋周围竹篱环绕，种有桂花、蜡梅、葡萄，将其命名为“枕琴室”，自号“枕琴室主”。

“文化大革命”后，萧娴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她奋笔疾书“明月千家满，春风一夜来”。此时她已年逾花甲，逢盛世而书法益精，她说：“娴老矣，而书尚不能老，若天益以寿，更奋十年秃笔，则书之老境庶几可及。”心情舒畅，时间充裕，受人尊敬，使她的书法创作迈向艺术高峰，进入创作的辉煌时代。她曾受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当选为江苏省书法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与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合称“金陵四大书家”。

萧娴幼年即离开贵阳，数十年不忘桑梓，作书每落款“黔南萧娴”。1983年，她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贵阳举办书展，恰逢南京电视台为她拍摄艺术专题片，白头还乡的萧老心潮澎湃，赋诗一首：“年年江表度重阳，老去他乡念故乡。想见娄山关山雁，正街明月叫晨霜。”她用篆、隶、行三体写了“真”“善”“美”三个逾丈大字，表现了她的书法特点和艺术追求，又奋笔写了“飞檐甲天下，落影秀寰中”，把“甲”“秀”二字隐含其中。1991年，她再次回到贵阳，将平生书法精品百余件“敬献故乡人民”。1993年，萧娴先生书画陈列馆揭幕，她带着孙女和学生第三次回到贵阳，并于次年在贵阳出版《萧娴先生书法集》。

1997年，萧娴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南京文艺界为之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悼词中说：“萧老的人格精神和艺术作品，都是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的遗产。”



## 贵州国画家宋吟可

宋吟可（1902—1991），原名荫科。江苏南京人，1945年定居贵阳。他长期在高校执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宋吟可出生于江苏南京，15岁时因家贫辍学，到上海学徒，在商务印书馆绘图室当练习生，学习绘制卫生解剖挂图。为了生计，他还画过月份牌、招牌广告等，这些经历为其绘画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30年代，宋吟可流寓广西，任桂林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的画风已初具个人风貌，其工笔仕女在黔桂川滇地区已有很高的知名度。

1942年，宋吟可在桂林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壮士磨剑图》《屈子行吟图》《王昭君》《霸王别姬》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作品，深得柳亚子、田汉等文化人士的大力夸赞，并著文作诗高度评价。1945年初，宋吟可从广西到贵州，定居贵阳，以绘制商标、图案及卖画为生。1946年，他结识了王渔父、孟光涛，先后在贵阳和昆明举办三人联展，翌年又与王渔父在重庆举办二人联展，一时名满西南。

195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成立，宋吟可担任该社美术编辑组组长，常到生产第一线去画年画、门画，做群众文化普及工作。至1953年，宋吟可多次下乡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画出连环画30多套，收集速写千余幅。他创作的连环画《苗汉儿女》《虎口屋》《蔓萝花》和年画《苗家娃娃上学了》《好好学习，



宋吟可作品 《梅花》



争取戴上红领巾》等，出版后都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他参加的省文联协会年画集体创作，为贵州夺得文化部年画评奖的集体一等奖。宋吟可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方针，多次深入贵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一批反映苗、侗、布依、白、傣等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的《妈妈您看我在开拖拉机》《打蓑衣迎春耕》《磨镰刀》三幅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处藏有其绘画。宋吟可的成名之作是绘于1954年的《妈妈您看我在开拖拉机》，作品描绘了两个布依族小孩利用竹椅、竹耙模仿成人开拖拉机，以及妈妈劳动归来对之投以赞许目光的生活细节，是新中国涌现的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人物画之一，被国内十几家报刊发表，又被印成年画大量发行。1956年创作的《绣和平鸽》，描绘一布依族姑娘坐在柳枝轻拂、桃花盛开的农家小院中，她手握绣针，一边看着眼前的两只白鸽，一边把它们绣在布片上。作品笔墨清丽，情趣盎然，生活气息浓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编入《百年中国画集》。此后，宋吟可又陆续有许多描绘民族风情的佳作问世，如《池畔》《芦笙舞》《夜歌图》《上学之前》《春江花月夜》等，有的作品反复画过多次，足见他对此类题材的喜爱。除了少数民族风情，宋吟可还画过《苗族人民抗清斗争》《毛主席接见苗族游击队员》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反映了他创作大型绘画作品的的能力。

1957年，宋吟可调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授；1958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越南；1959年，贵州民族学院撤销后，任贵州大学艺术系教授。

1956年之后近十年的艺术创作实践活动，是宋吟可取得成就的十年。由他亲自绘制或经他修改出版了数十种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斗争的画册，如《活捉匪首曹绍华》《孙占元和易才学》《独臂英雄李安家》《擒匪记》等。其中，他绘图的连环画册《红军家属陈大妈》获得西南地区文艺作品一等奖。

1978年，邓颖超访日，特请他画花卉、人物各一幅，作为国礼赠送日本政要。1979年，北京荣宝斋在日本举行画展，展品中有十幅宋吟可的作品，受到日本观众好评。1980年起，宋吟可任贵州国画院院长，曾为人民大会堂、人民日报

社等作画，并在北京饭店举办个展。

宋吟可是贵州当代杰出的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在中国美术界享有盛誉。其国画以人物为主，兼工水牛、花鸟，也偶作山水。宋吟可早年主要画仕女和仙佛人物，受唐寅、仇英、费丹旭、任伯年影响较深，也吸取了西画的一些技法，其作品造型准确，笔墨隽秀，设色雅致，为藏家所珍爱。宋吟可代表作有《醉八仙》《探梅图》《相马图》《渔妇晓妆》《霸王别姬》《屈子行吟》等，除了人物画之外，画梅和画牛是宋吟可常画的题材。他画梅讲究形式，穿插得体：看老干，虬如苍龙，樛曲万状，皱鳞苔藓，铁骨铮铮；观新枝，如锷如剑，枝梢挺拔向上，直刺苍穹。大雪隆冬，地冻天寒，枝梢横斜，朵朵寒梅或含或放，净洁如玉，四溢馨香。“但愿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他常借诗题署，表达自己的胸臆。他的梅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炉火纯青境界，是其一生艺术的高峰。他画牛，深悟传统画理中的“虚无之道”“无画处须有画”的哲理，画牛从不染水，“画中之白正是画中之画，也即画外之画也”。

宋吟可对贵州人物画的贡献，还表现为他长期在高校执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今天活跃在贵州画坛的一批人物画家，如陈敦品、杨抱林、黄天虎、杨小吾、何伊华、丁国才等，都是他的弟子。

1991年2月，宋吟可去世，享年89岁。其有《宋吟可国画选》《宋吟可国画集》《宋吟可画集》《宋吟可作品选集》等出版作品。



## 苏州园林的守护者谢孝思

谢孝思（1905—2008），字仲谋。贵筑县（今贵阳）人。书画家，苏州园林修复的先行者。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孝思生于贵阳城南太子坡（今石岭街）“谢家花园”，自幼受到书香熏陶，喜诗词、书画。他在正谊小学、达德中学就读时，书画得贾仲民、马啸澄先生指点，黄齐生先生亲为其指引人生道路，他的人格道德、立身行事受黄齐生先生影响至深。1928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现代著名大画家吕凤子先生的高足。1933年，他毕业回贵阳，在达德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师范学院任教。1935—1938年，他出任达德学校校长，继承和发扬“达德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谢孝思任“贵阳抗日救国会”总干事，当时宣传抗日的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都设在达德。

1938年，黄齐生先生从延安考察归来，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受到当局仇视，黄齐生和谢孝思师生二人被迫出走云南。不久，吕凤子主持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江苏南京迁到四川璧山，自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召谢孝思前往协助办学，并聘黄齐生为文史教授，二人又将“达德精神”带到正则艺专。1942年，谢孝思与刘叔华结为夫妇，二人志同道合，诗画共进。他后面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1946年随校迁往苏州，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务委员、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从此定居苏州。

谢孝思学识渊博，长于诗词、书画。他的画将诗情画意熔为一炉，形神兼备，



谢孝思

构图新颖，造型优美，意境深远，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尤擅工笔，所画《卢雁》《秋艳图》《柏园森森》《黄山松》及“梅花十万张”颇受称赞。他书法功底深厚，以篆为主，间以隶、行，字体苍劲古朴，新奇别致。在苏州这个文化厚重、文士如云的地方，谢孝思以其道德文章、书画艺术，赢得了苏州文化界的赞誉与尊重。1949年，他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副主席，前后连任八届，长达三十八年。其间，他兼任苏州市文教局局长、文化局局长、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文联主席、江苏省美协副主席及民主促进会

苏州市委副主委，改革开放后又任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及苏州市委主任委员等职。

谢孝思在苏州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苏州园林的修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名园须长留天地间”，1951年遂向政府提出恢复苏州园林的计划，并任园林修整委员会主任。他经过认真察访、精心研究，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了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四大名园”，以后又修复狮子林等三十多处园林。寒山寺是苏州古刹，在唐代极负盛名，张继《枫桥夜泊》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清代贵阳人陈夔龙任江苏巡抚时曾重修寒山寺，几十年后又是贵阳人谢孝思重修寒山寺，留下“人物风流两贵阳”的佳话。1997年，留园等“四大名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苏州又有五处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谢孝思主编的《苏州园林品鉴录》精辟地概括了苏州园林的特点，向世界宣称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件瑰宝”，是“富有文化历史和诗情画意的综合艺术”。2004年，在谢孝思先生百年华诞之际，《姑苏晚报》连续三天推出了《世纪老



人与千年古城的对话》，饱含深情地介绍了谢孝思先生的一生，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谢孝思对苏州园林修复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文章指出：“为了保护这座古城，无数人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而最不能忘记的古城守护者，就是谢孝思先生。”

谢孝思与刘叔华虽然长期寓居苏州，而乡恋之情弥深。谢孝思在《槿花楼诗文集》中写道：“定居苏州五十余年，而乡音未尝一日改变，乡思未尝一日去怀。”忆昔日往事，他写了《我的家庭和幼年》《进步的达德学校史略》《黄齐生先生和他的教育思想》。刘叔华的《故乡行》诗云：“垂垂入老境，依依恋故园。远去八千里，别来四十年。言归今偿愿，欢心何可宣。”近二十年来，两位老人多次还乡，并将书画作品数十幅捐赠故乡，在达德学校旧址设“谢孝思刘叔华先生书画陈列馆”。他们晚年拟回贵阳居住，然心愿未了而刘叔华仙逝。谢老回苏州后，于2008年病故，享年103岁，骨灰一半撒在太湖，另一半撒在贵阳黔灵湖。

## 人民的“营养师”罗登义

罗登义(1906—2000), 贵筑县(今贵阳)人。全国著名的农业生物化学家、教育家。

关于贵州野生刺梨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和《中药大辞典》均有记载。刺梨被誉为“水果之王”“维C之王”“贵州金果”等,因维C含量高,一直受到大众青睐。说到刺梨,一定会让我们想起出生贵阳的中国著名生物化学家、



罗登义

教育家罗登义。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罗登义出生于贵阳城区一户清贫的书香人家。其父罗勋元乃清末拔贡, 罗登义5岁即接受启蒙教育, 在家中由父亲传授蒙学书籍, 稍长入贵阳模范小学就读, 后转入三育小学, 小学毕业后考入贵阳南明中学。1922年, 罗登义中学毕业后, 根据其父安排, 赴北京报考法政大学。赴京途中, 一路看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物质贫乏、食不果腹、营养不良, 他最终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选择了北京农业大



学，攻读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专业。从此，“让民众吃上富有营养的食物，国民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事业，他也走上了与民众健康直接相关的农业生物和营养学研究的道路。

## 一、家乡情怀服务桑梓

罗登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1935年，他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37年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时值神州大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其断然放弃了留美的优越条件，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毅然返回祖国到北平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罗登义应邀受聘为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几经辗转，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贵州的湄潭，罗登义也随之回到了土生土长的贵州，在湄潭工作生活了七个春秋，主讲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和食品化学三门课程。

1947年，罗登义被贵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农学院院长。同年，联合国拟聘请他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顾问，但他看到国家尚处于动乱之中，报效祖国的心愿未实现，再次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留在国内艰苦的教学科研岗位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召其回校，他考虑到贵州急需建设人才，于是决定服务乡梓，留下来建设家乡，从此扎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为发展家乡的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耕耘奋斗一生。他曾作诗《家乡恋》以言心志：“生我育我好贵州，气候温和，山水清幽。地下蕴藏丰富有，金碗叫化，愚者蠢忧。勤劳人民应振奋，智力开发，兴工兴农。雄心壮志岂能休，暂时穷困，何惧何愁。”

## 二、研究营养造福大众

罗登义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七十余年，一贯主张科研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早在1928年他就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因当时国穷民困，百姓食不果腹，身体素质极差，他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大都围绕如何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和营养水平而进行。涉及内容有农民膳食中的豆类、瓜类、水果、蔬菜、稻米、杂粮等

农作物的营养价值，研究地域遍及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杂粮蛋白质的补缺作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即《高粱蛋白质之研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他就开始了生化营养的研究工作，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营养问题。1931 年至 1935 年间，他发表了《窝头之现代营养学识观》《北平农民膳食之营养问题》《华北膳食之蛋白质》等 10 多篇论文，出版了《蛋白质之营养化学》一书，对于改进工农大众的蛋白质营养寻找出一条新的途径。

二是微量元素与维生素的生成。20 世纪 40 年代，他致力于微量元素与维生素的生成研究，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载于国内外各学术刊物上，这项研究成果对于提高蔬菜的营养价值具有新的指导作用。三是发现维生素 C、维生素 P 之王刺梨。浙江大学在战时西迁贵州湄潭办学 7 年。正是这 7 年，罗登义在生化营养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奠定了他在生化营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罗登义在西迁办学的艰苦条件下，对 170 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生长在贵州山间毫不起眼的刺梨有着极为丰富的营养价值，是维生素 C、维生素 P 之王。他在对比分析研究中得出：每百克刺梨果肉中，维生素 C 平均含量 2391 毫克，高出猕猴桃约 9 倍、綦江红橘约 100 倍、梨子苹果约 500 倍……维生素 P 含量 5981 毫克至 12895 毫克，高出柑橘类约 120 倍、蔬菜类约 150 倍，在所有水果中，高至 60 倍不等。罗登义还通过生理试验，得出人体对刺梨的吸收利用率高达 70% 左右，正常人每日吃半个刺梨即可满足维生素 C、维生素 P 的生理需要的结论。在研究刺梨方面，他前后发表论文近 10 篇，主编出版《刺梨》专集。后来，罗登义在《刺梨的生物化学》研究论文中激动地写道：“真是天赐吾人养生的新山珍！”罗登义对刺梨的研究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震动了当时的学界，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将刺梨以罗登义的名字命名为“登义果”。

四是建设贵州农业生化基地。1964 年，在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罗登义在贵州农学院创建生物化学研究室，不久又建立了基础生化、动物生理生化教研室等，为我省农业生物化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生物化学分析、营养成分分析、农药残留量测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



对贵州的 140 个水果品种、920 个地方水稻中的营养品质和 73 个野生饲料的植物品种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测定。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贵州农学院又陆续建立了刺梨研究所、麦作研究室、森林生态研究室等，其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罗登义在农业生物化学、营养学科研教育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截至 1984 年，他以中、英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共计 58 篇，专著 7 本，另有近百篇文章发表在《科学》《学艺》《东方杂志》《自然界》《化学》等刊物上，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贵州省科学大会、贵州省科学评奖大会奖。罗登义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营养学研究，特别是食物中微量元素研究的先河，为改善国民的食物结构、食物品种搭配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研究的刺梨，如今已成为贵州一项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产业。

### 三、粉笔生涯为人师表

罗登义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为贵州农业教育同样作出了卓越贡献。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贵州大学农学院更名为“贵州农学院”，罗登义担任院长，当时的农学院只有一个农艺系，有几十个教职工和一百多名学生。作为院长，罗登义白手起家，兴建校舍，不断建立农、林、牧等学科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专家教授，扩大招生规模，完善科研设施，创建科研机构，提升教育科研水平，为国家和贵州本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1981 年，在他的指导下还创办了《贵州农学院学报》和《贵州农学院丛刊》两种学术刊物，他亲任《贵州农学院丛刊》主编。由他一手发展起来的贵州农学院与原贵州大学组建合并的贵州大学，如今已成为国家双一流大学。

## 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

殷宏章（1908—1992），贵筑县（今贵阳）人。20世纪50年代，殷宏章研制的抗生素填补了国内空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清同治年间，殷宏章祖父中进士后在京师做官，遂将全家接往北京。父有济，举人，曾在山东做过几任知县，致仕后举家定居天津。

1924年，殷宏章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理学院生物系本科。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与导师李继侗教授一起发现植物光合作用的特殊现象，即光



殷宏章

照突然发生时，会影响光合作用速度发生瞬间变化，然后趋于稳定到恒速这一现象。

由于多方原因，这一发现直到30多年后才被植物生理学界认识。同一时期，殷宏章还对植物生长素与植物叶片运动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曾被后来的授业导师，生长素的发现者温特教授引用。

1929年，殷宏章毕业留校，任教5年，其间曾到清华大学研究院进修一年，后入读北京大学研究生班。1935年，其获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工



学院，经过3年学习，获生物学博士学位。1938年，殷宏章回国，辗转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植物生理学，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员。其间，他主要从事生物化学合成及生长素的应用与测定等科研工作，在植物磷酸化酶对淀粉形成的作用、禾谷科作物实籽成熟过程、糖分转化、淀粉合成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的创新性成果。

1944年，殷宏章应邀到英国，任剑桥大学客籍教授，从事磷酸化酶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48年，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李约瑟博士邀请他任南亚科学馆合作官员，1951年秋，殷宏章任期届满回国。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直到1983年。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研制抗生素填补国内空白

1955年，殷宏章当选为新中国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任《植物生理学报》《植物生理学通讯》主编和《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的编委。其间，他主持、研制抗生素获得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这一研究成果，结束了中国在医药、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等方面依赖进口的历史。

#### 二、领导创建中国第一个光合作用实验室

20世纪50年代后期，殷宏章又把精力重点用于光合作用的研究上。1959年，殷宏章领导创建中国第一个光合作用实验室，用于光合作用研究，指导和支援农业生产建设，并提供理论依据。他们以禾谷科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植物生理的角度，研究光合的形成、输导、转化及在籽实中物质的运转积累过程，从而在宏观上为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指导。殷宏章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群体”概念，在当时的学术界耳目一新，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采用。1961年至1963年，在殷宏章的主持研究下，证明了光合磷酸化反应是整个光合作用的组成部分。他发表论文《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发现》，阐述光合磷酸化反应过程中，会形成

一种高能中间态的理论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光合磷酸化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美国科学家贾格洛夫证明了这一高能中间态的存在，并指出，这就是英国科学家米切尔（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关于化学渗透假说中的氢离子浓度差。《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发现》这一重要的科研成果，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对他科研上付出的心血和在学术水平上的充分肯定。

殷宏章先后还发表了《植物气体代谢》等数10篇具有科学意义的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殷宏章的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他又继续科学研究工作，并建立了国内首家人工气候室。

1988年，殷宏章获中科院从事科学工作50年奖状，同时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杰出校友称誉。1989年，他又获中科院荣誉奖。



## 致力地方文献编纂的李独清

李独清(1909—1985),原名忠信,字笃卿,后改名源,字独清,别号洁园,以字行。贵筑县(今贵阳)人。学者。

李独清出生于贵阳宦宦之家,父耀初,前清同知。1923年12月,李独清毕业于贵阳达德小学。1926年,他于达德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贵州大学经济专科,毕业后到贵州省续修通志局任校勘,后为编辑。由于政局、经费等原因,修志工作时断时续,恢复纂修《贵州通志》后,李独清专任金石志、艺文志、秩祀等专志的编纂。除三门专志外,对地方文献的研究,他亦有不少成果。

1932年,李独清受聘为省政府二等秘书;次年兼任省保卫团秘书。1934年,贵州省文献征辑馆成立,李独清受聘为名誉采访,后改任编审兼采访及文献委员会委员。在文献征辑馆工作期间,他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和整理工作,先后参加编辑《黔南丛书》,主编《贵州文献季刊》,征集文献、书画等。1936年,李独清在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 一、尽悉抄录《四库全书》黔地资料

李独清在抗战期间,为贵州的历史文化作出贡献。1940年,浙江图书馆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至贵阳,几经辗转后,藏于近郊地母洞。《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开始编纂,历经20余年完成的重要古籍,全书36363册、79000余卷、8亿多字。贵州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要抓住《四库全书》在贵

阳的机会，抄录和整理《四库全书》中有关贵州的珍贵史料，以弥补贵州在历史史料方面的缺憾。文献馆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同意，委托时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李独清带两名助手负责此事。他与两名助手于是年5月入地母洞抄录，至次年8月，历时年余，他们从浩瀚的典籍中发掘出一大批黔地资料，尽悉抄录。这批史料不仅填补了贵州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稽考不易”“淹没堪虞”空白，修正了历朝通志上的“疏漏过甚”“实难定论”之处。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民国《贵州通志》，其中很多史料来源于《四库全书》。李独清还写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记事四首》。事后，他将这些材料编排为8册，定名《贵州史料第一集》。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李独清受聘到贵阳师范学院任教，是时高等院校师资缺乏，李独清兼授师范学院及贵州大学两校课程，时常要往返市区与花溪之间。他先后还任两高校的副教授、教授。直至1948年，他才



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至  
贵阳北郊地母洞躲避战火



专门任教贵州大学中文系。

## 二、执教大学

李独清在大学讲授的内容大致为中国文学史、诗词、文选学、目录学、校勘学、读书指导、民间文学、诗经、专家诗选、群经概论、诸子概论、诗词研究、秦汉魏晋唐宋文学等。作为学者、教师，李独清授课旨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经常讲解一些传统的爱国文学作品和民间歌谣。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他不人云亦云，往往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正确的立场引导学生直接去明辨是非，这种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他上课联系实际，常常提出问题给学生思考，不束缚学生的思想。作为教育界的前辈，他又是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一直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亲自指导他们的业务进修；给他们指定参考书目，批改读书笔记；随时帮助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还积极参加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工作。

李独清在大学执教 40 年，时刻不忘宣传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先后在校内外的学术演讲有《诗之三阙》《鲁迅的治学方法》《纪念杜甫兼谈他的诗歌》《怎样读书和读什么书》《郑珍及其分期》《关于阅读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怎样阅读中国文学史》《诗词格律简论》《唐宋文学作品选讲及其历史》等专题，受到广大学校师生和社会听众的赞赏。

## 三、精于诗词创作著作等身

受家庭影响，李独清儿时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各种古籍。12 岁时，他便开始创作诗歌，青少年时结交贵阳学识渊博的前辈，与友人陈恒安参加贵阳名士杨恩元、桂诗成、聂树楷等组织的诗钟会。他毕生未间断诗词创作，他曾说：“总计数十年来，所作已近三千首。”

他对自己学习诗的过程，有一个大概的叙述：12 岁时开始学诗，先读的是《小仓山房外集》和《随园诗话》，读后“尤而效之”；青年时代与前辈诗人学者

们交往，才“知有苏黄，有韩猛，有李杜，有陶谢，有三曹七子，有乐府古辞，有三百篇”。他先是“以杜、韩为依归，进而参以东坡、双井、半山、后山、简斋”，后来读到了贵州诸先贤著述，特别是郑珍的《巢经巢诗钞》，“尤所笃嗜，寝馈习之”，潜研《散原精舍诗集》（陈三立自号散原老人）后，有所领悟，“所作又稍稍与巢经异矣”。他欣赏郑珍所说的“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的话，认为在诗中，要“有我之性情、抱负、识见、气象”，才是自己的诗，而非“唐也、宋也、清也”。他的词不及诗多，自称“作词本非所长，聊以备数而已”。他自述填词“早喜东坡、稼轩之雄放，晚取碧山、玉田之沉咽，时以白石清越参之，兼来诸家，惜皆得其短耳”“平仄依康熙间王奕清等所定《词谱》”“押韵则严守文顺卿《词林正韵》”。

李独清早期的诗、词，已发表的有《贵州文献季刊》所载《秋禊诗辑》中的21篇33首。后他自编《洁园剩稿选》收录诗作500余首，自编《幽心梦影录》诗集，共10卷，录诗千首，未刊行。《幽心梦影录》是他将所见及自藏并散失的书籍字画，就其珍贵者，将其特色、价值以诗述之，并有作者、版本、内容等的略述，书名取自“枉寄幽心，终成梦影”句。李独清尚有未刊行的《洁园剩稿》《五知轩文钞》《东轩随笔》（上、下）；已发表的文章还有《刘向别录考释》《辛弃疾及其流派》《李清照改嫁辨正》《关于晏殊珠玉词的评价问题》《略论旧体诗歌的声韵与格律》《笙鸣鼓和集序》《甲秀楼》等。

李独清著述颇丰，解放前在《贵州文献季刊》上发表《明史何腾蛟考异》《孙文恭公年谱初稿》《明代贵州抗战先烈事略特辑序》《五曹州乡土志序》《卢丰碑辨》等文。解放后从教之余，其仍不忘和关心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他除了担任省、市文管会和地方志编委会的顾问外，还对新修地方志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撰写了不少的文章，发表《甲秀楼修建考》《续考》《李白流夜郎考》《巢经巢诗说》《回忆谢六逸》等有深度的专论。



#### 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李独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0年加入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家协会；1952年受聘为省文教厅文物审定委员会委员；1953年高等院校调整，回贵阳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及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76年以后，任省古籍整理小组副组长、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并兼任省、市地方志编委会，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顾问。

## 贵州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李良骥

李良骥（1909—2008），贵筑县（今贵阳）人。1934年，其从清华大学地理系气象专业毕业后，择气象事业终一生。

李良骥，1924年于贵阳达德小学毕业后，赴天津居住在梁启超家，就读于南开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1934年6月毕业，是清华大学第一个气象专业的毕业生。

李良骥曾担任过贵州省气象局副局长，撰写论文《贵州的气候与植被》，编著《贵州综合农业气候区划》《贵州气象》《贵州农业区划》，均由贵州人



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起，李良骥担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科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担任省科协副主席。1987年起，他又担任贵州省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长三届，历时12年。李良骥生前一直担任清华大学贵州校友会会长，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2008年，李良骥荣获亚太国际气象生态研究贡献奖，被誉为“中国第一气象老人”。

清华大学毕业后，李良骥应约去南

李良骥



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所长竺可桢领导下，承担气象观测、天气预报、整理统计气象资料和气候分析研究工作。1935年，他在《气象学报》发表论文《东南沿海岛屿雨量稀少主因之探索》，还翻译外文专业论著。当年，竺可桢所长推荐李良骥去广西气象所工作，负责天气预报业务。此外，李良骥还在该所主办气象人员训练班，并担任普通气象学和天气预报的教学任务。

1936年，贵州省建设厅厅长湛溪邀请竺可桢协助筹建贵州省气象测站。于是，李良骥又奉调回黔。1937年，李良骥接办中国气象研究所贵阳测候所，并将其改名为贵州省建设厅贵阳气象所，并从三块田（现合群路）迁到六广门外桑园（原体育场），又于同年迁到大南门外马棚街雷祖庙（现新华路），1953年再迁至现翠微巷。

1937年，李良骥先后建桐梓、独山和毕节3个县级测候所。到1938年，他先后在铜仁、罗甸、兴义、仁怀、黎平、荔波、思南、石阡、威宁、湄潭、水城、赤水、青溪、关岭、余庆、织金、黔西17个县设雨量站。在县测候所和雨量站负责测报工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其训练班毕业的学员，1936年至1938年共办5期，每期半年，李良骥不仅任班主任，还任气象学的教学任务。

1939至1941年间，惠水、龙里、丹寨、安顺、息烽、黄平、晴隆、郎岱、紫云、大定、安龙、正安、瓮安、炉山、普安、锦屏、习水、册亨、镇远、三穗、清镇、平坝、长顺、榕江、贞丰、都匀、贵定、麻江、剑河、沿河、江口及开阳32个县增设雨量站。1942年至1944年间，又增设黄平、金沙、道真、玉屏、平越、印江、绥阳、纳雍、务川、台江、普定、望谟12个县雨量站。

1943年，李良骥兼任中央气象局（设在重庆）测政科长时，在贵阳举办一期测候人员训练班，该班毕业生分派到贵州的镇远、铜仁、安顺、罗甸、兴仁、威宁；云南的丽江、玉溪；广西的河池，增设气象测候所9处。1944年冬，贵阳和镇远建立气象站。

1946年，李良骥到北京任华北观象台台长，兼任清华大学气象系讲师。1948年，他到重庆任气象台台长。

1939年，竺可桢校长先期到贵阳，李良骥介绍竺校长与他姑父万勉之（时任贵州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联系，联系后万勉之同意让出该校部分校舍给浙江大学，李良骥作为牵线人之一，帮助浙江大学西迁贵州，功不可没。

1950年至1955年，李良骥担任贵阳气象站副站长兼技术指导员，兼任贵州农学院农学系和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的教授。1956年起，李良骥担任贵州省气象局顾问。



## 当代书坛的卓然大家陈恒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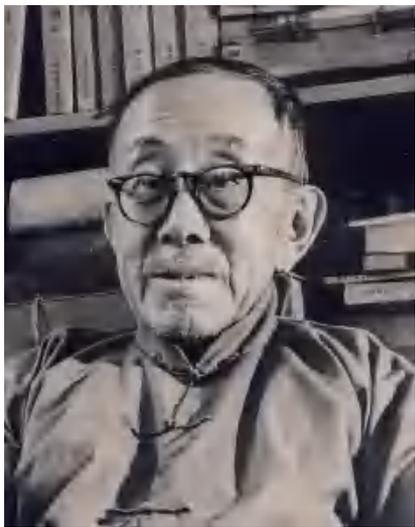
陈恒安（1910—1986），原名德谦，字恒堪，号宝康，晚年自号黔灵老学。贵筑县（今贵阳）人。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和艺术家。

陈恒安生长在贵阳一个富裕的家庭，少时天资聪颖，好学深思，就读私塾时，学习诗词、古文，其书法颇有灵气。少时的陈恒安在贵阳诗坛词苑已小有名气。贵阳诗人李大光有诗云：“髫龄早有神童誉，治学临池集众长。”

1925年，陈恒安就读贵州省立第一中学，后师从前清进士杨恩元（覃生）学古文经学，随王延直（仲肃）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又随乐嘉荃（良臣）学习辞章，遂学业大进。是时王敬彝、王延直、桂诗成（百铸）、聂树楷（尊吾）诸人组“诗钟会”，不时聚会唱和，非诗学有成者不得入会。陈恒安虽在弱冠之年，因别具诗才，得入其会，他的诗作得到几位前辈赞赏。

当时，贵阳不过边远小城，学者纵然博览群书，但见识终归有限。为开阔眼界，1929年冬，年仅19岁的陈恒安赴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深造。其间，陈恒安得到著名词曲家吴梅、清末探花商衍鎏指点。他因与商衍鎏侄商承祚（著名文字学家）交谊深厚，得以在商家临习明代书家王铎《草书诗卷》，深得“险峻之致，复归平正”的书法要领。

1931年冬，因母患病，陈恒安弃学回到贵阳，受聘为《新黔日报》主任编辑和副刊《绿野》《新地》主编，同时兼任二十五军下辖教导室秘书。1936年，浙江财团巨头吴鼎昌出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国学基础深厚，长于辞章，对陈



陈恒安

恒安的才学十分赏识，聘陈为省政府秘书。后陈恒安参与《贵州通志》《黔南丛书》的编纂，又受达德中学之聘，兼任该校国文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不少学术、艺术界名人和团体迁来或途经贵阳，陈恒安的活动范围得以扩大。1940年春，经大夏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教授李青崖共同举荐，陈恒安任该校讲师，讲授诗词学。之后，他又担任贵州师范学院讲师，讲授词曲学。1946年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陈恒安随吴鼎昌调职南京，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处简任编审、中央设计局秘书、国民政府图书馆

主任等职。解放前夕，陈恒安辞职返筑，结束仕途生涯。新中国成立后，陈恒安在贵州省抗美援朝分会任秘书，后又调至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成立，陈恒安调博物馆工作。陈恒安的主要成就在书法艺术、诗词创作、文物鉴定等方面。

### 一、抗战期间文化宣传的使者

1943年10月，贵州艺术馆成立，陈恒安任馆长。艺术馆成立后，陈恒安为来到贵阳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倪貽德、赵少昂、丰子恺，贵阳籍画家、达德中学校长谢孝思等举办画展，又为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和林声翕、王人艺举办音乐演奏会。贵阳人首次得以欣赏到当时国内顶级画家的作品，聆听到音乐大师的演奏，可谓大开眼界。抗战期间，陈恒安负责接待撤到贵阳的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电影导演谢添、韩涛和著名演员胡蝶等人。在众多著名人物中，陈恒安与徐悲鸿私交最深，他曾撰写《徐悲鸿先生在贵阳》一文，详细回忆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三次到筑的情况。为避免国家珍贵文物毁于战火，抗日战争时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南迁，其中一部分迁到贵阳。1944年4月，院长马衡与陈恒安合作，在贵州艺术馆举办了为期半月的故宫历代书画精品展，使贵州各界人士首次欣赏到这些艺术珍品。

## 二、当代书坛的卓然大家

陈恒安最为人们了解的是他的书法成就，从孩提时期至1986年去世，他从未间断过对书法艺术的研习，从甲骨、金文、秦篆、汉简、汉碑、魏碑及晋唐以降各种书体中吸取营养。他童年时代以临颜真卿《勤礼碑》《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入手，取其庄重雄迈的风格和平正的用笔方法，进而学习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诸帖。青少年时期，陈恒安在学习古文字学的同时，临写《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峰山碑》等，后以清人吴大澂、杨沂苏为楷模，随后他又上溯金文，对《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用力最勤。陈恒安深得石鼓文之精髓，形成古气盘旋，韵味淳厚的风格，后涉及米芾墨迹，领略其“刷字”的气概，使自己的书体变得雄强茂密。

甲骨文、汉代竹简的书写也是陈恒安的一大特长。20世纪20年代后期，陈恒安开始学习甲骨文。当时我国学术界对甲骨文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能见到的仅有《铁云藏龟》《殷墟书契》等少量书籍，能辨识的甲骨文字有限。但是这种精美的文字和后人无法企及的高超刻工，引起了陈恒安的极大兴趣，他在研究之余反复临写，即便写在平整的宣纸上，也令人感到有“刻”的效果，成为他书法艺术的突出成就。

陈恒安的书法艺术博采众长，泛滥各家，自成风格，加之丰富的书法理论和渊博的学识，他对篆、隶、行、楷、草及其他书体的书写无不精能，堪称当代书坛的卓然大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陈恒安曾三次参加中国赴日本的书法展。他的作品也到过亚洲、欧洲各国展览。198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陈恒安书法选》，共收陈恒安甲骨、金文、小篆、汉简、行书、章草、楷书各体书法作品四十余幅，全面反映了陈恒安书法艺术的成就，使更多的海

内外书法爱好者有幸欣赏到他的书法艺术。

以诗词创作形式阐述书法理论是陈恒安的一大特点。1985年，中国书法界及众多的古文字学者聚集安阳，举行安阳殷墟笔会，这是一次对甲骨文和甲骨文书法研讨的盛大集会。陈恒安以文字学家、书法家身份被邀请参加，遗憾的是他因病魔缠身，无法赴会，只撰写了《殷墟书法漫述》作为对大会的贺礼。《殷墟书法漫述》以二十首七言绝句为正文，阐述甲骨文的书法特点和理论，文字虽少，涵盖的内容却很广泛。除正文外，每首又附释文，文白交融，独具特色，显示了他书法艺术和诗词创作方面的造诣。《殷墟书法漫述》引起了甲骨文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是国内研究甲骨文书法的力作，阐述精辟深刻。

### 三、鲜为人知的画家

很少有人知道陈恒安还是一位画家，他以金石入画，古朴中透出隽秀。令人遗憾的是，他很少作画，只在晚年，时作小幅自娱，题材多为石竹花卉。他在宣纸上信手几笔兰叶也显得格外清挺，让人赏心悦目。1984年春节，陈恒安以朱色画一幅具有东汉风格的“朱雀瓦当”，古朴苍劲，如同瓦当的拓本，然而却是信手拈来，深得著名学者、画家姚茫父“颖拓”的真髓。在“朱雀瓦当”的左面是用大篆题写的唐代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书、画、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 四、创作传统诗词文物鉴定有成就

在诗词创作和研究方面，陈恒安也是穷毕生之精力，早期诗词多为朋友间的应酬之作及一些纪事琐事。20世纪50年代后，其诗风词句趋于开阔劲健，题材和意境大大拓展。陈恒安传统诗词创作造诣很高，音律和谐，绵丽沉厚，格律谨严，大多讴歌新中国和贵州的建设成就、山水风光、名胜古迹。作品读来抑扬顿挫，婉转如珠，抒发了他胸中的诚厚感情。其词作及成就，被认为是继姚华后贵州最优秀的词人。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以手稿加释文的形式，



出版了他所作的诗词《春茗词》四卷、《邻树移诗存》二卷。他深通古书版本、陶瓷鉴定之学。从贵州省博物馆建馆至 1986 年他病重以前，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里，贵州征集的大量文物都经他鉴定，他为贵州省的文物鉴定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他学术造诣精深，曾撰有《贵州出土汉永元罐铭文考辨》《水绕山环“白锦堡”——南宋杨粲墓的景物漫写》《贵山考辨》《郑子尹先生遗稿零拾》《黔灵是怎样得名的》等多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陈恒安先后担任过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 中国近代土壤科学的奠基人熊毅

熊毅（1910—1985），又名其毅。贵筑县（今贵阳）人。中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

清宣统二年（1910），熊毅出生于贵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熊桂笙（字述之），清末留学日本，学习农业科学，民国初年曾任甲种农业学校校长。母亲姚兰是著名学者、书画家姚华的妹妹，与熊桂笙同时留学日本，学习蚕桑。受父母影响，熊毅青少年时就酷爱科学。1925年，熊毅毕业于贵阳模范中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1932年，他毕业获学



士学位，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任助理员、技正。10年间，他奔波考察于各省，并着意研究各地区土壤情况和农作物生长状况。通过实践，他深知中国对土壤学的研究，尚处萌芽状态，方法也很落后，亟盼能出国深造，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以报效国家。

1947年，熊毅留学美国，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土壤系，毕业后获硕士学位，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土壤系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熊毅毕业，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百事待举，国家急需各方面人才。是年7月，熊毅放弃



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待遇，绕道日本回国。

熊毅从事土壤科学研究 55 年，他的研究领域深广，包括土壤物理化学、土壤矿物学、土壤生态学、土壤物理学、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肥力、盐碱土改良等方面，尤其是对土壤胶体、盐碱土改良利用和水稻土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开创了我国土壤胶体化学、土壤矿物学和土壤生态学。熊毅对于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成就，曾到苏联、巴基斯坦、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

### 一、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资料

1951 年熊毅回国，担任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编《土壤学报》。他带领有作物、植保等农业专业人员，组成东北粮食增产土壤调查队，先赴东北，分别到锦西、肇源农村开展调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他参加水利部组织的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和黄河流域调查和规划，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资料。1954 年，他任中科院土壤调查队队长，于次年带领百余名专家组成的普查队伍在华北及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数年的大范围考察，编写了《华北平原土壤》《华北平原土壤图集》，为综合治理华北地区旱涝、盐碱和改良土壤作出了重大贡献。

### 二、对水稻土和土壤胶体的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熊毅开始了水稻土的研究，首先提出“水稻土中的淡色层是铁锰还原淋溶的结果”这一科学论断，打破了当时国内外的传统观念。1980 年，他主持了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分类和肥力特征的研究，从农业生态的观点出发，对合理利用水稻土资源和改进耕作制度提出了宝贵意见，撰写了《水稻土的某些化学性质》《耕作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等有影响的论文。另外，他还考察了太湖流域的整体灌溉宏观综合系统。1982 年 3 月，在太湖地区科学讨论会上，熊毅做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报告，并与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

周立山合作撰写了《试论人工生态系统并兼太湖流域》的论文，指出人工生态涉及人和生物圈，它不仅要研究自然规律，同时还要研究经济规律；太湖流域的进一步开发，应该打破地区的行政界限，联合江苏、浙江、上海的力量进行综合规划。

在熊毅的科研生涯中，对土壤胶体的研究最具功力。早在抗战时期，他就从硅、铁、铝含量和阴离子交换量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美留学期间，他则首先运用 X 衍射仪对土壤进行土壤胶体化学分析。他把土壤矿物胶体和有机胶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我国开创了“土壤有机复合体”研究的新领域，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共发表《中国各主要土类胶体部之组成》《土壤胶体的矿物组成及其在发展分类学中的意义》（英文）、《黏土的矿物组成 II·中国主要土类》（英文）、《中国土壤胶体特征》等有关论文 20 余篇。

### 三、改善华北土壤条件

我国华北平原长期受干旱、水涝和土地盐碱化的困扰，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科委委托熊毅从事整治华北平原科学研究，提出改善办法。他带领一批科技人员，在黄河、淮河、海河地区进行土壤综合考察。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这一地区存在灌与排的矛盾，即少雨易旱的华北平原引黄漫灌带来土地盐碱化、沼泽化的危害，并且提出了缓解土地盐碱含量高的方法：运用改善耕地的排水系统，冲刷土地中的盐碱。他总结出灌排相结合治理盐碱、改良土壤的办法，即打井灌溉，排盐碱。他先在河南封丘地区进行试验，取得改良土壤，增加农业产量的显著效果，接着由国家全面推广这种“井灌井排”的治理经验，较好地改善了华北平原的土壤条件。

### 四、主持对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分类等问题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熊毅担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工作重点转移到江苏省。水稻土本是



熊毅青年时代研究过的课题，他曾提出“水稻土中的淡色层是铁锰还原淋溶的结果”的观点，打破传统认识。1980年，他主持对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分类等问题的研究，论述了肥力与耕作制度、肥力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对合理利用太湖地区的土壤资源及耕作制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1982年3月，太湖地区科学讨论会召开，熊毅在会上做了生态、生物圈与经济关系的重要学术报告。他与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周立山合撰了论文《试论太湖流域人工生态系统》，为进一步开发太湖流域经济和保护生态提出规划意见。

熊毅在所研究的领域均获重大成果，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他治学严谨，学术思想活跃，善于组织规模性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壤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开创了近代土壤学研究，是中国土壤科学的奠基人。除主编《土壤学报》以外，他还主编《环境科学学报》，参加编写中国第一部土壤学专著《中国土壤》，主持编写《土壤胶体》一书。1981年，熊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土壤学会理事长，在《中国科学家辞典》中，收录有熊毅的传略。1985年1月24日，熊毅在南京病逝，享年75岁。

熊毅的一生，是献身科学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1977年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党组和中共江苏省省级机关党委作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老科学家熊毅同志学习的决定》，表彰他在土壤科学事业的卓著功勋和高贵品质，激励人们努力奋斗。

## 奉献毕生精力的化学教育家邢其毅

邢其毅（1911—2002），字孟符。原籍贵阳，出生于天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邢其毅父亲邢端是光绪三十年（1904）翰林，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博学多闻。邢其毅自幼受其父影响，好学深思，在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下，学业有成，于1929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1933年，邢其毅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知名化学家罗杰·亚当斯，研究联苯立体化学。1936年，邢其毅获博士学位，转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在魏兰德教授实验室研究蟾蜍毒素。其研究成果芦竹碱的结构阐释与合成，成为吡啶甲基化方法，在有机化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声名鹊起。

### 一、抗战期间为医药事业用心尽力

1937年，邢其毅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就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副研究员。七七事变后，他随研究院迁到昆明，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的转运，绕道中国香港、越南，历经半年的艰辛，最终将图书资料和仪器完整无损地转运到目的地。抗战时期，疟疾肆虐，内地药物异常短缺。是时，抗日前线急需抗疟疾药品，邢其毅亲往云南河口地区寻找金鸡纳树，对其中的奎宁的含量进行分析研究，制成金鸡纳霜（奎宁），向抗日前线提供急需药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他以蓖麻油为原料，成功研制了不饱和脂肪酸，被普遍采用。他又与



人合作，在防己生物碱的研究中，分离出一种新的生物碱，命名为“防己诺林碱”，这是我国在生物碱研究方面较早较完整的一项科研成果。1942年，邢其毅与夫人钱存柔到安徽天长县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华中军医大学的教学和药物研制工作，研制出抢救伤员急需的葡萄糖针剂，缓解了该种药物的匮乏。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在皖北农村的茅草屋里开办药理学班和医训班，经过严格和正规的培训，培养出一批医药骨干，为根据地的医药事业费尽心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农学系，同时被聘为北平研究院研究员。



邢其毅

## 二、有机化学领域成就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邢其毅担任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辅仁大学化学系主任，积极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发展科学技术计划的制订。

1951年，邢其毅提出对蝎毒素中多肽成分的研究，成为我国进行按肽方法和标记氨基酸研究的第一人，早于国外同行15年。他提出用硝基苯甲酸酐与氨基酸发生德肯-威斯特(Dakin-West)反应，是使氨基酸末端生成一个带色的氨基酮化合物的好方法；他和助手在多年的多肽化学研究中，先后成功地完成了9种多肽的新试剂，因而获得国家科委1988年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1958年，邢其毅和几位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方面的专家研讨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可能性问题。1959年，由北京大学化学系、中国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协作，进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研究，邢其毅是主要

学术负责人之一。1965年，用人工合成方法得到的活性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中国问世！这是人类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结晶蛋白质，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关注。这是有机合成学科对生命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蛋白质多肽化学合成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国家赢得了荣誉。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1982年自然科学一等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认为，这是人类首次在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是属于世界级的科研成果。1997年9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再次获得求是科技基金颁发的“突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学术负责人之一，邢其毅功不可没。

氯霉素的合成与规模化生产，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原来的合成方法，工艺烦琐而复杂，原料也难获得。在1956年研究普林斯（Prins）反应的立体化学进程中，邢其毅与戴乾圜等人利用原料来源方便而价格低廉的苯乙烯，完成了氯霉素合成的新方法。该法使整个合成仅有五步反应，而且中间生成物全为液体，从而为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管道输送和连续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但在理论上解决了氯霉素的立体化学问题，而且还适合大规模生产。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意大利卡洛·埃巴公司采用这一合成路线，建成了年产400吨氯霉素的工厂。

天然香料的开发利用，也是当今世界回归大自然思潮下的发展趋势。国际市场对天然香料的需求越来越大，鉴于此，邢其毅亲自设计特殊的工具，到生产花果的现场收集“香气”，首开花果香气成分研究的先例。自1978年首次完成了白兰花香成分全分析之后，邢其毅相继进行了西藏扎布耶盐湖杜氏藻的香气成分分析，对玫瑰、荔枝等花卉以及水果的香味进行系统研究，其中有的成果已被有关企业采用。我国传统的中药，大都以水煎制，他选择人参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中药水溶性成分的研究，结果分离出几种水溶性小肽成分，并研究了它们的生理属性与化学结构。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三、教育战线被人景仰的典范

邢其毅在教育战线勤奋耕耘数十年，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作为知名学者，邢其毅备课从不懈怠，总要花大量时间反复修改讲稿，但上课时又不看讲稿，而是旁征博引，挥洒自如，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感染着每位听课者。他既重视理论教学，又重视实验课教学。他认为实验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物的结构及其合成的科学，是对微观世界的一个正确认识，而这种认识是通过实验手段，经过直接的观察和推理得到的，由实验提供的素材，总结出系统的理论，为探索分子世界打下基础，是一种更本质、更重要的学习。他对学生很关心、爱护，凡有来访、来信，都亲自接待，亲自回复。在科技教育战线上，他孜孜不倦，因而受到业内人士的敬佩，也成为后辈景仰的典范。他编写的《有机化学简明教程》、《有机化学》（上、下册）、《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成果，是高等院校化学教学的宝贵财富，其中《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北大10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了《院士文库》，其中收入的《邢其毅文集》将其在学术上的硕果分类辑要汇编，计学术论文68篇，综述9篇，化学家传记4篇，科普与化学教育8篇。这些成果反映了他对科技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邢其毅虽然一生都在外学习工作，但对贵阳情深意浓，一直十分关心家乡的科学教育事业。他与家人协商决定，把邢氏家族多年来珍藏的线装古籍图书，以及名人碑帖等，共计80箱20000余册，全部捐赠给贵州省图书馆和贵州省博物馆，以尽爱乡之情，受到政府的表彰和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 宇宙线锥体理论创建人之一张永立

张永立（1912—1972），字懋天。贵筑县（今贵阳）人。他是我国在比利时获得数学博士的第一人，也是世界宇宙线锥体理论的八大奠基人之一。

张永立父亲张冀卿，字瑞霖，清末任贵州军法官，民国省政府参议，后弃官经商。张永立曾就读贵阳正谊小学、贵州省模范中学。中学时代的张永立酷爱数学、物理、英文，成绩优异，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亦有扎实基础。

1931年，张永立考取上海震旦大学数学系。4年中，张永立发表论文多篇，所著《矢算初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首次在国内数学界使用“矢算”这一翻译名词。1935年，他曾回到贵阳，在省立一中任教，并在几所中学兼上物理、数学课。

### 一、宇宙线锥体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1936年，张永立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世界数学学会名誉主席瓦尔·甫山教授和物理、天文学家雷美德教授指导下，学业精进。他不仅获博士学位，而且成为世界公认的宇宙线锥体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他发表《单氘乙烯分子的振动模式及频率计算》《单氘乙烯的拉曼谱》《 $C_2HxDy$ （ $x+y=4$ ）分子的势函数和基频的计算》3篇论文，提出新的理论。后国际数学界将其提出的一个数学式命名为“张函数”。在鲁汶大学就读期间，张永立在布鲁塞尔《科学年鉴》和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讨论的星际单氘乙烯分子形



成的物理性质论文，成为国际上讨论星际分子形成的早期奠基性论著，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38年起，张永立在研究宇宙线理论中，相继发表了《宇宙线和乙烯分子的振动》《宇宙线的纬度效应和不对称效应理论》《南北磁纬300以内之宇宙线锥》《无限靠近赤道的宇宙射线的锥体》《近赤道的宇宙射线轨道》等文章。次年，张永立在比利时国家博士学院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国家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在比利时获得数学博士的第一人，时年仅26岁。张永立的照片被永远陈列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纪念馆中。



张永立

## 二、回乡从事教育和编辑出版事业

1939年，张永立放弃瓦尔·甫山教授介绍其去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先后任震旦大学、厦大教授。1940年秋，张永立离开上海，携全家经由香港回到阔别多年的贵阳，此时厦大已从上海西迁到贵阳。张永立除任教于厦大外，还承担成立不久的贵阳师范学院的教学。抗战爆发后，不少著名学者、教授陆续迁来贵阳。贵州爱国实业家华问渠成立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马宗荣、谢六逸任正副所长，张永立任部主任，编辑出版了大量社会急需的书籍。其中，经张永立编辑出版的书籍有《应用科学》（丛书）、《实用实验诊断》、《黔省柞蚕问题》、《农田水利》、《中英法德对照土木工程语汇》、《防沙保土》、《中国农业史》、《民众营养》等。他还参与编辑出版《大学丛书》和中、小学教科书，在《文讯》杂志第二卷二期上发表天文学论文《新宇宙观》，提出“宇宙之大，有与无之界限，空间有

限而无边之可能性，椭圆式几何学，实证椭圆式空间之可能性等问题”的新理论。其间，张永立担任中国天文学会贵州分会理事长。他为普及物理、天文科学知识，利用各学校放假期间举办科普讲座，使非物理、天文专业的众多青年和科学爱好者，通过听他的演讲获得初步的物理、天文知识。同时，张永立还出资协助天主教贵阳教区创办程万中学，并担任校董事会董事长。由于严谨治学，学校从创办时的20余名学生发展到千余人，是开设初、高中的完全中学，成为贵阳中学的后起之秀。1942年，国立贵州大学成立，张永立被聘为文理学院数理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949年，张永立应聘到云南大学任物理系教授，自此一直生活在云南昆明。

### 三、培养数学、物理学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张永立被任命为云南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建云南宜良宇宙线观测站。在教学中，张永立担任过理论物理、量子力学、量子场论、相对论、物理光学、物理力学等课程的教学。他精通数门外语，数学、物理、天文学造诣精深，加之口才出众，其授课往往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数学、物理学人才。著名的贵州籍物理学家易家训和数学家秦元勋、越民义皆出其门下。1963年，张永立因中风导致半身瘫痪，重病缠身，他仍坚持写完了《相对论导论》《激光束的谐振腔》。

张永立曾当选中国物理学会理论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物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天文学会贵州分会理事长；两次当选云南省人民代表，曾出席第三次全国政协会议。



## 著名中医大家袁家玑

袁家玑（1913—1991），祖籍江西清江，先辈迁居贵阳。著名中医学专家。

袁家玑祖父袁训皆、父亲袁平甫都是贵阳著名中医，亦精通中药，开有“袁体德堂”中药店。袁家玑自幼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早有悬壶济世之志。

1931年，18岁的袁家玑只身前往北平学习中医，先在北平国医学院就读，后转入贵阳籍名医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学习，1935年学成毕业，随施今墨实习一年后回到贵阳。1936年，他参加贵州省民政厅举行的中医执业考试，考出全省第一的好成绩。此后，他在贵阳协济、普济、同泰药店坐堂诊视，救治大量疑难杂症患者，声名鹊起，被推选为贵阳中医医师公会会长，受聘于国医馆，讲授《伤寒杂病论》和温病学。

新中国成立后，袁家玑参与了贵阳城区多所联合诊所的组建。贵阳市中医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他被选为副会长。1956年，他又被任命为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负责全市的中医管理。1964年，为了培养中医人才，袁家玑倡导成立贵阳中医学院。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贵阳中医学院筹备组成立，袁家玑任筹备组副组长，次年学院正式成立后任副



袁家玑

院长,并担任中医经典的讲授。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对中医经典有独到的见解,临床经验丰富,将理论理解和临床实用相结合,并用于教学中。

## 一、创建诊治伤寒病、温病的理论和原则

中国中医药学界对伤寒病、温病的研究,从东汉名医张仲景就开始,袁家玠创建了诊治伤寒病、温病的理论和原则,写成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医家圣典。袁家玠师古而不泥古,认为:“学者贵乎用,用者贵乎学,乃学用结合之理。学之与用,相辅相成,才能使学到的知识得到不断提高。”他根据自己学习和实践的积累,写成《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见解独到,通幽洞微。他还认为:“治疾病有两大法门,即外感和内伤。外感热病以伤寒、温病立论,内伤杂病以《金匱要略》立论。”袁家玠在精读中医经典并与临床实践结合后,总结出“为医”十要:一曰深究医经,努力继承发扬;二曰精勤博览,广集古今所长;三曰学以致用,验之临床实践;四曰审病问病,力主辨证论治;五曰灵活论治,师古而不泥古;六曰治病求本,分清标本缓急;七曰整体观察,重视脾胃升降;八曰遣方用药,贵乎精炼平正;九曰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十曰中西医结合,重在融会贯通。他重视中西医结合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中西医各有专门的治疗和防治技术,应以它之长而补己之短,中西医相互学习,相辅相成,达到共同提高的目标。

## 二、培养中医人才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省及贵阳市各个中医医院需要中医人才。袁家玠向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振兴中医的意见,意见得到采纳,成立以副省长为组长,袁家玠为副组长的贵州省振兴中医领导小组,拨出资金作为振兴中医的经费,为贵州中医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在袁家玠的主持下,多种中医书籍得以出版,恢复后的贵阳中医学院为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也开始逐年招生。袁家玠也把精力投入学院的教学与科研中,并带出5个研究生。1978年,他



被聘为学院教授，并担任院长。1984年，其改任名誉院长。工作、教学之余，他还研制成功具有良好效果、治疗冠心病的中药“冠心通络舒郁丸”，治愈不少患者，疗效显著。

### 三、著作等身

袁家玘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贵阳市、贵州省，乃至全国的劳动模范，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省人大代表，连续当选为政协贵州省第四、五、六届副主席。他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和贵州分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贵州分会名誉会长。他一生从事中医药研究、教学和临床，著作等身。他主编《贵州民间药草》、《医林拔萃》、《伤寒论讲义》（全国教材）、《中医学基础》、《中医内科学》、《中国名医名方》、《中医名方录》等著作；撰写《心病辨证论治的体会》《冠心病治疗经验》《治疗中风的点滴体会》《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体会》《学习〈伤寒论〉的一些体会》《矜肺的中医治疗》等论文；参与审定《内经阐释》、《伤寒论症状鉴别纲要》、《实用中医内科学》（参加全国专家组审定）、《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任编写顾问）等中医药书籍和教材。

1991年5月，袁家玘病逝于贵阳，享年78岁。

## 有色冶金物理化学家徐采栋

徐采栋（1919—2016），冶金物理化学家、有色冶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委。

1919年3月27日，徐采栋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父亲徐衍芬。1925年，徐采栋6岁入私塾。1930年，父亲考到南昌工作，徐采栋跟随父母来到南昌，在名校百花洲小学插班五年级，两年完成高小修业。毕业后，他的父亲调到九江，他也到九江同文教会中学读初中，后升高中部。教会学校是以浓厚的英语氛围为优势的，这为徐采栋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但教会学校数理化学科师资薄弱，1937年夏末秋初，通过考试，徐采栋转学至南昌二中读高二。中学时代的徐采栋表现出对数理化学科的强烈兴趣。

1939年，高中毕业的徐采栋满怀科技救国的宏图大志，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唐山交通大学工学院矿冶系。当时唐山交大的校长就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学校也辗转迁至地处黔中的贵州平越县（现福泉市）办学，这是他与贵州结缘之始。

唐山交通大学虽历经流亡辗转，但崇文重教的历史积淀、强大的师资力量、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没有变。矿冶系的教材大多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英文原版，教授都是用流利的英语讲课。学校还创造条件让学生到当地或邻省的矿山和工厂去实习，赋予了交大学子把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执行力和善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百折不挠的坚守精神。



徐采栋

1943年，徐采栋大学毕业，便去了玉门油矿矿冶研究所。当时中国95%的原油产量都来自玉门油田，国难当头，玉门油田正是一个矿冶专业毕业生的用武之地。从平越到祁连山下的玉门关，行程2000公里，辗转39天。在玉门油矿矿冶研究所，徐采栋每天都要去油井采油样，做工作记录，根据记录的数据调节采油机深度和压力，使采油量和采油速度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防止井喷发生。1945年，徐采栋被调到国民政府经济部重庆矿冶研究所冶金研究室担任技佐，从事矿产研究。日本投降后，徐采栋又被调去北平接收日本向中国交出的一个矿冶研究机构。

1946年，27岁的徐采栋在全国选拔留学人员的考试中金榜题名，被批准

为第二届全国公费赴法留学生，进入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工业工程学院深造。1946年9月，徐采栋从上海出发，漂洋过海40天，到达法国格勒诺布尔。此后的1946年到1949年间，徐采栋潜心在格勒诺布尔高等工业工程学院学习。1949年，30岁的徐采栋获得法国国家矿冶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徐采栋没有一丝犹豫，回到了因长年战争创伤、内忧外患却又充满生机的祖国。

徐采栋大学时期在贵州生活过四年，抬头见山，他就仿佛看到了无尽的待发掘的宝藏。1950年2月，徐采栋被聘为贵州大学工学院矿冶系教授，教授物理、化学，学校又专门为他量身定制开设了一门全国首创的铝冶金学课程。省里为了加快铝工业的发展，安排徐采栋和他的两个刚毕业的学生组建了全省第一个冶金研究机构——工农厅工矿冶炼室，要求他们尽快把贵州的铝矿石转变为有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铝金属。徐采栋既是教授又是科研人员，凭着简陋的设备，他和他的学生开始了开发贵州矿山的科学试验。1951年，他们炼出了贵州自古以来用自己的铝矿石冶炼的第一块铝锭，不久后，贵州开始筹建铝矿开采和铝矿石冶炼一体化的大型铝厂，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贵州省铝镁设计院。

1951年，徐采栋调到省工业厅冶炼组工作。不久，取代原有“土高炉”炼铁的小高炉炼铁试验成功。1953年，徐采栋被任命为贵州省工业厅总工程师，并当选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徐采栋主持的高炉炼汞试验获得成功。1954年，徐采栋主持的利用贵州锑矿制取锑氧粉和精锑试验成功，水套鼓风机烟化富集铅锌烟尘的试验成功。1956年，他主持采用电解法制取高锰酸钾的试验获得了成功，遵义很快建厂投产，成为国内生产高锰酸钾的主要基地。这些成功试验大多是省内或国内的首创，徐采栋用科技的力量，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徐采栋获得了贵州省一等劳动模范称号。

贵州是中国富碳矿的集中产区，贵州磷矿以品位高、质量优著称，特别是开阳、息烽等地的磷矿，是不经选矿即可用于高浓度磷肥生产的为数不多的优质磷矿。1957年，徐采栋主持的竖炉制取钙镁磷肥试验又取得成功。从1958



年起，国内各地陆续建厂，利用徐采栋的竖炉法生产钙镁磷肥。这种方法至今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钙镁磷肥生产的主要方法。

1958年3月初，党中央批准贵州新建贵州工学院。3月19日，徐采栋被任命为贵州工学院筹建委员会副主任。

徐采栋等跋山涉水，踏勘了30多个点，把校址选在当时城郊地势开阔、环境清幽、依山傍水的蔡家关，并确定了贵州工学院首届招生的地质、采矿、冶金、机电、化工、土建6个系13个专业。同年9月，贵州省人民委员会任命秦天真为贵州工学院院长，蒋汇泽、徐采栋为副院长，贵州工学院正式成立开学。

有徐采栋的地方就有科研。1959年3月，贵州工学院上报并列入省科研的项目共计56项。从1957年到1982年，徐采栋撰写出版了《土法制钙镁磷肥》《小高炉炼铁学》《铝氧的土法生产》《碱性热风化铁炉与碱性转炉炼钢》《炼汞学》《汞冶金的理论基础》《锌冶金物理化学》（与林蓉、汪大成合著）等著作，其中，《炼汞学》《汞冶金的理论基础》成为高校冶金专业教材。他发表论文13篇，系统地构建和充实了冶金物理化学理论，填补了有色金属冶金理论的多项空白，推动了冶金学的发展。

1959年4月，他当选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78年，徐采栋的汞冶金、锌冶金理论作为创新成果荣获国家科技大会奖。1980年，徐采栋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贵州本土推荐获选的首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至1982年，徐采栋担任贵州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冶金化学研究室主任。1983年，徐采栋当选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3年起，徐采栋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

1997年，贵州省委决定由徐采栋出任新贵州大学校长。78岁的徐采栋回答：“不要说是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小学校长，只要贵州需要我当，我也当！”2011年，92岁的徐采栋发表上万字的论文《熵论》，次年发表《能论》，字里行间涌动着徐采栋对科学由衷的难以抑制的热爱与激情。

徐采栋一直从事有色冶金物理化学的研究，在湿法冶金酸性浸出液除铁理

论方面，有较精辟的见解；在有色金属硫化矿焙烧产物的稳定区间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热力学处理方法；从事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金过程理论研究，在碳氮化钛形成及其对冶炼的影响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独到见解，把化工冶金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徐采栋对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对贵州冶金工业从粗放到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年4月，徐采栋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 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数学家秦元勋

秦元勋（1923—2008），贵阳人。数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功臣。

秦元勋自幼聪敏、记忆力非凡，在贵阳达德学校从幼儿园上到初中，被当地人誉为“神童”。1937年夏，秦元勋考上了上海中学高中部，还未入学，日



秦元勋（前排中）

军已入侵上海。秦元勋只得凭上海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进入贵阳高中学习。连续两个学期，他都因考试总分第一而免交学费。此时，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由南京迁来贵阳，他立即报考，被录取为高二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在实验中学的一个学期，他不仅成绩优良，连高三的全部课程也自学完毕。当时是战争时期，大学招生允许同等学力、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也可报考。因此，1939年秦元勋报考了由杭州迁来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数学系第一名的成绩被浙大数学系录取。数学系的苏步青老师很喜欢秦元勋，称他为“小孩儿”。1999年，秦元勋寄赠一张“全家福”给恩师苏步青先生，上书“小孩儿，小孩儿的小孩儿，小孩儿的小孩儿的小孩儿拜望苏老祖爷爷”。师生情谊，溢于言表。进入浙大数学系，秦元勋得到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等老一辈学者的教授。他的几何学、理论物理基础很好，又选修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1943年，秦元勋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得到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赏识和高度评价。《竺可桢日记》1943年7月11日记载：“秦为贵阳人，本届毕业生中平均成绩最高之一，其人体格亦佳，而性温厚，洵难得之人材也。”

浙大毕业后，经竺可桢推荐，1944年底，秦元勋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深造。他“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了”。在哈佛期间，他主攻拓扑学、理论物理，还利用暑假进修其他科目，仅五个学期就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校史上也是创纪录的。

秦元勋于1948年回到贵阳，与毕业于贵州大学外文系的冯敏结婚。不久，二人一起去香港参加工作，与曹日昌一道筹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主要任务是团结过港和在港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负责输送去解放区的同志和家属的后勤工作。在香港，秦元勋联系上了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1949年7月，秦元勋到达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协大会筹备工作并出席会议，并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0年，秦元勋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全国科技委员会委员。他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以一颗火热的心致力于新中国的科学普及工作。



当海内外知名人士汇集北京时，党中央动员在北京的人员到边疆去工作，秦元勋毅然响应，脱下时装，与妻子穿上第二野战军的灰棉军装，背上简单行装，进入重庆，过上了每月只有两元零用钱的全供给制生活。1950年至1953年，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研室副主任、科学普及处处长，参加接管、整顿西南大行政区的文教事业，制定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建立西南科学普及机构和协会，建立西南文化馆系统。1953年秋，西南大区撤销，他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处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数学会主席（1955—1964）、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1956—1979）。20世纪50年代，秦元勋是当时年轻有为的专家之一。他在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运动稳定性、近似解析、机器推导公式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处于开创性地位。其中极限环的研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他是大系统稳定性分解理论的开创者，解决了钱学森提出的燃烧不稳定性的时滞控制参数的界限。

1954年至1959年，因国家发展新学科的需要，受华罗庚所长之邀，秦元勋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从事常微分方程的研究，担负起在中国组织和发展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及运动稳定性理论队伍的任务。30多年的工作，他引进和开发了“实定性理论”和“运动稳定性理论”两个分支，并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定性理论”和“近似解析解”两个新分支。

1960年，秦元勋被调离中国科学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在819部队理论部任副主任及研究员，由纯粹数学理论研究转向结合国防任务的应用研究。秦元勋与参战人员一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中，解决了核装置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数学问题。他开辟了计算物理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发表论文90余篇。他提出非定态中子输运方程的“人为次临界”解法，对原子弹威力计算的误差做出整体估计，给出原子弹威力计算的粗估公式等，写成了百万字的《核装置分析》一书，同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核威力计算工作者队伍。1963年4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

见从事原子弹研制的专家们，陪同接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被接见的有邓稼先、黄祖洽、秦元勋、李德元、孙和生、郑绍唐、徐锡申、苏肇冰等人。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升起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震撼了全世界！1978年，由于核武器计算、常微分方程系统研究、犁面设计等科研工作成绩突出，秦元勋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做出重大贡献者”的个人奖状和集体奖状。

1966年是氢弹原理试验年，秦元勋被任命为专门负责抓数学、计算、计算机的副主任，他提出并参与研制的计算机及时地支持了中国氢弹研制。他还提出了“天然差分”概念，解决邻域选取问题，有助于克服二维流体力学计算中遇到的困难；对加强型装置做出粗估公式；对氢弹威力计算的误差做出整体估计；等等。1967年，秦元勋亲临第一颗氢弹试验现场，亲眼看到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的符合。他以《596及639任务的威力计算》为题，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重大成果奖。1982年，国家科委授予《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秦元勋是荣誉证书上9名列名代表者之一。1987年，秦元勋去美国讲学，旅居美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2008年9月，秦元勋因病在美国逝世，享年85岁。

秦元勋还担任中国核学会计算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秦元勋一共培养了23名硕士生，6名博士生，9名进修教师，这些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动手写了不少科普图书，如《几何学通论》《空间与时间》《从算术到常微分方程》《无限的数学》等。



##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宝贵的贵阳历史文化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成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质量进行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历史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贵阳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承担《贵士名贤》的编撰任务，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其他负责人任副组长的《贵士名贤》编撰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编研处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实施。

编撰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研讨会，商讨入选人物标准，邀请相关专家和对贵阳历史人物有研究的同仁共同磋商，听取意见和建议，经过反复论证、调整，

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合理的人选人物名单。

《贵士名贤》入选人物 87 人，上限至明朝初建，下限至近代，特殊情况适当下延至现代。由于受篇幅的制约，入选人物只是历史长河中，对贵阳有重大影响或重大贡献的部分代表性人物。

在人物资料的收集上，采取广征博采，宁多勿漏的方法。撰写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等，参阅相关方面的文章和各类报刊，尽可能使资料丰富。同时，注重资料的鉴别和考证，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使人物基本要素有据可考，真切无疑，以勾勒人物的概貌，真实反映其业绩，尽可能将人物写得丰满实在，以期通过贵阳历史人物所展现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为贵阳贵安强省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贵士名贤》的编撰，得到相关领导、专家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编撰《贵士名贤》，虽已尽力，但由于时间和人力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